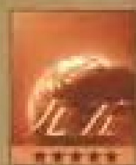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
教育部重点教材

汉语方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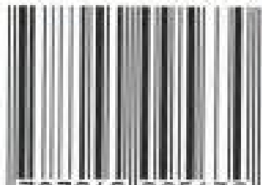
李如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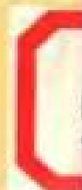
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 7-04-009563-7



9 787040 095630 >
定价 11.50 元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

汉语方言学

李如龙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教材，全书分11章，论述了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方言分区、语音系统和字音系统、词汇差异和词汇系统、语法差异，尤其注重了汉语方言的语音比较研究、词汇比较研究、语法的描写和比较研究、汉语方言与历史文化研究和汉语方言学的应用研究。本书立足于主要方言的比较，兼顾历时与共时、内部与外部，以理论总结为主，也注意了应用，反映了20世纪汉语方言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水平。本书适于高校汉语言专业本科生选修课和研究生专业课教学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学/李如龙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

ISBN 7－04－009563－7

Ⅰ.汉… Ⅱ.李… Ⅲ.汉语方言－高等学校－教材 Ⅳ.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810号

汉语方言学

李如龙 著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1年4月第1版
印　　张	13	印　　次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 000	定　　价	11.5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大约是1980年左右，我在台湾大学开“汉语方言学”的课，主要的参考书是袁家骅的《汉语方言概要》，那时候我就想应该有一本《汉语方言学》的专著作为课本，这本书应该有什么内容呢？既用了“学”字，自然要有严密的系统，对于汉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应该作一个概况性的说明，在若干相关问题上也应该有深入的讨论。但是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写这样一本书呢？这个人既要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对各大方言有深入的了解，否则言之无物；又要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及对汉语史的认识，否则只能谈共时的现象，无法跟传统的学问接轨。这个人还要在做研究的同时，有兴趣写通论性的书。等了二十年，当李如龙先生把他的《汉语方言学》的书稿给我看的时候，我发现终于让我等到这样的一个人写这样的一本书！他要我写一篇序，这是给我莫大的荣誉，当然欣然同意。

汉语方言的差异古已有之，对于方言的研究可以推到汉代扬雄的《方言》。Paul Serruys和严耕望分别研究《方言》的结果都是把汉代的方言分为六区。从汉代的六个区如何演变为今天各大方言的面貌，是很有意思但也不容易掌握的课题。这就牵涉到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本书第二章)，也要讨论语音、词汇、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在本书中都有专节加以详尽的检讨。

我们常说在讨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时候，以往都以印欧语为主，很少引用汉语的材料。王士元先生在《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见于《汉语研究在海外》）一文中，提出他的希望：“中国语言学将不只是吸收普通语言学的成果，还要为普通语言学作出重要的贡献，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有助于确定普通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李先生的这本书无疑是向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在“方言系统的整合”的一节里，他提到“叠置式、覆盖式、混合式、蜕变式”的不同，在“汉语方言的异读系统”中，他讨论了“文白异读、别义异读、音变异读”。在“方言与历史文化关系的微观研究”中，他指出“风物词语、习俗词语、观念词语”的特征。这都是汉语方言特殊的地方，值得研究普通语言学的人参考。我希望在这本书问世后能有人翻译成英文，使这本书的结论能够让讨论语言学理论的人引用。

近年来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可以说是提升了一个层次，对一般性的理论有新的探讨和发明，先后出版了几本重要的理论性著作。对于研究方言学的人而言，现在李如龙先生这一本《汉语方言学》正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我以后如果再有机缘开方言学的课，就不愁没有课本可用了。

丁邦新谨序

2000年10月11日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　何毓玲
封面设计　刘晓翔
责任绘图　朱　静
版式设计　史新薇
责任校对　马桂兰
责任印制　陈伟光



目　录

序 …………………………………………… 丁邦新 1
第一章　绪论 …………………………………… 1
一、方言　方言差异　方言特征 ……………… 1
二、方言与共同语 ………………………………… 5
三、汉语方言学的对象、内容和任务 ………… 7
四、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方法 …………………… 9
五、汉语方言学的回顾和前瞻 ……………… 12
思考与练习 ……………………………………… 15
参考文献 ………………………………………… 15
第二章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 16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 ………………………… 16
二、汉语方言的扩展和流播 ………………… 22
三、汉语方言的演变和发展 ………………… 25
思考与练习 ……………………………………… 28
参考文献 ………………………………………… 28
第三章　汉语方言的分区 …………………… 29
一、汉语方言的分区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 ……………………………… 29
二、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 ……………… 30
三、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 ……………… 35
四、汉语方言分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40
思考与练习 ……………………………………… 44
参考文献 ………………………………………… 45
第四章　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和字音系统 …… 46
一、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 …………………… 46
二、汉语方言的字音系统 …………………… 59
思考与练习 ……………………………………… 68
参考文献 ………………………………………… 68
第五章　汉语方言语音比较研究 …………… 70
一、汉语方言语音的共时比较 ……………… 70
二、汉语方言语音的类型分析 ……………… 75
三、汉语方言语音的历时比较 ……………… 81
四、汉语方言语音规律的探究 ……………… 86
思考与练习 ……………………………………… 93
参考文献 ………………………………………… 93
第六章　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和词汇系统 …… 95
一、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 95
二、汉语方言的词汇系统 …………………… 102
思考与练习 ……………………………………… 107
参考文献 ………………………………………… 107
第七章　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 108
一、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 ……………… 108
二、汉语方言词汇的历时比较 ……………… 115
思考与练习 ……………………………………… 128
参考文献 ………………………………………… 128
第八章　汉语方言语法差异 ………………… 130
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 ……………… 130
二、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不容小看 ………… 131
三、汉语方言语法差异的主要表现 ………… 132
思考与练习 ……………………………………… 141
参考文献 ………………………………………… 141
第九章　汉语方言语法的描写和比较研究 …… 142
一、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不容易 …………… 142
二、方言语法的描写 ………………………… 143
三、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 …………………… 147
思考与练习 ……………………………………… 154
参考文献 ………………………………………… 154
第十章　汉语方言与历史文化研究 ………… 155
一、方言研究的新视角 ……………………… 155
二、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宏观研究 …… 156
三、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微观研究 …… 161
四、方言的文化类型分析 …………………… 169
五、双语双方言现象 ………………………… 174

思考与练习 …………………………………… 178
参考文献 ……………………………………… 178
第十一章　汉语方言学的应用研究 ……… 181
一、方言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 ………………… 181
二、为方言地区的语言教育服务 ……………… 182
三、为制定语文规划和语文政策服务 ……… 187
四、为其他相关学科服务 …………………… 190
思考与练习 …………………………………… 197
参考文献 ……………………………………… 197
后记 ………………………………………………… 199

第一章 绪　论

一、方言　方言差异　方言特征

1. 方言

方言，俗称地方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通行在一定地域的话。本书所讨论的汉语方言就是这个含义。

方言有大有小，所谓“一定的地域”，可以大到十几个省，小到一个村子。只要有明显的方言差异存在，民间就会有“××地方的××话”的通俗说法，学者经过研究则可以根据语言事实为一定的地域给定一个适当的名称，例如俗称“广东话”、“白话”，指的是通行于两广、港澳和许多海外华人中的话，学术界称为“粤方言”、“粤语”；广州话和香港话之间虽然十分接近，总是还有某些差异，因此还有“广府话”、“广州话”和“香港粤语”的不同说法。

50年代的方言学论著曾有“方言、次方言、土语、次土语”的说法，这大概是翻译欧洲人的说法（Dialect，Sub－Dialect，Patois，Sub－Patois）而来的。方言的分布范围有大小，使用的人口有多少，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时势力有强有弱；然而就其素质而言，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对于本地人来说，方言总是最习惯、最自然的交际工具。曾经有学者提过，“次方言”、“次土语”的说法容易造成“次等”、“低劣”的联想，并不是恰当名称。如果要区分地盘大小，多大的地域通行的才算方言，多小的算土语，也很难划定。可见，这些术语不但容易引起误解，而且难以定义。不论是“官话”、“白话”、“平话”、广州话、东莞话、香港新界的围头话，还是统称“方言”为好。

方言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但是对于共同语来说，却有雅俗之别。地方话又称“土话”，不论是旧时说的“乡谈”、“俚语”，或者至今还在通行的“平话”、“白话”，都是着眼于它的“俗”。方言流通于“市井乡曲”，“平白如话”，一般只有口语形式，可以口头言谈而往往难以书写成文，因为那些通俗易懂而生动活泼的方言词语常常是“土得无字可写”的。在古代的传统中，方言土语和官方文牍、典雅诗文是判然有别的两种不同的文化层次。许多地方戏里，生、旦、净、末的唱腔和道白都是典雅的书面语，而男女丑角的插科打诨则是地道的方言口语，一雅一俗，相映成趣。

方言是自足的体系，在一定的地域，它可以是无往而不利的惟一交际工具。就这一点说，方言也就是语言。但是作为科学术语，语言通常指的是民族语言。现代的民族语言总是包含着民族共同语以及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方言。就这一点说，语言大于方言，是方言的“上位”概念。方言是民族语言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所谓“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

汉民族的语言，应该包含着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和各种现代汉语方言。现代汉语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有些教“现代汉语”课、研究“现代汉语”的人所理解的“现代汉语”是不包括汉语的方言的，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误解。朱德熙先生说：“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往往只研究普通话，不但不关心历史，把方言研究也看成隔行。画地为牢，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不管对本人说，还是对学术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语言地理类型学·序》，1985）。

大概就是从“变体”（Variant）这一点引申开去，现代西方语言学所理解的方言（Dialect），包括着地域方言（Regional Dialect）和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所谓“社会方言”就是同一种语言或方言在不同人群中的各种变体，例如因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的不同而造成语言的变异，这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

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虽说都是语言的“变体”，但是变异的形式不同，二者的性质也是有别的。第一，地域方言对当地来说是全民通用的语言；而社会方言只是在部分人之中使用，不具备“全民性”。第二，地域方言是一个自足的、完整的语言系统；而社会方言往往只有语音的、词汇的或某些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语言的基础成分是多种社会方言共有的。第三，地域方言的语言系统是经过长期的演变和整合而形成的，虽然经常有变异，但在一定的时代总有个稳定的系统；而社会方言则往往不甚稳定，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参杂着语用的需要。第四，研究地域方言和研究社会方言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社会语言学研究同一语言集团之中不同群体的人在使用语言上的各种变异，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把这种“语言的社会变异”定名为“社会方言”看来并不合适，因为“方言”早已用来指称“语言的地域变体”了。

把这两种变体归成一类，不论是把社会语言学并入方言学或是说方言学归入社会语言学都是不合适的。有的西方学者还把方言学列入语言地理学。方言总是分布在一定的地域，研究方言要考察地理因素，有时也用地理学方法（如绘制方言地图），但是方言也可作为完整的语言体系来研究，可以研究它的历史。因此把方言学局限于语言地理学也是不合适的。

2. 方言差异

所以有不同的方言，是因为存在着方言差异。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人们最容易感觉到的是语音和词汇。平时所说的“土腔”、“腔调”、“腔口”、“口腔”指的就是方音的差异。粤西各县断断续续地分布着客家话，那里的人称为“𠊎话”，又把较纯的客话称为“大𠊎”，杂有其他口音的称为“小𠊎”，这是因为客家话把“我”说成 ŋai，读音特别。在赣南、湘南，人们称客家话为“么个”（麻介）话，这是着眼于客家话把常用词——“什么”说成“么个”。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汉语方言之间差异最大的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语法上差异不大。随着调查研究的深人，这种说法引起了许多人的怀疑。如果说，汉语方言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语音，这是有道理的，人们接触中首先感觉到的是语音。至于词汇，如果是书面语，现代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用语，确实差异不大，但日常生活用语则差异甚大。至于语法，从近几年的研究材料看，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的差异也是不小的，特别是最常用的虚词，各方言分歧很大。闽南话相当于普通话的介词“在”的有“垫、带、伫、嘞”等说法，“坐在地上”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个代替“在”，也可以“嘞”为必要成分叠用其中的两个、三个或四个：“伫嘞、带嘞、垫嘞、带伫嘞、垫伫嘞、垫带嘞、垫带伫嘞”（李如龙、张双庆主编，2000）。随着研究的深人，在方言语法方面一定还会发现更多奇特的现象。

方言差异总是不平衡的。从方言之间的差异说，有的方言区内部差异大，和共同语及其他方言的差异也大，如闽语、浙南吴语、湘南——粤北土话；有的方言内部差异不太大，对于共同语或其他方言则十分特别，如粤语、客家话；有的方言与共同语及别方言相比特点不是太多，内部却不甚一致，例如湘语和赣语。从语音、词汇、语法的差异说，客赣方言之间语音差异小，词汇差异大；赣语内部词汇差异较小，语音差异较大。就闽语的语音说，声母差别不大，各地大约都是十四五个；而韵母则差异大，从 30 多个到 80 多个不等。就赣语的语音说，韵母和声调的差异小，声母的差异大。

汉语方言的差异不论大小，彼此之间都存在着对应关系，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官话方言大多没有入声，但是古入声字有的派入多调，有的归入一两个调，彼此之间也有一定对应。"交关"是吴、闽、粤都有的方言词，所用语素和构词法相同，但意义则殊异：在吴语是副词"非常"的意思；在闽语，福州话意为办事周至，厦门话意为"光顾、交易"；在粤语则表示"厉害"。这是同中有异。在雷州半岛的闽粤语和海南岛的闽南话都有 ʔb、ʔd 两种紧喉音，其周边方言则读为 b、d 或 p、t 或 m、n。就其音类说，都来自古帮、並、非、奉母和端、定、知、澄等母。"睡觉"，吴、粤语说"睏觉"（粤语因语音变读写为"瞓觉"），闽语说"睏眠"、"睏"，其根词"睏"都是从"困"（苦闷切，"悴也"）引申而来的，这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也好，异中有同也好，都说明汉语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传承、演变而来的，它们是同一民族语言的不同分支。

方言差异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亲属语言之间的语言差异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那么方言差异和亲属语言的差异有没有不同呢？

一般来说，方言差异要比亲属语言的差异小，因为不同方言之间虽有变异，总是要受到共同语的制约，而且方言之间也总有交往，总会相互影响。而亲属语言之间则往往各有自己的演变模式和发展规律。然而，有的方言差异也可以很大，而亲属语言之间也可以差异较小，这里还牵涉到语言的认同问题。汉语方言之间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几亿人口都在同一个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氛围中生活，几千年的历史是诸多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文化的认同感都很强。加上数千年统一的文字用同样的形式沟通着纷繁的方言，因此，各方言区的人都从未怀疑过自己所说的话是汉语的一支。迁徙、流寓于海外的华人，不论走得多远，离开多久，都想要为自己所操的浓重的乡音寻本求源。相反的，某些有亲属关系的民族语言由于分手不久或接触频繁，彼此差异并不太大，但是由于分治为不同的国家，营造着不同的民族文化或使用着不同的文字，人们并没有把这些语言认同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我国的壮语和布依语，欧洲的许多小语种都属于这种情形。可见，辨别方言或亲属语言，区分方言差异和亲属语言的差异并不能以"差异"的大小为标准，而必须和历史文化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对此，赵元任先生曾有过很生动的说法："平常说方言，是同一族的语言，在地理上渐变出来的分支；分到什么样程度算是不同的语言，这个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来分，与语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比方从前罗马国用的拉丁语，到后来渐渐变，变到现在，有许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们觉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几个都是不同的语言了……可是要把这些语言，……比较看起来么，有些地方也类似中国的几种方言，有如北京话跟上海话、跟广东话、跟福建话差别这么多，……在中国，全

国方言都是同源的语言的分支，虽然有时候分歧很利害，我们认为是一个语言的不同的方言”（赵元任，1980，100～101 页）。

3. 方言特征

方言差异是不同方言之间在语言结构和语言材料上的差异，了解方言、调查方言必须从这里入手。方言特征是拿方言差异作比较，为各种方言归纳出来的特点，这是研究方言的直接目标，也是研究方言的理论升华。可见，研究方言特征是方言学的重要内容。

方言是独立而完整的结构体系，所谓方言特征必须从整体的结构上去考察，必须是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多种特点（特征丛）的有机结合，各种特点之间应该是有主有次，有表有里，还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个别字音、个别音值和音类的特点，个别方言词、方言语法现象，只是方言差异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方言特征。正如要说明一个人的特征，不能停留于个别外貌特征、性格特点或思想、行为的列举，而必须是有关这个人的自然特征、品格特征和社会属性的多方面的分析和概括。

既然方言分布的地域有大有小，研究方言特征就必须区分不同的区域和层次，不同的方言点、方言片、方言区都应该有各自的方言特征。不仅如此，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片之间也会有共同的方言特征。方言是民族语的地域变体，考察方言特征首先必须弄清各种特征的地域分布。方言地理学就是研究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建立起来的学科。这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一再证明，方言特征的分布总是纷繁交错的，很难找到两条完全相同的“同言线”。可见，研究方言特征只能从实际情况出发，展现各种范围里的方言特征的分布。

弄清方言特征的分布之后，重要的是研究为什么会在那些地域形成那些特征，为方言特征的分布作出合理的解释。

在一定地域形成某些共同的方言特征，原因不外有三：或是类型相同，或是源流相关，或是地域相连。类型相同指的是同样的结构关系。例如 n 和 l，发音部位相同、都是舌尖顶着前硬颚；发音方法有同有异：都是响音，但气流的通道不同。因而在演变过程中可分可混，如果混同，或读 n、或读 l 或两可（自由变读），无非三种可能的类型。又如前面走/走前面、先走/走先、快走/走快，动词语序或前或后；双音词介绍/绍介、勉强/强勉、牵连/连牵、地道/道地，也有两种可能的组合等等。方言间的异同是结构方式和演变方向的类型选择的结果。源流相关指的是不同的方言由于历史上曾经同居一处或携手同行，因而形成了共同的特征。例如客赣两种方言，语音上有许多共同点：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晓匣合口混入非组，山蟹一二等元音有别，梗摄白读音韵腹为 a、宕江韵腹为 ɔ 等等。这显然是因为客家先民曾在现今的赣语地区停留过，客赣方言曾是源流相关的。浙南吴语的厝（房子）、箸（筷子）、卵（蛋）、配（下饭菜）、驮（拿）、埔（尘土扬）、滥（湿）等和闽东闽语的说法相同，也是因为古吴语曾是闽语的源流之一。由于地域相连，方言在共处交往之中常会发生相互的渗透，例如长江流域从成都、武汉、长沙到南昌、扬州、苏州都有 iŋ→in　əŋ→ən 的变化，这是跨几个方言区的相互渗透而趋同的结果。广东境内的客家话和闽南话都管煤油叫“火水”，大衣说“褛”，雨伞说“遮”，衬衣说“恤衫”，显然都是受粤语影响的结果。

类型特征未必是连片的，也可以和地域特征相重叠。纵向的源流特征往往是连片的，这是辗转移民的结果；如果远途迁徙，也可以不连片。由于方言的播散也可能异地相同，横向的渗

透特征则总是地片相连的，而且常常发生在不同方言区的交界地带。

研究方言特征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只有摸透各方言的特征才能为方言分区提供可靠的依据。目前关于汉语方言的分区还有一些分歧意见，原因就是对各区方言的特征研究得不够，尤其是不同方言的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研究得更少。其次，研究因源流相关而形成的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方言的渊源关系和亲疏关系，也可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第三，研究渗透关系形成的方言特征则可以考察方言间的互动关系，探索其中的具体规律。第四，关于方言特征的研究成果还应该应用于各个不同地区的语言教育中去。历来的语言教育由于未能针对方言母语的特点而进行相应的训练，因而事倍功半，这是不争的事实。此外，方言特征的分布及其解说对于研究地方史、民族史、文化史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启发。

二、方言与共同语

1. 共同语的产生和发展

远古时代的语言状况我们是无法具体了解的了。近代人类学家有些关于原始状态的部落社会的报道，都说那里的语言十分复杂，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方言。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推测：远古的部落社会里只有部落方言，而没有共同语。

不论是部落方言或最早的共同语，都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增强，社会群体逐渐扩大，产生了部落联盟，有了阶级的分化，出现了国家。大约就在这时，逐渐形成了共同语。

对于没有文字和典籍的语言来说，只能拿现存的语言作比较，构拟出古时候的“共同语”。正如梅耶（A. Meillet）所说的，“比较方法只能得出相近的系统……，而不能得出一种真正的语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梅耶，1957，14 页）。“构拟只能给我们一个不完备的，而且毫无疑问是极不完备的关于共同语的概念”（同上 12 页）。在汉语的历史上，由于早有文字的记载和丰富的典籍，我们对古代汉语的共同语可以有很具体明确的认识。汉语历史上最早的共同语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如果没有最简单的共同语，就不能设想“合纵”、“连横”的说客们如何在霸主和国君们之间周旋，就不能设想如何整理出《诗经》和《论语》。秦代统一六国文字又进一步推动了共同语的发展。到了东汉的扬雄作《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则说明了当时的“绝代语”“通语”已经有明确的界线和崇高的威信了。

殷周的近千年间，中华民族的活动中心是在河南一带，秦和西汉定都西安，东汉又迁往洛阳。先秦的“雅言”和东汉的“通语”看来都是以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当时称为“中国”，国之中也）的方言为基础的。陆法言《切韵》序评论了不正的方音包括“吴楚、燕赵、秦陇、梁益”，没有受到批评的中原音，这应该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标准音，也就是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所说的“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洛下”的百姓口音和迁往“金陵”的贵族口音）

先秦的经典、两汉的小学和隋唐的韵书，体现着汉民族共同语的文字、词汇、语音各方面的规范，标志着这一共同语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用这种书面共同语写成的浩如渊海的

典籍，创造了人类古代文化中少见的高峰。

物极必反，这套书面共同语拥有的典籍太多了，表达手段太丰富了，由于官方的倡导，权威也很盛，在方言口语悬殊的现实中发挥了重大的沟通、统一的作用，于是“文言”“诗韵”“六书”成了一整套坚固的体系。汉代的读经尊儒，唐代和清代的古文运动又不断加强了这种坚硬度。然而人民群众的口语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封建时代能运用书面语的只是少数人，“言文分家”愈来愈甚。分布最广的官话方言从六朝以后就逐渐与书面语分道扬镳了，经过隋唐五代的数百年变迁，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口语的共同语，这就是宋元白话和《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代汉语。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也就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

汉语共同语的产生和发展跟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历史演进是因果相应的。这个事实本身也充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特征。汉语共同语形成得早、发展水平高，这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生动体现。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方言分歧，这也正需要有高度发展的书面共同语来作为沟通的凭借。从文言到白话的交替，则是从小农耕作和贵族文化走向商品生产和市民文化的需要所决定的。汉语共同语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的缩影。

2. 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

汉语共同语和汉语方言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就其对立的一面说，共同语和方言首先表现在差异上。其差异不但有结构上的差异，而且有功能上的差异。结构上的差异就是上文所说的“方言差异”。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它们在功能上的差异。共同语的使用是全方位的，有口语、也有书面语，有日常生活语言、也有艺术加工语言、科学技术语言；方言则通常只用于日常口语，有些方言也有戏曲说唱加工过的艺术语言。这是方言与共同语功能差异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就方言与共同语的相互关系说，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以及方言对共同语的冲击，始终是一种深刻的对立。这种对立还将长期继续下去。不过，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越是到了现代社会就越强烈。这是因为共同语通行领域和地域都是方言无法比拟的，而且还可以透过各种媒体从书面语和口语两方面与方言争夺使用范围，借助行政、政治的作用限制和取代方言的流通领域。诚然，方言对共同语也会有某种冲击作用，有些强势方言对共同语的推行还有一定的抵制和竞争。在书面语中，方言成分对共同语的规范也难免造成障碍和冲击，这也是方言与共同语相对立的表现。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这种反弹作用是越来越有限了，既不能持久，也无法普遍。

方言和共同语统一的一面在汉语有很突出的表现。袁家骅先生说：“民族共同语……具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内部一致，……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统一的形式，也叫做文学语言，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内容是无限丰富的，对方言有无比的约束力，自身在一定意义上是超方言的。”（1983）这主要是指的书面语方面。事实上，在中国还长期存在着双轨制和双语制。所谓双轨制是书面语用统一的共同语，口头语则用分歧的方言。不论是先秦的经典、唐宋的古文或宋元的白话，汉语的书面语都是相当统一、影响十分深广的。但各地的口语则历来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使是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官话方言之间，按纯口语写下来的文字，一看便能辨认出不同的小区方言：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所谓双语制就是在方言地区同时兼通普通话，这一点，连最保守的粤语地区也正在悄悄地跟上来，应该说已是全国各方言区的共有现象了。总的看来，双轨制是古来如此，先前强烈、于今淡化，书面语和口头语逐

渐靠近了。双语制则是早期微弱，晚近强化，近代以来渐呈扩展趋势。

方言和共同语在语言结构上也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方言成分进入共同语，造成规范系统的失衡，共同语的成分进入方言，造成方言的“不纯”，这是对立的表现；共同语吸收了某些方言成分，方言则更多地接受共同语的影响，这种相互的转化则是统一的表现。

以上所说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是一般的关系，整体的关系。对于具体个别的方言来说，不同的方言与共同语关系则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考察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不能停留于一般的共性的考察，更重要的是进行比较，考察不同方言与共同语的不同关系。有的方言与共同语差异大，受共同语影响小，乃至对共同语的普及采取一定的抵制；有的方言大量接收共同语的成分，放弃方言特殊成分，迅速向共同语集中；有的方言采取双语制与共同语并用共存。不同的方言与共同语的各种不同关系主要是社会历史、地理位置、经济文化交往等因素决定的。研究这方面的差异，必须联系语言外部的社会因素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三、汉语方言学的对象、内容和任务

1.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对象

在西方，早期也有些方言的研究，到了19世纪，方言的研究主要是使用了绘制方言地图的方法。方言学又称方言地理学，主要是记录方言特殊成分，对个别方言做局部或全面的描写，调查方言特征的分布，绘制方言地图，说明造成方言差异的原因和过程。换言之，并没有把方言作为完整的结构系统来研究（廖秋忠，1988）。在中国，对汉语方言的研究一开始就进行整体的调查研究。

按照中国的经验，汉语方言学是研究汉语方言的学科，一切汉语方言现象都应该在它的视野之内，都应该进行研究。现实存在的方言之中，个体的方言是研究对象，但相关的方言的群体也可以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把所有的现代方言作为一个整体，则是综合研究的对象。历史上存在过的方言也同样可作个体、群体和整体的研究。诚然，现实的方言是完整的存在，可以确切地研究它的结构系统，这是方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历史上的存在过的方言，则只能从传世的文献史料中钩沉其片断，或通过后来承传的方言的比较勾勒其轮廓，往往很难恢复完整的面貌，但是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现今方言的来龙去脉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以往多着重于单点的描写，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群体的比较研究和整体的综合研究。任何个体的特征中都包含着个体独有的个性和群体共有的共性，只有经过群体的比较和整体的综合，我们对个体的了解才能区分个性与共性，才能臻于系统和周密。

2. 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内容

汉语方言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应该有自身的静态描写，有动态的考察；有内部结构系统的研究，也有外部关系的研究；有理论的概括，也有应用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应该是十分广泛的。

方言的静态描写可以是单点的报告，关于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系统及特点的说明，也可以是成片的包括若干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的比较分析，从而说明某一方言区片的特

征。方言的动态考察可以是现行的老辈和新辈之间差异的描写，也可以拿历史上的典籍、文献的方言材料与现今方言的实际情况作比较分析，说明古今方言的流变。静态描写和动态考察都是方言结构系统的研究，也就是罗列方言事实。为什么会形成这些方言差异，不同的方言走过了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演变过程中如何受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的影响，这就必须联系方言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材料来进行研究，寻求对方言事实的解释。如果说罗列事实是纯方言学的研究的话，解释事实则还必须有外部语言学的材料作佐证。静态描写和动态考察，罗列事实和解释事实都是辩证的关系，应该二者兼顾，交替进行，相互为用，共进共荣的。罗列语言事实是研究工作的起点，是认识对象的开始，理解事实、解释事实是从语言事实的内在联系所引出来的结论，是研究工作的目标，也是检验所罗列的事实是否客观、科学的尺寸。关于这一点，李荣先生说过："也许有人说，研究方言首先是分析记录当前的事实，方言之间的比较跟古今比较都是次要的。'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分析记录某个方言，不能受其他方言或古音的干扰。……要是一种分析方法，既反映本方言的实际，又照顾到其他方言和历史，那就更好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李荣，1983）关于文白异读，他曾经有过精彩的说法："概括地说，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其他方言区的文白异读，白话音是本地的，文言音往往是外来的。并且比较接近北京音。"（李荣，1982，115页）如果不经过纵横两面的比较，怎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理解了语言事实的根本，对日后的调查研究自是受益无穷的。

关于方言的理论研究，也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就方言学自身，可以研究汉语方言的分类和分区，说明各方言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研究诸方言结构系统的历史层次，说明各方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联系其他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也有许多生动的内容。例如，与现代汉语共同语相联系，可研究整个现代汉语的共时特征；与古代汉语相联系可以论证古今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与相关的汉藏系语言作比较研究，则可以考察方言在发展过程中反映的古代民族语言的"底层"以及汉语方言与相关民族语言的关系。关于从方言材料引出理论，王士元先生曾经多次强调过。他说："数十年来进行实际调查研究的成果，使我们拥有了非常丰富的语言材料。……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些丰富的资料该做些什么，怎样解释它们，以及怎样从这些资料中提炼出最重要的内部联系，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很少。在中国语言学的这个范围里，有一种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就是资料丰富而理论贫乏。……我们必须超越仅仅作为语言学理论消极的吸收者的角色，面应成为主动的贡献者。"（王士元，1995）

至于方言学的应用研究，也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针对方言区的人学习标准语的难题，经过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针对方言差异寻求最佳的教材、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又如调查方言地区人们的语言生活现状，经过比较为制定适用于各个地区的语言政策提供根据和论证。此外，透过方言的研究还可以解读各地的方言地名，解释各地的不同习俗，为研究地域文化和地方史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证（李如龙，1994）。

3. 汉语方言学的任务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品种多样，差异纷繁。汉语方言学自身所必须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把现实的方言的分类、分区弄清楚。不但要弄清各区方言的特征，也要弄清各区方言之间的种种关系：源流关系、渗透关系、类型关系。方言的现状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要弄清方言的现状，

还必须了解方言的历史。不但要考察方言特征所反映的历史层次，为方言的历史寻求内证，而且要了解方言地区的移民史和行政区划属辖的变迁，乃至了解该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整体来看，汉语方言学还必须研究汉语方言从产生、发展到萎缩消亡的各个过程，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方言和共同语的不同关系以及方言与共同语的互动变化，总结其中的规律。此外，透过历史和现状的变异的研究，方言学还应该窥测方言发展的前景，这项研究对制定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除了本学科的任务之外，汉语方言学还应该为许多相关的语言学科和人文学科服务。

现代汉语是由共同语和众多方言组成的。现代汉语的研究应该把现代方言包含在内。根据共同语总结出来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跟依据共同语和诸多方言所总结的规律，肯定有很大的差异。不仅如此，共同语不是还经常吸收着各种方言成分吗？有方言学者的参与，现代汉语的研究一定能得到重大的进展。

汉语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大多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方言中保存了大量古汉语的成分。“礼失而求诸野”，这些方言材料对于古代汉语、汉语史的研究是极端重要的。无论是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都必须把古代文献的材料和现实的方言材料结合起来相互论证，才能得到接近科学的认识。此外，方言地区还流行着不少俗字、简字，对于研究汉字的发展史，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但应该有古代或现代的共同语的参与，也应该有古代和现代的方言的参与。在汉藏系语言的比较中，汉语方言和共同语的材料具有同等的价值。有些方言与其他汉藏系语言的交流比共同语还多。对于汉语语言学——以汉语为例研究语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来说也是一样，历代共同语和历代的方言材料具有同等的价值。无视汉语方言的事实，汉语语言学的理论总是偏颇的。

在语言学以外，汉语方言的研究还可以为地域文化的研究、地方文艺的研究、地名的研究、地方习俗的研究提供重大的帮助。因为方言正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地方文艺的形式；绝大多数旧地名都是用方言称说的，所有的习俗都必须借助方言才能有明确的观念，才能具备可操作性，才能得到传承，这都是很明白的道理。

方言学的应用研究使方言学能够直接为社会生活服务，这也是方言学所担负的重要任务。上文已经提过，下文还将有评述，此处不再多说。

四、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方法

1．调查方法

方言研究必须从调查入手。严格地说，调查只是研究的准备，调查方法并不属于研究方法。但是调查如果没有体现研究的需要就做不好，研究者如不亲自动手作调查，也很难驾驭调查材料，因此把调查方法视为研究方法的初步也无不可。汉语方言学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方言语料的实地调查，这是一个优良传统。数十年的方言调查积累了不少切合汉语实际的工作经验。例如使用国际音标记音，用五度标调法标记调值，用四声分阴阳的方法标记调类，用广韵音系（《方言调查字表》）作为单字记音的调查表格。关于词汇、语法调查也先后设计了一些表格。

使用这些表格和工作方法已经调查了大量可用的资料。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现有的调查表格和记音方法已经有些不适应要求了。

关于字音调查表格，现行的《方言调查字表》为了照顾古音的音韵地位收了不少生僻字。这些字在许多方言中问不出音，勉强问出来也往往不可靠。对一般性调查来说，这就徒然增加了许多负担。然而对任何一种方言，该字表又是不够用的，总有些方言特有的音节调查不到，单是根据这个字表记音，整理出来的同音字表都会有遗漏的音节。看来，作为语音基础调查用的字表有 1500～2000 个字就够了。与此相关的是需要一个基本词汇调查表，多收口语中的日常生活常用的单音词，既可补充字表之不足，把方言音节收齐，也可了解方言基本词汇的面貌。现有的词汇和语法例句调查表格大多不切实用。在总结已有的词汇、语法调查经验的基础上，可以组织不同方言母语的专家合作，重编一套字音、连读音变和词汇、语法例句调查表。各个调查表的条目应该有多有少，采取"梯级"结构，以便适用于不同的深广度及时间条件的调查。看来这已经是一项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的工作了。

关于记音的方法，也有必要进一步做到规格化。目前，宽严的掌握分寸不一，附加符号各异，各种音变（轻声、变调、小称、儿化、子化等）的标音体例不同。关于方言词的汉字标写更是五花八门，或同音字、或训读字、或俗字、或生僻的本字，各取所好。以致同样的词写为不同的字，或不同的词写为同样的字，给外行人或初学者带来许多不便。这种状态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2. 描写方法

已有的方言描写方法也是语音描写方法比较成熟。记完字音，整理出声、韵、调系统和同音字表，以及文白读对应条例、连读变调的规则，如有必要还整理方音和古音及标准音的对应关系，这一整套方法已为一般的方言调查工作者所掌握。描写的质量高低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能否排除训读和误读，一是前后有没有矛盾。有的调查报告把训读音误认为白读音，因而文白对应就搞错了。有的声韵调系统、同音字表与词汇记音不相符，读到后面的词汇记音材料又冒出前面语音系统中所没有的新的音类或音韵组合。还有的为双音词标音时把变调误认为本调。这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方言词汇的描写需要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词义的调查和说解往往不够细致，在罗列方言词和普通话词的对照表时就经不起推敲。问形容词应该注意问所能修饰的范围，问动词则要问与宾语的搭配。普通话的"高"在上海话就不止有"高"的说法，个子高就说"长"，在厦门话则说"悬、䏜"。二是关于词汇系统的归纳和分析，至今所见到的叙述似乎还没有具备说服力的框架。说普通话的双音词在方言说成单音，说语素次序有异，词义广狭不同，××方言外来词多，古语词多等等，其实，这些内容并非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系统特征。而且往往只有举例而没有统计数据。

方言语法的描写工作基础更差，这是由于方言语法调查还缺乏经验，在没有进行全面调查之前，只就某些特殊结构去叙述"方言语法特点"是十分危险的。有些此类特点提出来了并未经过周密的调查检验，这就难免说的不合事实。有人说，某方言的动词比普通话多样而生动，例如关于"打"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在普通话，在官话区又何尝没有多样生动的说法？有人说某方言动词后附的"生动形式"比普通话多样，其实普通话花样也很多，只是他不

知道罢了。

在方言的描写中，最值得强调的是应该密切注意方言语音、词汇、语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些方言音节只见于有音无字的词里（包括叹词、拟声词、某些单音动词），在词汇未作全面调查之前要叙述声韵调组合关系，统计音节数，非出差错不可。大多数虚词、虚成分都是从实词变来的，有些语法成分在语句组合中发生了各种音变，以至和虚化前的音相去甚远，本源难辨，在未经深入研究之前，轻易地认定某个虚成分是什么字也十分危险。还有，这些富于音变的成分所变出来的音，或者是一般连读音变、小称音变、双音词合音变出来的音，在方言语音系统中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地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有许多人把这些音都排除在音系之外，恐怕是不妥的。

3．比较方法

方言是由各方面的方言差异整合而成的。所谓方言差异包含着该方言与共同语与其他方言以及与古代汉语的差异。研究方言，归根结底，一要研究方言差异，二要研究这些方言差异是如何整合成系统的，整合起来的方言差异也就是方言特征。研究方言差异也好，方言特征也好，都必须从比较入手。因此，可以说，方言的研究必自比较始。单点的方言描写实际上也要贯串比较的方法。从介绍声韵调系统开始，就少不了与共同语比较、与古音比较。区域方言的研究——群体的研究，方言研究综论——整体的研究就更是离不开比较了。

方言比较研究可以分为横向的共时比较和纵向的历时比较两类。共时的比较是现代方言与共同语比，甲方言与乙方言比。经过比较可以了解各方言的特征，各方言与共同语的相同点与相异点，以及各方言之间或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还可以看到不同的方言之间及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历时的比较是现代方言与历代的汉语共同语或方言作比较。经过比较可以了解各种方言差异所反映的历史层次，从而了解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属于历时的比较还有方言与其他民族语言的比较，经过这方面的比较则可以了解方言地区早期原住民的语言“底层”和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

4．考证方法

为了研究方言特点，尤其是了解方言与古代语言的关系，方言研究少不了要查证古代文献。就语言学文献说，历代的韵书、字书、词书以及记录古代口语（包括共同语和方言）的典籍都是常常需要查证的。方言里一些古时的读音残留、古词的残留，不经过查证就不能为之确认和断代。方言地区的说唱戏曲脚本或民间故事、山歌保留着前代方言的材料，研究方言也应该十分关注这些典籍。此外，正史、野史、民间谱牒也是方言研究工作者常常需要查阅的，因为摸清方言地区历来人口的迁徙，对于理解方言现象的历史层次有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5．其他方法

为了展示方言差异的地理分布，绘制方言地图（包括语言条目图和方言分布图）是个重要的方法。方言地图和一般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地图有同有异，但是都要借助某些制作地图的方法，这是可以肯定的。

为了调查老派和新派之间的方言的变异，不同社会成员使用方言的情况或某些地区存在的

双语使用的状况，为了了解共同语普及的状况，方言研究有时也必须采用社会学方法，在一定社区、家庭之中进行社会调查。这类调查少不了问卷和访谈，也少不了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计算统计。

在现代科学中，计量研究的方法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性。方言学的研究也正在引进数量统计的方法。通过语音相同点和词汇相同点的统计来论证方言间的亲疏关系，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关于方言形成的历史年代也有人在试行统计研究。关于方言的分区也许也可以从定量统计找到一些突破口。现代科学越来越重视多种方法的综合应用，汉语方言学也应该走这条路。

五、汉语方言学的回顾和前瞻

1. 古代时期

中国的古代语言学一开始就有汉语方言学的研究。最早的成就是汉代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是一本最早的汉语方言比较词汇集。后来晋代的郭璞为它作注，又补充了许多晋代的方言词。它们开辟了重视实际语言调查研究的传统，保留了二千年前的许多汉语方言词汇，被誉为“悬之日月而不刊”的著作。可惜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语文学热衷于追寻前代语言的本源，崇尚官方认定的正音，把方言现象作为“匡谬正俗”的对象，方言的调查研究很快就衰竭下来了。

2. 近代时期

入清以后，在中国小学再度大繁荣的时候，方言学又得到了发展。其主流成就有两方面：方言词汇的搜集和方言韵书的编纂。李实（1598～1676）的《蜀语》、杭世骏（1696～1793）的《续方言》、吴文英的《吴下方言考》（1783）、翟灏（1736～1788）的《通俗编》、钱大昕（1728～1804）的《恒言录》、范寅的《越谚》（1882）、杨恭恒的《客话本字》（1905）、章炳麟（1869～1936）的《新方言》等是一些重要的方言词汇搜集的成果。方言韵书方面重要的有官话的《五方元音》（1654，河北）、《十五音》（山东）、《十三韵》（徐州）、《字音汇集》（武汉）、赣语的《辨音摘要》（江西靖口）、粤语的《千字同音》（广州）、闽语的《戚林八音》（福州）、《建州八音》（建瓯）、《汇音妙悟》（泉州）、《雅俗通十五音》（漳州）、《八音定诀》（厦门）和《潮汕十五音》（潮州）等等。这些词汇和韵书的出现与近代城市的兴起、地域文化的发展有关。也说明当时的方言口语和共同语的书面语（文言）和口语（官话）已经形成三角鼎立之势。这些典籍为我们保存了三四百年前的南方方言的语音面貌和词汇特征，是我们研究方言史和汉语史的重要依据。

近代的汉语方言研究还有一个旁支，就是清末以来西方传教士所编的教会罗马字的方言词典和读物。规模较大、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有潮州（1847，曼谷出版）、福州（1870，福州出版）、广州（1877，香港出版）、厦门（1899，伦敦出版）、梅县客家（1901，香港出版）、上海（1911，上海出版）等方言词典。这些词典大多是根据已有的方言韵书的音系用罗马字拼音，方言词目同时注有汉字，用西文注释词义，是提供传教士学习汉语方言用的。虽然也杂有不少书面语词，词义说解未必准确，但还是保存了不少当年的方言口语用词，为我们了解这些南方

方言一二百年间的语音、词汇的变化提供了参照物。为了传教的需要，各地教会根据这些词典的拼音方案还编印过 17 种方言版的圣经，有人统计过总印数达 10 多万部。此外还有许多知识性、故事性的方言罗马字读物。这些读物虽然内容没什么可取，编写动机也是不光彩的，但也保留一些可供参考的方言语料。

3．现代时期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的半个世纪是汉语方言研究的现代时期。1924 年北京大学成立方言调查会，拉开了方言调查的序幕。接着，赵元任调查了数十点吴语。1928 年之后，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先后组织了两广、陕南、徽州、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省的方言调查。之后，《现代吴语的研究》、《两粤音说》、《闽音研究》、《厦门音系》、《钟祥方言记》、《临川音系》、《中山方言》、《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粤音韵汇》等单刊陆续发表，这些著作为单点的方言描写提供了不同的样板、把方言的调查和描写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参与这次调查、编写单刊的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是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他们为汉语方言学的奠基，筚路蓝缕，功不可没。而经过方言的调查研究，也促成了他们学术上的发展，吸收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的精粹，与西方现代语音学、语言学结合起来，建立了现代的科学的汉语方言学。

1955 年丁声树、李荣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做了《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会议建议两年内完成方言的初步普查。1956 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语言研究所合作培训了普查人员，一些高校也开方言课训练学生参加工作。《方言调查字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等相继出版，为普查做了业务准备。两年多时间，全国普查了 1000 多个县的方言，后来有 20 个省区编写了方言概况。在普查积累了材料、训练了人员的基础上，一代新人又发表了一批单刊和专题研究论文。北京大学则编印了《汉语方言概要》教材和包含全国 20 种方言的基本材料的《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还有语言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昌黎方言志》和苏沪学者所编的《江苏省及上海市方言概况》等，可以看成本阶段的研究成果中的代表作。在港台和国外也出版了一批单刊和区域方言报告。赵元任、杨时逢整理出版了一批调查材料，董同龢、丁邦新等也发表了一批新著。总之，这 50 年间积累了大量资料，培养了庞大的队伍，不论是单点的研究或区域的研究都形成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调查、描写的方法。关于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与古音的比较也创造了不少经验，获得许多科学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研究重语音而轻词汇和语法，以至形成“汉语方言的差异主要在语音”的片面观点。即使涉及词汇、语法也只是分体的研究，而没有把语音、词汇、语法的相互关联揭示出来。整个方言研究多止于静态的描写而缺乏动态的考察，而且大多局限于纯方言的研究，对方言与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则研究得很少。

4．当代的研究

当代的汉语方言学指的是最近的 20 年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创办了《方言》杂志，相继又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历次国家社科五年规划都上了一批方言研究的课题，出了一批单刊和包括 41 部单点词典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合作绘制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含全国方言地图）。全国编出了大批的省方言志和县市方言志。地方上也出版了一批大规模的专著如《汉语

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吴语、闽语、客赣语、粤语都有大型的区域调查报告,湘语则出版了包括十几部单刊的"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到20世纪末,已出版的方言志不下千种,单刊和词典不下百部,系统描写的单点方言语法及方言语法专集十多部。总之,近20年间所发掘的材料大大超过了前50年。

更为可贵的是近20年的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有不少新的突破。方言语音的研究跳出了"字音"的框框,着重注意词语间的各种音变现象,把方言作为一个结构整体,考察语音和词汇、语法的相互联系。如关于连读变调、小称音变、变声、变韵等的研究就揭示了许多规律。在方言的比较方面也有重要的进展。通过"考本字",弄清了许多方言词与古代汉语词汇的承继和变异关系,把共同语语法研究和方言语法联系起来,许多问题(如的$_1$ 的$_2$、了$_1$ 了$_2$ 的区别)都豁然开朗了。通过不同方言的比较,对于若干主要方言间的亲疏远近关系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由于方言工作者和民族语言学家的联手合作,关于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的研究也获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开辟了一条新路。此外,在引进西方的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理论之后,关于方言的共时变异的研究,双语、双方言现象的研究,方言与历史、文化以及民俗的关系的研究,方言与地名的关系的研究,都增加了方言研究的新视角,使方言工作者扩大了视野。20年来的这些成就是因为拨乱反正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境内外方言学者的交流,因为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相互为用,使得人文学科在总体上得到新的发展。

王福堂的《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1998)认为,80年代之前的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都还处于"草创时期",最近的20年才进入"提高时期"。方言的描写全面了、深化了,方言的研究是"由现象描写趋于规律探求,由纯语言研究进而联系社会原因"。"研究工作紧张热烈,成果众多,水平也大有提高"。这一历史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5.未来的展望

有了现在的基础,汉语方言学应该有光辉的未来。为了在新的世纪登上新的台阶,今后的研究应该着力于比较研究。除了方言——普通话——古汉语的"小三角"的源流、变异的比较,还应该有现代汉语的共同语及方言——周边的民族语言——西方语言的类型的异同的"大三角"的比较。运用丰富的汉语方言的材料,认真开展这两方面的比较研究,不但可以加深对现存方言的理性认识,而且还必将使汉语方言学为汉语史的研究、为汉语语言学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使中国语言学摆脱有丰富的资料却无切实的的理论的尴尬局面,改变中国学者准备资料、西方学者总结理论的状态,使中国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占着自己应有的地位。

在比较研究、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加强应用研究。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得益于社会生活的需求和应用的研究。古代方言学是为读经、读史服务的;近代的方言学是为学话(教会罗马字)、识字(地方韵书)服务的;现代方言学是为研究音韵学和推广共同语服务的。如上所述,当代方言学的为理论建设服务已经露出端倪,而应用研究则还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儿童学话从方言母语出发到掌握共同语乃至学习外语,究竟经历过什么过程,蕴藏着什么规律,如果是出身于双语区、双方言区,又有什么不同的情况?标准语教育和外国语教育如何循着这些规律安排合理的计划?为了适应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充斥着复杂方言的广大城乡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语言规划?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政策?方言及其所体现的地域文化观念对于社会的发展及个人思想

的形成和演变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发挥着制约的作用？这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题目，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思考与练习

一、与普通话比较，你的母语方言或你所在地的方言最显著的差异是什么？试就语音、词汇和语法各方面举例说明。

二、方言和共同语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什么不同的表现？最近的半个世纪间有无变化？

三、你调查过方言、研究过方言吗？试谈谈你的调查工作经验和研究体会。

四、你读过的关于汉语方言学的论著中哪一本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启发最大？

五、经查询，整理一份有关你的母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资料和论文）的目录索引。

参考文献

朱德熙（1985）　桥本万太郎著《语言地理类型学》序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2000）　介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80）　语言问题　商务印书馆

A. 梅耶（1957）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科学出版社

袁家骅（1983）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詹伯慧（1988）　方言地理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李　荣（1982）　音韵存稿　商务印书馆

（1983）　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　《方言》第一期

王士元（1995）　语言变异和语言的关系　《汉语研究在海外》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李如龙（1994）　方言与文化的宏观研究　《暨南学报》1994 年第 4 期

王福堂（1998）　二十世纪的汉语方言学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二章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

1. 方言差异的形成

有了方言差异才有不同的方言。方言的形成首先必须有方言差异的产生和积累。就汉语的情况看，方言差异的产生和积累都必须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并非所有的方言差异都能形成新的方言区。多少差异、多长时间的积累会形成新方言，这是由时代和地域两方面的条件所决定的。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有专门的讨论。

形成方言差异、促使语言分化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原因。就汉语方言的情况而论，形成方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的分离，人民的迁徙，地理的阻隔，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接触。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当社会生活分离，统一的纽带就可能一分为二。在闽语中有个典型的因社会分离而形成的莆仙方言。这种方言到20世纪70年代还只是通行于莆田、仙游两个县，使用人口不到300万。它虽然处于闽东、闽南两大方言区的窄缝之中，却能够保存着鲜明的方言特色和强烈的方言意识。宋代时这里的方言还属于闽南方言区。宋代莆仙诗人和闽南诗人的用韵习惯还是相当一致的。当时移民到潮汕平原和海南岛的闽人主要是莆仙人，至今那里的闽南话性质依然十分明显。直至近现代，据真人真事编的《陈三五娘》的戏文在莆仙和泉州一样是家喻户晓的。自宋代建立兴化军之后，这两个县靠着木兰溪、萩芦溪的大流量及南安陂、木兰陂的水利设施和沿海的渔场、盐场，在莆仙平原上创造了惊人的文明。两宋300年间，这里出过990名进士，5位状元，6位宰相。其中的蔡襄、刘克庄、郑樵都是名宦兼诗人、学者。由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口迅速增长并大量外徙。就是靠着这种背景，兴化话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又因离省城近，接受了福州话的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方言。论人口，并未有异族和外人迁入的记载；论地理，距泉州只有100公里，并无高山阻隔。形成这种新方言的主要原因显然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分离（李如龙，1997，65页，247页）。

人口迁徙是形成新方言的常见原因。几乎所有汉语方言的形成和人口的流动都有关系。但是，移民要造成新方言往往要有3个条件。第一，要有一定批量的移民而不是零星的少数；第二，要集中聚居而不是插空散居；第三，移民的语言与原住地的语言或方言形成抗衡之势。零星的散居使移民方言融入原有方言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客家人自赣北下赣南、入闽西，后来又进入粤东和粤北，都是批量聚居的，而且都能够团结奋斗、艰苦创业，这些地区便成了后来的“纯客区”，连原住民也跟他们说起客家话。相反的，有不少客家零星移民穿插到闽中、闽南、闽东各地（陈支平，1997，72页），由于当地闽语是强势方言，大家都改口学该地已有的方

言，这些移民所说的客家话并未在那里立足。

方言是和一定地域相联系的。地理的阻隔在古代社会里往往成为方言分化的条件。谈到晋语的形成时，侯精一说："太行山和黄河及山西西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作为天然屏障阻止了中原官话的北上和北京官话的西进。"又说，"不同的地貌特征很大程度影响晋语区的分片"，"中部的太原盆地为晋语并州片，忻州盆地为五台片，大同盆地为大同—包头片，吕梁高原为吕梁片。"（侯精一，1999，44 页）晋语的封闭性地理环境在北方官话中确是少见的，应该说是形成晋语的重要因素。但是地理环境总是受社会历史所制约的。晋语之所以成为方言区，不论是作为一个大区或官话中的一区，还因为它有久远的历史和大量的人口，历史上曾是人口输出地。相对而言，大西南及东北的一些山比太行山、中条山还高，但因为汉人迁入得迟（明清之后），所以形成的方言差异并不大，尤其是东北地区的方言反而离北京话更近。

民族融合在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是大量存在的事实。从先秦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后来的突厥、契丹、羌、僰等等，历代的正史都有许多民族抗争的记载，而且都是用儒家的"尊王攘夷"的思想写成的。事实上，数十个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争战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和平相处。许多民族各领风骚，都为建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在生活共处，血统相融的过程中，语言上也有许多相互吸收乃至相互混合的表现。关于南方方言和壮侗语、苗瑶语的关系，北方汉语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桥本万太郎在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1985）一书中已经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近数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引起了方言学者和民族语言学者的注意，并有许多研究成果了。

语言的接触包括方言与共同语及方言间的接触，以及不同民族语言间的接触，由于语言接触和渗透而产生新的方言差异乃至形成新区方言，这也是常见的现象。江苏和浙江的吴语原本应该是比较相近的。近代以来，由于受下江官话的影响，苏南的吴语已经丢失了许多吴语的固有特征，例如全浊声母在多数吴语区仍读浊音，在金坛、丹阳一带已经有清化的了（钱乃荣，1992）。厦门话是一百多年前形成的，由于早期来此定居的主要是操泉州、漳州两种口音的人，厦门话就由泉漳两种土腔混合而成。同样道理，通行台湾全岛的闽南话也是这种混合体（李如龙，1993）。又如皖南方言早期应是苏南和浙西吴语的延伸，后来，南片受赣语影响变为徽语，北片沿江地带则有不少地方蜕变为江淮官话（郑张尚芳，1986）。因为吸收外来语而造成方言差异也见于许多方言。粤语因为香港的华洋杂处，不断有英语词汇借入，成了粤语方言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闽南话因早期闽南人到南洋谋生，归侨学会并夹用了不少马来语，这些借词也成了闽南方言的特点（李如龙，1992）。

形成方言差异的各种原因往往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分裂了，迫使人民长途迁徙，到了新地，又因山川阻隔，无复返顾，并与其他民族的原住民杂居相处。类似这样四种因素兼有而形成的方言就有不少。有的方言则可能有一两个主要原因。例如明代的将领沐英平定大西南之后，江淮湖广一带汉人大量移居云、贵、川，于是形成了西南官话，这主要是移民的原因。闽南人移居海南岛因受土著"临高人"说的临高话（原属壮侗语）的影响而产生不少方言变异，成为闽语中的二级区。这是移民加上民族融合、语言接触的因素所使然，当然也有孤悬海岛的地理因素。

2. 方言系统的整合

方言并非许多方言差异的杂乱堆积，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把这些方言差异整合而成的新的语言系统。只有经过方言差异的累积，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整合，方言才能最后形成。

造成方言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各方面因素还有各自的复杂性。例如社会生活的分离，在漫长的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往往有反复。在移民史上，北方人南下，东部人西迁，腹地人外徙，何止一次了事！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也可能是多方面参与、多次发生的。因此，长时间积累的方言差异也是多来源、多层次的。所谓整合，就是这些不同来源、不同历史层次的语言特征，经过长时间的混杂竞争而逐渐按照某种原则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常见的方言差异整合方式有如下几种。

叠置式　就是把不同时代形成的方言特征兼收并蓄，组织在一个多层的结构系统中。徐通锵在研究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后提出了“系统的叠置”的概念（徐通锵，1991，350 页）。他说：“一个方言向另一个方言吸收结构要素，产生文读形式，这就在系统中出现了叠置。”笔者 1963 年在分析厦门话的文白异读时就分析了厦门话的文白读各有属于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层次（李如龙，1963）。看来，不但语音上有文白读的叠置，方言词和语法手段也有“固有的”和“外来的”两种因素的共存和竞争。开头一定是方言固有成分常用、外来成分备用，后来可能出现不同的消长和相互转化：固有成分退居备用，外来成分上升为常用的。常用和非常用也是一种兼收并蓄，也是一种叠置——共时的不同频度的叠置。

覆盖式　一种方言如果历史上有几次移民带来的语言特点，由于移民的批量不等，势力大小不同，经过竞争，其中有一次占了优势，成为该方言的主体，把前此传来的语言特点替换了，这便是覆盖式的整合。现代粤语应该就是覆盖式整合的典型。在粤语地区，历史上有过三次大规模的移民。首先是秦汉时期北方号称 50 万戍卒主要从西江入粤；其次是初唐曲江人张九龄凿通大庾岭打开赣南通道后，北人由北江入粤；其后是两宋之交北人经由南雄珠玑巷散居珠江三角洲。从现状看，应是第三次移民潮占了上风。至少在语音系统上把前两次移民带来的语音特征覆盖了，所以造成“广韵”和“广东语之韵”如此相近的局面。至今为止，珠江三角洲的粤人还念念不忘祖上来自“南雄珠玑巷”的传说，便是最好的注脚。第三次移民不但批量大，居住地集中，而且因为自然条件优越，新入住的移民经济实力强，文化水平高，在那河网地区，他们发展了先进的稻作农业和商品经济，对于南粤各地辐射了重大的影响。珠江三角洲也便成了粤语的中心区（司徒尚纪，1993）。

混合式　构成一种方言的多种来源的语言特点中，如果经过竞争之后，没有明显的主次强弱，就会形成混合式的方言。这种方言或者由于在形成的历史上接受了多种方言区的人群，容纳了多种方言的特征；或者几个方言区的人聚居在方言交界处，没有出现主体力量，也会造成混合型方言。前者是纵向的合成，典型的例子是海南岛南端的迈话。这种话包含着粤语、客语和闽语的特征，很难分出主次（黄谷甘、李如龙，1987）。后者是横向的合成，典型的例子是福建大田的“后路话”。这个四县交界处的十个乡镇的小方言是明清之后闽南、闽中、闽北的移民杂居的地区，处于三种闽语交界地带。从现状看，这种闽语兼有闽南、闽中、闽北的各种特征，是方言交界处形成的混合型方言。详细情况可参阅拙作《福建大田广平话：一种混合型方言》（李如龙，1996，267 页）。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交界处也有因语言接触带来重大的方

言差异而形成的混合型方言。如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五屯话”，据陈乃雄研究，是明代万历年间南京迁来的汉人说的江淮官话受了当地藏语重大影响而形成的混合语（陈乃雄，1982，1988）。

蜕变式　某些边界方言由于受邻近方言的影响，长期的大面积的渗透，最终也可能发生蜕变。在闽语的西北缘有两处这种方言蜕变的事例。一是宋代的邵武军所辖4个县（邵武、光泽、建宁、泰宁），由于宋元之后江西东北部说赣方言的人陆续迁入，在总人口中甚至占了优势，当地原来的闽北话虽然还保留着一些重要的语音特征和特征词，但从整体来看，不论是语音系统或词汇面貌，都已经是赣语的特征占优势了。例如语音方面全浊声母读送气清音，非组和晓匣合口混为f、v，山、蟹一二等读音有别，清从母读为t'，透定母读为h，咸深摄入声字塞音韵尾转为相应的鼻音韵尾，有小称变调，有广泛的儿尾词和轻声词等等。词汇方面也有好多常用词已经不是闽方言。例如：今朝、明朝、禾（稻子）、秆（稻草）、人（不说侬）、嘴（不说喙）、供猪（不说饲猪）、话事（不说讲话）、脱（不说褪）、畏（不说惊）、盘（不说桌）等等。尤其是建宁和光泽，蜕变为赣语更为明显（参见李如龙等，1991，219页）。另一处是浦城县的北部大半个县则从闽语蜕变为吴语，仅就声母特点说，古全浊声母全读不送气清音，非敷奉读为f，舌上不读舌头，端母读为l，匣母不读k、k'，来母不读s等等，就可以说明问题。发生这种蜕变是由于浙江西南部衢州、处州吴人近代以来大量移民，致使吴语成分在浦城话里占了上风（详细情形可参阅李如龙，1991及郑张尚芳，1985）。

3. 汉语方言形成的上古期与中古期有不同特点

关于上古时期的方言，我们现在只能有个模糊的认识。《礼记·王制》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说文解字》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些说法应是可信的。袁家骅先生根据先秦典籍的零星记载认为当时的“语言或方言也必然是复杂的”（袁家骅，1983，17页）。据林语堂研究，扬雄《方言》所罗列，在黄河流域有明显差别的方言就有7个区：西秦、秦晋、赵魏之西北、韩郑周、陈郑之东郊、魏卫宋、齐鲁。除“西秦”之外，这些区可能都是汉语方言的差异。此外，《方言》里常常提到的还有北方的“燕代”，东边的“东齐与徐”，南方的“梁西楚、荆楚、南楚、吴扬越”等6个区。按考古学所研究，外围的这6个区主要恐怕还是汉族以外的民族语言，但其中可能有的已经开始和汉族融合了（林语堂，1989）。只从《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所记载的零星材料以及《说苑》里记载的“越人歌”，就可以断定：当时的楚语和吴语的主要成分应该是“百越语”而不是汉语。《荀子·儒效篇》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荣辱篇》又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可见，吴越和楚是和“中原雅言”差别最大的方言。看来，当时造成方言差异的主要因素是民族的融合和多少与血缘关系相关的部落（诸侯国）的划分。所谓的“雅言”主要还是指的书面语，实际口语应是方言分歧十分严重的。孔夫子办学时设有“言语”课，究竟是训练学生们具备周游列国所需的、通晓各国方言的能力，还是培养演说和辩论的语言表达能力？由于缺乏记载，已经无从猜测了。

从先秦到隋唐隔着800年。这是汉民族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汉语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民族的融合和扩展，汉语一方面形成了书面和口头的共同语，另一方面则分化出了众多的方言。

这 800 年中，前 400 年是两汉的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在长安和河南郡一带，史籍只有向蜀中移民的记载（扬雄《蜀都赋》："秦汉之徙，实以关东"），这一路有蜀郡、巴郡及牂牁、犍为、越嶲、益州等郡的设置。而在华中一线，则有南郡（今武汉）、长沙国、及豫章、武陵、零陵、郁林、苍梧，合浦、南海诸郡。看来善于内陆交通的西汉人，在开辟丝绸之路的同时把这东西两线都走通了。现今的两湖（洞庭、鄱阳）地区和湘、桂、粤也已经充填了不少汉人。

后四百年对于南方汉语方言的形成则有关键的作用。在汉末天下大乱之前，东汉的和平时期北人南移还是集中于中部。葛剑雄据东汉永和五年（140）的户口统计，比较了从公元 2 年到 140 年间南方诸郡人口增长率如下（葛剑雄，1993，136 页）：

零陵	桂阳	武陵	长沙	豫章	丹阳	吴郡
13.5%	8.3%	3.4%	11.6%	11.3%	3.2%	2.2%

由此可见，湘赣地区的汉化和汉语的扩充显然在东南沿海之先。

东汉末年之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头一次大分裂。这次大分裂时间长、战乱不断、灾难深重。黄河流域的人自西而东，自北而南，沿长江中下游全面推进，移民潮规模极大。汉魏之交的情况，史籍早有记载。《三国书·魏志》说"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蒋济传》），又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至西晋末年，在江南吴语区，"永嘉丧乱后渡江南下的的士族和百姓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一百万人以上"，设立侨置郡县有 20 多处(周振鹤、游汝杰，1986，95 页)。看来古楚语和古吴语的汉化，这个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是决定性因素。而在"吴头楚尾"的江西，罗香林研究的结论是："并、司、豫诸州的流人，则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边诸地"（罗香林，1975，41 页）。赣语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这次大迁徙。这个时期的福建，在闽东有冶县、侯官和后来的晋安郡（晋太康 3 年～282 年置）；在闽北有建安郡的设置（吴永安 3 年～258 年），吴国治理江东时，至少越过浦城已经开发了闽北、闽东。属于汉语成分的闽方言的第一排基石也是这个时期奠立的。

如果说"中古汉语"从隋唐算起的话，在中古之前，南方几个主要方言就已经奠定基础了。经过盛唐 200 年的稳定发展，南方方言的大体格局就已经明朗化了。到了唐末五代十国的二百年间，又有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出现汉人的自西而东的迁移。到五代十国的割据，又是一次北人南移。这次迁徙使吴、赣、湘三种方言整合成各具特色的汉语方言，福建地区则因有陈政、陈元光征闽、建置漳州及王审知据闽、建立闽国，汉人骤增，中原文化也深深扎根，闽语在这时也得以定型。唐代诗人顾况作哀闽诗，所用方言词"呼儿曰囝"，"父为郎罢"，至今还在闽语中使用着，《祖堂集》中和尚语录的许多方言语法也和现代闽语毫无二致。也是在唐五代之间，客家人从赣北进入赣南和闽西，形成了早期的客家话。

第三次分裂出现于宋末。南宋迁都临安，北方相继为金元所统治。中原汉人在这一百多年的动乱中再次渡江南下。至此，东南各省除了湘西桂南和海南岛的五指山区，多数地区都汉化了。少数民族只在部分山区里小村聚居。东南部诸方言不论是吴、赣、湘或闽、客、粤都已经定型，并且和现今的结构系统相去不远。客家进入粤东粤北也是这一时期到位的。闽语流向广东沿海和海南岛则始于此时。如上文所述，在广东，由于珠玑巷移民集中开发珠江三角洲整合成了新粤语。因为经济、文化的繁荣，这种新粤语较之粤西、桂东的老粤语更有威望，成为粤

语的主流，左右着此后粤语的发展方向。六百年来粤语更为丰富、严密了，但它的基础还是那时奠定的。

中国的移民史先是北人南下，后是东人西徙、中心区向边疆移动。大西南、大西北和东北地区的汉语都是明清时期江河之间的移民带去的官话。因为历史短、变异也少。在中原地区，由于一派平川，战争频仍，人口的流动更新十分迅速。平时的彼此交往也较为方便。中古之后又有不少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因而虽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广阔的地域和大量人口中并没有形成十分复杂的方言差异。在北方大片比较统一的方言（晋语除外）和东南部复杂多样的方言之间，自东而西横着江淮方言的长廊。它和南北两片的方言都有一定关系，也是各方面都较为容易接受的，对于后来发展而成的共同语有很大的影响。近几年来，有些学者认为明清以来逐渐在全国通行的官话就是在江淮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后来的《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等白话小说就是顺应这种社会需求用江淮官话写的。有的还提出，官话的“官”，原来指的官场，到了宋代，“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男子皆可敬称为官人，奴婢称主人为官人，妇人称丈夫为官人……普通百姓被称为看官、客官”，（李葆嘉，1999）在现代的许多南方方言里，“翁姑”可以称为“大官、老官、家官”，“顾客”可以称为“客官”；在北方则有“猪官、羊官”的说法。

这就是从中古以来汉语方言分化的大体过程。和上古时期相比，这种分化和布局主要是移民的历史所决定的。山川的阻隔，民族的融合已经不再是主要原因了，而方言间及共同语的影响，则主要是后来的事。

4. 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大多是多层次多来源的

除了那些不久前由于一次性小批量的移民而形成的、封闭于小地域的方言岛之外，应该说，现存的汉语方言的形成都是多来源、多层次的。这是方言形成的时空条件所决定的。一个方言区的形成，要产生和积累相当数量的方言差异，要经过一定方式的整合，这就需要相当的历史过程，稳定地分布在一定地域。不论这个地域多大，总是难免要与周边地区的异方言交往，有了交往便会相互渗透。即使不与外方言接触，总也少不了要与共同语接触，各种语言接触在方言的形成和整合的过程中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

就东南部的各种大方言区来说，其多源多层的形成是十分明显的。汉人最早入吴可能要上推到春秋战国时代。先秦两汉的史籍都有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及仲雍“奔荆蛮”的记载，研究百越史的学者也认为，作为百越的一支，早期的吴文化中也有周文化的成分（陈国强、蒋炳钊等，1988，8页）。汉人最早入粤则应是秦兵平定南越的时候。两汉及六朝时期的第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则牵涉到湘、赣、吴、闽诸方言。按一般看法，赣语就是客家话的前身，赣、闽、粤的客家话形成于两宋之交。这样说来，南方诸方言，长的有1500年历史，最短也有800年历史了。这么长的历史中，除了三次分裂和迁徙之外，各地的军阀混战、饥荒天灾引起的小批量的移民，绝不在少数。少数民族的迁徙和同化以及语言接触也多所发现。方言之间的接触和较量更是普遍存在。每个方言的形成都有曲折的过程，特殊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形成史。湘语分布的地区原住民是所谓的“武陵蛮”，从后来的民族说，大概属于苗瑶语族，古楚语则是它主要源流。有的学者已经研究了湘方言和《楚辞》的承继关系。吴楚之间，楚语应该汉化得早，两汉以来黄河流域南下快便，它所叠置的古代汉语成分一定是很多的。（彭逢澍，1999）。

像客家话这样从赣语中分出来历史较短又较为保守的方言，在下赣南、越闽西、入粤东粤北的过程中，也有与畲族的接触和融合，与闽语、粤语的较量，也不可能纯之又纯。连徽州方言这样区域不大的方言，其历史形成过程也是相当复杂的。徽语的前身应是西部的吴语。当地曾有过“山越”的同化过程，后来在与赣语和江淮官话的接触中也受到渗透，发生了许多变异。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绝不能用直线式、单线式的观点去考察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有些学者喜欢说某方言是某方言的前身，为各汉语方言精心地勾画“树形图”，断定其分化的年代，分出不同的“辈分”。这种说法隐含着一种错误的假设：方言的形成是单线继承的，语言的分化只有母体的遗传，没有异体的接触和交配。事实上，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活动最为广泛，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领域关系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方言之间的关系远近和人种的血缘亲疏可能有松散的联系，但绝不是一回事，语言的亲缘关系是绝对不能用 DNA 去测定的。用生物学进化论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方言的“亲缘”关系，绘制树形图，显然很不合适。任何一种方言，不论其历史长短，都是活生生的“现代人”，而任何一个现代人，都有远古的祖先直至父母亲继承下来的质料和精神，也有生长过程中在外界条件作用下的后天的各种变异。北京话一般都被认为是变化最快、变化最大的了，打开《方言调查字表》，第一页歌韵就有“他大那阿”4 个字读为 a 韵，还不正是保留了汉代的读音吗？至于歌韵的开口字读成合口，合口唇音字读为开口，则显然是后来受外路口音影响的结果。

二、汉语方言的扩展和流播

1. 方言扩展的原因

方言形成之后并不是固定在原先的地域，不再经历新的变动，相反地几乎所有的方言区域都会发生各种变化和调整。从总的趋向看，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各方言在形成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扩展。具体地考察，不同的方言的扩展还有着不同的原因。常见的扩展原因不外是民间自发移民、外出谋生和官方组织的移民或征战屯垦。

最常见的是外出谋生，造成方言的自然扩展。

方言区域的自然扩展最典型的是官话和晋语的扩展。官话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北岸。后来，主要是明清之后扩展到东北、西南和西北地区，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使用人口数亿，成为汉语最大的方言区。其中河北、山东人移居东北（俗称“下关东”）是最典型的谋生移民。东北原是满人居住地，清初满人入关后即明令限制汉人出关垦殖，直至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才废除禁垦令。这时河北、鲁西大量人口出关进入三江平原，胶东人渡海登上辽东半岛。山西人向内蒙古草原移垦也是因为人口爆满，加以天灾人祸，生态破坏，难以维持生计，于是“走西口”，从营商到定居，把晋语带到了口外。

明代“湖广填四川”之后，江西北部也是人口增长快速，分布密集的地区，赣语区的人大量西移，入住湘东长廊和鄂东南、皖西南，把赣语带到那些地方，一部分也越过武夷山到了闽西北，使那里的闽语也蜕变为赣语。

宋元以来福建东南沿海，由于偏安一角，得海山两利、人口增长很快，而耕地资源有限，数百年间形成了外出谋生的传统。最典型的是兴化人向潮州、雷州和海南岛的移民。宋代初置

兴化军时，那里的方言还和泉州话相去不远，由于修建木兰陂，大兴农业，人口增长，很快就出现了耕地不足，于是越过泉、漳二州，先是向潮汕平原移民，后又沿着海岸线过海陆丰到雷州，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至今粤琼两省操闽南话的人都还盛传着“祖上来自莆田荔枝村”的家族史。管“桌子”叫“床”可谓莆仙方言的特征词，这个方言词跳过泉、漳二州一直传遍粤琼两省的闽语区，至今犹然。可以作为上述家族史的可靠注脚（参见《福建方言》，李如龙，1997，87～90 页）。

客家先民大约是两宋之前大量定居在赣南、闽西的山区，他们自江北平原来到赣北平原，又转到闽赣山区，显然不适丘陵地的耕作，从原住民畲族那里学到了“刀耕火种”之法，在山上开荒垦田，没多久就把森林砍光了，种了两季，地就废了，于是再往人烟稀少的山区移垦。宋元之后客家人又大量移居粤东粤北，向珠江三角洲逼近。清代初年，不少客家人移居四川及湘赣边界，乾嘉之后，同先到的广府人发生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械斗，经官方调停，未能进入三角洲，部分安置到粤西高州雷州的山区。

人满为患，资源不足是移民迁徙谋生的基本原因，在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若遇上天灾人祸，则又如催化剂，使人口流动加大了批量，方言的自然扩展也扩大了规模。这类移民多数就近迁徙，逐步转移。若行之有效，则越走越远。

官方组织的征战和屯垦造成汉语方言的扩展也不为少见。

官话扩展到西南和西北主要是征战和屯垦。明代沐英镇守云、贵，江淮一带，说官话的人大量在那里屯垦。在四川则是清代初年官方组织的移民。顺治十六年清军克成都，同年据有全川，次年即“严督有司力行招徕劝垦”，其后，又有计划地抽拨兵力屯田，鼓励官吏招垦以授禄，“于是浮民客女随地占籍者，遂相属不绝于道”。从康熙初年到乾隆初年，川中人口由不足10 万增至 325 万（崔荣昌，1985）。

闽南方言向台湾扩展主要是明末清初之后。荷据时代的台湾汉人，一般估计有三四万人，而随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兵丁眷口也有三万多人，将近翻番。崇祯年间，福建大旱，巡抚熊文灿建议郑芝龙“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乾嘉之后又多 次下诏准许闽人携眷渡台，至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人口已达 200 万（连横，1983）。隔着海峡，没有官方的允许和组织，短时间之内的批量移民是很难实现的。闽语向台湾的扩展主要靠官方的组织。

诚然，有的地方的移民很难分清属于官方组织或是民间自发行为。新疆的汉人也是清代后期到民国初年的数百年间主要从陕、甘两省移居的。究其原因，戍边、经商、逃荒、避难的都有（刘俐李、周磊，1986）。

2. 方言流播的方式

方言流播的方式取决于移民在新地的定居状况。一般说来有三种情形。

一是延伸型。向方言区边界就近移民扩展造成方言区域的延伸，这种类型往往见于民间自发的长时间小批量积累的移民。冀鲁人下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江西人填湖广，过武夷人闽北，浙江人下浦城，吴语区的人人崇明，过江北或江淮官话区的人渡长江人徽州府，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就近延伸常常使方言区域形成半岛状，突破了行政区划界限或山河的阻隔。这就是方言分布和行政区域分界或山水的分界往往不能完全密合的原因。

二是穿插型。这是小批量向区外移民的常见方式。这种区外移民可以是民间自发的，也可以是官方组织的驻军或屯垦。这类移民如果能把原籍的方言保存下来，便成了大大小小的方言岛或方言群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区外移民都能够形成方言岛。要形成方言岛还需要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移民人口要有一定数量，尤其是与当地人混居的，更要占有较大的比例。人数太少，在总人口中占劣势就容易被当地方言同化。不少客家人迁居闽南地区，因为是分散的，并没有形成客方言岛。第二，移民的方言与原地方言应有较大差异，差异不大就容易一方被同化或形成混合型方言。闽、粤、客三种方言都有不少移民到东南亚各国谋生，大多是同当地原住民混居的，那里的南岛系诸语言都和汉语方言迥异，这正是使三种方言固守下来的重要原因。第三，移民必须有较强的方言意识。在这一点上客家方言是个典型，他们素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家教，走出家门同本地人说本地话，回到家里则要改口说自己的方言。加上他们往往喜欢在山区垦荒聚居，自成村落，因此容易形成方言群岛。在闽东腹地和浙南、皖南，都有这样一些小小的客方言岛，有的只是一二百人的小村落。第四，移民经济实力较强，文化较高，其方言是强势方言，就容易形成方言岛。最典型的是粤语的西渐。广府人历来擅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除了走出零丁洋，到东南亚各国乃至美洲、非洲营生，他们还沿着海岸线到广西北海，沿着西江到桂东各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原来广西的平话就是早期的粤语，因为已经发生变异，不易听懂，广府人一到，也就把广州话带去，连本地人也学广州腔。广西的许多城镇都成了平话和白话相互穿插的拉锯地带。第五，移民与当地原住居民之间是否有密切的交往，也是能否形成方言岛的原因之一。所谓交往最重要的是通婚和商业往来。人烟稀少的地方，不与原地居民通婚，只营小农经济，商业交往只有“日中为市”的赶集，这种地方就容易形成移民的方言岛。边陲驻防的军事城堡，兵士携眷同住，或退役后留地屯田，城堡中的人仗有权势，与原地居民来往不多甚或互不通婚，这种官方派出的戍士也容易形成方言岛。福建境内的几个官话方言岛，粤琼两省多处可见的“军话”都是这样形成的。形成方言岛的这些条件往往是交叉重叠、综合作用的，对每一个方言岛都必须在调查的基础上作具体分析。

三是填空型。移民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拓荒、垦殖，又是自己聚居，不论移民人数多少，不论分布地域多大，也不论是官方组织或民间自发的移民，把方言带到异地都属于这个类型。华北一带屯垦者过河西走廊入疆，江淮间移民沿长江进入云贵川，把官话（含晋语）撒向四周国土的，基本上都是填空型移民。早期闽人入粤、渡琼也是填空型的。当年韩愈被贬潮州时，那里还有鳄鱼出没为害呢！后来的潮汕话也正是纯粹的闽语。

延伸、穿插和填空是从本土方言与异地方言的关系来作的分类，三者可以作为一个平面上的相互排斥项，也可以对各种方言的异地流播作穷尽的分类。这和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关于“移民方式和方言地理分布类型”的提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不完全相同。“填空型”大体是他们说的“占据式”和“相似型”。“穿插型”包括他们说的“蛙跳型”、“孤岛式”。“延伸型”大体是他们说的“渐变型”。

三、汉语方言的演变和发展

1．方言存在的全过程都有变异和整合的交替

不但方言形成阶段有变异和整合的长过程，在整个存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变异和整合的不断交替。

语言是概念的指称，人类认识外部世界是永无止境的。心灵有了感悟，便需要新的语词来表达新的概念。无限的语义不断要冲破已有的语音、语法结构的限制，这就决定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变异。只要是存活在社会交际生活之中的方言，就必然要经常发生各种变异。

变异使固有的系统失去原来的平衡，开头总是在局部的使用中生效，只是一部分人掌握。语言既然是一种结构的系统，它就必然对这些失衡的变异进行审察。在社会生活应用中，多数人接受了这种变异，它就进人了新系统，逐渐在全社会推广。如果新的变异未被多数人接受，它也可能逐渐被扬弃。不论是接纳或放弃，都是一种新的平衡代替了旧的平衡，结束了不平衡的动荡。这个审察、接纳或扬弃的过程，也是一种整合。香港粤语为了适应高节奏的社会生活，也因为有了许多新闻媒体和方言通俗读物的推波助澜，每个时期都又多又快地造出许多新词。但是使用了一个时期之后，往往有的留下来，有的被淘汰。例如说人自负狂妄，20 世纪 60 年代曾说过“沙尘白霍”，70 年代后则说“招积”“大鼻”，近来则多说“串”（或写为“寸”）。对父母的暱称，曾用过“爸打（father）”、“妈打（mather）”，现在则用“爹地（daddy）”、“妈咪（mammy）”。有些词的音变至今还在摇摆不定之中。如依家～而家（现在）。福州话的声母类化至今还有一部分语词属于可变可不变的。例如钱票的票可 m 可 pʻ；讨死的死可 s 可 l；做节的节可 ts 可 ʒ。可见整合尚未完成。

在方言演变之中，变异是部分人的创新，整合是社会的认同。变异是个体的变化，整合是结构的调整。总之，变异是量变的积累，整合是质变的飞跃。变异是方言差异的产生、扩展或缩减，整合则是方言差异的成立或淘汰。任何方言都是在这种变异和整合的不断交替中向前发展的。

2．影响方言演变的因素

方言的演变和它所处的社会生活的几个方面的状况有关，这是制约方言演变的外部因素。

社会生活是安定繁荣或动荡衰败，对方言的演变影响很大。如上所述，动荡、战乱的时代，人口大起大落，长途迁徙频繁，因而方言变异大、分化多。安定繁荣时期，方言则多表现为整体结构相对稳定。这是明白的道理，无需论证的。

家庭生活是方言使用最纯粹最频繁的地方。家庭生活状况对方言演变的影响主要是婚娶往来的状况。特别是在多方言地区或方言交界地区，如果在方言区内通婚，方言演变慢，如果在多种方言区之间通婚，则方言的相互作用力大，变异快。

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状况也会影响方言的发展。平原地区方言区往往范围比较大，山区则多歧异的小方言，这是交往的多少决定的。交通方便的地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方言区域大、内部差异小；反之，小农经济条件下，只靠“赴墟”“赶集”交换农副产品的山村，往往

小方言多、差异大。相对而言，城镇方言变异快，乡间方言则偏于保守。李荣先生说：城市越大，来往的人越多，那儿的方言对周围的方言影响也越大。地方越小，方言越纯；地方越大，方言越杂（李荣，1985）。珠江三角洲是河网地带，交通便捷，历来农业发达、商业繁荣，其方言内部歧异小，稳定而不易变，对外影响也大。在湘语区，铁路沿线的城镇，浊音声母往往已经清化，而在偏僻的农村则保留着完整的浊音声母系统，这都是很好的例证。

经济实力强、人口多、方言意识浓的方言是强势方言，其变化比较慢，受共同语及周边方言影响也少；反之，弱势方言则受外界影响大，因而变化快。粤语区经济发达、人口多、方言意识又浓，三者齐备，在汉语各大方言中是最强势方言。客方言则是方言意识特强，因而变化较慢的典型。

在语言本身，制约方言演变大小快慢的另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人口密集的大方言区变化慢，内部差异小；反之，人口稀疏的小方言区往往受到各种冲击而变化快、分歧大。在闽语地区，闽东、闽南区域大、人口多，因而内部统一，变化慢；而闽北、闽中则区小人少，内部分歧大、变化快。北片吴语和南片吴语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

方言区域的中心地带语言变化慢，边缘地区由于方言间的相互渗透，往往变化快，各个方言区都有这种情形。

共同语普及的地方，能通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者多，方言受共同语的冲击大，因而变异也快，方言特有成分消磨得也快；在共同语不普及的地方，方言往往比较稳定、保守，变异也就小。湘赣方言区属于前者，闽粤方言区属于后者。

多语地区、双语、双方言地区比起单纯的方言区显然变得快。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因为同壮语形成双语，与“白话”“平话”以及客家等形成双方言区，因为变得快，彼此差异也大，远没有云、贵、川的西南官话那么一致。粤西地区粤语、闽语和客家话相互穿插，往往双语、多语并用，相互影响不小，那里的三种方言都不太典型。

3. 汉语方言的发展大势

明清以前，汉语方言呈分化趋势，形成了众多的方言，且各区方言之间差异大，各自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成了汉语历史上的一大特点。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大势呢？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语言状况的社会基础。

自汉代以来直到元代，中国一直以小农经营的农业为社会基础，手工业、畜牧业也只是家庭经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宗族则是社会的组织。每个人都定位在宗法关系之中，束缚在小块土地上。这种耕作制度和生活制度正是固化方言的最佳土壤。因为不论是传授生产经验或道德观念都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本乡本土的方言为传授工具的。有人说，表形表意的方块汉字构成了高度统一的书面语，超乎方言而补足了方言的不足，造成了统一的汉字和书面语与分歧的方言的互补状态。其实，这种统一只是在上层社会，在士大夫的身上有效，同劳动大众是无关的，因为他们不识字。他们从小听的是口耳相传作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种教材：谚语、儿歌、童谣、神话、传说。看的、唱的、还有作为娱乐和道德教育的主要项目是：地方戏曲、说唱、山歌。总之，他们所习闻常见的都是方言的作品。在这种环境中生长和终老的农民，一生只是同自己的方言打交道。在家族、乡社之上，还有层层的文官体系和经常出现的侯国、藩镇的割据，这些也都是滋生和固守一方土语的温床。

明清之后，城市逐渐兴起，商业流通加剧，手工业作坊扩大，开始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走南串北的人多了，能读会写的人也多了。宋元以来的官话方言逐渐形成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通行的共同语。并且出现了大批用这种口语写成的小说和戏曲（北戏及南戏）。一个共同语，一批口语加工而成的文艺作品又适应了市民阶层的需要，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各区方言还会有创新，产生适应新的社会生活需要的方言成分，但是形成新方言的可能性小了，整个社会的语言生活是缓慢地，但是却是持续地趋向于统一。原有的语言分化的趋势减弱了，逐渐地让位给统一的趋势。正因为如此，不论是北方的山东河北人下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中原人过关西；南方的湖广人下西南，闽南人登上台湾、海南两个大岛，都未曾形成新的大区方言。而沿江南岸的吴语、徽语、赣语、湘语则受到江淮官话及共同语的越来越大的影响，逐渐放弃固有的方言成分。

语言的这种整化趋势，到了现代社会里，只有逐步增强而不可能削弱回头的。其根本原因依然是社会生活的需求。试想在经济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技术现代化的浪潮之中，空间距离的意义日趋淡薄，而作为空间距离的附着物——地域方言则越来越成为人们交往和发展经济的障碍。不同方言区的人面谈尚可借助身手的比比划划，达到沟通的目的，在电话里，方音太重就无法交际了。方言的萎缩、语言的统一成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现代潮流。

就近百年间的情况看，方言的萎缩和消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双轨制，一种是蜕变式。所谓双轨制就是方言区同时普及共同语，实行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轨并用。在差异大、与普通话距离远的方言，例如南部吴语和闽、粤、客诸方言，大体上都走这条路。最典型的便是闽语区。这些方言虽然也在放弃特殊的方言成分，补充进共同语的成分，但整体格局已经固化，不可能有大的变动。人们对内仍习惯于使用方言，对外则采用共同语。另一种是蜕变式，就是方言内部的成分变得越来越靠近普通话，而方言特有成分则愈来愈少。北方的晋语、沿江的吴、赣、湘、诸方言都属于这种情况。湘语区许多人，苍蝇早已不说“饭蚊子”了。吴语区的许多人，个子高也不说“长”。有些南昌人连“清汤”也改口说“馄饨”了。再往前走一步，再过若干年，这些方言也许可以和官话区里的小区方言放在同一条线上。

为了制定合适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我们必须进行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现状及其发展趋向的调查。

面对着这种发展趋势，有的人感到惋惜，以为地域文化中的所有富有历史蕴涵的珍品行将失传，怎能置老传统于不顾，任其颓败下去呢？于是有人提倡保存方言，主张在小学里教授母语，攻击推广共同语是摧残地域文化。其实，地域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向现代化发展。那些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珍品是绝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的。至于淘汰某些陈旧的东西，充实一些新鲜的成分，这是任何时代共有的规律。地域方言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历史。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方言将逐渐走向萎缩，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着力地去扶植它、颂扬它，也是无济于事的。然而方言的完全消亡还不是近期的事。即使不作为现实生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作为历史的遗产，它也是必定会永恒存在的。我们现在不还在为许多前代的方言作钩沉、作研究吗？

思考与练习

一、查查前人研究结论并用史料核实，说明你所熟悉的方言形成于什么年代，其中包含了多少不同的历史层次。

二、为什么说汉语方言的形成大多是多来源、多层次的？这和中国历史的特点有什么关系？

三、在现代社会里，方言的演变速度和发展前途有什么新的动向？

参考文献

李如龙（1997） 福建方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陈支平（1997） 客家源流新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

侯精一（1999） 现代晋语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桥本万太郎（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钱乃荣（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1993） 闽台方言与闽台文化 《同源同根，源远流长》 海峡文艺出版社

郑张尚芳（1986） 皖南方言的分区（稿） 《方言》第1期

李如龙（1992） 闽南方言和印尼语的相互借词 《中国语文研究》（香港中文大学）

徐通锵（1991） 历史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1963） 厦门话的文白异读 《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司徒尚纪（1993） 广东文化地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黄谷甘、李如龙（1987） 海南岛的迈话 《中国语文》第4期

李如龙（1996） 方言与音韵论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陈乃雄(1982) 五屯话初探 《民族语文》第1期

(1988) 五屯话音系 《民族语文》第3期

李如龙、陈章太 （1991） 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李如龙（1991） 浦城县内的方言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郑张尚芳（1985） 浦城方言的南北区分 《方言》第1期

袁家骅等（1983）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林语堂（1989） 前汉方音区域考 《语言学论丛》 上海书店

葛剑雄等（1993） 简明中国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周振鹤、游汝杰（1986） 方言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香林（1975） 客家研究导论 台湾古亭书屋

李葆嘉（1999） 江苏方言文化论 《江苏方言文化史论》 南京师大出版社

陈国强、蒋炳钊等（1988） 百越民族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彭逢澍（1999） 湘方言考释 湖南师大出版社

崔荣昌（1985） 四川方言的形成 《方言》第1期

连 横（1983） 台湾通史 商务印书馆

刘俐李、周磊（1986） 新疆汉语方言的分区（稿） 《方言》第3期

李 荣（1985） 官话方言的分区 《方言》第1期

第三章　汉语方言的分区

一、汉语方言的分区是汉语方言学的重要课题

大多数汉语方言学者都十分重视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但是对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可能认识不一。应该说，研究汉语方言的分区对于汉语方言学来说，既是研究的起点，也是研究的终点，是检验研究水平的标尺。方言是方言差异整合起来的结构系统。为方言分区是从各种方言的诸多方言差异中经过比较提炼出各区方言的特征，可见这正是方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必须完成的任务。研究方言必自比较始，比较方言必自分区始。没有对分区的初步认识，随便拿两个方言点的材料作比较，往往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然而人们又只有在作过全面深入的比较之后才能获得对分区的科学认识，因此说它是研究的起点，又是研究的终点。每一次提出分区的意见是已有研究的总结，又是新的研究的起点。汉语方言学应该在方言分区的“假设—检验—修订—再检验”的过程中获得进展。

方言差异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各种方言之间的异同是分层次的，有的方言之间差异大，有的差异小。因此，对方言的分区必须分出大区套小区的多个层次来。完整地认识诸多方言之间的全部亲疏远近的关系，需要浩繁的比较工作，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汉语方言的历史长、分布广、人口多，要弄清全部方言之间的关系，工作量之大更是可以想见。看来，认识方言的分区必须贯穿整个比较研究的全过程。

从20世纪一开始，中国的语言学家就开始关注汉语方言的分区。最早为汉语方言分区的是1900年章太炎在《訄书》初刻本中，提出的十区说。当时由于未曾进行方言调查，只能凭感性印象分区，难免缺乏科学性（王福堂，1999，40页）。30年代之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全国各地陆续做了许多区域调查。赵元任、李方桂等先后提出了八区说和九区说，把官话和东南方言各分若干区并列起来，大体还能反映诸方言之间的异同。50年代之后丁声树、李荣、袁家骅等在开展全国方言普查前后两次作了重新分区，把官话（或称北方话）统为一区与东南诸方言并列，总共分为8区或7区。所作分区相当一致，只是闽南、闽北取分取合之不同。80年代为绘制《中国语言地图集》，大陆各省又进行一次面上调查，经李荣审订，提出了10个大区的分区说。这10个大区是：

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

从总体上说，历来对汉语方言的分区从粗疏到细密，从感性印象到科学分析，是逐渐进步的。每次分区意见都标志着汉语方言研究的深人发展和水平的提高。目前虽然还存在一些分歧，但这是占有了较多的语言材料之后的理论上的新探索，属于提高了一个新层次上的认识分歧。在新的世纪，我们不要回避这些分歧，而应该从理论和材料两个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的探

讨。以期对汉语方言的分区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

从理论上说，还要进一步开展关于分区的原则和标准的讨论。如果大家心目中的标准不同，自是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从材料上说，还要进一步进行词汇和语法的比较。因为以前的分区主要是用语音作为区分标准的。另外一方面，还要往细里深化，发掘小地方的方言材料，使各层分区逐渐过细。以往的分区着重于大区方言，小方言点显然因材料不足而还不能把界线划得很清楚。

二、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

1. 方言的分区与分类

为汉语方言分区是对汉语方言的一种分类——方言特征的异同分类。经过不同方言的特征的比较，把特征相近的方言归成一个区。同一个区之内又把特征相近的归成一个小区或小片。为方言分区不是要为各种方言找到归属，给各种方言安上个合适的名称，而是为了分清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由于比较时在共时方面总是拿共同语作参照系，因而也可了解各方言和共同语的不同关系。在历时方面则拿不同时期的古汉语作为参照系，因而也可了解各方言和不同时期的古汉语的关系。一句话，为汉语方言作科学的分区是经过纵横两面的大量比较研究来为各种方言定位，包括在共时的共同语及方言的系统中定位和在历时的古今汉语共同语及方言的系统中定位。朱德熙先生说过："方言区实质上是方言亲缘关系在地理上的分布。划分方言区是给现代方言分类，可是划分出来的类要能反映亲缘关系的远近。因此，这种研究实质上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范畴。"（朱德熙，1986，249 页）应该说，为汉语方言分区是对汉语方言的最基本的分类。

除了这种方言特征异同的分类，对方言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分类。例如桥本万太郎所进行的方言结构类型的分类研究。他提倡"从语言结构的全貌上检验类型特征的区域性变异的过程和原理。"（桥本万太郎，1985，35 页）并发现了汉语的"北方语有把动词修饰语（"到学校"）放在动词之前的趋势，而南方语则尽量放在动词之后。"（同上，42 页）"向南方移动，名词的修饰成分就移到名词之后，往北则相反，修饰成分就前置于名词，与动词短语的情况完全一致"（同上，58 页，这里指的"公鸡—鸡公"的不同类型）。

为汉语方言分类还可以从文化特征方面进行分类。例如从同一个区里的小方言之间差异看，有向心型和离心型的不同。向心型方言内部差异小，有威信较高的代表点方言；离心型方言内部差异大，缺乏有高威信的代表方言。从方言演变的快慢说，有稳固型和变异型的不同。稳固型方言保留前代语言特征多，变异型方言创新成分多。从语用功能说，有活跃型和萎缩型的不同。活跃型方言在社会生活中有全方位的应用，萎缩型方言则逐渐缩小其使用范围。这都是从方言的文化特征方面区分的类型差异（李如龙，1996）。文化特征的分类和结构特征的分类有一定的关系，但毕竟是两个领域的研究，前者属于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后者属于纯方言学的研究。

2. 方言的分区与分层

50年代方言普查之后，许多学者认识到方言的分区必须是多层的。袁家骅等所著的《汉语方言概要》1960年初版时，对多数方言区都分了两层——方言和次方言。例如"北方方言"分为北方、西北、西南、江淮四个次方言区，把粤方言分为5个"小系"。《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则把福建境内方言按"群—区—话—音"分为4层。80年代为绘制《中国语言地图》作了普查之后，李荣先生在《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1985)中明确提出："本图集的方言区画最多分为下列五个层次：大区——区——片——小片——点。其中区、片和点是最基本的。区底下一般分成若干片，片有时分成若干小片。有些区可以总括为一个大区。"这种三个主要层和两个备用层的分法，把全国各种方言的不同情况都管住了。地域广阔的若干相关的方言区可归成大区，地域较大、内部又有较多方言片的，可再分小片，但是并不是任何方言都一定要分为五层。这样做既能层次清楚划一，又便于针对不同区的不同情况作灵活处理。这种分层法受到大家的欢迎，并且被普遍接受了。

分区和分层其实是一回事，只是划分大区和划分小区的不同，完全可以并案办理，也是应该并案办理的。同一个区域之内的各种方言点，提取其重要的共同特征划为方言区，而后再按其他大小范围不同的共同特征划出片和小片来。如果和其他区还有共同点，便再合为"大区"。

有一种看法认为分区和分层是两回事。例如温端政说："划界指的是划定某个方言区的范围，划分层次是指划出来的方言区域在方言分区系统中应该归人哪个层次。在分区过程中，这两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确定标准时，必须严格加以区分。""用来划界的只能是语音标准。操作性最强的是单一的语音标准"。"划分层次不仅要考虑语音方面的标准，而且要考虑社会历史等方面的标准"(温端政，2000，5～6页)。他的意思是先用有入声划分出晋语来，而后加上其他条件来确认它属于和官话并列的这一层次。其实，就语音特征说，官话各区之间有共同特征，例如全浊声母清化，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大多不分尖团，辅音韵尾少，多没有-m、-p、-t、-k，上去不分阴阳，多有轻声、儿化等等。如果在晋语区大多也是一致的，晋语区便应该归在官话大方言区里；如果这些特征(还应该有词汇、语法特征)覆盖不住晋语，那么把它与官话并列起来，便是合适的。可见分层、定性同样要以语言特征的比较为主要依据。

3. 为方言分区的依据

为方言分区就是从方言差异提取方言特征，地域方言的语言特征便是分区的依据。关于分区的依据有不少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关于语言外部的参考资料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在为福建方言分区的时候，首先强调"语言材料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其历史比较"，同时也提过"从方言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去研究方言的划分"，此外还要与考察方言区的代表方言，了解社会交际中的通话情况以及方言观念等等相联系。应该说，方言特征是分区的内部依据，人文历史方面的情况是外部参考，是起论证作用的，而不是内外各取若干项来作依据。就实际考察的经验说，语言特征的内部依据和人文情况的外部参考是不会矛盾的。一个方言区之内，移民的历史、地域文化心理、方言认同感总是相当一致的。在赣南，自称"客家"的地区的方

言绝不会是赣语。在两广，自称说“白话”的人说的一定是粤方言。但是人文方面的材料有时难以具备确定性。例如是否能通话，往往因人而异，因说话内容、方式、快慢而异。即使作社会语言学的统计也不容易说清楚。在方言歧异严重的“离心型方言”，由于缺乏代表方言，方言片的区分也不太明朗，人们的方言认同感往往比较狭窄。例如福建省南平市的郊区，问某人说什么话，凡是属于闽北方言的都只冠以乡镇的名称说自己的话是“王台话、夏道话、大凤话、峡阳话……”，只有西芹的官话方言岛自称“土官话”。因此，人文情况、方言意识、通话程度都只能作为论证参考材料而不能作为分区的依据。

第二、关于语音标准和词汇、语法标准

多数学者都认为以语言特征为依据就是用语音标准来分区。接触一种方言首先听到的是语音，方言差异首先表现在语音，但并不是“主要表现在语音”。方言语音确实有比较鲜明的系统性，方言差异可以归纳为少数几条，作为分区标准似乎比较容易掌握，其实也不一定。如果有几条语音标准，有的管的字多又是常用字，有的管的字少又是生僻字，也还有权衡轻重的问题。词汇差异则数量庞大，频度差异也大，作为分区标准，操作时有一定难度。语法方面主要是调查材料缺乏，以致到现在还流行着“汉语方言语法差异不大”的说法。从这几年所发表的方言语法材料看来，这个结论值得重新审查。

应该说，只根据语音标准来为方言分区总是片面的。只有兼顾词汇、语法才能使分区更加全面，更加准确。《汉语方言概要》早已指出：“我们发现南昌话在词汇方面似乎更接近吴、湘、江淮诸方言，而与客家话并没有特殊的亲密关系。”（袁家骅等，1983，127 页）练春招博士在她的学位论文《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1998）中，就闽粤赣 9 点客家方言所记录的 3000 多条方言词作了如下统计：

客闽粤赣相同的 93 条　　客闽粤相同的 142 条　　客闽赣相同的 52 条

客粤赣相同的 170 条　　客闽相同的 148 条　　客粤相同的 328 条

客赣相同的 228 条

据以上累计：客粤相同 733 条，客赣相同 543 条，客闽相同 435 条。这些材料相当有力地证明了客家方言在词汇上显然与粤方言最为接近。众所周知，在语音上则是客赣最为相近。可见方言间的语音异同和词汇异同并不见得都是重合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只以语音标准为方言分区，就肯定是不准确的，最好是把二者综合起来考虑，或者选取一个合适的比例，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确定方言的属辖或分合。

第三，单一标准好还是综合标准好？

用方言特征来为方言分区，如果用的是词汇特征，似乎没有人提出用单一标准去划分方言；而用语言音标准去区分方言则有单一标准和综合标准两种意见。

用单一的语音标准去为方言分区，操作起来十分方便，这是明显的道理。如果是从一组分界相仿的语言特征中选择一条最有代表性的分界线来划界，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划界一来不符合方言区分界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有难于掌握的地方。

应该说，除了自然地理的阻隔，例如孤悬的海岛，荒无人烟的高山、大漠，在有人烟的地方，方言区的分界线多半是模糊的。袁家骅说：“方言地理学纠正了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留给我们的一种错误印象。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语言学家为了确立语言系属的分类和分期，认为语言的分化一般采取突然分裂的形式，不同的语言间或方言间有划然的鸿沟，不同的历史阶段

是截然分明的。可是方言研究让我们体验到语言分化或整化的缓慢发展和逐渐过渡的实质。”（袁家骅等，1983，13页）不论是大区之间或小片之间，方言边界的调查材料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方言区之间没有断然的界线。闽浙交界处的吴语有浊声母清化的点，在闽西客家话与闽南话交界处，有连城那一边的全浊清化而不送气（客家清化后送气）；也有龙岩这一边的全浊清化后送气多于不送气（闽南话不送气多于送气）。据《昌黎方言志》，就在河北昌黎一个县的范围内，南北两个小片之间各条同言线也多数不能重合。因此，用单一标准为两个方言区之间划出斩钉截铁的界线来，貌似准确，其实难免挂一漏万，并不符合实际。如果真是完全重合的同言线，取一条出来就够了，其余都是冗余的，然而在事实上，完全重合的同言线，过细地调查到自然村，可以肯定是不可能存在的。

用单一标准划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众多的语言特征中选取哪一条，往往并不容易判断。重要的特征、常见的特征、管字多的特征，其分布的界线未必典型；典型的分界线却未必是重要的特征。如何选择，这其中就很容易含有主观性和任意性。吴语的界线如果用浊音声母来划，就得把一些边界点划出去。粤语如果用有长短音之别来划界，真正的粤语区也不能全部覆盖，用三套鼻音和塞音韵尾划界则与客家、闽南雷同。用有入声把晋语从官话中划出来，许多人首先就会想到，江淮官话不也有入声吗？于是又提出晋语还有其他的“综合性”特征，晋语的研究者确实也是找到许多特征的。其实，江淮官话除了有入声之外，何尝没有其他的“综合特征”？据《江苏省志·方言志》，江苏境内的江淮官话除了有入声之外，还有10条语音特征。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咸山舒声字合流读为鼻化韵；深臻曾梗开口舒声字混为1、2个韵；遇摄唇舌齿音字与果摄字相混；知章精庄多合为一套塞擦音；邪母字多读送气塞擦音（鲍明炜主编，1998）。

从李方桂先生开始，大多数学者都主张用综合标准为方言区分类。几年前，丁邦新、罗杰瑞都有过专门的论述。朱德熙说过“最好只用一条同言线来规定方言区之间的界限”的话，但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根据某一特征划分方言跟选择多项标准进行统计分析是两种方法，各有各的用处，不应偏废。前者是根据对选定的语言特征（分类标准）的 Yes or no 的反应分类，是定性的。后者实际上是比较不同方言之间相似程度的，是定量的。”（朱德熙，1986，248页）其实，先有多项标准在手，才能有单一特征的选择。定性是定量的结果。如果说单一特征是从多项特征中提取出来的，是画龙之后的点睛，为了在地图上划出一条较为明白的线条来，当然也是可行的。但这一条是代表了许多条而不能用这一条去代替那许多条，更不能认为只有这一条管用，那许多条是羡余的，没用的。

第四，要不要定量统计？

如果承认为方言分区时寻求区别不同的方言特征的综合标准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先有综合标准再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一标准用来划界，那末，对于综合标准的考察就离不开定量统计。

既然标准不止一条，考察某点方言属于何区，就必须统计该方言符合标准的有多少条，然后经过抽查，确定一定的比例作为判断是否该区方言的依据。音类特征有管字多的，也有只管一两个字的。对不同的标准必须按照重要性适当加权，这样统计出来的数据才能比较符合实际。

现代系统论十分重视量化统计。方言是系统的结构，各种特征都是构成系统的一部分。引进现代化的统计分析，对于科学地进行方言分区肯定是大有作为的。

第五，统一的标准，还是多种标准？

在讨论分区标准时，有的论者提出：在这个区用这几条把它和周边方言区分开来，在另外一个区，则用另外几条去区分。这样为一个区设定一套标准的作法是否合适，很值得讨论。

诚然，在交界的两个区之间为了划清其间的界线，了解它们之间的亲近度，根据已有的调查材料专门设定一套区分标准，这应该是可行的，必要的。但是对全局来说，全国方言的分区应该还有一套各地适用的统一的标准，而且这一套各区通用的标准还应该是主体，而为各区选定的与此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为补充。如果有了大小两套标准，当我们对某一地区方言知之甚少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它，为它定性——属于什么方言区。有的学者提出“有了‘类’后再去找划界标准，还是根据标准去划类？”（温端政，2000）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为已知的两个连界区找线，这是前者；还没有很多材料积累时为少数调查点划类定性，这是后者。看来，面向全国方言提取出统一的分区标准，还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基础的工作。

4. 为方言分区要不要穷尽？

看来，主张用单一标准去划出明确的方言分界的论者心目中是要把所有的方言都分别划在一个个的区域里的。那么，这种想法和做法对不对呢？

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的深入，一些小地方的方言被发掘来了，这些边远的山村由于历史上移民频繁，周围方言环境复杂，不论是纵向的层次或横向的渗透源都是多样的，因而目前的方言结构系统就可能是面目不清、归属难辨的，以致有好些方言的归属至今还有不同的意见。例如：

浙江省西南部新安江上游的原严州府4个县（淳安、遂安、建德、寿昌）的方言，《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归徽语区，最近曹志耘的调查报告说：“四县方言之间，淳安和遂安比较接近。其中遂安县是严州方言中最为特殊的方言。即使是与遂安关系最密切的淳安人听遂安话也比较困难。遂安人听淳安话相对容易一点。建德话和寿昌话比较接近，尤其是二者的文读系统十分相似。……淳安、遂安二县方言跟建德、寿昌二县方言之间的差别比较大，相互间通话很困难。”他的结论是：“要确定严州方言的性质和系属为时尚早。”（曹志耘，1996）

湖南境内的方言分歧意见更多。《中国语言地图集》把西北部的吉首——溆浦一带定为湘语的“吉溆片”，把零陵——东安一带划为西南官话和土语的双语区，而周振鹤、游汝杰则把前者归为官话区，把后者视为“湘语南片”（周振鹤、游汝杰，1985）。

在福建境内，西北部的邵武将乐一带，《中国语言地图集》划为“闽语邵将区”，据李如龙、陈章太研究，邵武、光泽、建宁、泰宁4县应划归赣语区，顺昌将乐则是闽语和赣语的过渡区（李如龙、陈章太，1991）。另外，尤溪、大田一带有一片包括10个乡的方言，归为闽东、闽南、闽中都不合适，《福建省志·方言志》把它划为闽语次方言的过渡区（黄典诚、李如龙等，1998）。

苏皖两省北部分界是江淮官话和北方官话的分界。据鲍明炜、颜景常调查，“江淮话”一侧的各公社很多都带点过渡性。以入声而论，沭阳北部、东海南部、泗洪大部，虽有入声这个调类，但都有几十个常用原入声字已经变成其他调类”（鲍明炜、颜景常，1985）。东海县城牛山镇《中国语言地图集》划归中原官话，据苏晓青调查，牛山镇有入声，这＝借、舌＝协、今＝京、身＝生、祥＝墙、徐＝渠，与东南部的江淮官话同；而般＝班、判＝盼，官＝关、换＝

患、限≠现、颜≠严，哥≠锅，个≠过，则与西北部的中原官话同，明显带有过渡性质（苏晓青，1997）。

把所见到的调查报告和笔者数十年调查的经验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各汉语方言区之间的交界处的方言，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用自然地理或行政区划隔开的断然分界。例如南通至靖江之间的长江是吴语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福建的松溪、政和的北面省界是吴语和闽语的分界，台湾岛内只有闽语和客家，也是一种天然界线。二是双语交叉式的过渡。例如湘南和粤北交界处有大片归属未定的土话（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和西南官话的双语区，闽南和闽西之间有一个闽语和客话的双语过渡带。三是渐变式的过渡，东西两头是两种方言，当中是方言特征的扩散式渐变。如上文所述的严州方言、湘西北方言等都是这种水乳交融式的过渡地带隔开的方言区界。这种过渡地带或宽或窄，有时还可以构成一个过渡小区。

类似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方言区交界处都或多或少、明显不明显地存在着。如果凭某条标准划出明确的界线来，似是“准确”，实是不准确，因为它掩盖了边界的各种不同的过渡状态。对于那些交叉很多，很难分出主次的方言或方言片，据各种标准的综合表现，如实地划成过渡点、过渡片，岂不是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吗？

三、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标准

1. 关于语音标准

关于为汉语方言分区的语音标准，丁邦新先生曾有较为深入的讨论（丁邦新，1982）。他提出了语音标准的两种性质区别：“第一是历史性和平面性”，“第二是普遍性和独特性”。历史性标准又以隋唐为界分为早期的历史性标准和晚期的历史性标准，“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条件分次方言”。就我所理解，所谓“历史性条件”指的是在历时演变中音类的分混。所谓“平面性条件”指的应是共时系统中的音值特征。他把 f－xu 的分混列为“平面性条件”未必妥当，因为晓匣合口混入非组声母也是晚期的音类演变。如 ai 读为 ɛ，au 读为 ɔ，an 或 aŋ 变读为 ã，s 变为 ɬ 或 θ，ki、k'i、xi 变为 tɕ、tɕ'、ɕ 等应该算是平面性条件。音类的分混较之音值的变异，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标准。而早期分化出来的音类特征往往是大方言形成时代的差异；晚期的特征是各大方言形成之后演变发展的结果，这种区分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承认方言是方言差异整合的系统，就必须引出另一个结论，方言的特征还应该包括系统整合方面的特征，即语音结构的特征。语音是语义的表现形式，有些语音特征是和词汇、语法现象相关联的，这种特征也是结构的特征。换言之，作为区分方言的语音特征不但应有分体（音类、音值）的特征，更应该有整体的结构性的特征。

什么是整体的结构性的语音特征呢？

文白异读，这是方言把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特点整合成系统的一种方式。汉语方言中，文白异读的面（包括对应的条例和管辖的字）是各不相同的。像闽语和晋语都是文白对应比较广泛的方言，吴语次之，有的方言就很少文白异读。在闽语中的闽南话，文白读两个系统都较为完整，而在海南方言许多白读音就挤掉了文读音，白读系统完整而文读系统残缺，这也是一种

差异。

声韵调组合关系，这是方言共时系统的整合方式。例如有多少种韵头、韵尾，不同韵头与不同声组的配合关系，韵尾和声调的组合关系，都很能表现方言语音特征。闽北方言唇音声母可以拼撮口呼韵母（斧 py、殍 p'y），鼻尾韵可以出现在入声调，许多客家话 v 可以自成音节，有些官话 ɭ 也可以自成音节等，都应该是不同层次的区域的语音特征。

多音词语音节之间的一系列连读音变也是重要的语音结构性特征。例如官话普遍存在的轻声和儿化，部分晋语（如获嘉）的“子变韵”，吴语、赣语、粤语的小称音变（又有变韵、变调等区别），福州话的变声、变韵，许多方言都有的形式各异的连读变调等等。李如龙曾经以《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为题，著文提倡把连读音变的种种不同的表现，作为划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文中以福建方言为例，论证了用这几条标准便可以准确而明白地把福建境内的闽方言分成一个个的二级方言（李如龙，1996）。

丁邦新提出的用普遍性标准来区分多种方言，用独特性标准把个别区的方言及其小区小片划分开来。这种提法对于区别不同的语音标准中重要性和作用也是有益的。

根据以上所述，开列以下若干可用来作为区分方言的普遍性语音标准和独特性语音标准的条目。

普遍性标准：

（1）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並、定、群、从、澄等）今读：是否清化，如清化，是读送气音或不送气音，如果送气不送气并有，又受什么条件制约。

（2）古精、庄、知、章四组声母的分混：知是同端或同章，精组细音是否与见组合流，今音有几套塞擦音声母。

（3）古非组声母今读：非敷奉有否读同帮滂并的，微母是否混入明母。如果有这种“轻唇读重唇”的现象，管的字有多少，晓匣合口是否混为 f－。

（4）古阳声韵今读：有几种鼻音韵尾，有否鼻化或鼻音脱落的现象，若是部分变为鼻化或鼻音脱落，又是什么条件决定的。

（5）古入声韵今读：有几种塞音韵尾，是否变为喉塞尾，或者连塞音尾也脱落了，若是部分变异，条件如何。

（6）开合四等的演变：有无一、二等字今读细音的，有无三四等字今读洪音的，有无古开口字今读合口或古合口字今读开口，有无撮口呼韵。

（7）古入声字今声调：有无独立入声调，如有入声调，分不分阴阳，是否读为短促调，有无“入派三声”或舒声字读为入声调的现象。

（8）有无文白异读，有文白对应的音类多不多、字数多不多。

（9）多音词语连读有无变声、变韵和连读变调现象：若有，是个别字变化或是大片的规律，其变化规律属于什么类型。

（10）有无轻声、儿化或小称音变现象，如有，是少数字或大片的规律。

独特性标准：

（1）有无长短元音的对立或入声调分长短调的现象（例如粤语）。

（2）有无浊上字混入阴平调的现象，全浊上与次浊上有无区别（例如客话）。

（3）有无“舌头读舌上”、“匣母读同群母”的现象，若有，字数多少（例如闽语）。

（4）有无平声不分阴阳或上声不分阴阳的现象（例如官话及其他）。

（5）古泥、日、来、母有何特殊变化：泥来不分，来母读 s- 或 t-，日母读 ȵ- 或 h- 或混入影母读零声母。

（6）心、邪、书、禅等古擦音今音有无读为塞擦音的，如有，字数多少。

（7）有无大面积的古韵混读：歌—模，歌—豪，尤幽—萧宵，唐—东。

（8）古影母字有否混入别类的：影→泥，影→疑。

（9）古知章组字有无特殊读法的：读为 k、k'，读为 pf、pf'，读为 t、t'。

（10）有无送气分调的现象，如果有，是个别类或多类如此，管的字有多少。

2. 关于词汇标准

用词汇标准为方言分区，就是经过比较提取各方言区的特征词。关于特征词的概念，特征词的特征，以及如何提取特征词，本书第五章还将有专门的详细讨论，这里先谈谈从哪些方面去调查方言特征词，并为制定调查特征词的参考词表举一些例子。

特征词就是大大小小方言区的具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所谓特征意义就是区内比较一致，区外又比较特殊的。由于词汇的变异快，受外方言的影响也大，因此要找到区内各点完全一致的，区外又完全排它的特征词是很少的。况且与某些外区方言共有的方言词也是一种特征，因为不同的区和哪些区共有，都是不同的。例如客家与粤语，湘语和赣语，浙南吴语与闽语之间都有一批共有的特征词，而粤语与吴语，闽语和湘语，交叉的就比较少。这种不同范围、不同数量的交叉也是一种特征。

就初步研究的经验看来，方言特征词往往是常用的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用词，尤其是单音词。惟其常用，在区内才容易趋于一致，才具有特征意义。这种方言词往往有较强的派生能力，在使用和派生的过程中则常常形成引申的比喻的诸多义项。换言之，方言特征词有许多是常用的单音词，是多义词，是具有较强派生能力的根词。有些很常用的基本词，可能基本义项是许多方言共有的，并非特征词，但是它的某个义项或用法只见于少数方言，这便具有特征意义。例如“伤”作名词（身上有～），动词（别～了他），各方言大体都有，但是用做副词，如闽南话“伤大”（太大），南昌话“辣伤”（太辣），就很具特色。又如厚，许多义项并非个别区的特征，但是苏州说粥厚（稠），厦门还用来表示不如意、不应该的多（厚蚊虫，厚话），这也是具有特征意义的。

值得作重点调查和比较的，可能存在特征词的有以下一些方面，略举一些例子。

某些数量不大却很常用的封闭性词类（或小类）例如，时间词、方位词、指代词、称谓词，人体名称、量词等等。

时候	时节/辰光/时家/辰候	今天	今日/今朝/今儿个/今旦
去年	旧年/头年/上年/年时个儿	明年	出年/开年/来年/下年
上午	上昼/上半日/昼前/前晌	明天	明朝/天光日/明儿/明旦
上面	上边/顶头/高头/悬顶	里面	入便/里沟/里厢/底势
后面	后头/后首/后背/后壁	旁边	边头/边首/侧仔/边浪
他	渠/伊/俚/伊侬	我们	我侬/俺/我伙人/倕侪们
这里	格搭/这搭/呢度/只块	什么	乜/啥/孰事/么子/啥干

哪里	边度/啥地方/底落/啥所在	谁	么人/啥人/边个/底侬
男孩子	丈夫囝/细佬/男伢/男娃子	老头	老侬/老官/老汉/老蚁
爸爸	爹/爷/大/老窦	妈妈	奶/娘/阿婆/姆妈/阿姐
哥哥	阿兄/阿哥/老伯/哥子	丈夫	老公/老官/翁/爷儿们
乞丐	告化子/花子/乞儿/乞食	女婿	姑爷/囝婿/郎/姐夫
鼻子	鼻/鼻哥/鼻公/鼻头	眼泪	眼泪水/目汁/目滓/目屎
脖子	颈子/项颈/脰/颔	胳膊	手膀/手杆/手骨/手肚
眼球	眼睛珠儿/眼珠子/乌珠/目仁	舌头	口舌/脷/喙舌/舌子
一个人	介/只/倍/其	一座房子	所/落/块/栋
来一趟	摆/回/头/次	一尾鱼	条/头/行/只

数量很大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中都有一些很常用又很具特色的方言词。例如：

房子	房/屋/厝/房屋	热水	汤/烧水/滚水/烧汤
煤油	洋油/涂油/火油/火水	地方	场化/所在/位处/巴基
胡同	巷/弄/弄堂/巷子	坟	墓/冢/地/坟冢地
稻草	禾秆/草/稿/稈	自行车	单车/脚踏车/洋马/洋驴
玉米	棒子/苞米/包粟/麦穗	红薯	白薯/地瓜/番薯/山芋
西红柿	番柿/番茄/洋柿子/臭柿仔	辣椒	辣子/番椒/辣茄/番姜
花生	地豆/地生/长生果/番豆	母狗	草狗/狗母/狗嫲/犬母
下蛋	娩蛋/屙蛋/生春/生卵	猴子	猢狲/马骝/猴哥/老猴
蚂蚁	蚁公/蚁子/蚍蜉/狗蚁	苍蝇	蝇子/乌蝇/蚨蝇/饭蚊子
肥皂	胰子/洋碱/番碱/胰皂	毛巾	手巾/帕子/脸布/面巾
锅	镬/锅头/煲/鼎	伞	遮/雨盖/撑子/雨伞
东西	物事/物件/嘢/乇	桌子	枱/桌/床/盘
粥	稀饭/糜/米汤/糜粥	馒头	馍/包子/面头/卷子/实心包
下饭菜	下饭/菜/配/餸	茶叶	茶/茶芯/茶米/茶箬
银元	光洋/龙番/大银/白银	一毛钱	一角银/一毫子/一角洋钿/一角钱
做饭	烧饭/弄饭/舞饭/煮食	玩儿	耍/嬉/嫽/搞
盛（饭）	舀/贮/装/载	回来	回来/倒来/转来/来归
喝（酒）	饮/吃/食/啉	洗澡	沐浴/洗浴/冲凉/洗汤
娶亲	娶媳妇儿/接老婆/讨堂客/娶姥	出嫁	出门/做客/行嫁/做新妇
折本	亏本儿/了本/赔本/蚀本	下棋	动棋/行棋/着棋/来棋
吃	喫/食/哇	脱（衣）	除/褪/解
拿	驮/捞/抬/提	藏	收/囥/屏
找	寻/讨/揮/揾	看	眨/觑/望/睇
哭	喊/叫/啼/吼	选择	挑/选/拣/择
知道	晓得/知得/八传/知影	忘记	唔记得/天放/赊记得/赖记
（粥）稀	水/薄/清/潡	（粥）稠	厚/干/涔/洞
干净	净/清气/汰洁/淋俐	肮脏	脏/赦糟/龌龊/邋遢

（味）淡	白/甜/口轻/饗	坏（不好）	赖/孬/否/呆
忙	无闲/唔得闲/无工/不得闲	吝啬	抠门/悭/孤寒/咸涩
没	无/毛/冇/未曾	不	弗/唔/勿/无
给	畀/把/度/拨	很（大）	好/老/野/蛮

词汇方面也有普遍性条目和独特性条目之别。以上大多属于普遍性条目，各区还有一些特有的可以鉴别某一方言区的条目。例如：

吴语区有　汏（洗）掮（扛）调（换）揿（按）掼（摔）洞（窟窿）渧（滴）交关（很）拨（被）

闽语区有　囝（儿子）侬（人）喙（嘴）厝（房子，家）涂（泥土）硋（瓷）粟（稻谷）秫（糯米）

粤语区有　罇（瓶子）谂（想）争（差欠）啵（球）料（馅儿）敨（歇）倾（交谈）博（换）嘢（东西）

赣语区有　屋场（村子）涿雨（淋雨）禾穗（稻穗）杌子（凳子）猪婆（母猪）女客（女人）博士（木匠）崽（儿子）

这类条目不论大区小区都有不少，有些写出字来，往往也很特别。

3. 关于语法标准

陆续发表的关于方言语法的论著说明了，不同方言间的语法差异绝不是无关紧要的。从已经知道的情况看，在语法方面提取分区标准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词形变化　主要是各类重叠式和词缀的不同。

单音名词重叠在共同语范围很窄，在晋语、西南官话和闽语的闽东方言范围要宽得多。如说杯杯、盘盘、包包、角角、堆堆等等。

动词重叠式在各方言里大体都有，但重叠的方式往往有不同，（说说/说一说，商量商量/商商量/商量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也常常有差异。

形容词重叠式方式更多：红红/红红红/红通通/通通红/通红通红/……各种重叠式的作用也常常有别。

此外，其他词类也有可以重叠并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的。

词缀见于名词、动词、形容词。名词的“子、儿、头”在各方言就多有不同。晋语的“圪”不但可以构成名词（～洞，～台），还可以构成量词（～丝、～撮）、动词（～落、～挑）、形容词（～流不直底）（侯精一，1999）。形容词生动形式的后缀、中缀，各地方言都有，形式和含义也各不相同。

第二，虚词用法　虚词的差异包括：用不用虚词，用什么词，在词组中置于何处。助词虚化最彻底，因此各方言差异最大。副词主要是词序问题，有些方言后置作补语，而不是前置作状语。介词有的虚化得不彻底，也有不用介词的时候：放（在）桌子上/走（到）前面去/鸡（被）打死了/（把）书还给我。比较方言虚词上的差异必须组成短语进行调查，然后放在一个平面上作比较。下列例句可供参考：（字下加点的应着重调查）

太阳出来了。	吃了饭再走。
找了三趟没找着。	想了想还是不去好。

抓住了我不放。
三个梨吃了两个。
外面下着雨呢。
墙上挂着一口钟。
你拿着！
他喜欢站着吃。
戴着眼镜找眼镜。
他低着头不说话。
他年青时当过兵。
昨天找过你三次。
猜猜看他是谁。
想着想着就想起来了。
这书是谁的。
好的书多看些。
站得高，看得远。
慢慢地说，别急。
他说得活龙活现。
把门关好！
鱼被猫吃了。
猫把鱼给吃了。
他在哪儿找到的？
放在地上呢。
怎么老跟我过不去？
酸的和甜的我都不要。

第三，若干句型　有些句型在各地方言组织方式不同，尤其是语序不同，也是很明显的方言语法差异。也举些例句：

你是喝茶呢，还是喝咖啡？
要不要我陪你去？
他是不是你兄弟？
老师来了没有？
好沉，你拿得动拿不动？
这水果吃得吃不得？
我比不上他。
他和你一样重。
他比我熟多了。
他送给我三本书。
公司收了我 300 元定金。
外面冷，多穿件衣服。
快点儿走，来不及了。
再喝一杯吧！
拿本书给我看看。
你叫他来找我。
你骗不了我。
我说不过他。

四、汉语方言分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关于客赣语的分合

大约从六朝到中唐，客赣方言区的先民曾经在鄱阳湖地区共同生活过。后来客家继续南下了，赣人又向东越过武夷山到了闽北，向西扩展到两湖和沿江，便与江淮官话区有许多往来。分手的一千年来，客赣方言各自向前发展了。应该说已经分属两个大方言区。50 年来，这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从《汉语方言概要》到《中国语言地图集》都没有异议。近年来，王福堂又提出客赣应合为一个大区（王福堂，1999）。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以往讨论分区，都以语音特征为主要依据，而事实上，客赣之间词汇差异比语音差异更大。据《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等，1992），客赣之间的语音异同和词汇异同如下：

语　　音		词　　汇	（共比较了 1089 条）
共同特点	明显差异	说法一致的	明显差异
14 条	17 条	150 条	478 条

上文也已经提过，赣语词汇与官话、湘语、吴语都有关系，而客家词汇则与粤语相似甚多，同闽南话也有一些交叉。在语法方面，客赣之间也有许多重大差异。例如下面一些词语两区说法多有不同：

普通话	客方言	赣方言
不是	唔系	不是
没有	冒得、冒有	毛
不必	唔使	不要
被（介词）	分	畀、等
把饭吃了	食了饭去	把饭喫呱
（外面）下着雨	落紧水/落稳水	在落雨
吃不下饭	食唔落饭/食唔饭落	喫饭不下
能不能来	来唔来得	来得正莫
我告诉过他	偃话过渠知	我跟渠话过
太辣了	忒辣哩	辣死得/辣伤嘚

可见如果综合语音、词汇、语法的标准，应该把客赣方言分立。

即使就语音来看，客赣也宜分不宜合。

关于全浊声母清化一概读送气，其实并不是客赣一致的特点。从深层的角度看，赣语在清化之前就把次清和全浊混变为"全浊送气音"（或称为次清混入全浊）。在赣语的西片——鄱阳湖西岸及修水流域（幕阜山脉）至今还保留这种送气浊声母，这和客家的全浊清化后混入次清，应属于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现象。看来，客家的南迁经过的是鄱阳湖东岸和赣江流域。这一带的赣语在全浊声母的变化上完全和客家同步了。陈昌仪说："赣语从整体上完成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向送气清塞音塞擦音声母演变应在两湖赣语片大批赣语先人迁入之前，应在客语形成之前，应在客语先人离开赣南迁往粤东粤北之前，不应在中原汉人第三次移民大潮到来之前。它的下限至迟应在北宋期间"（陈昌仪，1991，15 页）。据《后汉书·地理志》，公元 140 年，豫章郡已有 40 万户，160 多万人（许怀林，1993）。到了初唐，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江西境内已设有 8 州 38 县，在全国人口普遍减少的情况下，江西饶州从开元年间到元和年间，人口从 1.4 万增至 7 万左右，洪州、吉州也有相当的增长。可见在客家人入赣之前，赣语应该有了雏形了。

关于浊上读为阴平，在客家次浊全浊兼有，在赣语主要是次浊。客家全浊归阴平的字都读为不送气音，说明这一变化发生在浊声清化之前。看来这是客家从江北带来的，进入江西后影响了赣语。这一特点剩下的例字已经不多，总数只有二三十个常用字。可见是先时的残留现象，作为划分客赣的主要依据是不合适的。

除了这两条，赣语还有不少特征是客家所没有的。例如送气分调的现象；知章组乃至精组字都有读为 t、t'的；影母洪音混入疑母；流、曾、臻三摄部分见系字今读为细音。还有，入声

字按送气与否，或按摄、按韵尾为条件分化为两调，等等（陈昌仪，1991）。

2. 关于晋语的分立

最近20年间，晋语的调查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进展。在绘制《中国语言地图集》时，学者们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分立出来，按照单一标准的办法，以有入声为根据，把“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划为晋语。在官话里，江淮官话也是“有入声的方言”，因而不少不太熟悉晋语的学者提出质疑，单凭一条有入声的标准能把晋语分立吗？

事实上，晋语的学者只是划界时用一条标准，关于晋语的特征他们还是提出了不少条来。如侯精一1989年提出5条，1996年他又增加至10条（侯精一，1999）。最近，温端政在侯精一首先提出的5条之外，又补充了6条，其中有4条是侯精一1996年补充时未提的。综合起来看则有14条之多，加上同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平声不分阴阳”，可算是15条（温端政，2000）。

已经归纳出来的这15条语言特征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晋语的入声，绝不单是有入声调类和读塞音韵尾的调值那么简单。如果把侯、温二位提到的几条与入声相关的特点排列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究竟了：

① 入声多带有明显的喉塞音。

② 多数地区有读为入声的词缀“圪”[kəʔ]。

③ 北京话的轻声“子”尾多数地区读为入声的[tsəʔ]。

④ 入声调值或调型与某个舒声的调值或调型具有一致性。

⑤ 不同程度地存在古舒声字今读入声的情况。

⑥ 入声音节里有成系统的构词能力很强的不表义音节。

⑦ 部分入声音节分为表义与不表义两个部分，即“部分入声音节两分”。

⑧ 通摄合口一等与合口三等精组字今读音多有区别，曾摄开口一等入声帮组字、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帮组字今韵母多读齐齿呼。

这种种特征充分说明了入声在晋语并没有表现出弱化的趋势。如所周知，从纵向说，自从《中原音韵》以来，入声就明显走向弱化了；从横向说，现代方言中不但大多数官话入声消失了，在湘语中大多只有入声调类而没有塞音韵尾，甚至连闽语和客语这些比较保守的方言里也有一些点入声消失了，例如客家话里的长汀、连城，闽语里的尤溪新桥话。而在晋语，入声不但没有消磨减弱，反而呈扩大的趋势：舒声入化，词头词尾（圪、子）入声化，部分入声音节不是简化而是繁化（别义不别义两分，及通、曾、梗的部分入声音节韵母变读都是一种繁化）。这说明了晋语的入声不但没有弱化、简化，反而还在强化、繁化着。这种情况不但与江淮官话的入声有别，甚至和其他东南方言的入声也有区别。还应该指出，其他方言的文白对应，往往白读保存入声，文读派入非入声，或文读保存入声，白读读非入声，而晋语的文白对应至少从平遥话里看不到这种情形（侯精一，1999）。

看来，晋语的入声确实是内涵很丰富的方音特征，不容小看。

除此之外，广泛存在的文白异读和分音词，平声不送气，阳声韵读为鼻化韵或阴声韵，指示代词三分，高元音后的-n混入-ŋ（in→iŋ、yn→yŋ、ən→əŋ等）也都是很具特色的。

在词汇语法方面，除了词头“圪”，分音词大量存在两点之外，侯精一曾提出18条晋语的

特征词（侯精一，1999，8页）。过细地从晋语词汇对照表中提取，应该还有一批内部较为普遍、在外区又比较少见的特征词。例如“昨天”说“夜里、夜来”，“公鸡”说“草鸡”，“辣椒”说“辣角角”，“热闹”说“红活”（应是“红火”变来的），介词“被”用“叫”等等。

根据晋语的特点，至少足够在官话中把它立为一个二级区，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华北官话等并列，这一点看来已经成为方言学界的共识。至于能否从官话方言中分立出来，成为另一个大区方言，这主要要看各区官话的共同特征能否把晋语包含在内。不同意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的王福堂，援引丁声树、李荣1955年在《汉语方言调查》中提出的官话的三个共同点（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m尾并入－n尾，多数无入声），其实，这三条特征已经大多包容不了晋语了：在晋语区有的平声不送气，大多有入声，有些地方也有－m尾。官话能否包容晋语，官话的下位应该分为几区为妥，看来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3．其他问题

在汉语方言的分区方面，目前有争议的还有广西平话的归属问题。《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平话分立为一个大区，有些学者也提出异议。从见到的材料的初步印象说，桂南平话和粤语勾漏片、邕浔片相当接近，这是没有问题的，刘村汉曾主张把桂南平话归入粤语（刘村汉，1995年第5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但桂北平话和桂南平话又确实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而且桂北平话除了受紧邻的西南官话和北面的湘语的若干影响外，不论语音或词汇也有许多和粤语相近之处。据梁金荣用《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的词目比较统计，临桂两江平话和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完全相同的方言词汇有664条，占51.1%，部分相同的有194条，占14.9%。两项合计竟达66%（梁金荣，1997）。把桂南桂北的平话都划归粤语，作为粤语大区的一个区是可以考虑的。它很可能是保留早期面貌较多的粤语。不过目前所报告的平话材料还比较少，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近几年来，湘南土话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但是发表的材料还不多。范俊军的博士论文《郴州土话语音及词汇研究》调查了郴州2区1市8县中的20个方言点，进行了语音、词汇比较。他的结论是“就语音方向来说，郴州土话整体似乎可以将它看作是赣语特征稍为明显且揉合湘、客特征的混杂型方言。”“郴州土话各地一致或多数点一致的词语占总调查词语数的60%以上，其中与湘语一致的词语为总数的80%以上。其次是赣语，最后是客方言。”（范俊军，1999）这种语音杂糅、赣语特点略多、词汇统一、大多同于湘语的状态和湘南土话的历史背景是相当契合的。宋元之后，尤其是明清以来，江西人口大量填入湘东长廊，湘南土话里所以有赣语语音特点正是那时的赣人带来的。但数百年来，这里一直是湖南省的辖区，与湘语区的人交往较多，词汇上自是大量与湘语趋同。这个结论应该是切合实际的。当然要做出更为明确有力的结论，还有待于用更多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

粤北土话已经发表的材料就更少了。这里是客赣湘三个方言区的接合部，总的说来有点像湘南土话，与赣语、客语和湘语都有关系。南边不远处又是粤语区，数十年来粤语已经占据了许多县城的交际领域，于是也有了粤语成分的掺杂。具体地说，离什么方言近一点的点，就同那种方言共同点多些。这个区很可能要划为多区方言之间的过渡区。

关于各个大区之间的关系，也很值得研究。罗杰瑞在他的《汉语概说》中对汉语方言有过一种归类。他用10条标准把中国方言分为北方、中部和南部三大区。北方是官话区，中部是

吴赣湘，南部是闽客粤（罗杰瑞，1995，163页）。

我的想法和这种三分化比较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

汉语的方言第一刀应该分为官话方言和非官话方言两大类。官话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内部差异相对较小，这是因为它的主体是在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里使用磨合而成的。边远处的官话（东北、西北、西南）则都是近三四百年以来才从江河之间随着实边移民散播过去的，所以虽然面积广，人口多，内部却差异不大，彼此之间并不难通话。其中差异较大的便是晋语和江淮官话。晋语是由于封闭在群山之中，江淮官话则是由于同南方诸方言相连界而受到渗透。官话和非官话的最大区别乃在于它是基础方言，它的词汇语法比较容易为共同语所接纳。相声、评书、鼓词都是用华北官话说的，都流通甚广。许多现代作家写作时可参杂河北、山东、四川话。小品演员正流行用东北、河南口音表演，就是这个道理。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官话以外的方言（可以称为东南方言）才是真正的方言。因为它们不是基础方言，它们的成分要进人共同语是很艰难的。这些方言又可以长江为坐标划为两大片——近江方言和远江方言。

近江方言自东而西是吴语、徽语、赣语、湘语。它们的共同点是既古老又很“现代化”。所谓古老是随着汉人渡江和原先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实行民族融合，中原汉语也最先在这里扎根。所谓现代化是指它们受到共同语及其基础方言的影响较之远江方言要大得多。这种影响遍及语音、词汇、语法。像铁路沿线的城镇的湘语、吴语边缘的一些方言点，已经把原来的方言特点扔了很多，变得很不像湘语和吴语了。这一带方言现代的发展走的是蜕变的路，即放弃方言成分、接受普通话成分。相对而言，东边的吴语、徽语较之西边的湘、赣语还保留着较多的方言特色。其中的原因对北片吴语来说是人口集中、文化发达、经济实力雄厚等起的作用；对徽语和南片吴语来说则是因为交通闭塞，商品经济长期不发达。

远江方言分布在东南部的沿海和山地。山地上的客家人是后来才到达的。“先人为主，后到为客”确是事实，不过清初迁海复界之后他们也到了沿海，并且也和闽粤人一起登上台湾、海南两个大岛，飘洋过海到了东南亚。来到东南沿海的汉人和原住民是彻底融合了。在以汉语为主整合为各自的方言的同时，各方言都吸收了一批百越的“底层”词，而且有些底层在这三种方言里都对得上。正由于与原住民的融合，这里的人很早就擅于舟楫，奔向海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了海洋文化。随着他们的足迹所到，这些远江方言近几百年间播散到东南亚各地乃至东非、大洋洲和美洲，也把华夏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在现代生活中这些方言的发展往往走的双轨制的道路，一方面保守着自己的方言特色，一方面也学习和推行共同语，实行双语制。只是在一些内陆地区如闽北、闽西和赣南等地的方言，由于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在实行双语制的同时也发生了“蜕变”。在粤西和桂东一带则是当地的粤语和平话向广州话靠拢。

思考与练习

一、为方言分区用单一标准和综合标准各有哪些优缺点？二者能否整合为互补的方法？

二、为方言分区是否一定要穷尽？过渡型方言和混合型方言是否确实存在，应如何对待？

三、谈谈目前关于汉语方言分区上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整理出双方的依据，并作一番权衡。

四、试用加权法把多方面综合标准化为可以运算的特征数率，为你所熟悉的两种方言进行分析统计。

参考文献

王福堂 （1999）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 语文出版社

朱德熙 （1986） 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中国语文》第 4 期

桥本万太郎 （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 （1996） 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 《暨南学报》第 2 期

李 荣 （1985） 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 《方言》第 2 期

温端政 （2000） 晋语的“分立”与汉语方言分区问题 《语文研究》第 1 期

袁家骅主编 （1983）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鲍明炜主编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曹志耘 （1996） 严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周振鹤、游汝杰 （1985） 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 《方言》第 4 期

李如龙、陈章太 （1991） 闽西北七县市的方言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黄典诚、李如龙等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鲍明炜、颜景常 （1985） 苏北江淮话与北方话的分界 《方言》第 2 期

苏晓青 （1997） 东海方言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

丁邦新 （1982） 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 《清华学报》 新 14 卷 1～2 期

李如龙 （1996） 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 《方言与音韵论集》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侯精一 （1999） 现代晋语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张双庆等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陈昌仪 （1991） 赣方言概要 江西教育出版社

许怀林 （1993） 江西史稿 江西高校出版社

刘村汉 （1995） 桂南平话——粤方言的一个分支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论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梁金荣 （1997） 桂北平话语音研究（博士论文）

范俊军 （1999） 郴州土话语音及词汇研究（博士论文）

罗杰瑞 （1995） 汉语概说（张惠英译） 语文出版社

第四章　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和字音系统

一、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

1. 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是多层结构系统

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只到音节为止，着重于把音节（字音）分解为声、韵、调，研究各类声韵调组成音节的规律。究其原因，大概与汉字有关，正如1500年前刘勰的《文心雕龙》所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字——音节是汉语中有意义的最小的自然单位。此外，也与早期缺乏多字相连的语音变化有关。这些连音变化大概都是近几百年间才出现的，包括轻声、儿化、变声、变韵、变调，宋元以前可能都还没有形成规律。方言里比较保守的如闽北方言就都没有这些变化。各地客家话只有少量的点有不多的变调和轻声。粤语除了"高平、高升变调"之外，也是清清楚楚地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出来的。其变调属于什么性质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随着汉语方言调查的深入，人们知道了好多前所未闻的语言现象，看到了语音的变化和词汇语法的构成有很多关系。语调的研究也跟着语言教学和艺术语言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这是语言事实给人们的启发。1962年，李如龙在《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一文中就提出："把方言的语音研究和词汇、语法的研究联系起来，对方言结构体系作进一步的描写和比较研究，""有必要加以提倡"。同时提出语音变化的类型应该分为"语音音变（或称单纯音变）"、"词汇音变"和"语法音变"（李如龙，1962）。但是这种观点在中国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发挥。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的音系学受到生成语音学的挑战，并且很快败退下来。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虽然是可以剥离的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是却有密切的关联，音系的研究不能不考虑语法、语义的因素。在批判结构主义的线性音系学的基础上，生成音系学认为："语音结构上的区别最终标志着句法和语义的区别，所以语音是包括在语法内的，音位单位是体现语法、词汇项目体系中的一部分"。生成学派用"系统音位"代替了原来的"自主音位"，"立足于句法平面，力求反映词汇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语法规则对语音变化的支配作用"（王理嘉，1991，205页）。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观点很快传入中国，并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运用和发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方言》的推动之下，许多学者研究了各种方言的连读变调以及儿化、轻声、子尾等等与词汇、语法相关联的语音现象。逐渐地，汉语方言音系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分析法："以单字音为基础，首先确定单字音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在音节结构中的配合限制，然后确定单字音在各种连字环境中的变化。各种连字环境有纯语音性的（如上声连上

声)、语法结构性的（如接"儿"、象声四字格）等。……这种分析法可以叫做'基于单字音的音系分析法'。……既不同于结构主义，也不同于生成派，……这一传统模式的效力和深刻内涵，正在现代西方引起越来越多的重现……很值得进一步深挖其理论方法论的价值。"（王洪君，1999，101 页）

语音之所以成为语音，全是因为它和语义（词汇义和语法义）纠缠在一起。人类所能发出来的音是无限的，而任何语言的语音都是有限的。只是和大大小小或显或隐的意义结合起来、互为表里的那一部分，才成为语音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相结合的语音单位，从音位到音节、到连音组、到与句子相应的音流，每扩大一层，都与更深一层的语义相联系。这就是语音系统的立体结构及其表义功能的深化过程。把传统的字音的研究（包括音节和声韵调的分析）和与字—词—句相关的语音现象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汉语的语音结构系统包含着 4 个层面的内涵。以下将对此作逐层的分析。

2. 汉语方言的音位系统

音位系统是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第一层面。传统的音韵学把字音分解为声、韵、调，其中韵母又分解为韵头、韵腹、韵尾，这是十分切合汉语语音结构的实际的，因而也突显了汉语语音结构的特点。如果用西方语音学分析法，直接用辅音、元音及音高、音长的特征来分析音节，就很难体现汉语的特点。不论从字音的组合或变迁看，声韵调都是字音构成和演变的基本零件。例如双声叠韵的构词法，历史音变中的声母的分合，介音的合并，"阴阳对转"，韵尾的脱落，声调的分混，"入派三声"等等，莫不以这些分解的小类为单位。用现代语音学原理来检验传统音韵学对中古音的分析，这种分解可以说是穷尽的，并没有未经分解的剩余物。所差的只是对这个分类的下位只有类的区分而没有音值的具体描写。但是其音位的观念还是十分明确的。无怪乎各家现代音韵学家用音标把十六摄、开合、四等的音类标出来的《广韵》系统的音，竟然没有多少差别。倒是对现代汉语的音位分析出现了不少的分歧。这大概也因为现代汉语及方言在语音结构的音节以上的层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也就是那些与词汇语法有关的语音结构形式，例如北京话里的合音音节 uom 、im 、am、轻声调、儿化韵等等。虽然关于归纳音位的原则并没有明显不同的看法。赵元任提出"相似性、对补性、系统性"三个主要条件和"少为贵"、"觉得自然"、"跟历史的音韵相吻合"三个附属条件（赵元任，1980，30～37 页），把各种看法都概括了，但是具体的归纳法还是见仁见智，各执一端。赵元任最后还是认为"广泛的音位系统没有无条件的绝对对跟不对的问题在里边"（同上）。看来，用现代西方的音位学来分析现代汉语的音位系统，还不如用音韵学的方法分析古音那么干脆利落。这也可以说明传统的音韵学对汉语的音节及音节以下的成分的分析是十分得当的，经得起推敲的。

3. 汉语方言的音节系统

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第二个层面是音节系统。这也是传统的音韵学说得很清楚的。赵元任曾用现代科学语言作过这样的表述："传统的中国音韵学将音节分成声母和韵母。声母是音节的开头，一般是一个辅音。……有少数音节开头没有辅音，……音节除去声母就是韵母。……最长的韵母包含三部分：介母或半元音，主元音，韵尾；在儿化韵中，有时有两个韵尾，……音节可以没有介母或韵尾，但一定要有主元音。除声母和韵母之外，每个音节都有一个声调，

声调是音节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表示音节的浊音部分的音高模式，因此，要是声母是浊音，那么声调就贯串整个音节，要是声母是清音，那么声调只贯串在韵母之中。”（赵元任，1979，16～17 页）

如果严格按发音原理处理，清辅音无法负载声调，那么清辅音韵尾也应置于声调之外，这样，声韵调组成汉语的音节应如下图：

<table>
<tr><td rowspan="2">清</td><td colspan="4">声　　　调</td><td rowspan="2">清</td></tr>
<tr><td>浊</td><td rowspan="2">韵
头</td><td rowspan="2">韵
腹</td><td>浊</td></tr>
<tr><td colspan="2">声　　母</td><td colspan="2">韵　　尾</td></tr>
</table>

这样的结构是汉语音节最常见也是最复杂的结构模式。除此之外，根据这些年来所得知的方言事实，还有一些与此不相符合的音节结构方式：

（1）所有的次浊辅音都可以充当韵腹。例如广州：唔$_{(不)}$ m^6，厦门：荒$_{白}$ $h\eta^1$，上海：鱼 η^2，长汀：夫 fv^1，西宁：布 pv^5，高淳：而 l^2，西宁：李 l^3。韵腹既然可以没有“主元音”，还是称“韵腹”好。有的方言塞音韵尾浊化，因而次浊音也有充当韵尾的。例如都昌：急 $tɕil^7$，发 $ɸual^7$。

（2）两个韵尾（或称双韵尾）的结构不限于儿化韵。闽东、闽北方言和徽语有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并见的，如福州：县 $kaiŋ^6$、双 $søyŋ^1$，建瓯：鳞 $saiŋ^5$、仁 $jeiŋ^3$，婺源：金 $tɕiɐin^1$、军 $kuɐin^1$。闽南方言有鼻音韵尾和塞音韵尾并存的，例如厦门：默 $hmʔ^8$（无言貌）、□$ts'ŋʔ^8$（犹豫貌）。

（3）声母有因为韵头摩擦化而使声母附加擦音的双辅音的。如上杭客家话：贵 $kvεi^5$、葵 $k'vεi^2$，平遥晋语：女 nzu^3。

（4）也有韵腹无元音的纯辅音音节。例如江西石城客家话：食 st^8。另有甄继祥曾经相告，甘肃东部地区应答之词“呵”发音为 ȟ̥ə（吸气喉音，元音清化）。

（5）赣语有些点有“中塞调”，伴随着塞音在前、鼻音在后的“双韵尾”，这种音节，由于声调中部的塞音停顿把一个音节分割成两段。例如：雪 $sietn^7$（调值为 21－5），墨 $məkŋ^8$（调值为 21－1）（李如龙、张双庆等，1992）。

（6）徽语休黟片多有长介音 i、u、y，把韵腹读得像韵尾一样又轻又短，是否为长介音或韵腹转移，值得讨论。如休宁话：别 p'iːε，园 yːε，话 uːɔ（郑张尚芳，1986）。有些晋语的［ʅə］和有些吴语的［ɯɤ］等组合，究竟何者为韵腹，也值得研究。如山西临县：闪 ʂʅə，染 ʐʅə（侯精一、温端政等，1993）。汤溪：南 $nɯɤ^2$、板 $mɯa^3$（傅国通等，1985）。

在音节的构成上，各方言的差异更多的还在于不同的音位在音节组成的各部分有不同的分布。例如 ŋ 在官话方言里一般只充当韵尾，在赣语兼当声母，在闽、粤、客、吴诸方言则可作声母、韵腹和韵尾。韵头的元音，在官话多为 i、u、y，在多数客家话和闽南话，只有 i、u，

在江西宜丰赣语只有 i（李如龙 、张双庆等，1992，12 页），但有些闽南话 ɯ 也可以作韵头，例如福鼎沙埕鸡 kɯe^1、鞋 ɯe^2（李如龙等，1995）。韵尾的元音在官话区一般只有 i、u，在粤语和闽东方言还有 y，例如广州话：区 k'œy^1、女 nœy^4，福州话：衰 søy^1、锯 køy^5、坐 sɔy^6。在徽语和闽语还有 ɯ，例如黟县：盖 kuaɯ、灰 uaɯ（郑张尚芳，1986 年），永安：多 = 刀 taɯ^1，罗 = 劳 laɯ^2（李如龙，1991）。在晋语有从 - ŋ 转化而来的 ɤ。例如，争 tsəɤ、风 fəɤ、听 t'iəɤ。除了从辅音转化而来的之外，就整个现代汉语方言的情况说，所有的高元音 i、u、y、ɯ 都可以充当韵头和韵尾。当然，韵头韵尾的高元音也可能因弱化而读成开口度较大的元音。例如闽南的 ue（杯、初、鸡）在潮汕地区变读为 oi，浦城吴语蟹摄字韵尾读为 ɛ，例如排 paɛ，开 k'aɛ。

此外，不同的方言在声韵调的拼合关系上也有各自的特点。例如，北京话唇音不拼 u 韵以外的合口呼韵母，在闽、粤方言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杯、培、梅”在福州、广州都读为 pui^1、p'ui^2、mui^2。北京话撮口呼韵母除 n、l 之外只能拼 tɕ、tɕ'、ɕ，但在闽东方言还可以拼 t、t'、k、k'、ts、ts'等声母，在闽北方言还可拼 p、p'声母，如建瓯话：斧 py^3、除 ty^3、朱 tsy^1、鬼 ky^3、许 xy^3、屁 p'y^5、畜 t'y^7、出 ts'y^7、躯 k'y^1（李如龙、潘渭水，1998）。

声韵调的组合规律是方言语音系统的重要内容。它是历时发展的结果，也是共时整合的依据。比较声韵调系统只能看到表面，只有考察组合规律才能看到底而。m、ŋ 在南方许多方言都可单独用作韵母（其实北京也有 hŋ 的音），但大多不能与零声母以外的声母相拼，而在闽语、永安话的 m 可拼唇牙喉音声母，例如汤 t'ɔm^1、暗 m^5、横 xm^2、分 p^{u}m^1（双唇始终紧闭，舌面如 u）；厦门话的 ŋ 则可拼所有的声母，例如：饭 pŋ^6、毛 mŋ^2、当 tŋ^1、糖 t'ŋ^2、软 nŋ^3、砖 tsŋ^1、床 ts'ŋ^2、酸 sŋ^1、广 kŋ^3、囥 k'ŋ^5、荒 hŋ^1、黄 ŋ^2。知道这一层，就可了解，闽语中 m、ŋ 这两个韵母反映的是一个重要特点了。又比如，i、u 在北京话可以作介音，也可以作韵尾，但是在音节里不能共现，而在一些方言则可以有 iai、iei、uau 的组合，例如：成都：界 tɕiɛi^5，蟹 ɕiɛi^5，赣榆：街 kiai^1、戒 tɕiai^5，福建平和：芋 uɔu^6、姑 kuɔu^1。

4. 汉语方言的连音变读系统

在音节之上是第三个层面——多音词语连读后的变音系统。这类变音在许多方言都有，但是有哪些项目，牵连的词语有多少，变音的形式如何，不同的方言区各不相同，同一个方言区里的小片也常有区别。但是从总体上看来，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而不是杂乱无章的。

从性质上说，多音词连读变音有的是纯粹的联合音变，与词汇的界线，语法关系没有制约关系。例如北京话的“上上变调”在不同的词之间也可以发生，厦门话的连读变调也有类似的情形（李如龙，1962）。更多的变音则与词义和语法意义相关联。

从历史上说，多音词的大量产生是唐宋之后的事。以下三个统计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左传	全文 20 万字	共有复音词 284 个	（陈克炯，1978）
论衡	全文 21 万字	共有复音词 2000 多个	（程湘清，1992a）
敦煌变文集	全文 27 万字	共有复音词 4347 个	（程湘清，1992b）

多音词的连读变音应该是多音词大量出现、从数量上占优势之后才发生的变化。从产生到形成一定规律，又需要经过相当的历史时期。正因为连读变音形成的历史不是太长，所以各方言区表现差异很大，有的方言变得少，有的方言变得多，有的还处于可变可不变的不稳定状态。

从地域上说，多音词变音在官话区比非官话区多，近江方言比远江方言多。这一方面是外部的历史社会原因所使然：远江方言趋于保守，受官话影响小；另一方面也有一定内因：闽、客、粤方言阳声、入声韵的韵尾保留得较为完整，不少方言 -m、-n、-ŋ、-p、-t、-k 齐全。封闭的韵尾对连音变化当是一种障碍。远江方言的单音词的比例应该比其他方言大，这也是它们连读变音较少的内因之一。

以下把常见的与词汇、语法有关的连读变音作一粗略的介绍。

(1) 轻声

在北京话里，轻声有两种，一是词汇轻声，即有些双音的“老资格的口语词语”的后音节，只能读轻声，资格不老的则可轻读也可不轻读。依前字的声调不同，北京话轻声有高、中、低三种调值，主要语音特点是读得短。如果用字相同，轻声不轻声可以表示两个截然不同的意思，例如“东西、兄弟、大意、干事、生气、打手、靠背、自然、练习、老子”等等，读为轻声的或者是偏义复词（兄弟：弟弟），或者是词性转移（打手、练习），或者是词义转移（东西、老子），这都是词汇繁衍的结果。这种轻声实际上是有音位对立的，从这一点看，轻声已经是一个独立的调类了。另一种轻声是语法所使然，包括后起的词缀，表示语法意义的虚成分以及重叠式的后音节，代词用作宾语等等。有些读为轻声的虚成分已经很难知道本调是什么了，这也是主张轻声作为一个独立调类的根据之一。各地官话的轻声现象大体和北京话相仿。

应该是受官话的影响，近江方言轻声的范围也与官话相近，调值则往往只有低而短的一种。就其差异说，吴语（北片）的轻声多限于虚成分，有些也很难考证其本音本字了。如苏州话的里向（里面）、床浪（床上）、去哉（去了）、大葛（大的）、俚笃（他们）、筷五（筷子）、慢慢交讲（地）、喫仔饭再走（了）（叶祥苓，1993）。其余双音词读轻声的较少，这显然是因为吴语多有后字读变调的规律。其实，叶祥苓所说的有些后字变调（21 调）和无喉塞尾的轻声调值是相同的，如新郎＝心浪。二者都视为轻声可能是更合适的解释。在湘赣语，轻声相当发达，而且有轻重音和轻声之别，轻重音是前轻后重或前重后轻，没有失去原来声调的轻读，轻声是“失去原来的调，调值的高低取决于前字”。如南昌话：翅膀、自在、字纸篓、沙皮子钱（粗制铜钱）、妻室儿女、收脚迹子（瞎逛）、汗褂子（内衣）、声气（声音）都属于轻声范围（熊正辉，1995）。在湘语湘乡话，普通话里带有规定性的轻声也读轻声（或可称为绝对轻声）；普通话里的“可轻声”（或称为相对轻声）则受制于语法结构的不同，分别读为前轻后重或前重后轻。换言之，不是可轻可重而是视语法结构的位置而定轻重。前者（绝对轻声）如：

落雪哩（了）　困嗒看书（着）　他回来哩啊（了、啊）　行得飞快的（得、的）
行不得　鸡婆子　手套子　伢唧（子）
姑唧　鸡公　拳头牯　他打我
到哪里去哩啊　块布绯红唧的呀（这布挺红的）　条鱼几重（这鱼有多重）
到哪里去哩　在屋里　往南边行好些　你当我冒听见啊

后者（相对轻声）则有前轻和后轻两种：

述宾结构及某些数词、词头、为前轻后重，联合结构、偏正结构及述补、主谓为前重后轻。

轻重型：吃饭　打架　打转身　一斤　第二　老王
重轻型：兄弟　修理　堂客（妻子）　冬至　打开　草鱼

“立春”用作体词为重轻型，用作谓词为轻重型（王芳，1997）。

远江方言的轻声现象较少。粤语是没有轻声的。客家方言只见于语助词、词缀等，也还不是十分定型。闽语的“囝”可作词尾，但声调都不轻读。闽东方言真正的轻声只有“其、去、架、吼”等少数几个：依弟其书（的）、破去了（掉）、蜀架侬（一个人）、囥吼（藏着）。闽北方言也没有轻声。闽语中明显的轻声见于闽南话，并且比较广泛，有绝对轻声、相对轻声之别，有词汇轻声、语法轻声、语气轻声之别。最有特色的是在词汇轻声中从泛指区别出特指来。例如：

倒去三年（回去三年）——崇祯三年

放假三日——五月三日

相对轻声中并列成分读轻声以加强语气，也很有特色：

早起读即本，下晡读许本。（上午读这本，下午读那本）

是汝唔着，唔是我唔着。（是你不对，不是我不对）（详见李如龙，1962）

轻声是变调的一种，但不是纯粹的联合音变，而是与词汇——语法——语气相关联的音变，应作独立一类来考察。李如龙 1962 年所提出的把轻声分为绝对轻声和相对轻声以及词汇轻声、语法轻声、语气轻声的观点，现在看来都是合理的。

轻声不仅是声调的轻读短读，而且往往引起声母、韵母的弱化。从历史的角度看，有些方言里老资格的读为轻声的虚成分，往往因为语音的弱化变得面目皆非，或分道扬镳，找不出共同的语源，这就给语法史的研究带来很多困难。相当于普通话的“子、了、着”等，在许多方言都有这类疑难问题。因此，考察轻声带来的声韵变化是很重要的工作。

除了轻声，北京话及其他官话里还有轻重音的现象。轻声和轻重音是否同一个语音特征的小类之别，其间关联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变调

近 20 年间，汉语方言所报告的连读变调的材料已经不少了。很可惜还没有就这些丰富的素材作过比较深人的分析。先罗列事实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及时地作比较分析，对这些事实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还会影响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工作质量。

就已经知道的事实说，现代汉语方言的多音连读变调彼此差异甚大。有的方言完全没有变调（如建瓯话）。有的连读后普遍发生变调，甚至本调也推不出来（如温州话）。先就《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 14 个分卷所提供的二字组的连读变调作一简略比较：（地点后的数字是单字调数）

比较项目	北京$_4$	太原$_5$	武汉$_4$	南京$_5$	苏州$_7$	上海$_6$	金华$_8$	温州$_8$	福州$_7$	厦门$_7$	梅县$_6$	于都$_6$	南昌$_7$	长沙$_6$
变调多、规律繁	−	−	−	−	+	+	+	+	+	+	−	+	−	−
只有前字可能变	+	+	+	+	−	−	−	−	+	+	+	−	+	−
一个调类一种变法	−	−	−	+	−	−	−	−	−	+	−	−	+	−
变出新调型	+	−	+	+	+	+	+	+	+	−	+	+	−	+
曲折调皆变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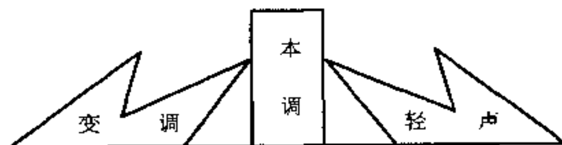
从这个简表可以看出各方言变调上的一些情况：①吴闽语较复杂，其他方言较简单（广州话的变调有特殊内容，下文再讨论）。②凡是变得少的都只变前字，可见连读变调是从前字开

始的。③同一调类有多种变调的居多，而整类同变的较少。可见，变调的制约因素主要不是原来调类，而是连读音节的调值。④多数点都变出新调型，不论单字调类多少。可见，变调是调型组合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补足调类的短缺。⑤有变调的方言，凡是曲折型调值的都变，可见变调是从曲折调变起的，因为在相同时长中发直调应比发曲调方便省力。

连读变调的发生显然是为了适应多音词的需要。几个语素组合成词，用来表示一个新的完整的意义，连读变调就是把几个音节粘合成一个音流的整体的手段。这种音流的整体有人叫"语音词"，或"大音节"，有人称为"声调单位"或"声调群"，看来还是称为"联调组"较为合适。因为它既不是音节，也不是词，而是几个音节，有时是几个词组成的按连读变调规律粘合起来的一个结构单位。

一个词是最小的联调组。词内的变调在多数方言是习惯性的联合音变，和语法没有直接关系，该变调而不读变调，刻意读为本调是语用需要的临时变读。例如福州话"泉州"与"漳州"连读后声韵调都相同（阴阳平作前字时变调合流），如果为了不致含混，泉州必须读为本调：$tsuoŋ^{53}-tsiu^{44}$。然而也有些方言，两个调类连读有不同的变调，各依语法结构关系为条件。例如金华方言述宾结构的变调方式往往与非述宾结构有不同（曹志耘，1996）。

在不同的方言，联调组大小不同，性质也可能不同。北京话上声变调看来是纯属联合音变，因为它可以扩展到句子成分之间。"我想给你买两把小雨伞"，可以一口气读为"变阳平"，到最后一个字才读上声本调。什么时候把联调组断开，不是变调规则决定的，而是和语义相关的逻辑重音及语速所决定的。当然，读词表时，一个词是一个联调组。也可以说，连调组是以多音词为最小单位的。在厦门话，多音词只有末字不变调，轻声则只能跟在本调之后。复杂的联调组是由"变调音节＋本调音节＋轻声"构成的。本调音节是联调组的核心，变调音节和轻声音节则是对它的双向依赖，其关系有如下图：



联调组的长短则决定于句法关系（有时也与词性有关）。并列成分之间，主谓之间多不联，述宾、述补之间多联。偏正体词之间，用虚词的多断，不用虚词的则多联。双宾之间断，连谓之间联。介宾结构与谓语多断，专名、方位、时间、数词多按词或词组而联。例如：

黄/红/乌/白/四色牌　起大风/落大雨/惊什么　大大只的/牛　对上海/来　𠲥使得四界走不能到处跑　唔免共伊讲不必同他说　送您兄/一本册送你哥一本书　厦门/鼓浪屿/日光岩　公元/两千年/三月　汝/行头前　汝/头前/行　（详细规则可参阅李如龙，1962）

可见，连读变调是一种语音规律，但与词的结构及类别有关，与句法结构有关，与语气、语调也有关。

在不同的方言区，有无变调，规则繁简，性质如何，制约因素可能是各不相同的。这说明像轻声一样，形成连读变调的历史也还不长。那种可变可不变的状态就说明了有些方言的连读变调还处于尚未完全定型的阶段。还有的方言则处在"词汇扩散"阶段，尚未形成规律。例如闽北和吴语连界的松溪、政和方言，有些多音词的前字声调逢后字是阳平时会被同化，但是只

见于几十条词而不能普遍类推。例如政和话（李如龙，1996）：

今年 kiŋ$^{51-33}$niŋ^{33}　　阿娘 aŋ$^{51-33}$nioŋ^{33}（女人）　　半冥 puɛiŋ$^{31-33}$maŋ^{33}（半夜）

咬人 kau$^{31-33}$mɛiŋ^{33}（痒）　骹腹头 k'au^{51}pu$^{24-33}$t'ɛ^{33}（膝盖）　电泥 tiŋ$^{55-33}$nai^{33}（电池）

变调的研究似乎只是音节以上的层面的事，其实也与音节之内的音类的分析有关。有些方言单字调调类数和连读调类数就有不同。严格地说，不能只凭单字调来确定方言的调类，而必须兼顾连读变调的分类来确定。例如现代泉州话老派有 7 个声调，去声不分阴阳，都读 31 调；新派则只有 6 个声调，加上清平与浊上相混，都读 33 调；但是实际上都应该有 8 个调。因为用连读变调，二者都可以分开：

泡心	p'o^{33} sim^{33}（萝卜失水）	抱心	p'o$^{33-22}$sim^{33}（竖心旁）
分侬	pun^{33} laŋ^{24}（按人分）	笨侬	pun$^{33-22}$ laŋ^{24}（笨人）
真心	tsin^{33} sim^{33}	尽心	tsin$^{33-22}$ sim^{33}
晏班	u ã$^{31-55}$ pan^{33}（晚班）	换班	u ã$^{31-22}$ pan^{33}
斗头	tau$^{31-53}$ t'au^{24}（搭伙）	豆头	tau$^{31-22}$ t'au^{24}（前作种豆）
做侬	tsue$^{31-53}$ laŋ^{24}（做人）	秽侬	tsue$^{31-22}$ laŋ^{24}（多人）

这种单字调不分、连读有别的情况，还见于吴语的温岭方言（李荣，1979）。

福州话还有一种韵母的声调变体，高调读紧韵，低调读松韵，如果是双音节词的前音节，按连读变调的规律低调必须变为高调时，其韵母也要随着变换。韵母的这种变体前人多称为“变韵”，其实它是变调的伴随现象，和下文说的变韵不同。例如：

故事　ku^{53}（＜ɔu^{213}）　l（＜s）øy^{242}　　事故　sy^{53}（øy^{242}）kɔu^{213}

（3）变韵

这里所说的变韵全称应该是“合音变韵”，指的是某些后缀因意义的虚化而引起语音的弱化，最后与前面语根的末音节合并，造成该音节的韵母按一定模式的变化。最常见的是许多方言都有的“儿化”，此外还有晋语的“子变韵”和闽语的“囝变韵”。温岭方言的“儿化”表现为升变调和降变调，为了和不具语法意义的变调相区别，李荣先生把这种变化称为“变音”。他说：“变音不但能区别意义，本身也有意义……‘名词化’就是温岭话变音的语法意义。……本音和变音之间是语法变化的关系”。（李荣，1978）考虑到“变音”可以包括变声、变韵和变调，而儿化、子尾、囝尾的合音尽管也有使前音节变调的（例如温岭方言），但毕竟多数方言是一种变韵现象。像温岭方言那样可以处理为由变韵转化为变调。因此本书称此类语音现象为“合音变韵”，简称“变韵”。

北京话和许多官话方言里的“儿化”是最典型的变韵。赵元任说：“卷舌韵尾‘儿’－r，或更确切地说从‘里’、‘日’和‘儿’派生出来的三个同音后缀，是官话中仅有的非音节语素。它在词根语素的韵母中引起一套很复杂的形态音位变化，这套变化最好用一个带卷舌韵尾的韵母来表示。”他称这种变化是“可共存发音的同时性”变韵。（赵元任，1979，重点号是引者加的）可见，“儿化”不仅是“儿”尾（小孩儿、心肝儿），还有“日”尾（今儿个、明儿个）、“里”尾（这儿、那儿）。看来，这百十年来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发展，已经从附着于名词发展到附着于其他词类，所代替的也不止三个词尾了。例如：好好儿走、等等儿、想一想儿、逗笑儿、热闹儿、处处儿、年轻轻儿的，热汤儿面等等。至于“儿化”的语法意义，赵元任在《新国语留声片乙种课本》中曾概括为五种：表示小，具体字抽象化，动词名词化，形容词名

词化，特别意义。后来张洵如又具体化为 5 大类 14 个小类的功能和意义（张洵如，1939）。这种变韵既然是非音节的语素，是词汇、语法意义引起的，各类儿化韵母最好还是把它列入韵母表，这才是科学的做法。早在 80 多年前，赵元任就说过了："卷舌韵的用法，不但是为说漂亮北平话用，它在文法上、造词上，都是很重要的，常听见说国语不必像北平土话用大些'儿'的话，这是不明白中国语言实情的人所说的话。"（赵元任，1923）那种反对儿化进入标准音的外行话，至今有时还可以在南方和台港东南亚的知名汉语学者那里听到。可见在各种现代汉语教科书中还必须大书特书"儿化"的语法意义。

儿化在吴语和徽语中表现形式最为复杂。在温岭话中，儿化在舒声韵是声调的替换，如桃儿 dɔ$^{31-15}$；在入声字是韵母和声调同时替换，例如蝴蝶 ɦu$^{31-13}$（diʔ^{11}）die^{51}。在金华话中，"儿"音 ŋ^{212}，儿化引起韵母的鼻化合音后转化为鼻化作用和部分变调：清上 535→55、浊上 535→24、阴入 4→55、阳入 12→24。例如囡儿$_{女儿}$nã（<a）$^{535-24}$，小叔儿 siau$^{535-53}$ɕi ȭ^{55}（<ioʔ^{4}）。在徽语儿化大多是加上 - n 尾，部分发生变调。如休宁话，儿化合音后使原音节加上 - n韵尾，并把声调统一变为 24 调（单字调的阳上调）。例如索儿 son^{24}（<o^{5}），裤儿 k'un^{24}（<u^{55}），栗儿 len^{24}（<e^{11}），姐儿 tɕiːen^{24}（<iːe^{32}）。黟县话加上 - n 尾后多数还有韵腹的变化，声调变化则只在部分声调。例如：

筷	k'ua^{324}——筷儿	k'uan^{324}	蕨	tɕyːe^{3}——蕨儿	tɕyen^{324}
包	pau^{31}——包儿	pun^{44}	袋	tuaɯ^{3}——袋儿	tuən^{324}
条	t'iːu^{44}——条儿	t'yn^{44}	剧	tɕyɛi^{31}——越剧儿	tɕyn^{324}
盒	xau^{3}——盒儿	xun^{44}	球	tʃaɯ^{44}——松球儿	tʃən^{44}

（平田昌司主编，1998）

除了"儿尾"可化入韵母造成变韵，"子尾"也有造成变韵的。有的学者称为 z 变韵："z 变韵流行于河南北部和山西南方，它是以韵母或声调的变化表示类似普通话'－子'尾意义的一种构词法。……只要是有文白两读的字，闻喜方言的儿化词都用文读作词根，而 z 变词都用白读做词根。"（王洪君，1999，215 页）可见 z 变词是晋语固有的"小称"，而儿化词则受共同语影响而来。

山西闻喜话的子尾变韵相当复杂，变后的韵比原韵都延长了韵腹并增加或换上圆唇元音韵尾。例如：

蹄	i→iːəu	女	y→u	骡	ua→uaːu	筛	æe→æeu
裤	u→uː	柜	uei→ueiu	盘	æ→æ̃ːũ	院	yæ→yæ̃ːũ
盆	e͡ĩ→ẽːũ	裙	ye͡ĩ→yẽːũ	疯	ʌŋ→ʌ̃ːũ	聋	uʌŋ→uʌ̃ːũ

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变调：阴平（31）、上声（44）、部分去声（53）→241

阳平（213）、部分去声（53）→551　　（同上 217 页）

河南获嘉话的变韵分为两类情况，更为复杂。贺巍（1982）把它称为 Z 变韵和 D 变韵。前者见于名词，后者见于处所词，小地名和动词、形容词。在 47 个基本韵母中，两类变韵共有 36 个之多。例如：

基本韵母		**Z 变韵母**		**D 变韵母**
a	拔	ɔ	鞋拔	
ɤ	盒	o	洋铁盒	

iɛ	茄	io	茄		
yaʔ	角	yo	墙角		
au	帽毛	ɔ	帽	ɔ	毛庄儿
an	盘安	ã	盘	ã	永安
ian	钳田	i ã	钳	i ã	田楼儿
aŋ	帮纺	ɔ̃	菜帮	ɔ̃	纺线
ai	盖	io	锅盖	ɛ	盖房子
ɿ	枝史	ɿou	树枝	ɐ	史庄儿
i	鸡提	iou	鸡	iɛ	提水
y	驹锯	yu	驴驹	yɛ	锯树
ei	痱背	iːou	痱	ɛ	背个包
ən	盆陈	iːŋ	洗脸盆	ɛ̃	陈庄儿
iŋ	蝇丁	iːŋ	蝇	i ɔ̃	丁庄儿
əʔ	汁织	ɿou	面汁	ɐʔ	织一丈布
iʔ	栗踢	iːou	毛栗	iɐʔ	踢一脚
uʔ	秃出	u	秃	uɐʔ	出车

这类变韵在闽语只是偶尔可见。在福建省戴云山区的大田县广平镇，那里的方言是闽南、闽中、闽北三区闽方言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种小称音变“包括变调和变韵：凡原字是去声（21）的变为阴上调（52），原字是其他声调的一律变为新调 351；原字韵头一般不变，韵腹为高元音或次高元音的变为次低元音，不论原字韵尾如何均变为鼻化韵。”（李如龙，1996，《福建大田广平话》）这种变韵共发现 7 个韵（每个变韵是从几个原韵变出来的），100 多条例词。例如：

ɛ̃ 韵　鸡 ki^{33}→k ɛ̃^{351}　瓶 pe^{24}→p ɛ̃^{351}　竹 tiɐ^{21}→tɛ^{52}　钳 k'ei^{24}→k'ɛ̃^{351}

u ɛ̃韵　尾 gui^{52}→ŋu ɛ̃^{351}　犬 k'ue^{52}→k'u ɛ̃^{351}　嘴 tsuɛ^{52}→tsu ɛ̃^{351}　袋 tui^{21}→tu ɛ̃^{52}

ɐ̃/i ɐ̃韵　刀 tɯ^{33}→t ɐ̃^{351}　虫 tsɤ^{33}→ts ɐ̃^{351}　车 ts'ia^{33}→ts'i ɐ̃^{251}　尖 tsiaŋ^{33}→tsi ɐ̃^{351}

õ/i õ韵　牛 gu^{24}→ŋ õ^{351}　裤 hu^{21}→h õ^{52}　条 tiu^{24}→ti õ^{351}　羊 iɔŋ^{24}→i õ^{351}

ø̃韵　厨 ty^{24}→t ø̃　豨 hy^{52}→h ø̃^{351}　根 kø^{33}→k ø̃^{351}　厝 tʃ'y^{21}→tʃ'ø̃^{52}

这种变韵显然是从闽语的特征词“囝”变来的。“囝”《集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除用来表示“儿子”外，还可作为名词、量词、形容词的后缀。如说鸡～、椅～、一丝～、慢慢～。作为后缀的“囝”都读上声。其声韵福州话为 iaŋ，在厦门话为 a，在泉州为ã，在惠安为ỹ，在尤溪为 ŋ。在广平话变为一种鼻化作用，把高元音放大为近于ã、ɔ̃的音，声调则变读为上声（52）或与上声相近的 351。这种变韵和变调是与“囝”合音而成的，这是完全可以确认的。

（4）变声

轻声也好，合音变韵也好，都是一种音节的弱化，前者主要弱化了声调，减少了时长，后者是彻底地弱化，并入了其他音节，只留下声、韵、调中的一两项特征“寄存”其中。这种弱化音变往往不是单项的，而是声韵调中多项参与、综合表现出来的。

北京话的轻声不但声调轻而短，而且声、韵母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去了 liau^{213}→lə^{1}，看着 zhau^{24}→dʒə^{1}，我的 ti^{51}→də^{4}，三个 kɤ^{51}→gə^{1}，盖一盖 kai^{51}→gɛ^{1}。除了声调变得短而轻之外，韵母的元音单化、央化了，声母则浊化了。复合元音会变为单元音，前系、后系元音则变为央元音。元音的这些变化显然省力了，辅音由清而浊也是气流减弱的表现。

变调其实也是一种弱化的音变。变调音节弱化之后表现出对本调音节的依赖，二者便浑然一体了。“老嫂子、老大爷”之类的结构，前音变调，末音轻声，都依赖着当中的本调音节，形成联音组中的明亮清晰的“音峰”。作出语图来一定是本调音节最长。

汉语方言连读音变中，单纯的变调不涉及声韵变化的较多，合音变韵则肯定要涉及声韵调三者的变化，而表现为单纯的变声的就很少了。已经知道的有福州话的声母类化。

早在30年代陶燠民就报告了福州话的“声母之类化”（陶燠民，1956），至今这种音变并无明显的变化。其规则简单地说就是：多音词的非首音节的声母如果不是浊音，便会发生浊化，浊化的音依前字韵尾而定。在鼻音韵尾之后各组清音声母混变为同部位的鼻音：p、p‘→m，t、t‘、s→n，k、k‘、h→ŋ；在非鼻音韵尾之后则混变为同部位的浊辅音或脱落清辅音：p、p‘→ß，t、t‘、s→l，ts、ts‘→ʒ，k、k‘、h→ø。但在原收 k 尾的入声字之后不变。例如：

冥晡(晚上)　maŋ$^{52-44}$（p>）muo^{44}	土匪　t‘u$^{32-24}$（p‘>）ßi^{32}
戏台　hiɛ$^{213-21}$（t>）lai^{52}	清天(冷天)　ts‘iŋ^{44}（<ɛiŋ^{213}）（t‘>）nieŋ^{44}
洋参　yoŋ$^{52-44}$（s>）nɛiŋ^{44}	水仙　tsui$^{32-21}$（s>）lieŋ^{44}
生字　ts‘aŋ$^{44-52}$（ts>）ʒɛi^{242}	青草　ts‘aŋ$^{44-52}$（ts‘>）ʒau^{32}
米缸　mi$^{32-21}$（k>）ouŋ^{44}	长裤　touŋ$^{52-21}$（k‘>）ŋou^{213}
西风　sɛ^{44}（h>）uŋ^{44}	便利　pieŋ$^{242-52}$ l>）nɛi^{242}

后字声母为鼻音或边音、前字韵尾是原来的－k，还有后字声母为送气音的，有些也不发生类化。例如：

东门　tøyŋ^{44}muoŋ^{52}	上元　suoŋ$^{242-44}$ŋuoŋ^{52}
病侬(病人)　paŋ$^{242-44}$nøyŋ^{52}	波浪　po$^{44-52}$lɔuŋ^{242}
漆布　ts‘ik$^{23-5}$puɔ^{213}	蜜糖　mik$^{5-32}$t‘ɔuŋ^{52}
日头　niʔ$^{5-32}$t‘au^{52}	乌犬(黑狗)　u$^{44-52}$k‘ɛiŋ^{32}

在句子里，大体上按词划分，词内类化，词间不类化，但是有时也不严格。除了某些语音条件之外，还受语义是否融成一体、语法是否结合紧密以及语用方面是否常用、属于什么语体等条件的制约。下列谚语中声母类化与否就有不同表现。

日头弹昼，大雨就遘中午晴，下午雨

niʔ$^{5-32}$t‘au^{52}taŋ$^{52-21}$tau^{213}tuai$^{242-52}$y^{32}tsiu$^{242-52}$kau^{213}

六月雨，鱠过垺雷阵雨常下在小地域

løyʔ$^{5-32}$ŋuoʔ$^{5-52}$huɔ^{242}mɛ$^{242-21}$（<a）kuo^{213} ^{52}tuo^{242}

儿团豚，扛饭床大小孩食量大

nie$^{52-21}$（k＞）iaŋ$^{32-21}$t'ouŋ^{52}k'ɔuŋ$^{52-21}$puoŋ$^{242-44}$（s＞）nouŋ^{52}

拉渣食，拉渣肥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la$^{40-21}$（ts'＞）ʒa^{44}（s＞）lieʔ^{5}la$^{44-21}$（ts'＞）ʒa^{44}（p＞）βui^{52}

有时，有些用字相同的二字组，由于语法关系或语义色彩的不同，一个类化，一个不类化，就靠它来区别意义。例如：

有味　u（＜ɔu）$^{242-52}$ʔɛi^{242}　有异味　　u（＜ɔu）$^{242-52}$ɛi^{424}　味道好

落地　lɔʔ$^{5-21}$tɛi^{242}　火灾结束　　lɔʔ$^{5-21}$lɛi^{242}　本来（副词）

洗汤　sɛ$^{32-21}$t'ouŋ^{44}　用热水洗　　sɛ$^{32-21}$louŋ^{44}　洗澡

做风　tsɔ$^{213-44}$huŋ^{44}　刮风　　tsɔ$^{213-44}$uŋ^{44}　发脾气

由于决定是否类化是多种因素制约的，所述规则只是相对而言，都缺乏严格的规定性，什么地方类化，完全按习惯形成，情况相当复杂。详细情况可参阅《福州话声母类化的制约条件》一文（李如龙，2000）。

5. 语调结构系统

就语言表达说，最小的单位是句子。一个句子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每个句子都有一定的语调。有的句子只有一个词，带上语调就可成句。不带语调，哪怕是很长的一串词组也不能成句，依然给人觉得是在读词表。语调是句子这个层面的语音系统。连读的语调像一条彩带，把一个个有抽象的、概括的一般意义的连音组连成一串，用来表示一个更为复杂的、特定的、具体的、主观的意义和情感。为了适应各种句型、句式以及语气的需要，句子的语调是有一定规则的，是成系统的。母语的语调往往先人为主，尤其是成年人在学习外族语言或外方言时总是用母语的语调套用于目的语。正由于语调系统的差异，一听就可以识别出说话人的母语是什么。欧洲人、日本人说汉语，语调不同；上海人、广州人说普通话，语调也不同，就是这个道理。人机对话时如果不提供语调的参数，机器发出来的语句总是平铺直叙，不但使人昏昏欲睡，而且未能真正地达意，也是这个道理。

历来对语调的理解有宽窄两种。狭义的语调指的是句子的抑扬——高低升降，主要是连续音高的掌握。广义的理解则包括停顿、快慢和轻重音。主要是音强、音长的掌握。停顿、快慢和轻重音同句法也有一定关系，例如各种标点符号都要求在语音上有一定的停顿，但是这些方面主要是由逻辑关系、语用需要（感情、语气）决定的，因而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方言之间有许多共同特点，并无太大的差异。因此，高低升降应是语调的主要内容。

对于有声调的语言来说，如何处理好字调和语调的关系尤其是个重要问题。赵元任对此曾有过著名的"代数和"的说法："可将音节的声调和句子的语调比作小波浪跨在大波浪上面，实际结果是两种波浪的代数和。"（赵元任，1979，28 页）说惯了无声调的语言的西方人，往往不知道这个道理，用夸张的语调把"我姓陆，他姓王"说成"我姓卢，他姓望"。

从语言表达艺术的需要出发，研究语调采取广义的说法是有好处的。比较方言或概括汉语的语调特征则似乎应该着重于高低升降的考察。

赵元任还把汉语的字调和语调的"叠加"分为"合并叠加"和"后续叠加"（赵元任，1933）。所谓合并叠加是在句中贯穿到每个音节的抑扬，这是句段语调；所谓后续叠加，则是

在句末完成字调之后接上一定语调，这是句末语调。句段语调包括句首的叹词的语调，句末语调则包括句末语气词的语调。可见，研究汉语的语调必须包括句中的语调，句首叹词和句末语气词的语调。显然，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眼下都还很不深入。

就不同的方言说，表达语调的重点部位可能是不同的，抑扬升降的幅度也有不同的度。总的印象看来，官话区的升降幅度较大，东南方言的语流升降较为平淡。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方言区的语调差异可以是很大的，例如：

北京　　这↘怎么—行↗呢·

苏州　　该个↗搽哼↗来三↘

福州　　嘅↘蒋样↗使→噜·

厦门　　咹呢—简—会使↘

广州　　噉↗都得嘅↘咩—

疑问句的语调在许多语言里都有上扬的语调，在北京话里，即使没有疑问语气词，整个后半句的音高也要上升，如说“是他告诉你↗的˙”“这么迟了还不↗去˙?”但在一些南方方言，疑问句的语调并无明显上扬，反而有降调趋势，尤其句首有疑句词的问句，逻辑重音往往在疑问词上，音高也跟着升上去。

福州话　只蜀本→好看．固是$_{\rightarrow}$许蜀本→好看$_{\rightarrow}$?（这一本好看还是那一本好看?）

溪势↘唔↘去$_{\rightarrow}$噜→?（为什么不去?）

底呢→有汝→份↗↘?（哪里有你的份儿?）

相半前日↗固𫒷八→唔是↗（端详了半天还不认识吗?）

明旦．有去$_{\rightarrow}$无→（明天去不去?）

厦门话　食日昼→未．（吃午饭了吗?）

咹呢写↘会使得↘𫒷—（这样写行吗?）

北京→汝简有↘去着—（北京你哪有去过?）

哪通→去度伊→请啊↘（哪里好去让他请啊?）

即款药↗底落→有卖↘（这种药哪里有卖的?）

相比之下，厦门话问句多为降调，即使末字是高字调，也可配一个疑问词读低调，所有句末疑问词都读为轻声。福州话问句的末尾多为中调，既无着意上扬，也没有明显下降。

南方方言的叹词是很能寄托语调的，例如：

上海话的“哪能 na^{33}nəŋ^{55}　喏 nɔ^{53}　嗳 ɛ^{34}　唷 io^{53}　喔唷唷 o^{33}io^{55}io^{21}”

福州话的“哇哈 ua^{53}ha^{242}　诶 øy^{52}　五帝 ŋu^{44} la^{213}　会死 ɛ^{52}si^{32}”

广州话的“哗 wa^{53}　哗哎 wa^{53}hai^{35}　啫 tsɛ^{53}　吓 ha^{35}”

粤语的语调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麦耘说：“句末语气助词的语调还可以有‘覆盖叠加’的形式，叹词又可以有语调与语调的后续叠加，而句段语调与句末语调和叹词的语调之间也是合并叠加的关系。”（1998）他又说：“广州话的语气助词都有相对固定的字调。语气助词本身已荷载表达语气所需的语素成分，在有需要时再追加语调。在种类上，语气助词的语调要比不带语气助词的句末语调来得复杂。”（同上）正由于这种“覆盖式叠加”，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确实样式多，时值长，负载着全句的语调，把本来应该在句中起伏升降的语调都集中到句末的语气词的拖腔上了。许多小品在模仿“广东腔”时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大作文章。下面举若干例

句：

架单车唔踹得㗎　ka^{33}　（这自行车骑不得啦！）

唔该你话畀佢知啦　la^{55}　（麻烦你告诉他吧！）

等阵唔会落雨呱　kwa^{33}　（等会儿不会下雨吧？）

见到个仔好开心嚙　$pɔ^{33}$　（见到这孩子好高兴吧！）

植符兰说："广州话语气词有时两个连用，甚至三个连用，意思是顺承的，以最后一个语气词表达的为主，说的语气比较重，拉得也比较长。"（1997）例如：

佢已经畀咗钱嘅咯㖞　$kɛ^{33}$ $lɔ^{33}$ $wɔ^{13}$　（他已经给了钱了呀！）

你还翻啲书畀佢㗎啦咩　ka^{33} la^{33} $mɛ^{55}$　（你还给他书了吗？）

我买咗飞㗎啦嚙　ka^{33} la^{33} $pɔ^{33}$　（我买了票的）

佢重时时捱更抵夜添嘅咯嚙　$kɛ^{33}$ la^{33} $pɔ^{33}$　（他还常常在熬夜呢！）

关于汉语方言的语调系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项研究既要联系不同的句型、句式，又要抓住叹词、语气词的特征。从方法上说，既要有口耳的观察，也应该有机器的实验。方言语调的比较研究不但可用来指导方言区的人学好普通话，也可更全面地认识现代汉语的语调系统。

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应该是这样一个多层级的结构系统。如果打个比方，音节的下位——音位系统有如下地基或地面见不到的地下室。音节层面是一楼的固定面积的商店门面。连音变读是二楼的大小不同的办公室、会议室、舞厅。语调系统是包括凉亭、阳台和花坛在内的附属物，显得空灵而个性化。汉语的音节（字）大多是有意义的语素，是构词、连语、造句的最小单位。音节的分解及其结构形式的考察，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但是如果停留子音节及其下位成分的研究，显然是不能揭示汉语语音系统的整体面貌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了，连字成词，连词成语，连语成句，每一个层次的意义的组合都无不与音节的缀连方式、与语音的音响效果紧密相关。对于音节上位的两个语音层级的研究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在四个层级系统中，汉语诸方言都有共同性，也有各自的特点。在研究单一方言时要切合该方言的特点作深人的考察，充分展示它的"异"。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则要注意各方言点之间的"同"，有了许多区方言语调的调查之后，还可以归纳其中的类型，概括汉语语音的共性。回顾数十年来汉语音系学的研究，总在汉字的魔方里打转，只是往细微处观察，对于音节以上的种种组合和变化未加深究，实在是局限了视野，见不到整体，抓不住特点。就那些局部的细微的特征去为汉语方言分区，也便众说纷纭，相持不下，未能得出大家公认的结论。汉语方言的语音研究本来应该为现代汉语音系学乃至整个汉语音系学作出贡献的，由于我们的眼界不够开阔，这种作用也还没有能够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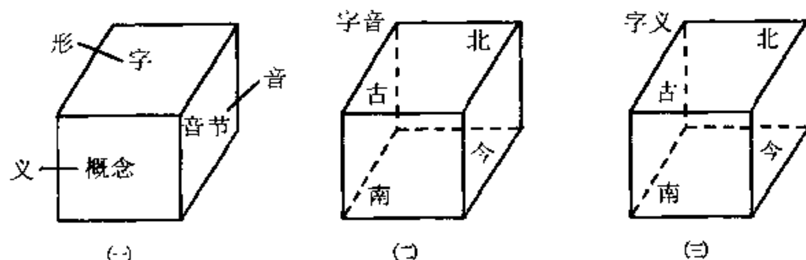
二、汉语方言的字音系统

1. 字音系统是汉语方言语音特有的系统

上文讨论的四个层级好像把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都说遍了，那么，历来所说的这个方言和那个方言的不同，如果纯粹从共时的角度去描述方言语音的特点，诸如说有几个元音音位、辅

音音位，ts、ts'、s不拼i、-i-等等，人们总觉得没有抓住要害，不能说明问题，非得要另外罗列一套什么“全浊声母读为送气清音”、“舌上音读为舌头音”之类的语音特征，才算是说到点子上。那么，这些音类的特征究竟属于哪个层面呢？这些声母的特点其实都是以广韵系统为参照系的历时比较的特点，而不是共时的结构特征。历来的音韵学所以一说语音特点便走到历时的轨道上，这并不是人们迷失了方向，而是汉语方言特有的结构基础所使然。

对汉语来说，本来就只有“字”的观念。音节、词的概念都是后来从国外语言学引进的。汉语的字确是一个奇特的东西，中国人都知道，凡字，都有形音义，这本来也是事实。中国的字还有一个特点，许多字都是时贯古今，地跨南北的，倘若摒弃一切异体不算，各个字的音义，古往今来，南北四方都可以有同，也可以有异。这种情况可用以下图解来说明：



第一个图说明字和音节和概念是三位一体的（当然要扣除少量的连绵字）。第二、三个图说明，字是抽象的，其音义在古今南北都可以有不同。就字音的异同而论，古今也好，南北也好，都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对应的。所发生的变异也有一定的规律性，也是构成一定的系统的。这就是汉语语音的特有系统，最能体现汉语特色的字音系统。做方言调查时要归纳“声韵调表”，填制“单字音表”（声韵调配合的音节总表），这是反映方言语音系统的；除此之外还要编制“同音字表”。有经验的方言调查工作者都知道，这是更加重要的材料，因为它除了反映了方言语音系统之外，还包含了方言的字音系统。

徐通锵在他的新著《语言论》中提出，字是汉语的结构本位，也是结构基础。他说：“字在结构关联中的地位是多向的、立体的、处于核心的位置，是语音、语义、语法、语汇的交汇点，一切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它对各个层次的关联方式都是以‘1’为基础的‘1=1×1’的层级体系，形成‘1个字·1个音节·1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基本结构格局。”（徐通锵，1997，127页）

可见，几千年来研究汉语方言语音特点时都拿字音的音类分合作为主要考察内容，这并不是不合科学的，而正是切合汉语特点的表现。

汉语方言的字音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音类系统，一是异读系统。音类系统是每个音管了哪些字，包括每个音节所管的字和每个声、韵、调的类别所管的字。也就是字在音节或声韵调的类别中的分布。异读系统是方言词语用到的字都有哪些不同的读音，也就是不同音节在字里的共现。

如果汉语不使用汉字，也就无所谓音类，有的只是音节或音位在语流中所出现的频度，而音的频度和管多少字还是两回事，因为有的字极常用，有的极不常用。如果不使用汉字，当然也无所谓异读。hǎo-hào不用同一个“好”字来写，只是两个不同调的音节，当然就无所谓

异读。可见，字音系统是汉语语音特有的系统，是我们研究汉语方言语音应该聚焦的特殊点。

2. 汉语方言的音类系统

音类系统的不同是字音在音位系统中的分布的不同。例如在各地闽南话都有 i、u 两个单元音韵，但是以下字音在不同方言点的这两个韵里的分布就有同有不同：

	知$_{文}$	支$_{白}$	之	久$_{白}$	蛛	富$_{白}$	锯	女	煮	区	具	取
惠安	ti^1	ki^1	tsi	ku^3	tu^1	pu^5	ki^5	li^3	tsi^3	$k'u^1$	ku^6	$ts'u^3$
厦门	ti^1	ki^1	tsi^1	ku^3	tu^1	pu^5	ku^5	lu^3	tsu^3	$k'u^1$	ku^6	$ts'u^3$
漳州	ti^1	ki^1	tsi^1	ku^3	tu^1	pu^5	ki^5	li^5	tsi^3	$k'i^1$	ki^6	$ts'i^3$

12 个字在 i、u 韵中的分布数如下：

	i	u
惠安	6	6
厦门	3	9
漳州	9	3

有时，正如赵元任所说，“因为音的类变了，就会影响到整个儿音位的系统”。（赵元任，1980，131 页）还用上述例字，如果用泉州音读出来，就可发现“锯、女、煮”三个字的声母、声调都和三个点的读法一样，但是韵母都读为 ɯ，比另外三个点多出了另一个元音音位。可见字音的差异对于汉语方言来说，不仅对区分大方言是重要的，对于区分小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

方言的音类包括音节和声、韵、调的类别，也包括元音、辅音音位的类别，大大小小的音类，多的可达四五百个。全部作为考察对象，工作量太大，而且重点不突出，特征显示不出来。因此，必须拿一个共同的参照系来对比。这个参照系就是《广韵》系统。有些学者喜欢说南方方言里有“超《广韵》”的现象，其实，即使方言的字音反映的是上古音的类别，不论是上古的共同语或上古的方言，也都和《广韵》系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说闽语的轻唇读重唇，舌上读舌头是“超《广韵》”的，拿《广韵》的轻唇音和舌上音来比较，不也一样可以说明这些特点吗？韵母方面的一些特点也一样，例如歌韵字读 ai、a 韵，鱼、模韵字读为 ɔ 韵，虽然也“超《广韵》”，也同样可用《广韵》的对应关系来说明。可见，用《广韵》音系的音类来作为各方言比较时使用的共同参照系是完全可行的。

在诸多的音类中，拿哪些作为比较的重点，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选择重点音类时，应该注意哪些原则呢？上一章在讨论方言分区时曾引用了丁邦新的说法：既要区分“历史性和平面性”，也要区分“普遍性和独特性”（丁邦新，1982）。也就是说，早期分化的音类比晚近分化的音类重要；多区方言有不同分合的音类比个别区方言有特殊分合的音类重要。除此之外，选择重点音类时还应该区分大音类和小音类。凡是管的字多的大音类在方言中有不同的分合的都比较重要，管的字少的小音类或个别字的特殊读音重要性就差一些。例如声调的音类中，入声调的有无就显得重要，浊上字读什么调的重要性同它不好比。据《普通话正音字表》（1958，新知识出版社），2279 个常用字中，入声字有 633 个，占总字的三分之一以上，在各

地方言中入声调或有或无，有入声调的分不分阴阳，无入声调的归入何调，情况差别很大。虽是元明之后入声调才归入舒声调，可以视为晚近分化的音类。但由于它是一个管字多的大音类，入声调的演变还应是比较的重点。口语常用的次浊上字的总字数充其量才数十个，黄雪贞提出的次浊上归阴平的字，在梅县才 36 个，在有的客家点则只有 20 个左右或者更少，又只是个别区的“独特性”特征（黄雪贞，1988），其重要性就差些，不必作为比较时普遍采取的重点。又如声母之中，精知庄章的分混，也是牵涉面甚广的特征，据上述正音字表，普通话读卷舌音的达 675 字，也占总字数近三分之一，汉语诸方言中有的都混为 ts、ts'、s，有的分 ts、tʂ，有的还有 tɕ、t、k、pf 等读法，可见它也是个“普遍性”特征。而 n－l－r 的分混，牵连的只有 300 多字，又是晚期音值演变后混同的“平面性”特征，显然就没有那么重要。f－h 的分混虽然只有 233 个字，但牵连到是否有轻唇读重唇的早期分化特征，牵涉到 f、h 与 u 韵头的组合规律，因此还比 n－l－r 的分混显得重要。

上一章讨论区分方言的语音标准时列举了属于字音音类的 7 条普遍性标准和 14 条独特性标准，都是比较重要的、又具有较大覆盖面的音类比较的项目。在考察方言的音类特征时不妨把范围再扩大一些，待比较之后再作筛选。下面的一些条目也可以作为初步比较考察的参考项目：

（1）有无疑母、日母脱落读为零声母的现象或疑母与泥母相混的现象？

（2）开合口上的分歧，有无开口一等字读合口或合口一等字读开口的现象？

（3）有无能区别广韵重韵或重纽的现象？

（4）二等韵有无 i 介音，见系声母逢二等韵是否颚化？

（5）分不分尖团，若分是 ts－tɕ 之别或 ts－k 之别？

（6）去声分不分阴阳？有无清上去、浊上去各自合流的现象？

（7）次浊字的声调有无阴阳两归的现象？

（8）浊上字有无读归阴平调的？

3．汉语方言的异读系统

关于汉语方言的字音系统，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方言音类差异的考察。关于汉语方言的异读，以往有一些局部的研究，但是都没有充分地理解它在语音系统中的意义，未能认识异读现象的性质，也没有把异读作为方言比较研究的课题，因此，本节将多花些笔墨就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方言字音异读常见的有三种类型，以下分别讨论。

（1）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首先是一种语音现象，是方言不同历史层次的字音的叠置。在方言形成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共同语和方言的语音特点都可能沉积其中。一般说来，在外地方言，白读音是方言固有的，包括古时候承传的和方言创新的；文读音是共同语的影响，也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例如厦门话：

平　piŋ^{2}和～　pĩ^{2}～坦　p'ĩ^{2}～整　piã^{2}～声　p'iã^{2}～本(捞回成本)

piŋ^{2} 是按反切推出的文读音，其他 4 个是白读音，可能读为ĩ韵的比读 iã韵的古老些。如果是年轻人，可能还会把“和平、平叛”，等现代书面语词读为近于普通话的p'iŋ^{2}，便是新文

读音。

"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读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从外地借来的。"（李荣，1982，115页）

文白异读又是词汇现象。不少方言文读音用于书面语词，所以又称为读书音，白读音用于口头语词，所以又称为说话音。例如北京话薄：pɔ²～弱、pau²～纸，落：luo⁵～后、la⁵～了、lau⁵莲花～。厦门话的"唐山"读 tɔŋ²san¹，指的是河北市名，读 tŋ²suã¹，是华侨所称的祖国和故乡。在实际语言中，字音都是组成一个词而连说的，在词语里，读文读音或白读音常常不能任意更换。久面久之，不同的字音便和词语里的语素义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单字在不同语词里有不同的语素义，文白读便成了区别字义的手段。例如北京话"和了"读 hə² 指下棋打个平手，说 hu² 指打麻将时牌的分配符合要求，得胜。上例中厦门话"平"的四种白读音也是不能任意更易的，成了区别字义的手段。因此，"文白异读"是"字音"的概念，对字来说是异读，如果在词语中，文读词和白读词一般是有定的，并非异读，就词语来说，只能称为文白读，不能称为文白异读。

文白异读是字音整合的手段。方言的字音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来源的音的总汇，文白异读是把这些不同的音兼收并蓄、叠置起来，使它们各得其所的整合方法。所谓整合就不是杂乱的堆砌，而是有一定对应；不是任意变读，而是有明确的分工。当然，这种整合不是人为的，而是方言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衍生的规律所决定的。厦门话的"平"字的文白读反映了声母有 p－p'的文白对应，韵母有 iŋ－ĩ²、iŋ－iã的文白对应。并母字读为 p/p'，庚韵读为 iŋ/ĩ、iã。在种种组合之中，piŋ² 是按反切推出来的音，是模仿得不太像的中古标准书音。p'ĩ²的读法声韵母都早于中古，piã² 的声韵母都晚于中古，和平的平读 p'iŋ 便是现代国音的影响。许多一文一白的字音，其对应关系所反映的不同历史层次都是很清楚的。下面厦门话的例字中前音文读，后音白读。人们很快就可看出各个声类韵类的文白读，何者为先，何者为后。

斧	hu³——pɔ³	（非、麌）	扶	hu²——p'ɔ²	（奉、虞）
超	ts'iau¹——t'iau¹	（彻、宵）	柱	tsu⁶——t'iau⁶	（澄、麌）
猴	hɔ²——kau²	（匣、侯）	活	huat⁸——uaʔ⁸	（匣、末）
榕	iɔŋ²——tsiŋ²	（以、锺）	翼	ik⁸——sit⁸	（以、职）
注	tsu⁵——tu⁵	（章、遇）	支	tsi¹——ki¹	（章、支）
事	su⁶——tai⁶	（禅、志）	陈	tin²——tan²	（澄、真）
月	guat⁸——geʔ⁸	（疑、月）	石	sik⁸——tsioʔ⁸	（禅、昔）
反	huan³——piŋ³	（非、阮）	转	tsuan³——tŋ³	（知、狝）

文白读也是词汇整合的手段。不同语体色彩的语词、不同义项的词，虽然用字相同，由于是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的语词，便用不同历史层次的音来包装它。也可以说是让不同的音有了分工。对字来说是不同的包装，对音来说是不同的分工。"包装"也好，"分工"也好，也都是一种整合。以泉州话为例，不同的词汇层用文白读来区分有如下的分工：

方言固有词多用白读，普通话转借词多用文读，例如（例词声调只标原字调）：

前方　tsian² hɔŋ¹——tsuĩ² paŋ¹　（前次）

空间　k'ɔŋ¹ kan¹——k'aŋ¹ kuĩ¹　（空房）

生气　səŋ¹ k'i⁵（～～蓬勃）——tsĩ¹ k'ui⁵　（傻里傻气）

童子　tɔŋ^{2} tsɯ^{3}（～～军）——taŋ^{2} tsi^{3}　（神乩）

书面语词多用文读，口语词多用白读，例如：

诚实　siŋ^{2} sit^{8}——tsiã^{2} tsat^{8}　（塞得很紧）

数目　sɔ^{5} bɔk^{8}——siau^{5} bak^{8}　（账目）

世界　se^{5} kai^{5}——si^{5} kue^{5}　（四处）

糊涂　hɔ^{2} tɔ^{2}——kɔ^{2} t'ɔ^{2}　（沾上泥）

先生　sian^{1} səŋ^{1}——suĩ^{1} sĩ^{1}　（先出世）

作息　tsɔk^{7} siak^{7}——tsoʔ^{7} sit^{7}　（干活）

专门术语用文读，一般用语用白读，例如：

熟地　siɔk^{8} te^{5}（中药名）——siak^{8} tue^{5}　（熟悉的地方）

张力　tiɔŋ^{1} liak^{8}（物理名词）——tiũ^{1} lat^{8}　（准备用力）

开方　k'ai^{1} hɔŋ^{1}（数学名词）——k'ui^{1} hŋ^{1}　（开药方）

大食　tai^{6} sit^{8}（历史地名）——tua^{6} tsiaʔ^{8}　（食量大）

雨水　u^{3} sui^{3}（节气）——hɔ^{4} tsui^{3}　（下雨的水）

大寒　tai^{6} han^{2}（节气）——tua^{6} kuã^{2}　（严寒）

外地地名多文读。本地地名多白读，例如：

长安　tiɔŋ^{2} an^{1}——长泰　tio^{2} t'ua^{5}

四平　sɯ^{5} piŋ^{2}——西坪　sai^{1} pĩ^{2}

黄河　hɔŋ^{2} ho^{2}——黄厝　ŋ^{2} ts'u^{0}

河西　ho^{2} se^{1}——西河　sai^{1} o^{2}

有时，不同时代形成的方言词各用文白读，用字相同，音义迥异，例如：

伤重　siɔŋ^{1} tiɔŋ^{4}（耗费大）——siũ^{1} taŋ^{4}　（太重）

定着　tiŋ^{6} tiɔk^{8}（确定计划）——tiã^{6} tioʔ^{8}　（一定，安定）

无过　bu^{2} kɔ^{5}（只不过）——bo^{2} kə^{5}　（没过）

丈夫　tiɔŋ^{4} hu^{1}——ta^{1} pɔ^{1}　（男子）

文白异读在不同的方言有各不相同的表现。从量来说，不同的方言有文白异读的字有多有少。就已经知道的大略情况说，北京话、广州话的文白异读是少的，闽语的文白异读就很多。李如龙 1963 年整理过 1 千多字的文白异读（李如龙，1963），后来又陆续有所发现。常用字大概有 6 成以上有文白异读。罗常培早已说过："各系方言的读书音和说话音往往都有一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罗常培，1956，41 页）从质来说，不同的方言的文白异读在语音上都有不同的对应，在词汇中则有不同的分工。比较常见的是韵母的不同，其次是声母不同，声调不同的较少。有的方言也有两项或三项都不相同的。例如福州话：

树　søy^{6}建～——ts'ieu^{5}（大～）　　面　mieŋ^{6}方～——mɛiŋ^{5}作～：做姿态

腐　hu^{3}防～——pɔu^{6}木头朽了　　有　iu^{3}专～——ɔu^{6}～力

氓　maŋ^{5} 流～（新文读）——mɔuŋ^{6}流里流气

复　huʔ^{8}～兴——pɔu^{6}～来了（又来了）

就在闽语之中，各地表现也有不少差异。闽南有文白读的最多，闽东其次，闽北较少。

闽、台境内的闽南话文白并存的较为普遍，粤、琼境内的闽南话有许多字只有白读没有文读。

可见，文白异读是方言字音系统的重要方面，从中不但可以看到方言语音和方言词汇演变的历史层次，也可以看到方言整合的特点。文白异读的比较是方言比较的重要内容。

（2）别义异读

别义异读是较之文白异读更为广泛的字音异读，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从共同语到方言，都普遍存在。而且古今有别，南北相异。

从古典语文学到现代语言学，别义异读都有许多学者研究过。或称为因音别义，“音随义转”。周祖谟先生则把异调别义称为“四声别义”。他说（1946）：“古人一字每有数音，或声韵有别，或音调有殊，莫不与意义有关。盖声与韵有别者，由于一字所代表之语词有不同，故音读随之而异。……至若音调有殊者，则多为一义之转变引申，因语词之虚实动静，及含义广狭之有不同，而分作两读。”（81 页）对于此种现象的性质，他说：“借四声变换以区分字义者，亦即中国语词孳乳方式之一端矣。其中固以变字调者为主，然亦有兼变其声韵者。”（112 页）“汉语古代书音以四声区分词性及词义，颇似印欧语言中构词上之形态变化。”（113 页）他还注意到“以四声区分语词，不仅见于书音，抑且见于口语。”（116 页）但毕竟他着重注意的是古代书音中的此类异读，而且集中于考察“异调别义”，近年，北京大学博士生孙玉文的博士论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也限于此项异读别义。因此，把古今南北的此类异读联系起来，从语言的系统上来考察它的性质和演变，还是一个值得提倡的新课题。

文白异读有时并不别义，或者最多是语体色彩有所不同，但有时也可别义（如上文所举闽南话的例子）。如果是别义的，也就是别义异读。可见文白异读和别义异读二者有交叉。

从音的角度考察别义异读，这种异读也不是随心乱造的，而是含着一定的规律的。

从声母说，别义异读常常是“旁转”，即声母变读为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发音方法不同的音类。下面所举诸例是《切韵》、《广韵》的异读在今日泉州话里还保留着相应音义的异读，可以说明《切韵》与闽南话在别义异读上是一脉相承的：

例字	古音反切及义注	泉州话音义
揣	丁果（端）摇	tai³走路摇摆貌
	初委（初）度量	ts'ə³推算、估算
解	加买（见），说议	kai³文 kue³白 ～说
	鞵买（匣），晓	e⁴ ue⁴善于待人，通晓
断	都乱（端），决狱	tuan⁵决～，～定
	徒管（定），（原缺义注）	tŋ⁴～去(断了)
		（以上切韵，以下广韵）
徛	渠绮（群），立也	k'a⁴～咧（站着）
	居义（见），石杠，聚石以为步渡	kia⁵石～：浅水河中所立供步渡的石墩
跪	去委（溪），拜地	k'e³～公：跪拜祖宗
	渠委（群），长跪	kui⁴罚～
跳	他吊（透），越也	t'iau⁵～过去
	田聊（定），跃也	tio²～：惊吓而跳；t'io²～：弹跳
巡	详遵（邪），逡巡	sun²～视

俞巡（以），行也　　　　　　　　un²漫步

从韵母说，有的异读别义是"阴阳对转"，即阳声韵与人声韵的互变。《广韵》的异读中有不少此类对转，有的在现代方言中还有保存。例如：

腌　于严切，盐渍鱼也；又于业切，注同。阳声多见于官话读 ian¹，人声多见于客、赣、粤诸方言，读 iap⁷。

盦　乌含切，覆盖也；又安盍切，注同。阳声在厦门话读 ŋ¹，人声在福州话读 aiʔ⁷。

搵　于粉切，没也；乌困切，搵衲，按物水中；乌没切，手擦物貌。阳声见于粤语，广州音 uɐn³，意为寻找；去声入声见于闽语，厦门话 un⁵ 意为沾湿；ut，意为手脚扭伤。

扩　胡旷切，捶打也；苦郭切，张大也（见《集韵》）；苦郭切见于闽南话，厦门音为 k'ɔk⁷，意为敲打。胡旷切见于粤语，广州音 k'uɔŋ⁵、意为张大，二者音义互调。

去声和入声两读的既异于韵也异于调。还以泉州话合于《切韵》异读的音义为例：

例字	古音反切及义注	泉州话音义
刺	七置（置），针刺	ts'i⁵草～，～绣
	七迹（昔），穿刺	ts'iaʔ⁷～羊毛衫（织毛衣）
契	苦计（霁），约	k'ue⁵田～厝～（房契）
	苦结（屑），刻绝	kueʔ⁷～绝（排挤）
画	胡卦（卦），图	ue⁶～图，图～
	胡麦（麦），分	ueʔ⁸～痕（画线）
副	敷救（宥），贰，	hu⁵～手
	芳逼（职），析	p'iʔ⁷～皮（剥切取皮）
乞	欺讫（迄），取也	k'it⁷～食，～囝（买儿子）
	去既（未），与人物也	k'i⁵～伊骗（被他骗），～出来
出	尺类（至）	ts'ui⁵（挖出）
	尺律（术）	ts'ut⁷～人

变调别义在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对应。在古汉语和官话区，平声与去声异读最多，上声与去声有异读的也不少。例如：

平—去	古音反切	北京音	上—去	古音反切	北京音
冠	古桓	kuan¹	种	之陇	tʂuŋ³
	古玩	kuan⁵		之用	tʂuŋ⁵
过	古禾	kuo¹（姓）	处	昌吕	tʂ'u³
	古卧	kuo⁵		昌据	tʂ'u⁵
传	直专	tʂ'uan²	数	色主	ʂu³
	直恋	tʂuan⁵		色句	ʂu⁵
将	即良	tɕiaŋ¹	饮	於锦	in³
	即亮	tɕiaŋ⁵		於禁	in⁵
空	苦红	k'uŋ¹	好	呼皓	xau³
	苦贡	k'uŋ⁵		呼到	xau⁵
当	都郎	taŋ¹	假	古雅	tɕia³

	都浪	taŋ^{5}		古讶	tɕia^{5}
相	息良	ɕiaŋ^{1}	少	施沼	ʂau^{3}
	息亮	ɕiaŋ^{5}		施照	ʂau^{5}
兴	虚凌	ɕiŋ^{1}	倒	都老	tau^{3}
	许应	ɕiŋ^{5}		都导	tau^{5}

沿海闽语有些异调别义也与古反切相符：

例字	古反切及义注	福州话	厦门话
过	古禾，经	kuai^{1}（莱）老	kua^{1}（同左）
	古卧，失	kuɔ^{5}罪～	ko^{5} kua^{5}（同左）
槧	七廉，削板	ts'ieŋ^{1}竹签	ts'iam^{1}（同左）
	七赡，札	ts'ieŋ^{5}（厮打）	ts'iam^{5}札（尖物刺）
盐	余廉，咸也	sieŋ^{2}食盐	iam^{2}（同左）
	以赡，以盐渍物	siɛŋ^{6}腌	sĩ^{6}（同左）
长	直良，久也，远也，常也	tuoŋ^{2}不短	tŋ^{2}（同左）
	直亮，一日余	tuɔŋ^{6}剩余	tiɔŋ^{6}（同左）
乞	欺讫，取也	k'øyʔ^{7}乞讨	k'it^{7}（同左）
	去既，与人物也	k'ei^{5}被（介词）	k'i^{5}（同左）

粤语的异调别义都是拿高平调（阴平）与高升调（阴上）来表示引申义的。例如：

例字	本调	高平变调	高升变调	
儿	ji^{2}～童	ji^{1}乞～：乞丐	计 kɐi^{5}～算	kɐi^{3}计谋
尾	mei^{4}月～	mei^{1}第尾：最后一个	睡 søy^{5}～眠	søy^{3}独～：单人床
文	mɐn^{2}～章	mɐn^{1}一～：一元钱	父 fu^{6}伯伯	fu^{3}伯～：老大爷
如	jy^{2}～果	ji^{1}～家：如今	婆 p'ɔ^{2}肥～	p'ɔ^{3}八卦～：啰嗦女人
大	tai^{6}～小	tai^{1}咁～：太小（反语）	大 tai^{6}～小	tai^{3}咁～：仅此而已

晋语的异读别义在声韵调方面都有异读的。平遥方言就有以下诸例（侯精一，1999）：

异声	透	t'əu^{5}尙（詈词）	təu^{5}～气（语音避讳）	
	块	k'uæ^{3}纸～～（名词）	xuæ^{3}一～人（量词）	
异韵	哥	kiᴇ^{1}外人称述某人之义	ka^{1}对年长者的昵称	
	婆	p'ɔ^{1}，pei$^{1}_{白}$公公（背称）	pæ^{3}～～：姥姥	
	娘	ȵiaŋ^{1}大～：大伯母	ȵyə^{1}～～：供奉的女神	ȵia^{1}～～：祖母
异调	片	p'iᴇ^{5}～～：女阴	p'iᴇ^{3}一～纸（量词）语音避讳	
	颗	k'uei^{1}一～蛋（量词）	k'uei^{3}～～：疙瘩（名词）	
	和	xɔ^{1}～气	xuei^{5}～面（动词）	xuei^{3}连词

从义的角度看，异读别义所别的字义之间完全无关的也很少，如欧，鸟侯切，姓，乌后切，吐。可能是“呕”的异写。大多数都有一定的意义的联系，从上文所举异读的词例即可看出其间意义上的联系。周祖谟就“四声别义”的意义上变异的分类也可作为参考（周祖谟，1946）。

因词性不同而变调者：

①名词用为动词 ②动词用为名词 ③自动词与他动词互变 ④形容词用为名词 ⑤形容词用为动词 ⑥时间词用为动词 ⑦数词用为量词

因意义不同而变调者：

①意有彼此上下之分 ②意义引申变转 ③意义有特殊限定 ④义类相若，略有分判

有别义异读的字在北京音里大概占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在其他方言相对较少。李如龙(1999)曾作过50个常用字的调查和比较，在北京话里有107个别义异读，在其他方言，厦门话除文白异读外只有3个字有异读。然而如果连文白别义也算在内，恐怕厦门话的别义异读的比例是最高的。上海话只有6个，在香港粤语也只有15个。在北京话，"缅、蒙、强、糊、作"都有3个音义，有几个外地人能掌握好？不少非官话区的人连"都 tu^1、tou^1，假 $tɕia^3$、$tɕia^5$"还分不清哩！可见，就别义异读进行普通话与方言的比较，以及方言间的比较，都是十分必要的。

(3) 音变异读。

如果说文白异读和别义异读是成系统的稳定规则的话，这里所说的音变异读则是系统性不明，不稳定的，还处在变异中的异读。具体地说又有以下4种：

① 新旧异读 即同一个字老派与新派有不同读音。如山东姓"盖"，老派读 $kə^3$，新派读 kai^5。广西地名百色，老派 po^2，新派 pai^3。

② 借用异读 即受共同语或外方言、外国语影响而产生的异读。如泉州"书"原读 $sɯ^1$，后又借了 su^1。

③ 正误异读 误读产生后与正读长期竞争，如厦门话"放假"ka^3/ke^5，广州话"纠"误读为 $tɐu^3$，目前已占优势。

④ 同义异读 即用同义的字训读。如海南话"思"读"想"的音 tio^3。

为了考察方言的共时变异，这类异读也是值得研究的。但这毕竟没有构成共时的稳定系统，因而也就没有前两项那么重要。这里就不再详细讨论了。

思考与练习

一、就三种重要方言整理出它们在多音连读方面的音变差异，并说明这些差异的不同类型及其对方言分区的意义。

二、根据普通话多音多义字典对你的母语方言作一番字音异读的考察，说明方言和普通话在字音异读上的差异的类型和性质。

三、列举你所熟悉的方言有哪些别义异读，并查清哪些是古代异读的继承、哪些是方言的创新。

四、试论文白异读的性质。

参考文献

李如龙 (1962) 厦门话的变调与轻声 《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王理嘉 (1991) 音系学基础 语文出版社

王洪君 (1999)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 (1980) 语言问题 商务印书馆

(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1933) 中国字调跟语调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二分
李如龙、张双庆等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 (1986) 皖南方言分区(稿) 《方言》第1期
侯精一、温端政等 (1993) 山西方言调查报告 山西高教出版社
傅国通等 (1985) 浙江吴语分区 《杭州大学学报》增刊
李如龙等 (1995) 福建双方言研究 汉学出版社(香港)
李如龙 (1991) 闽中方言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李如龙、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克炯 (1978) 《左传》复音词初探 《华中师院学报》第4期
程湘清 (1992a) 两汉语言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2b) 隋唐五代语言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叶祥苓 (1993) 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熊正辉 (1995) 南昌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王 芳 (1997) 湘乡方言的轻声及轻重音在词语与句子中的分布 暨南大学(硕士论文)
曹志耘 (1996) 金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 (1996) 松溪政和方言的谐音变读 《方言与音韵论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李 荣 (1979) 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第1期
(1978) 温岭方言的变音 《中国语文》第2期
张洵如 (1939) 北平音系小辙编 开明书店
赵元任 (1923) 新国语留声片乙种课本 商务印书馆
平田昌司主编 (1998) 徽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贺 巍 (1982) 获嘉方言韵母的分类 《方言》第1期
陶燠民 (1956) 闽音研究 科学出版社
李如龙 (2000) 福州话声母类化的制约条件 《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
麦 耘 (1998) 广州话语调说略 《广州话研究与教学》第三辑 中山大学出版社
植符兰 (1997) 广州方言的语气词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徐通锵 (1997) 语言论 东北师大出版社
丁邦新 (1982) 汉语方言分区的条件 《清华学报》新14卷1、2期
黄雪贞 (1988) 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 《方言》第4期
李 荣 (1982) 音韵存稿 商务印书馆
罗常培 (1956) 厦门音系 科学出版社
周祖谟 (1946) 四声别义释例 《问学集》 中华书局
孙玉文 (2000)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侯精一 (1999) 现代晋语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 (1999) 论汉语方言异读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第五章　汉语方言语音比较研究

一、汉语方言语音的共时比较

1. 共时比较研究的对象和目的

汉语方言语音比较研究的对象无非是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以及方言与方言的比较两类。

方言与共同语的比较在理论方面有两种目的。一是考察方言与共同语差异的大小，一是考察方言受共同语影响的深浅。事实上，这两个目的也是相互联系的。

汉语方言中有的和共同语差别很大，像东南各方言，除近江湘语之外大多与官话区的人不能通话，而有的则差异不大，如广阔的官话方言区。笼统地说“汉语方言复杂多样”是不科学的说法。官话方言区，使用人口应有10亿之众，分布面积则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约6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西欧和北欧的面积，人口可能有西欧北欧的3倍。这样大的方言区内部差异不大，在世界上是仅有的。丁声树、李荣在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报告中，谈到官话方言区时说：“本区人口约38 700万。汉族人口总数是54 700万，本区约占70%，本区的语言一致的程度很高，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直线距离大约有3 200公里，从东南的南京到西北的酒泉，直线距离大约有2 000公里，各地的人通话没有困难。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地域，语言如此一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汉语的方言情况是很复杂，因此常常有人片面地强调复杂，忽略了一致的一面，这是跟事实不完全符合的。”（丁声树、李荣，1956，82页）究竟不同的方言和共同语的差别有多大，这就必须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加以准确的说明。

汉语的共同语在古代时期主要是书面语。明清以来，由于城市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以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由于官话方言分布地域广阔，使用人口众多，加以近代白话小说（《水浒》、《红楼梦》之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现代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普通话和诸多方言连界相处以及双语并用的过程中，在书面语逐渐与口头语接近并加大了对口语的影响的过程中，在社会生活逐渐趋同、地域经济和地域文化特色日趋淡化的过程中，某些方言的语音也发生了一些向普通话靠拢的变异。例如，湖南境内沿江和沿铁路线湘方言已经把古来的全浊声母变读为不送气的清声母，现代吴语单字调的缩减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据钱乃荣（1992），他所调查的33个吴语点中，老辈单字调类多有7～8类，而青年一辈则有15个点减少为6～5类。其中苏南的金坛自8类减少为5类，昆山和南汇周浦自8类减少为6类。调类减少是近代以来汉语语音演变的大势。官话普遍只有4个调，多者5个，少者3个。东南方言调类的缩减也是向共同语靠拢的表现之一。从总体上看，近江方言受官话影响大些，远江方

言受影响则小。但是具体地表述哪个方言受共同语影响多少，有时还有一些并非沿着共同语的方向演变的，又占有多少比例，也非得经过全面系统的比较不可。

方言和共同语比较还有应用方面的意义。经过比较，找出方言和共同语的语音对应关系，便可以帮助方言地区的人学好普通话标准音。如有实际需要学习周边方言，也可用找出对应的办法，使学习别的方言事半功倍。

方言之间的语音比较又分为两种，一是同类或同区方言之内的比较，一是异类或方言区之间的比较，同区或同类方言的比较，可以显示同类、同区方言的共同语音特征，为方言的分区作出具体的论证。例如把许多吴方言的声母进行比较，便可以看出除了边界吴语之外，大多数吴语都保留着浊音声母古“帮滂並、端透定”等三分。这便是吴方言的重要语音特征。又如各地闽方言比较之后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方言点没有 f、v 声母，把许多古非组字读为 p、p'、m；没有两套塞擦音，把许多古知组字读为 t、t'，此外，闽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共同特征，可参阅《论闽方言的一致性》（陈章太、李如龙，1983）。至于异类、异区方言之间的比较，主要是用方言间的异同来说明不同区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客方言和赣方言之间古全浊声母读为送气清音，晓匣合口字读为 f、v，浊上字有些读归阴平调。似乎二者之间相同点很多，其实，全浊送气也见于江淮官话和关中官话；晓匣合口为 f、v，也见于粤语；而赣语中则还有次清归全浊读为送气浊音的。此外，知章组在赣语不少点读 t、t'，又赣语影母读 ŋ－，尖团不分，n、l 多不分，也是客家话不为多见的。还有，赣语的轻声很明显、很普遍，客家则基本上没有。可见，只有作全面的比较，才能真正把方言之间的异同看清楚。

方言共时比较的目的，除了考察方言的异同和关系的远近之外，还应该着力于了解方言语音的结构规律。任何方言的语音的种种差异和特点总是用一定的方式整合在一个共时的系统之中。通过方音特点的分项比较，可了解方言的异同及关系；通过方音整体合成的比较分析，则可了解不同方言的共时结构规律的差异。共时的结构规律包括音位分布规律、音节结构规律、音组连读变化规律和句段的语调系统。例如元音音位、辅音音位的多少及彼此间的区别特征，调型和调值的结构，声韵调拼合关系，连音变化的项目多少、规律的繁简，字音异读的多少及其对应关系，停顿、抑扬在语调中的作用等等，在各方言都有不同的整体表现。诚然，由于文化历史条件的不同，有的方言共时结构规律严密些，有的就比较松散。例如连读变调，有的方言快说则变，慢读则不变。有些方言因自身发生急剧变化或外方言施加强大影响，因面新旧异读或固有音与外来音的异读就多。这都是应该经过共时比较才能显示出来的。

2. 共时比较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方言语音的比较研究一般都从分项特征的比较入手。把参加比较的方言调查材料放在一个平面上对齐，就可以看出有哪些分项是同的，哪些分项是异的，而后便可以考察各项异同的具体表现。

考察方言语音分项的异同，必须按照汉语方言语音系统的多层结构进行全面的比较，但是也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的重要性，着重考察主要项目。

在音位的层面，声母的类别和声调的类别是比较重要的项目。声母的类别和辅音音位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按照对立互补的关系确认辅音音位。有无浊音声母系列和有几套对立的塞擦音应该是考察的重点。调类的多少往往影响方言的可懂度。像官话方言，多数只有 4 个调类，哪

怕是初次接触的官话方言，不论调值如何古怪，听了十分钟、半小时的话，大体就能够把它的调值折合成普通话的调类，很快就能听懂这种话。这是许多南方人听山东话、河南话都有过的经验。如果调类有 7～9 类，哪怕有的调类同普通话或自己的母语是相对应的，要在短时间里掌握这种折合能力就很困难。同一个方言区片调类数往往比较接近，因而可懂度也较高。例如吴语区多为 7～8 调，少数点新派为 6 调。闽语区 7 调居多，少数为 6 调或 8 调。客赣方言多数点 6 调，少数为 7 调或 5 调。粤语多数为 8～9 调，少者 7 调，多者 10 调。

在音节层面，应该着重考察的有两方面。一是韵母的结构特点。各方言的韵母都有韵头、韵腹和韵尾，但是组合起来轻重强弱却各不相同。吴方言强韵头、弱韵尾，上海话“呆、单”都读 tɛ^{1}，“包”读 pɔ^{1}，“霍忽”读 hoʔ^{7}，这是韵尾弱化（或脱落，或合并）的典型表现，“钱、全”都读 zei^{2}、“花”读 ho^{1}，“火”读 hu^{3}，这是韵头强化，影响乃至吞并韵腹的典型。粤方言是韵头韵尾强而韵腹弱，韵尾有 i、u、y、m、n、ŋ、p、t、k，广州话“标 piu^{1}，边 pin^{1}，半 pun^{5}，雪 syt^{7}”是强韵头和强韵尾联合起来挤掉韵腹的典型。客方言是韵腹、韵尾强而韵头弱，撮口呼 - y - 并人齐齿呼 - i -，不少合口呼 - u - 也脱落混人开口韵，如梅县：弯 van^{1}，泉 ts'an^{2}，权 k'ian^{2}，宽 k'ɔn^{1}。另一个考察重点是声韵母的组合特点。不少方言都有一两种在多数方言中少见的声韵组合，虽然管的字不一定多，却是特点鲜明。例如合肥话唇音拼舌尖前元音：比 pɿ^{3}、p'ɿ^{2}、mɿ^{3}，闽北建瓯话唇音和舌尖塞音拼 y 韵：斧 py^{3}、扶 p'y^{5}、锄 t'y^{5}、竹 ty^{7}。闽南话 ŋ 韵可与多组声母相拼，如厦门话：饭 pŋ^{6}、当 tŋ^{1}、汤 t'ŋ^{1}、庄 tsŋ^{1}、算 sŋ^{5}、光 kŋ^{1}、糠 k'ŋ^{1}、远 hŋ^{6}、黄 ŋ^{2}。徽语 ts、tʂ、tɕ 三组塞擦音声母都可拼齐撮呼韵母，例如祁门话：姐 tsiːə^{3}、遮 tʂiːə^{1}、鸡 tɕiːə^{1}、最 tsyːə^{5}、赘 tʂyːə^{5}、桂 tɕyːə^{5}（平田昌司等，1998）。

在字音层面，音类的差异是历来研究者注意的焦点。声类、韵类、调类都要全面地比较，条目多，牵连到全部字音，工作量大、类型多。为了突出重点，应该着重注意那些大跨度的变异。例如在官话方言中有无入声，在人声消失的方言中，古人声字派人何调，便是重要特点。《官话方言的分区》（李荣，1985）一文据此把各官话区都区别开来了。请看下表：

古入声字的今调类

	西南官话	中原官话	北方官话	兰银官话	北京官话	胶辽官话	江淮官话
古清音	阳平	阴　平		去　声	阴阳上去	上　声	入　声
古次浊		阴　平	去　　声				
古全浊	阳　　平						

在阴、阳、人三大韵类中，阴声韵促化，人声韵鼻尾化的变异也是大跨度的变异。晋语之中，“部分古舒声字今读人声或舒人两读的现象……相当普遍，只有数量多少和具体字有所不同”（侯精一、温端政主编，1993）。例如大同话：蔗 tʂaʔ^{7}、指 tsəʔ^{7}、把$_{介词}$pəʔ^{7}、涂 tuəʔ^{7}。属于赣方言的闽西北的邵武、光泽一带把咸、深二摄的人声字读为鼻音尾韵，例如：答、纳、急、十，光泽：tam^{7}、nam^{7}、kəm^{7}、ɕim^{7}，邵武：tan^{7}、non^{7}、kən^{7}、ɕin^{7}，在赣东的余干话则读为 tat^{n7}、lɔt^{n7}、tʃət^{n7}、ʃət^{n7}。阳声韵三种韵尾的分混也有大跨度的变异，如浙西淳安方言通、宕、梗三摄字有读为 - m 尾韵的：红 = 黄 ɔm^{2}、棚 = 篷 p'ɔm^{2}、缸 = 公 kɔm^{1}、荣 = 雄 iɔm^{2}（曹志耘，1996）。晋语祁县方言大部分臻摄合口和通摄字都读ũm、y ũm，例如：敦、东 tũm^{1}，春、村、从、崇 ts'ũm^{1}，昏、红、分、逢 x ũm^{1}，军、穷 tɕy ũm^{1}，云、荣、晕、庸

yũm^{1}（杨述祖、王艾录，1984）。闽语永安方言则把山咸开口一二等及合口三等，宕（多数字）江（少数字）、通合口三等（多数字）读为 - m 尾韵。例如：簪、脏 tsɒm^{1}，惭、残 tsɯm^{2}，凡、防 xm^{2}，中 tam^{1}，宫 kiam^{1}，共 kiam^{5}。像徽语绩溪方言，开口一等韵读 i，合口一等韵读 ɑ、ɑ̃，也属于这类罕见的变异：楼 ni^{2}、沟 ki^{1}、杯 pa^{1}、腿 t'a^{3}、东 t ã^{1}、门 mã^{2}（平田昌司等，1998）。声类的演变中，像南城赣语精、庄、知、章 4 个组的字都有读为 t、t'声母的：当、张、章、姜 tɔŋ^{1}，窗、昌、疮、筐 t'ɔŋ^{1}，读、族、逐、赎 t'u^{7}，策、宅、择、贼 t'eiʔ^{7}（李如龙、张双庆等，1992）。有些晋语则把拼二等韵的见溪群母字读同端透定。例如洪洞话：家、痂 tiɑ^{1}，界芥 tɑi^{5}，交胶 tiɑo^{1}，轿 t'iɑo^{5}，牵 t'iɑn^{1}，轻 t'e^{1}（乔全生，1999）。闽北建阳话把定、澄、从、邪、崇、禅都读同来母：邻、停、情、沉 lɔiŋ^{2}，立、涤、直、集 lɔi^{8}，绝、舌 lye^{8}，老、早、稻 lau^{3}，犁、堤、持、齐 lɔi^{2}（李如龙，1991）。

如上一章所述，字音的异读也是汉语方言差异的重要方面。在字音异读方面，最重要的项目是文白异读和别义异读。从纵向看，文白异读是方言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语音成分的叠置；从横向看，是共同语与方言语音相互影响的结果，都是方音共时系统整合方式的重要表现。不论文白对应条例多与少，也不论各个条例管的字有多少，都很值得注意。已有的调查报告大多已经注意到文白异读的对应，此处不再举例。别义异读以往较少引起方言工作者的注意，其实在各区方言都有大量的表现。拿西宁方言为例（张成材等，1987），略举数例：

熬　nɔ^{1} ～饭，nɔ^{2} 煎～　　派　p'ɛ^{3} ～别，p'ɛ^{5} ～遣

择　tsei^{2} 选～，tsei^{5} ～菜　　座　tsu^{3} ～房子，tsu^{5} ～位

筛　ʂɛ^{1} ～子，ʂɛ^{3} ～～　　溃　k'uei^{3} 崩～，xuei^{5} ～烂

着　tʂu^{2} 火～了，tʂ'u^{2} 睡～了，tʂɔ^{3} 对～

闽方言里有些别义异读是从古汉语继承下来，内部比较一致并为共同语所无，很具特色的。例如上一章所举的例字：盐、画、乞、过、长，具体音义不再重复。

有些别义异读则是各片还有区别。以下例子分别见于闽东、闽南和闽北：

福州		厦门		建瓯	
张	tuoŋ^{1} 姓	跳	t'io^{2} 弹跳（田聊切）	骑	kuɛ^{6} 肩扛
	t'uoŋ^{1} 量词，一～纸		tio^{2} 吓一跳		kuɛ^{8} 背负
			t'iau^{5} ～水（他吊切）		
鼻	p'ei^{5} 大～，流～	跪	kui^{6} 罚～（渠委切）	指	ki^{7} 手指头，手～子
	pei^{6} 嗅		k'e^{3} 跪拜，～公（去委切）		i^{3} 戒指
涂	t'u^{2} 泥土	滑	kut^{7} 滑稽者，～鸟（古忽切）	衫	saŋ^{1} 上衣
	tu^{2} 抹		kut^{8} 路～（户骨切）		saŋ^{6} 棉袄罩衫
才	tsai^{2} 天～	摊	t'u ã^{1} 沙～（他干切）	交	kau^{1} ～代
	ts'ai^{2} 奴～		nu ã^{3} 揉（乃坦切）		kau^{5} ～杯酒

音组层面的语音特征是后起的现象，也是较迟发掘出来的现象，各方言项目有多有少，表现各不相同。句调的层面目前还研究得很不够。在今后的比较研究中这两项比较都应该大力加强，有一项研究一项，先把各方言的表现罗列出来才能开展比较研究。

在分项比较的基础上，还必须作整体的比较。以往的比较研究只有分项特征的比较而没有

整体特征的比较。所谓整体的特征就是各种分项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连和相互制约。这种关连和制约也就是一种整合——共时结构系统的整合方式。下面就几个方面举一些例子来加以说明。

声韵调类别的数量在各大区方言之内大体有相近的幅度，而各方言区之间三种音类的多少则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下面是据《汉语方音字汇》（北大中文系，1989）所整理的20个方言点的声、韵、调音类的对照表：

	声母	韵母	声调
北京	22	40	4
济南	24	38	4
西安	27	40	4
太原	21	36	5
武汉	19	37	4
成都	20	36	4
合肥	21	41	5
扬州	17	47	5
长沙	20	38	6
双峰	28	33	5
苏州	28	49	7
温州	29	34	8
南昌	19	65	7
梅县	18	76	6
广州	18	68	9
阳江	19	61	9
厦门	17	76	7
潮州	18	85	8
福州	15	48	7
建瓯	15	34	6

从上表可以看出，官话区声母都在20个左右，韵母40个左右，声调4～5个。有浊声母的双峰、苏州、温州等方言点声母多近30个，韵母则不是太多（33～49之间）。东南方言普遍声母较少，韵母和声调则较多。与此相联系的官话区声韵调类别少，但是普遍有轻声和连读变调，许多点有儿化。据董少文（1958），北京话的儿化韵母就有25个，对于拼合音节来说，这显然起了一种补偿作用。江淮官话（如合肥、扬州）声母不多，因有入声韵、入声调，只有轻声而没有儿化韵。而在东南诸方言，声韵调类别多的就大多没有轻声调（像厦门话、梅县话，有轻声，但字不多），没有儿化韵。粤方言韵类、调类多，不但没有轻声、儿化，多音连读也不变调（部分粤语的声调变读是词汇、语法现象而不是连音变化）。拿官话和非官话作比较，还可以说，官话区的异读别义多，非官话区的文白异读多，官话区语调较为复杂，有更多升降、快慢的变化，而东南方言则相对较为平淡。

共时比较研究因为参加比较的方言点多，所需比较的项目包括音系、字音、词音等也多，要把所有方言的所有材料都拿来做比较固然很好，但工作量太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抽出某些重要的比较项、限定某些条目，要做到把大量方言点材料对齐，也是很难的。因此，可以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方言点，列出要作比较的重点课题，并选好例字，然后把各点的材料备

齐，放到一个平面上，便可以展现方言间的异同。李如龙、陈章太所著《闽语研究》（1991）一书就是这样做的。包括福建省内18个闽语点的比较和若干闽语片的比较。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则取7个省区的赣方言和客方言各17个点，选取1 320个单字和1 089条词语，列出对照表，然后再作比较分析。这样的做法必须有重点调查的先行，正像探查油田先打探井一样，先对少数有代表性的点作深入研究，并了解各片方言的分布，这样列出来的方言点和调查条目才能比较切合实际。

在比较过程中，如果有较多的条目，为了较为准确地说明方言区片的异同，有时还应对某些统计作计量分析。今后的比较研究应该利用电子计算机建立方言语料库，这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更全面、细致的比较研究。

二、汉语方言语音的类型分析

汉语方言语音的共时比较着眼于汉语方音之间语音系统的异同，在这个基础上，把所比较的项目的各种差异归纳出若干类型来，也就是对语言事实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便可以加深我们对方音差异的理解。可见，类型分析是共时比较的深化，是理论分析的基础。

对汉语方音的类型分析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1．结构类型的分析

语音是成系统的，方言语音特征的差异也是系统上的差异，每一个特征项都处在一定的结构系统之中，每一项特征本身也都形成一定的结构。拿不同的结构作比较，便可以归纳出语音特点的结构类型。这里举几个特征为例作一些分析。

上文说到，不同的方言的音位系统中有的声母多，韵母不多，声调更少，于是多音连读之后的各种变化就比较发达；有的声母少，韵母和声调都多，多音连读后各种变化就少。这说明音类的多少，和连音变化的繁简是相关连、相制约的。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在另一个方面，不同的方言在语音结构系统上也有不同的类型差异：有的方言音类多、连音变化也多；另有些方言则音类少、连音变化也少。例如西南官话的武汉话，只有19个声母、37个韵母、4个声调，属于音类最少的方言之列，在连音变化上只有轻声和个别调类的变调，没有儿化韵。闽语建瓯话15个声母，33个韵母、6个声调，没有任何连音变化，连轻声也没有。这些方言的语音结构系统属于简单型。吴方言普遍有浊声母，韵类、声调也多，而且连读后又有复杂的变调、小称，有的还有轻声。闽语福州话声母不多，但有48个韵母、7个声调，多音连读后变声、变韵、变调兼而有之。这些方言的语音结构系统则属于复杂型。

拿各种方言的连读变调的规则作比较，也可以归纳出各种类型。

从变调的原因说，都是由于多音连读，这是各个有变调的方言之间的相同点。从变调的条件说，则有依相邻调值而定和依自身类别而定的两种类型，这是各方言之间在变调上的重要差异。

吴语以外的诸方言除厦门话之外，大体都依前后音节的调值而定。简单的可以北京话为例，上声、去声的前音节都依后音节的调值的不同而分别发生变调，具体规则大家熟悉不必再提。复杂的可以福州话为例。福州话的7个声调可归为三类：

Ⅰ　含阴平 44、阳平 53、阳入 5，可称为高调，其中再分两类，$Ⅰ_1$ 是阴平，是为长调；$Ⅰ_2$ 是阳平与阳入，是为短调。阳平和阳入两分为 $Ⅰ_{2a}$、$Ⅰ_{2b}$。

Ⅱ　含 $Ⅱ_1$ 上声 32 和 $Ⅱ_2$ 阴入乙 23（强喉塞尾，早先是收 k 尾的），都是中短调（上声调长与阳平相当）。

Ⅲ　含 $Ⅲ_1$ 阴去 213、$Ⅲ_2$ 阳去 242 和 $Ⅲ_3$ 阴入甲（弱喉塞尾）都是低长调，阳去头尾低，阴入甲较阴入乙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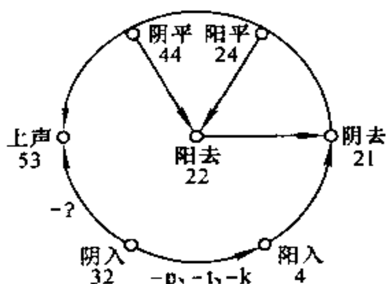
福州话二音节的连读变调，如果按以上所归调类来看，可以归纳为如下的相当简单的规则：

后字 / 变调 / 前字	Ⅰ	Ⅱ	Ⅲ
$Ⅰ_1$ Ⅲ	$Ⅰ_1$	$Ⅰ_{2a}$	
Ⅱ	$Ⅲ_{1a}$（阴去前半）	$Ⅲ_2$（阳去前半）	$Ⅰ_1$
$Ⅰ_2$	Ⅱ		$Ⅲ_{1a}$

详细情形可参阅《福州方言词典》（李如龙等，1994）。这里不再罗列具体材料。

吴语和闽语的厦门话的连读变调大多依自身调类或调值特征而定。

厦门话二音组前字都变，不以相邻声调为条件而变，而是一个调类固定一种变法。是各调类之间的递嬗变化，并未变出新调。其规则像一个 11 点 5 分 15 秒的钟面图形。



吴方言二字组是前后字都会发生变调，但各地规则又有不同。苏州话以阴阳调类及舒促调值为条件：阴调类不变，阳调类变；促调（入声）不变，舒调变。上海话前字分阴阳调类，四声同变；后字按四声分，阴阳同变；平声入声有别，上声、去声交叉。温岭话前音多变、后音少变；阴调类多变，阳调类少变（阳调类作前字只有平声变，上去入不变）。温州话前字变调分平、仄（上声和去声）入三类，阴阳同变；后字平调（阴平、阳去）不变，非平调皆变；上声、入声阴阳同变，平声、去声不同变。限于篇幅，此处也不再列举具体材料，详细情况请参阅该地方言词典及李荣（1979）。

汉语方言中表示小的名词后缀主要包括儿尾、子尾、囝尾。语音上除少数方言保留原来的声韵调外，大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弱化。最初的弱化形式是读为轻声调，然后又伴随着声韵的

变化。如晋语“子”尾变读为入声短调，客家话的“儿”变声（长汀“咧” le）或只留韵腹（梅县“呃” ε），闽语的“囝”声母脱落（福州：椅囝 iaŋ）或只留韵腹（厦门：椅囝 a）或只存韵尾（尤溪：椅囝 ŋ）。进一步便发生了合音。合音之后则又有不同的形式：

（1）合声型，声母并入前音：官话区为儿化，吴语区是鼻尾化。

（2）合韵型，韵母并入前音：部分晋语（如获嘉）为子变韵，在吴语变为鼻化韵。

（3）合调型，使前音发生变调：变后只有一调是“合变式”，分为几调是“分变式”；变出新调来是“新变式”，变为原有的某调调类是为“互变式”。

（4）混合型，合音之后，声韵调不止一项发生变化。如福建大田后路话“囝”化合音使前音节变为鼻化韵，声调变为两种，一种新调，一种旧有调。

曹志耘曾将南部吴语的小称类型整理成下表，可供参考（曹志耘，2000）。

	儿缀型		鼻尾型	鼻化型	变调型		混合型	备注
	准小称	小称			分变式	合变式		
磐安			−n				鼻尾/变调$_{\text{分变}}$	
金华				+	+		鼻化/变调$_{\text{分变}}$	
汤溪			−ŋ			55	鼻化/变调$_{\text{分变,合变}}$	
龙游						45，213$_{\text{次要}}$		少
开化		ȵi^{55}	ŋ			53		
常山		n^{52}						
玉山		ȵi^{52}						
遂昌		ȵie^{221}						
缙云	ȵi^{231}				+	55		
云和	ȵi^{324}		−ŋ	+	+		儿缀 ȵi/变调$_{\text{合变}}$，鼻尾/变调$_{\text{分变(未详)}}$	
庆元			−ŋ	+		55，33$_{\text{次要}}$	儿缀 ȵie/变调$_{\text{合变}}$，鼻尾/变调$_{\text{合变}}$，鼻化/变调$_{\text{合变}}$	
文成						445	儿缀 ŋ/变调$_{\text{合变}}$	
温州		ŋ^{31}	−ŋ			44	儿缀 ŋ/变调$_{\text{合变}}$，鼻毛/变调$_{\text{分变}}$	

2. 语义类型的分析

有些语音特点不是单纯的语音现象，而是表现一定语义的变异。对于这种语音现象的分析还必须从语义的角度考察它的分布，归纳其类型。这里也举几个例子说明。

广州话的变调既不属于联合音变的“连读变调”，也不是单纯“表小”的小称变调。而是固定在一定范围的语词中的声调变读，称为“语素变调”是比较合适的。这些变调包括高平变调、高升变调和低平变调三种，大体上和阴平本调之一的 55、阴上的 35、阴平的 21 调型相当。此类变调多半属于一种词的构形法手段，是一种形态音位学（morphophonemics）。麦耘曾为这类变调罗列了各种语义类型，他的分析是已有研究中最详尽的（麦耘，1997）。

Ⅰ　名词性标志

a. 使非名词名词化，如：弯(弯曲处)、凿(凿子)

b. 某些常用名词，如：鸡、梨、柠檬

c. 某些姓名，如：何伯、岳飞

d. 表示缩略其他语素，如：斜(斜纹布)、滑牛(滑溜牛肉片)

Ⅱ 小称标志

a. 表小指爱或带蔑视义，如：包(小包)、嗰人(蔑称，这个家伙)

b. 表示主观感觉的形容词（用作反语），如：咁大(这么小)、咁长(这么短)

c. 叠音谓词后字变调表程度减弱，如：绿绿哋(略呈绿色)、会会哋(会一点)

d. 部分亲属称谓前音为低变调，后音为高平变调，如：哥哥、妹妹。

Ⅲ 特指标志

a. 常用义，表具体事物的义项，如：皮带(比较"地带")、纸条(比较"便条")

b. 特指义，方言义，如：基(田埂，堤岸)、信肉(信瓤儿)

Ⅳ 风格标志

口语词变调，书面语不变，如：梅花鹿(比较：逐鹿)

Ⅴ 虚词合音后使前音节变调

a. 动词体标志"咗"合音，如：食咗饭→食饭(吃了饭)

b. 介词"喺"合音，如：坐喺道→坐道（坐在那儿）

c. 叠音词中的"一"合音，如：望一望→望望、一只一只→一只只。

厦门话的轻声也表示了多种语法意义（参阅李如龙，1962）。

Ⅰ 名词后置成分

a. 人名的称号，如：平呵、章哥、王氏、孙先生

b. 地名的某些通名，用与泛指相区别，如：江头(非江之头)、张厝(张家庄)

c. 时间词、处所词的后置成分，如：日时/后年/十八日(非十八天)/山咧(山头)/边头(边上)/东片(东边)

d. "的字结构"的"的"，如：金兮(金做的)、乌兮(黑的)、炊兮(蒸的)、看命兮(相命的)

Ⅱ 动词后面表时、体、态的助词

a. 表示经历过的"着"，如：有去着(去过)、寒着(着了凉)

b. 表示持续体的"咧"，如：门开咧(门开着)、徛咧(站着)

c. 表示短时貌的"者"，如：来坐者(来坐一坐)、厮共拍算者(共同商量一下)

d. 和助动词相呼应的"得"，如：会用得(可以，可以用)、𫧃使得(使不得)

Ⅲ 某些补语

a. 趋向补语，如：出去、行入来(走进来)、倒来去(回去)

b. 结果补语，如：拆开、弄破、拍死(打死)、踢倒

Ⅳ 某些宾语

a. 人称代词作宾语，如：送我、请汝，但若有后续成分则又读变调。

b. 数量结构作宾语时，表示约数读轻声，如：加写两字，若重读是为确数。

Ⅴ 句末语气词及表疑问的否定词

a. 否定词，如：去唔(去不)、有来无(来了吗)、会使得𫧃(行不行)

b. 语气词，如：去哦(去吧)、食饱咯(吃饱了)、唔啦(不啦)

字音系统中的文白异读，文白之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就这些对应材料整理出对应规律

来，这是结构类型的分析。别义异读的异读与别义之间也有一定的规律，也可以作语义类型的分析。例如北京话的别义异读至少有以下两条比较明显的别义类型：

Ⅰ　声调变读以转变词性

a．动词异调转为名词，如：量(～衣/大～)、藏(贮～/宝～)、调(～整/音～)、传(～闻/自～)

b．名词异调转为动词，如：冠(衣～/～军)、种(～子/～植)、间(房～/～隔)、数(～目/～一～)

c．形容词异读转为动词或名词，如：好(～坏/爱～)、假(真～/～手)、空(～虚/没～儿)、难(～说/患～)

Ⅱ　声韵异读使实词虚化

a．名词或动词转为副词，如：还(～钱/～好)、都(～市/～是)、曾(姓～/～经)

b．名词或动词转为助词，如：着(～火～陆/拿～)、了(～结/看～)、的(目～/大～)

3．类型区的分析

有些语音特点的类型分布在连片的地域，有时是两个或多个方言区连界的地区，因而形成特定的方音特征类型区，也就是不同方言区之间的语音区域特征。

形成方言语音的区域特征有两种原因，一是纵向的同源关系造成的，一是横向的渗透关系造成的。几个方言之间既然有纵向的同源关系，它们在历史上就可能在同样的地域共处过，体现过同样历史时期的语言特征。后来它们各自流播在不同的地域，这些共同的语言特征不可能荡然无存。换言之，同源的姊妹方言之间必定会有共同的语言特征。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是客家方言和赣方言，在历史上它们曾经是同支。经过许多史家的研究，客家的迁徙在隋唐之际主要是散居在江西中北部，唐末五代进入赣南、闽西，两宋期间大量迁入广东。正由于有这一段历史的渊源，客赣两种方言确实存在着不少共同的语音特征，《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等，1992) 就列举了 14 条，较为重要的有：全浊多混入次清，庄、精逢今洪音无别，晓母合口字混入非组，同摄一二等韵都有不同韵腹的对立，梗摄字白读韵腹为 a，宕江韵母混为 ɔŋ、iɔŋ，次浊声母字阴阳入两边走等等。无怪乎历来不少学者认为客、赣可以归为一个方言大区。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南的吴语和闽东闽北的闽语。浙闽交界处，东有雁荡山、西有仙霞岭，经济落后，交通阻塞、人烟稀少，人们历来交往并不多，方音上的一些富有特色的共同点很难用横向的渗透去解释。例如丽衢片“舌上读舌头”（猪、长、帐、竹四个字，丽水音：ti^{1}、dəŋ^{2}、di ε̃^{8}、tiuʔ^{7}）是闽语通例，温州片效摄一二等不同韵（宝/饱：乐清 pə^{3}/pa^{3}，温州 pɛ^{3}/puɔ^{3}）同闽东（傅国通等，1985)，船、禅母读 j－（温州：船 jy^{2}、上 ji^{4}、唇 jyoŋ^{2}、赎 jyo^{8}）近闽北，匣母字白读 g－、j（温州：厚 gau^{4}、衔 ga^{2}、含 gaŋ^{2}、寒 jy^{2}、汗 jy^{6}）则闽东、闽北皆然。丁邦新先生曾有过一种推论：“我们发现有一些吴语方言中具有‘端、知’不分的现象，这种现象大致局限在白话音里，因此推断现在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丁邦新，1998，254 页）说浙南吴语有闽语的成分自无争议，说闽语有古吴语的继承也是站得住脚的。至于闽语里，应该还有古吴语以外的源流，此处不加论证。

横向的渗透形成的区域特征往往分布在大小方言区（片）的交界地带，大范围的可以包括

几个大方言区的一批连片方言点，中小范围的可以包括几个方言小区（片），小范围的则见于某个方言小区。从渗透源说，大多是不同的方言，有时也有民族语言影响的结果。这里也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长江流域有不少城市，从成都、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到扬州、苏州，都有后鼻音韵尾－ŋ受i、ə韵腹同化而前移混入前鼻音－n的现象，把古深、臻、曾、梗的相当大部分字（开口一二三四等的字都有，还包括部分合口字）都读为 ən、in（扬州无 in 韵，读为 iŋ），例如针、真、恨、顿、轮、等、层、升、胜读为 ən，林、心、民、斤、兵、丁、情、灵读为 in（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论方言区，其中有官话，也有湘、赣、吴等方言，论地域，横贯六个省，这显然是相互影响而趋同的结果。其渗透源可能是来自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因为在远离长江的湘、赣、吴诸方言并没有多少点表现这个特征。对于东南方言来说，官话应该是强势方言。

在赣方言和客方言的交界地带，包括赣语的吉安片（井冈山地区）和客家话的赣南片和闽西片，古阳声韵字除通摄之外，各摄都有读为鼻化韵的，尤其是靠西的赣县、大余、茶陵、永新一带，读鼻化韵的字更多。陈昌仪在谈到赣语吉安片特点时把“有丰富的鼻化韵母”作为最重要的韵母特点。“横江、万安县、高陂、永新县、莲花县、坊楼、宁冈县、井冈山等 8 个代表点除通摄阳声韵有［ə̃ŋ、iə̃ŋ、uə̃ŋ］以外，其余的阳声韵都读为单纯的鼻化韵母。”（陈昌仪，1991）看来这个特征是自赣南闽西的客家话向吉安一带扩展的，因为赣语的其他片鼻化韵并不多见。

在闽方言的几个小区之间，也有几个区域有明显的共同语音特征。

（1）闽江流域（含沙溪、建溪、富屯溪）的一些县和下游不少县，古阳声韵字有一种“复韵尾”的读法，即同时有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永安有 ɛiŋ、iɛiŋ，沙县有 ɛiŋ、iɛiŋ、iɛŋ、yɛiŋ、œyŋ、ɔuŋ，建瓯有 aiŋ、uaiŋ、eiŋ、ieiŋ、œyŋ、uiŋ、yiŋ，建阳有 aiŋ、ɔiŋ、eiŋ、ieiŋ、ueiŋ、yeiŋ，福州有 ɛiŋ、ouŋ、øyŋ、aiŋ、ɑuŋ，古田有 ɔuŋ、eiŋ、øyŋ 等。（《闽语研究》）这个特点在闽北各县表现最充分，可能是沿江而下向闽东扩散的，而在闽东北片（福安、宁德一带）未受影响。闽北是福建开发最早的地区，唐以前闽北是全省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强势方言。所以这种现象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

（2）闽南方言各点阳声韵字白读音都有各种鼻化韵读法，如厦门话就有ã、iã、uã、ɔ̃、ẽ、ĩ、ãi、uãi、ãu、iãu 等，这种情况向西影响了闽中方言，永安话有ã、iã、uã、õ、iõ、ĩ、uĩ；向北则影响了仙游话（ɵ̃、ã、iã、uã、yã、ĩ、uĩ、yĩ、iũ）。闽南话对永安话、仙游话来说也是强势方言。

（3）同是闽南方言区，粤东闽南话包括潮州、潮安、汕头、澄海、饶平、揭阳、潮阳等点，古阳声韵字只有－m、－ŋ和鼻化韵的读法，没有－n 韵尾（在海陆丰，只有－in、－un）（林伦伦、陈小枫，1996）。这一现象数十年间已经向北扩散，影响到连片的闽南漳州地区。从诏安、漳浦、东山到漳州龙海，60 岁以下的人也大多把许多－n 尾韵发成－ŋ 尾韵了（陈碧加，1990）。

三、汉语方言语音的历时比较

1. 汉语方音历时比较的对象和目的

方言语音的历时比较比起共时的比较规模更大，难度也更大。

单点方言的历时比较一般是拿方言同广韵系统作比较，通常还拿现代共同语作参照，这就是所谓“大三角”的比较。现代的汉语方言学一开始就是按照这种作法做的，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到了 80 年代，也引起了语法学界的注意。许多研究共同语语法的学者都开始注意拿它和古汉语、方言的语法现象作比较。

这种“大三角”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某一方言作历史的透视。包括考察方言形成的历史年代及演变过程，考察方言与当代共同语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探讨在方音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规律。

如果单点方言有早期的语料或史料保存下来，也可以在方言史上截取一段历史过程进行古今方言的比较。但是这种比较也离不开“大三角”的比较。因为不论是古方言或现代方言都免不了要受到共同语及周边方言的影响。何大安（1988）说：“今天的任何一支方言，都不会是孤立地从祖语传衍下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固然有传统的成分，有自创的成分，也有外来的成分。而所谓外来的成分，不只是其他的汉语方言，甚至会有非汉语在内。”（109 页）“要研究语言结构的变迁，我们必须对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接触二者，同时进行考察”。（4 页）这外部的接触就包括着多种时代的共同语和方言的接触。

关于拿方言和广韵系统作比较，我们只能理解为方言和中古音系的比较，考察该方言与中古音有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同的，方言和广韵系统不一致之处是什么样的演变关系。也就是说广韵系统只是一种参照系，只是方言之间的一种音类折合换算的依据。广韵系统究竟是一时一地之音，还是综合古今南北之音的杂凑的系统，至今还没有定论。但至少可以说，广韵系统简化而成的“平水韵”确是统治中国文坛长达千年的书面语的标准音，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庞杂的广韵系统可能有些音类的区分是拿不同地方的方音作参考把它区别开来的，尤其是那么多的字音异读，绝不可能是一时一地之音所能承受的。但它也绝不可能把许多地方的方音、把久远年代的古音都综合进去。倘若如此，还有必要研究先秦两汉的旧音、研究“唐代西北方音”吗？拿广韵系统代表中古音的大体面貌应该是可行的。然而广韵系统并非现代方言的祖语，现代诸方言并非直接从广韵分化而来的。现代方言有的早在广韵之前就形成了，而就在广韵时代各地也必定有分歧的方音。“吴楚则时伤清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陆法言的《切韵序》不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吗？可见，《广韵》系统是大体上反映着中古时期书面语的语音系统，是方言比较的可供折合的共同的“中介”，并不是现代方言的祖语。因此，说有的方言“超《广韵》”，这（隐含的观点是有的方言未超《广韵》）是不科学的说法。应该说任何方言都是“超《广韵》”的，因为各方言中都可能有广韵前的特点，也有广韵时代的方言特点，更有许多广韵之后又发生了变化的特点，当然也会有受中古时期文学语言读音——《广韵》——影响的结果。这几种成分只是多少之差，而不是有无之别。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现代方言都是一个“大杂

烩"。纯之又纯，十代单传、一脉相承的方言是不存在的。我们应该摒弃单线相承、直线演变的方言观。

方言语音的历时比较不但可以使我们对方言作历史透视，理出方音的历史层次、为方言作历史定位，还可以大大帮助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因为方音的共时差异往往是语音历史演变的不同阶段的反映，把各地方音的差异按历史顺序的不同串连起来，往往可以找到历史音变的各个"停靠站"，认识语音历史发展的完整而具体的过程。现代中国最早的音韵学教材之一，八易其稿方始出版的《汉语音韵学导论》（罗常培，1956）早就说过："治韵学者，务须本乎时序，参校方言，各还本真，弗加轩轾，而后流变昭然，是非不掩。""民间俗语，每存古音，异族方言，可证旧读。苟欲旁征博校，窥见音韵精微，则外宜博学殊域言文，内须多明方音系统"（24 页）。不仅如此，如果理清了各方言语音演变的过程，综合起来，总结出古今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则对建立汉语语言学的理论，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2. 汉语方音历时比较的内容和方法

方言语音历时比较也应该全面进行，从音位到音节，从音组到句段，都可以作纵向的考察。以下就若干常见的重点课题举例说明之。

多点方言的比较可以看出语音演变的过程和音类分混的原因。

由于音值的演变而导致音类的分混，是方音演变中常见的现象。在同一个方言区内，把同一个古音类的字的不同读音对比罗列之后，往往可以看到音值的逐步变迁而最终导致音类分合的轨迹。音值的变化是量变，音类的分合是质变。吴语韵母的演变中有两条很具特色的规律，一是 - n 韵尾的脱落，一是 - i 韵尾的消失。有的方言这两条音变的水渠最终也合流了。下面的对照材料把这两种音变的过程展示得很清楚（据颜逸明，1994，个别点据其他材料补齐）：

	金华$_{文}$	嵊县	玉山	诸暨	金华$_{白}$	无锡	宁波
连	lian^{2}	liẽ^{2}	liẽ^{2}	liɛ^{2}	lie^{2}	liɪ^{2}	li^{2}（=厘）
烟	ian^{1}	iɛ̃^{1}	iẽ^{1}	iɛ^{1}	ie^{1}	iɪ^{1}	i^{1}（=衣）
	金华$_{文}$	**丽水**	**温州**	**嵊县**	**诸暨**	**无锡**	
班	pan^{1}	pã^{1}	pa^{1}	pɛ̃^{1}	pɛ^{1}	pᴇ^{1}（哀 ᴇ'）	
胆	tan^{3}	tã^{3}	ta^{3}	tɛ̃^{3}	tɛ^{3}	tᴇ^{3}（=歹）	
	金华$_{文}$	**常州**	**丽水**	**无锡**	**诸暨**	**温州**	
爱	ai^{5}	ai^{5}	ɛ^{5}	ᴇ^{5}	e^{5}	e^{5}	
碍	ɦai^{6}	ŋai^{6}	ŋɛ^{6}	ŋᴇ^{6}	ŋe^{6}	ŋe^{6}	

从上表可以看到，同一个音类的音值在各地是渐变的，连起来看正好是一个变化的全过程。在宁波话，连=厘，烟=衣，在无锡话，胆=歹，阴阳两个韵类便合二而一了。而有些方言点在中途的停靠点中止了音变，就没有造成音类的合并，如诸暨、丽水和温州 an 和 ai 就还没有混同。这说明不同的点语音的演变是不平衡的。

见系声母颚化引起"尖团不分"，在官话方言和晋语也有许多区域的比较可以看出变化的

过程。例如山西境内的方言（据侯精一、温端政，1993）：

	高平	阳城	平顺	沁县	太原
姐/解～开	tsie^3/cie^3	tɕie^3/cie^3	tɕie^3/cie^3	tɕiɛ^3	tɕiɛ^3
全/拳	tsʻiæ^2/cʻiæ^2	tɕye^2	tsʻy æ̃/cʻy æ̃^{2}	tsʻuei^2	tɕye^2
席/吸	səʔ^7	ɕiə^7/ɕiəʔ^7	sieʔ^7/ɕieʔ^7	ɕiə^7	ɕieʔ^7

从上表可以看到见系从 c、cʻ、ɕ 到 tɕ、tɕʻ、ɕ，精组从 ts 到 tɕ 的合流过程，但是在各点或单点之内都可能是不平衡的。

语音是一个系统。某一个语音特点常常和别的语音特征相关连。作面上比较，为某一个方言特征作历史定位，往往不能孤立地考察，而必须联系其他语音特征的历史时代作合理的判断。客家方言浊上字读归阴平调究竟是发生于什么时代的变化，这是为客方言作历史定位，考察客赣方言之间的关系所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蓝小玲（1999，62～64 页）在比较了客赣方言各片浊上归阴平的状况之后，作出了以下判断：

（1）从闽西、粤东到四川、台湾，各地客方言，全浊上声读归阴平的字相当一致。然而次浊声母读归阴平的字则是闽西较少、广东及从广东再迁出的地区的客家话较多，可见全浊归阴平先于次浊归阴平（客家人是先到闽西，后入粤东粤北的）。

（2）在唐宋之后全国多数方言的“浊上作去”的洪流中，客方言的一些口语常用字掉队了，未归入去声。待全浊声母清化后，客家人进人了闽赣地区，残留的字的具体调值与去声及清上均有不同，在浊平分出阳平调的同时，这些清化的浊上字填入了阴平。次浊上应是后些时候尾随归人阴平的，这时正是客家自闽西陆续转人粤东的时期。

（3）在赣方言，抚州片也有全浊上及部分次浊上读归阴平调的现象，但限于某些声组，而其他赣方言则少见。抚州一带正是客家人南下闽西赣南时的主要居住地。这种情况也正说明浊上归阴平应该是客家方音的特征。

最早提出次浊上归阴平是客方言特征的是桥本万太郎（1973）。后来黄雪贞（1988、1989）又补充了不少材料，认为这是客方言的声调特征。何大安（1988）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这些字读阴平，而不是阳平，那一定是在平声分阴阳之后。最迟在 9 世纪前后，汉语已有部分方言平声开始分阴阳”（102 页）。张双庆、万波（1996）在分析赣语南城方言的浊上归阴平时，也认为南城方言的这一现象是早于“全浊归去”的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客赣方言的这个重要特点的历史地位应该说已经是相当明确的了。

多点方言的历时比较，对于能对齐的少数字应该特别注意考察。十几个、二三十个常用字的白读音在一大片方言中有特殊的对应，这种情况既不是主流的对应关系，也不可能是个别的偶合，一定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因此特别值得注意。李荣（1982）曾经就浙南吴语和闽语的匣母字读为 k、kʻ声母的现象，作过分析，认为这是古群母也有一二四等字的证据。虽然只有 13 个字，但却是口语用字。方言点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连片地区，很具说服力。在多数闽语里，《方言调查字表》中的匣母字大概可找出 20 多个字来。对此，徐通锵（1991）说：“残存在白读中的个别事实，有助于语言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决不能简单地作为例外而置之不顾。”这是很有道理的。

和部分匣母字读 k、k'相类似的还有闽西北地区的来母字读 s 声母的现象。这个现象早在1971年就引起罗杰瑞的注意，他和梅祖麟（1971）发表了专文对此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认为这反映了早期汉语有 *lh 声母。李如龙（1983）的专文发表了11个闽西北方言点的31个读为 s 声母的来母字的材料，联系来母与"心、邪、生、书、禅"谐声相通的现象，说明这是早期闽语保存上古汉语的一个语音特征；又罗列了某些壮侗语和苗语的材料说明这种现象与壮侗语还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指出这可能是更早的汉台语系的同源现象的反映。看来，这也是一个十分引人入胜的例证。

单点的方言也可以与古音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主要是为了考察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看该方言的语音都包含着哪些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哪一个层次占着更大的比例。有了这个了解，就可帮助我们认识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方言与不同历史时代的共同语的关系，以及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关系，从而为方言作纵横两面的定位。

考察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最方便的是从方言的文白异读或别义异读人手。字音的异读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形成的，或因共同语的影响，或因字义的延伸、转移，因而异读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这里举闽语的两个多音字为例，可以见到一斑。

下　福州话有4个读音

ha⁶　文读音，口语也说，用作动词，意为"运载"

a⁶　①量词拍几～，②方位词眠床～，③形容词～回：往后

kia⁶　动词：向下游去（"行下"）（"后也"）

ŋiaʔ⁷　形容词：差劲，质量低下（"贱也"）

泉州话因阳上、阳去有别，有6个读音（轻声与变调不计）

ha⁴　文读，口语也用，如说下消：差劲（"贱也"）

he⁴　动词：放置（"降也"）

e⁴　方位词～底：下面，～摆：下次（"底也"）

ke⁴　形容词悬～：高低

k'e⁶　动词：放置

e⁶　量词两～（括号中引文为《广韵》所注）

《广韵》"下"有两个反切，字义有别。胡雅切：贱也，去也，后也，底也，降也。胡驾切：行下。下属匣母，这些异读的历史层次，从声母说 k、k'在前，然后是 ø，最后是 h。k、k'反映的是尚未混入匣母时的上古群母，零声母最接近中古的 ɦ，h 是匣母清化之后的音，ŋ 是方音的"旁转"变异。从韵母说，a 是中古麻韵的读音，e 是唐宋后元音高化而成的单元音，ia 是宋元之后受二等颚化影响的变异。可见，在历史层次上，声母和韵母的表现可能是不完全相同的。

过	"古禾切，经也，又过所也。"	
福州话	kuai¹　青菜过时而不嫩（"过所"）	ua³　顺途经过（经）
厦门话	kua¹　青菜过时而不嫩（"过所"）	kua¹　顺途经过（经）
	"古卧切，误也，越也，责也，度也"	
福州话	kuɔ⁵　～去（"越"也，度也）	kuai⁵　受～：受罪（连读在后 k－脱落）
泉州话	kɔ⁵　不～（连词）　kua⁵　罪～	kə⁵　～去　ə⁵　～褒：污染（度也）

从韵母说，过属过韵，广韵时代应是ɒ。kua、kuai、uai的音应在前，ɔ、uɔ、ə的音在后。声母见读k是常例，读零声母是旁转。据《广韵声系》（沈兼士主编，1985）见母字与影母谐声相通的共有200多字。

单点的历时比较，并不能解释一切方音流变的原因和过程，因为除了纵向的演变，方音还有横向方面的作用。但是在分析这种横向的渗透作用时依然要运用历时分析的方法。例如1986年崔荣昌、李锡梅所发表的四川永兴话（崔、李，1986），作者认为“历史上是湘方言，现在已经向四川话靠拢了”。何大安（1988）曾对此作过很细致的历史分析。永兴话有送气与不送气两套浊声母：b、d、dz、g和bh、dh、dzh、gh。不送气的浊声母见于平上去入各调的字，而送气浊音则大部分只见于平声读为阳平调，不见于仄声。但西南官话来自入声的阳平字，永兴话却又不读浊音声母。显然，送气浊音是永兴话吸收西南官话的“送气”而立的新音。由于在湘语入川时四川官话的浊音清化、入归阳平均已完成，而永兴话一定还有入声，因此入声字在永兴话仍读不送气浊音。这是一个纵横两面的语音演变相互交叉作用的典型例证。

除了要留心周边方言的影响之外，单点方言的历时考察有时也要和姐妹方言作比较。说明这一点也有一个极好的例证。彭小川（1989）曾介绍过广东省南海市沙头话把相当一部分古轻唇音声母字读为重唇音p'的现象。对此，作者经过比较作了三点分析。第一，沙头话的轻唇字读重唇是存古而不是新变。因为从溪母变来的f声母未变为重唇。第二，沙头话轻唇读重唇不是闽语影响的结果，也和闽语不同类型。闽语无f声母，有文白对应（文读h，白读p、p'），沙头话另有f－，无文白之别，非敷奉皆读p'。第三，沙头话的p'正是处于p、p'→p'→f变化的过程中，除韵腹为圆唇音u或ɔ，已变为f外，其余皆读为p'声母。文中还引用了当地三个大姓的族谱资料说明：“三姓人家不约而同均于北宋末或南宋初迁居沙头，并且迁居前都在广州住过一段时间。”彭小川的结论是这一现象是“来自粤语”的。其实，这一现象至今还可以在广州话找到旁证。现代广州音除了微母大多仍读明母之外，在非敷奉母也还可以找到一些轻唇读重唇的例字。除常见的番禺的番读p'un¹，“新妇”（媳妇）的妇读p'ou⁴之外还有：

浮水　p'ou² sœy³　（浮于水面）　　浮浮泛　p'ou² p'ou² p'an⁵（漂浮状）

此外，粤语的常见俗字煲（如说，瓦～、铜～用作名词，～粥、～汤用作动词）可能即是“釜”和“缶”。釜，扶雨切，缶，方久切，义合音有变异。就在离广州市区100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像南海沙头话、新会荷塘话这类与广州音相去甚远的方言，可见，粤语的研究实在还有许多值得开发的课题。

纵向的演变和横向的渗透在许多地方是并存的。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二者对于具体方言来说可能有强弱主次之别。早期的历史比较法只考察纵向的演变而不注重考察横向的扩散，在方言研究上这种方法热衷于利用现有的方言差异来构拟原始母话。这种单线传承、直线发展的思路和方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关于这一点，徐通锵说：“谱系树理论和波浪理论是历史语言学的两个对立的理论模型，前者着眼于时间，着眼于语言的分化；后者着眼于空间，着眼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这两种模型与其说是对立，还不如说是互补。”（1991，383页）应该说，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使方言比较研究开拓眼界而不受局限，也只有用纵横两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才能使方言比较研究为语言学的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汉语方言语音规律的探究

方言语音比较研究的终极目标应该在于探寻汉语的语音规律。从主要方面说，共时的比较是为了探讨共时的结构规律、历时的比较是为了探讨历时的演变规律。当然彼此也很难决然分开，而必须相互照应。

从古代的小学到现代语言学，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历来不太重视理论的研究和规律的探索，以为解读一个个字句才是真工夫，谈理说道似乎是走江湖。诚然，不研究具体材料而发空议论是不可取的，那并不是理论研究，真正的理论研究应该是从具体的语言事实中经过归纳得出观点，把总结的理论演释之后又回到语言事实中去检验。理论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事实，也可以使语言事实的调查研究得以不断的深化。如果以罗列事实为终极目标，没有抽象出隐含在事实之中的条理，恐怕连事实也罗列不好。自己不动手去探究理论，遇到语言现象便到外国学者的理论中去寻求解释的理论，这固然也是一种办法，有时也可以奏效，但也有不能切合我们的语言事实的时候。因此，规律的探究应该是很值得鼓励的。以下讨论几个理论探究中值得注意的课题。

1. 变异与整合

语音的变异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有些变异由局部扩展到整体，新式代替旧制；有些变异一闪而过，没能被全社会承认；有些变异会长期处于新旧并存的状态。可见，变异是否成功，必须受制于另一种力量，这就是整合。变异总是产生于个别的、局部的言语行为之中，经过整合才能稳定地进入整体，进入语言的系统。变异是局部变化，是量的积累；整合是整体的结构，是质的飞跃。变异是长期存在的试行，整合是阶段性的总结认可。通常，变异是个别的或一部分人的创造，整合是为多数人接受的社会的认同。复杂多样而又无序的变异出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求，源于社会各式人等的创造或偏误；有序的成系统的整合则是来自语言的两个基本性质——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语言功能的社会性。因为要全社会通行，就必须有共同理解和遵行的规则；因为要口耳相传、世代教习，就必须形成一定的系统。总之，整合是变异的对立面，也是变异的补充和调节。

方音的变异是连续不断的，作为阶段性总结的整合只能把各种不同进程的变异组织在一个共时的平面。这就决定了各种方言的语音系统和前代语音的对应都是不整齐的。

哪怕是系统性最严密的方言语音，其音类和古音类的对应也往往不是一对一的，必定有常例、变例和特例之别。常例是无例外的对应或基本对应，变例是有条件的局部对应，特例则是个别的对应（或称为例外现象）。常例是被认可进入新系统的主流，变例是变与不变的某种妥协，特例则是未参与变异或新发生的超前变异的个别现象。常例、变例和特例并存，这是方言语音整合的常见模式。例如，广韵系统的麻韵字在北京话里，二等读 a、三等读 ie 是常例；二等逢见、晓组读 ia，三等逢章组读 ɤ 是变例；二等见晓组读 a（虾）是特例。戈韵字读 uo 是常例，帮组读为 o、见晓组读为 ɤ 是变例。歌韵逢端、精组读 uo、逢见晓组读 ɤ 是变例，“他、大”读为 a 则是特例。经过共时的整合，每一种方言都会形成自己的语音结构规律。例如上述北京音歌、戈韵字的变异和整合就构成了这样的音节拼合规律：有 po 无 puo、有 tuo、tsuo 无

to、tso，有 kɤ、kuo 无 ko。一旦形成了共时的语音结构规律，它对于变异就会产生明显的约束力，大规模的变异就会受到抑制。语音的演变因此便显示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任何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有前代语音材料和语音规律的传承，也有语音变异所形成的创新。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特点并存于一个共时的语音系统之中，这就是叠置。用历时的观点透视共时的方音系统，都是一种叠置的系统。方音的异读，不论是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或新旧异读，都是一种把历时的层次整合成共时系统的方式。这种整合是一种兼容。有的音见于文读，有的音见于口语的白读，或者不同的音见于不同意义的词语，便是兼容之中的分配。有些字古时候只有一读，后来的方言有了几种音义，例如：

汉字	反切	北京音义
葛	古达	$kɤ^2$～布～藤/$kɤ^3$ 姓
恶	乌各	$ɤ^5$　善～/$ɤ^3$～心
多	德何	tuo^1～数/tuo^2～大？
宿	息逐	su^5～舍/$ɕiu^3$　住一～

“节”在《广韵》只有子结切一读，在各地闽语，都用几种读音来表示几种不同的意义：

	福州	建瓯	厦门	潮阳
节省、节约	$tsieʔ^7$	$tsiɛ^7$	$tsiat^7$	$tsiak^7$
过节、春节	$tsaiʔ^7$	$tsai^7$	$tsueʔ^7$	$tsoiʔ^7$
一节甘蔗	$tsaiʔ^7$	$tsɛ^7$	$tsat^7$	$tsak^7$

新老派异读是表现了同一时代的新旧两种读音。这类异读大多是近现代方言受普通话影响所产生的现象。例如：苏州话杂、纳，老派 $zɤʔ^7$、$nɤʔ^7$，新派 $zaʔ^7$、$naʔ^7$；武汉话恶、饿，老派 $ŋo^2$、$ŋo^5$，新派 o^2、o^5；“秘”，成都、温州、建瓯音：老派声母为 p－，新派为m－。这种新老派异读反映了最新变异的语音层次和原有语音的并存。

方音的比较研究应该从变异入手，考察不同方言的语音差异，但是在罗列出方言差异之后便需要探讨不同方言是如何把这些差异整合在一个共时的系统之中的。只有认识了整合的规律才能理解各种方音差异的条理，才能对方音系统有整体的了解，才是对方音系统的理性认识。

2. 内因与外因

经过比较，了解了方言语音特点及其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之后，人们就很自然地想到这些变化是出于什么原因。弄清楚演变的原因，我们对方音的现状才算是有了透彻的认识。

关于语音演变的动力和原因，历来已经有很多语言学家讨论过。在德·索绪尔的时代，就有过许多说法，这位语言学大师列举了七种说法之后说：“没有一种是能够完全说明问题的。”（德·索绪尔，1980，205 页）布龙菲尔德（1980）也宣称：“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在音变和某种先行的现象之间成功地建立一种相互关系：音变的原因是不知道的。”（477 页）“一个音变的原因要是依靠普遍的考虑或者观察其他的时间和地点的说话的人群，是找不到的。”（480 页）确实，要为某一个语音发生的变化找出十分具体的原因，尤其是到社会生活中去进行考察、寻求原因，是不可能有答案的；然而“依靠普遍的考虑”，观察发生语音变异的动因，应该说是

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语音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发生变化。

辩证唯物论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对立和矛盾。运用这个原理来考察语音演变的动因，道理是一目了然的。

方言语音演变的内因是音素之间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同化现象和异化现象。异化就是对立，同化就是统一。官话方言普遍发生的见系细音和精组细音的合流（kj→tɕ、tsj→tɕ）是两套声母的辅音受韵头摩擦化的半元音 j 同化的结果。客、赣、粤诸方言晓、匣合口与非组声母相混（hu→f）也是韵头同化声母的例子。50 年前的泉州话阴平调读 33 调，阳上调读 22 调（类似现今粤方言阴阳去之别），后来二者混同（同化）了，两个调类合为一类，这种调值的接近和混同造成调类的缩减也是经常可以发现的。

大多数客赣方言和部分粤方言（如广州）、闽方言（如建瓯）三个人称代词（我、你、渠）读为同调，粤方言“有——无”也读为同调（阳上），这是发生在小规模的词汇系统中的语音形式上的同化。

多数现代方言浊声母清化，可以说是浊声母与韵母的异化，而官话的轻声音节中发生的声母浊化则是声母受前音节韵尾同化的结果。

许多方言里塞音韵尾的脱落可以看成韵腹对韵尾的同化，有些赣语清塞尾变为浊尾 -t→-l、-p→-m 显然是半同化，完全脱落则是全同化；不少方言阳声韵变读为鼻化韵是元音韵腹与鼻音韵尾双向同化的结果，先是 ian→iãn，韵尾同化韵腹，而后 iãn→iã，是韵腹同化韵尾。

连读变调大多是异化，例如北京话上上相连、去去相连，前字变调。有时也有同化的，例如北京话“工农兵”的农字也读阴平。闽西长汀客家话有不少二三音节连调属于同化：“是非、帮助、相思树、旧社会、大学生”等组合都是后字声调对前置音节实行逆同化（李如龙，1965）。

有时一处同化会造成另一处的异化，是为类推变化或称为补偿变化。例如浊声母清化之后与清声母相混了，平上去入的四声则发生阴阳调类的分化，原清浊声母的对立转化为阴阳调类的对立。

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物，语义内容发生变化是引起语音形式变化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语义对于语音来说是外在的因素，因此，语义演变造成语音的演变是语音演变的外因。

汉语语法史告诉我们，着、了、过等时态助词是宋、元以来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许多方言都是用作动词时重读，用作助词则读轻声。这类虚词及其他表示语法意义的词缀（子、儿、头，的、地、得，们等）以及代词用作宾语等的变读为轻声，显然是语法意义的需要所引起的语音变化。儿化及其他小称变韵变调也是“表小指爱”的语法意义所决定的语音的变化。有些方言“炒菜”用作名词和用作动宾结构，连读音变有不同规律，也是语义决定音变的例子。福州话的双音词之中，有种种声韵调的变化，如果是不成词的短语，则规律不同：

有味　u（<ou）$^{6/2}$ʔɛi^{2}　：有了异味（词组）

　　　u（<ou）$^{6/2}$ɛi^{2}　：有滋味（形容词）

透底　t'au$^{5/2}$ tɛ^{3}　：穿了底（鞋、桶之类）

　　　t'au$^{5/2}$ lɛ^{3}　：向来

别义异读，其实也是语义决定语音变化的例子。不过它决定的是字音的变读，而不是音类

的分混或连音的变读。例如建瓯话：

露　su^{6}（露水）　lu^{6}　（白露）

力　sɛ^{6}（勤力、勤劳）　li^{8}　（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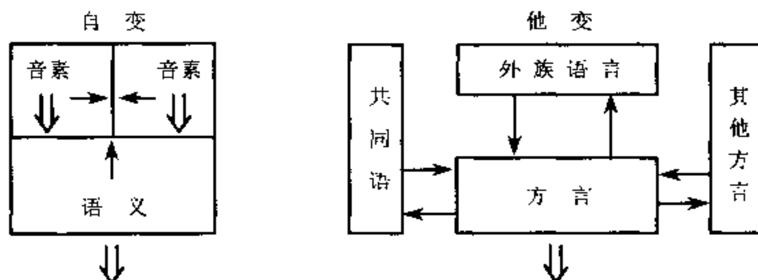
跳　tiau^{3}　～舞、～高　t'iau^{5}～板　t'iau^{6}　弹～

盘　puiŋ^{3}　～货　puiŋ^{5}　算～　p'uiŋ^{5}　～腿

以上所说的内因和外因都是方言在新的地域、新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自身的变化，可以称为“自变”。

方音发生变化的另一种常见的原因，是受共同语或其他方言甚至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这就是语言间的相互渗透，这种变化可以称为“他变”。

自变与他变可用下图表示其区别：



从另一个角度说，自变和他变也是一种语言演变的内因和外因。

语义对语音来说是外在的，对语言来说，音义又都是内在的。语音的演变还有更进一层的外在原因——即语言之外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原因。语音所以发生变化，有时是由于这个更大的外因决定的。例如，为什么受共同语或周边方言语音的影响有大有小，这就不是语言内部原因所能解释的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外因一定要经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它毕竟不是直接的动因。对方言的演变作庸俗社会学的解释也是不可取的。

3. 共性与个性

在探究方言语音的演变规律时我们必须分清各方言共有的规律和具体方言特有的规律。

从整体上看，自古至今汉语语音的演变有若干共有的规律，而从一部分方言或单个方言看，则各处在不同的地位，体现着各自的个性。让我们看看各方言在几条共同规律面前的不同表现。

（1）由分化而整化

在汉语的历史上，古代时期的发展以分化为主要趋势，近代以来则逐渐让位给整化。因此，早期形成的方言——东南部诸方言——语音差异大；晚近形成的方言——官话区的各方言则语音差异小。

东南方言大多有了千年的历史，南下汉人在那里定居后，都与当地原住民发生过民族融合，后来与北方的往来也减少了，这就造成了东南各省方言保留古代语言成分多，吸收其他民族语言成分多，和共同语及官话方言的差异以及各方言内部差异都比较大等等共同特点。总

之，显得古老而纷繁歧异。

东南方言保留古代语音特点比官话多，这是人所共知的。唐以前汉语普遍存在的全浊声母，如今主要保存于吴方言和湘方言，此外，偶见于赣西北方言和闽北方言。元以前普遍存在的入声调类，如今在官话地区少见了，而在东南方言则普遍存在。至宋代还普遍有别的一二等韵的语音对立在东南诸方言也多有反映。例如：

	财——柴		灾——斋		保——饱		官——关		菜——债	
苏州	zᴇ^{2}	zɒ^{2}	tsᴇ^{1}	tsɒ^{2}			kuø^{1}	kuᴇ^{1}	ts'ᴇ^{3}	tsa^{5}
温州	ze^{2}	za^{2}	tse^{1}	tsa^{1}	pɜ^{3}	puɔ^{3}	ky^{1}	ka^{1}	ts'e^{5}	tsa^{5}
双峰	dze^{2}	dza^{2}	tsue^{1}	tsa^{1}					ts'e^{5}	tsa^{5}
南昌							kuɔn^{1}	kuan^{1}		
梅县	ts'ɔi^{2}	ts'ai^{2}					kuɔn^{1}	kuan^{1}	ts'ɔi^{5}	tsai^{5}
广州	tʃ 'ɔi^{2}	tʃ 'ai^{2}	tʃɔi^{1}	tʃai^{1}	pou^{3}	pau^{3}	kun^{1}	kuan^{1}	tʃ 'ɔi^{5}	tʃai^{5}
阳江	tʃ 'ɔi^{2}	ʃ 'ai^{2}	tʃɔi^{1}	tʃai^{1}	pou^{3}	pau^{3}	kun^{1}	kuan^{1}	tʃ 'ɔi^{5}	tʃai^{5}
厦门	tsai^{2}	ts'a^{2}	tse^{1}	tsai^{1}	po^{3}	pa^{3}	ku ã^{1}	ku ãi^{1}	ts'ai^{5}	tse^{5}
福州	tsai^{2}	ts'a^{2}	tsai^{1}	tsɛ^{1}	po^{3}	pa^{3}	kuaŋ^{1}	kuoŋ^{1}		

官话方言各区的分化大多是元代以后的事。在汉语方言中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并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的基础方言。其中心地带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直是中华民族活动的中心，从西北高原到华北平原，历来交往密切，东北、西北和西南各地的大量人口是明清之后由黄河、长江流域移居充填的。最近的数百年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近代城市的形成，汉民族共同语也逐渐定型了，汉语的发展逐渐以整化代替了分化。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官话方言，语音上的差异就比较少，一致性特征比较多，这是有目共睹的，具体情况不必细列。正是这个原因，官话方言虽然使用人口占汉族人口70%，分布地域则纵横都达两三千公里，但是彼此间通话并没有困难，不像东南方言不少地方一个县内都有几种不能通话的小方言。

从这一点看来，把汉语方言先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是合理的。从现在的面貌说，官话代表着一致的一面，东南诸方言反映了复杂的一面；从历史渊源说，官话是晚近时代汉语整化时期形成的，非官话是早期汉语分化时代形成的。不论从哪一方面看，这种分类法都是合理的。

为什么会早期方言分化趋势强，而后期则整化占了上风呢？这便是社会历史的“外因”所决定的。在中世纪的古代社会，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小农经济，政治上则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人民一再迁徙，因而汉语分化出许多歧异的方言。近现代以来，城市兴起，交通发展，商品经济逐渐成熟，文化也跟着繁荣起来，语言整化、统一的趋势就到来了。

(2) 由自变而他变

早期形成的东南诸方言大体上是北中国几次大动荡或者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后，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定居而形成的。当时的共同语只有书面表式，口语共同语尚未形成，东南各省大多

丘陵起伏、江河交错，各方言区间交往也不多，因而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及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太大。由于原来南方的原住民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语方言吸收土著民族的语言成分也不会太多。因此可以说，早期形成的东南方言的语音系统主要是“自变”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东南方言之间所存在的一些语音系统上的共同特点，不少属于“先天”的同源现象。例如吴方言与湘方言都存在的全浊声母，复合元音单音化（元音韵尾脱落），该是反映了上古时期吴、楚方言的关系。又如客赣方言共同的全浊声母不论平仄今读大多为送气清音，也应该是历史上曾经共有过的特点，赣方言分布地区显然是客家先民经过住过的地方。这是许多史学家论证过的。

在东南诸方言之间，也不乏“后天”的渗透现象，即共同语对方言的影响或方言之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他变”。例如东南方言中的“近江”方言：湘语、赣语、吴语（也可包括徽语），见系声母三四等韵大多已经颚化为 tɕ、tɕʻ、ɕ。中古入声韵尾大多已经合拼或脱落；湘语和徽语多无入声韵类，只有入声调类，赣语的入声韵类 -p、-t、-k 尾大多不全，吴语只留下 -ʔ。这显然是北边和西边官话影响的结果。影响最大的湘语和徽语脱落的最彻底。在“远江”的闽、粤、客诸方言也有见系读 tɕ、tɕʻ、ɕ 和塞尾脱落的现象，但都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至于方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较为明显的多见于交界地区，特别是双语地区。例如龙岩、漳平的闽南话，古全浊字今读送气的较多，这是闽西客方言影响的结果，粤北的粤方言（如连山、连县及仁化、东昌等地）无 -m、-p 韵尾，显然是粤北土话和客家话影响的结果（詹伯慧、张日升，1994）。客家话大多没有撮口呼，有撮口呼韵母的少数点大多受周边方言带撮口呼的影响。如广东的连南、河源，广西的陆川，其周围都有粤方言（李如龙、张双庆等，1992）。

可见，在东南方言中，可以再分为远江方言和近江方言两大类，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受官话的影响小，后者影响大。这种从大处把汉语方言分两层三类的区分法比起并列分为几个大区或分为官话方言、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三大类都显得比较合理。

从历史上看，所以从自变而他变，也是语言之外的社会原因所决定的。自变是因为一个方言区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共同语未能普及。他变是由于共同语的普及，双语区的增多，以及社会生活的逐步开放。

(3) 由字音变读而连音变读

综合各方言的情况而论，汉语方音的演变早期多表现为字音的变读，包括音值的递变、音类的分合、字音异读的增减。至于各种连音变读则是后起的演变。得出这个结论，是从以下事实得到启发的。

第一、普通话的轻声儿化都是后起的现象。说到轻声时，赵元任说：“多数文言词语、反映现代生活的新名词、科学术语，这些都不含轻声，剩下的，也就是老资格的口语词语——有的有轻声，有的没有。”（赵元任，1979）可见普通话轻声是晚近的口语中产生的。至于儿化，唐诗中的儿肯定是单独的音节，押 i 韵（ȵʑi）。到元代，儿读为 ʐʅ，到明代才读成 ər，明杂曲、杂剧儿尾不入韵，押韵的是儿尾前的音节（《芳茹园乐府》：只怕房先儿，全轻府产判儿，勉强相留没个笑脸儿，陪着咱坐似针尖儿）（向熹，1993，353～354 页）可见儿化大约只有 300 年历史。

第二、拿连音变读最复杂的福州话说，1870 年教会所编《福州话词典》有变韵和变调的

描写（前者较为清楚，后者含糊），尚未有变声的记录，可见变调和变声（声母类化）是近百年间才发生的变化。从 1906 年所编的《美全八音》和陶燠民的《闽音研究》到现在，声韵调的连音变读都有些变动，可见最近数十年，福州话的连音变读还处于调整之中（李如龙等，1979）。

第三、就全国范围说，各方言的连音变读各有不同的“热点”，甚至同一个大方言区内的小方言也有不同的取向。官话轻声、儿化多，连读变调少；湘赣方言轻声多，变调也少；吴语连读变调最为复杂，浙南吴语还有小称音变，没有轻声和儿化；闽方言中闽东有变声、变韵、变调，闽南有轻声、变调，闽北则各种连音变读都没有；客方言只有正在生成之中的少量轻声现象。这也充分说明了各种连音变读是最近三二百年之间生成的，是大区小区方言“各显神通”的结果，而不是源远流长的语音演变。

那么，近几百年间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样的连音变读呢？

应该说，各种连读音变是汉语多音词占了优势之后所引发的现象。因为多音词把几个语素意义重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于是要求语音上也把几个音节融化为一个整体，连读音变就是把几个音节合成一个新的语音单位的组织方式。

在汉语词汇史上，复音词的大量增加是中古以后的事。向熹指出：“复音词大量产生是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特点。中古产生的新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词。上古词汇以单音为主，到了中古，就口语而论，复音词变得逐渐占有优势了。”他还说：“近代产生的新词中，双音词占有绝对优势。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不少三音节和多音节词，这是近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在近代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向熹，1993，494～622 页）连音变读既然发生于复音词大量增加之后，说它是近数百年间的事是合乎逻辑的。

如果从个别方言出发考察其共时结构规律和历时演变规律，我们便可以更具体地看到各方言的演变的另一面——具有鲜明的个性。这种个性化的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发展异向。就音类的演变说，声、韵、调趋于繁或趋于简，不同方言有不同取向。同样是闽方言，建瓯话韵母只有 34 个，潮州话多达 85 个。闽方言声母一般是 14～15 个，吴方言是 28～29 个。就字音变读说，文白异读、别义异读、新旧异读等在不同方言也有不同取向。例如闽南话有文白异读的字，估计在常用字中应超过半数。而北京话、客家话、广州话中有文白异读的字就少得多；普通话的多音多义字（别义异读）大约占常用字的十分之一，在其他方言就少得多；上海派的新老派异读多，而在福州话就很少。至于连音变读如上节所述在各地方言中也是表现得大不相同的。

（2）演变异速。不同的方言在继承前代语音特征或调整创新上有极大的差异。中古音的平、上、去、入在一些方言里各分阴阳成为 8 调，粤语甚至还因元音长短再分为 10 调，大多数官话则重新整合成 4 调（西北有的点又合成 3 调）。闽方言大体上还保留了上古声母的“无清唇”、“无舌上”的特点，这是语音变化缓慢的典型；而北京话韵母原来只有 38 个，儿化兴起之后，一举增加了儿化韵 25 个，如果加上 4 个 -m 尾合音韵（am、im、əm、uom）韵母数增加了近 8 成，这是语音变化迅速的典型。

（3）变动异途。不论是音类演变或连音变读，不同方言的具体变化途径常有不同。例如全浊声母清化后有按古四声分送气不送气的，北京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粤语平上送气、去入不送气，也有全送（客赣方言）、全不送（部分湘方言）、或少送多不送（闽、徽语）的。塞音

韵尾的消变是近代以来汉语方言音变的主要流向，但具体途径又多有区别。吴语走合并简化的路（－p、－t、－k→－ʔ），部分赣方言走浊音化的路：－t→－t^{n}、－k→$k^{ŋ}$（余干），－t→－l（都昌），－p→－m（光泽），－p→－i（阳新），－t→－ɛ（新余），－k→－u（秀篆）（李如龙、张双庆等，1992）。小称音变在北京表现为儿化，在浙南吴语是－n尾化加上变调，在粤语是高升变调。

（4）深广异度。方言里音类的变读未必都是穷尽的变化。不同音类的变读往往所管的字有多有少。例如客赣方言古全浊塞音塞擦音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也有少数字读为不送气清音，邵武话咸、深两摄入声字有变读为鼻音的变化（搭 tan^7、合 xon^6，十 $ɕin^6$、急 $kən^7$），但也有一些字不参加这种变化：鸽 ko^7、踏 $t'a^8$，狭 xie^6、腊 la^6，笠、粒文读 li^6（同上注）。北京话连读变调只发生在上声字作双音词前字，在吴方言不论什么调类、也不论是前字后字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且还有广用式和窄用式（固定结构里的变调）之别。同样的小称变调，粤方言里词例不算太多，在浙南吴方言则相当可观。再如轻声现象，在客家话刚刚冒头，只见于若干词缀；在闽南话往往与语法意义、词汇意义相关，范围也有限；在北京话及湘赣方言双音词及多音词组的轻声现象就十分普遍了。这种音变的不同深度与广度，大概与发生音变的时间长短以及在该方言的语音演变中是否属于主流特征有关。

为什么方言语音的共时结构规律和历时的演变规律会出现如此纷繁的歧异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方言的语音系统的形成和演变都有独特的社会条件，都是历时演变规律（变异）和共时结构规律（整合）相互制约、相互竞争、相互作用的结果。共同语的普及情况，周边方言的强弱势乃至该地区的行政属辖、人口迁移、变更的过程，文化教育的普及状况，地方戏曲等的流行情况等等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着共时系统的整合力与历时演变的方向和速度。

思考与练习

一、试述方言语音结构特点在方音差异中的重要性。

二、举例说明汉语方言语音的跨方言区的区域特征。

三、用你所熟悉的方言字音列举古今音类对应中的常例、变例和特例，并说明造成不同对应的原因。

四、在本章所述的汉语方音历史演变的若干规律中抽出一点来用方言事实加以论证。

参考文献

丁声树、李荣（1956）　汉语方言调查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汇编》　科学出版社

钱乃荣（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1983）　论闽方言的一致性《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　商务印书馆

平田昌司主编（1998）　徽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李　荣（1985）　官话方言的分区　《方言》第2期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曹志耘（1996）　严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杨述祖、王艾录（1984）　祁县方言志　《语文研究》增刊（8）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乔全生（1999）　洪洞方言研究　中央文献出版社
李如龙（1991）　闽北方言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张成材等（1987）　西宁方言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　汉语方音字汇　文字改革出版社
董少文（1958）　语音常识　文化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等（1994）　福州方言词典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　荣（1979）　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　《方言》第 1 期
曹志耘（2000）　南部吴语的小称　《第 7 届东南方言比较研讨会（武夷山）论文》
麦　耘（1997）　广州话的声调系统与语素变调　《第 9 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汕头）论文》
李如龙整理（1962）　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　《厦门大学学报》　第 2 期
傅国通等（1985）　浙江吴语分区　《杭州大学学报增刊》
丁邦新（1998）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陈昌仪（1991）　赣方言概要　江西教育出版社
林伦伦、陈小枫（1996）　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　汕头大学出版社
陈碧加（1990）　漳州话前后鼻韵尾演变状况及其应用《漳州师院学报》第 1 期
何大安（1988）　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90）
罗常培（1956）　汉语音韵学导论　中华书局
颜逸明（1994）　吴语概说　华东师大出版社
蓝小玲（1999）　闽西客家方言　厦门大学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1973）　The Hakka Dialect Cambridge：U.K Univ.Press
黄雪贞（1988、1989）　客家方言声调的特点　《方言》第 4 期、第 1 期
张双庆、万波（1996）　赣语南城方言古全浊上声字今读的考察《中国语文》第 5 期
李　荣（1982）　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　《音韵论稿》　商务印书馆
徐通锵（1991）　历史语言学　商务印书馆
梅祖麟、罗杰瑞（1971）　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来母 s－声字　《清华学报》新 9 卷 1、2 期合刊
李如龙（1983）　闽西北方言来母字读 s－的研究　《中国语文》第 4 期
沈兼士主编（1985）　广韵声系　中华书局
崔荣昌、李锡梅（1986）　四川境内的“老湖广话”　《方言》第 2 期
彭小川（1989）　沙头话古非敷奉母字今读重唇音　《中国语文》第 3 期
德·索绪尔（1980）　普通语言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
布龙菲尔德（1980）　语言论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1965）　长汀话两音节三音节的连读变调　《厦门大学学报》第 2 期
詹伯慧、张日升（1994）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暨南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向　熹（1993）　简明汉语史（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等（1979）　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　《中国语文》第 2 期

第六章　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和词汇系统

一、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1. 对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估计

有一种说法至今在学术界还十分流行——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在语音。近 20 年来，汉语方言的词汇调查有了长足的进步，人们对这种说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尤其是近百部单点方言词典和《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及《汉语方言大词典》两部巨著出版后，关于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可以得到更为确切的认识。

说起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人们总是想到东南角的闽粤方言。其实，就在官话方言区，词汇差异也很可观。据《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1996），即使只就日常生活最常用的若干词目来看，词汇差异就很不简单了：

词目	说法种类	方言词举例
粥	10	稀粥/稀饭/米汤/水饭/粘粥/汤/二抹子饭/二抹头/甜稀粥
米饭	11	大米饭/大米干饭/白米饭/干饭/蒸饭/饭/粳米饭/稠饭/干粥/稠粥
饺子	14	水饺儿/水饺子/饺儿/饺得/角子/角角/煮饺儿/饸饹/包子/元宝/水饭/弯弯顺/煮包子
胡同	19	胡同儿/过道（儿）/巷儿/圪浪得/合浪（子）/巷道/巷当/巷路/巷巷（儿）/冲冲/弄子/弄儿/巷口/巷子/道子
厨房	22	灶火屋（儿）/饭屋儿/灶火坑/伙房/火庵儿/里楼/屋儿地下/堂屋地/正间地/灶间/伙屋/灶屋/棚儿底下/灶房/灶门间/火边/灶门口/锅屋/灶下/锅上
厕所	17	茅房/茅厕/茅厕坑/茅子/茅坑/厕所儿/茅楼（儿）/便所（儿）/栏子/圂/屎栏/后楼/圈圂/茅厕子
晚饭	19	黑家饭/后晌饭/下午饭/黑夜饭/黑劳饭/黑间饭/黑喽饭/喝汤/黑米饭/贴晌饭/下晚儿饭/下黑饭/夜饭/晚上饭/汤/黑了饭/宵夜/过夜
自行车	15	自行车（儿）/车子/车得/洋车子/洋驴子/洋驴儿/急行车/脚踏车（子）/洋马儿/单车/线车/杆子车/钢丝车
车轮	17	车轱辘（儿）/车轱轮儿/滚子/车滚儿/车滚子/车盘儿/车陀/花轱辘/轱辘/车滚滚儿/车脚得/角子/二轱辘子/车轮子/轱辘子
公羊	20	羊公子/怕子/羯子/羯羊/羝羊/顶羊/种羊/骚货/骚胡/圪顶/骟羊/圪

羝儿/羊牯/羊头儿/老骚胡/骚胡羊/骚胡芦羊/羊怕子/骚羊子

丈夫	32	当家的/男人/先生/孩儿他爹/孩子他爹/老头子/老汉/汉子/掌柜的/老汉子/班儿上的/外头的/屋外的/老登/女婿/她男的/男的/外头人/当家哩/当家人/老倌（儿）/男边的/门前人/老公/领头人/男将/外手的/外人儿/老爷们/他爹
妻子	34	媳妇儿/太太/老婆（子）/娘儿们儿/孩子他娘/女人/媳子/孩儿他娘/家里（的）/老伴/婆姨/屋里人/老抳/屋儿里的/屋里（的）/家里人/老婆儿/婆娘/家里头的个/堂客/女的/她的/屋头边的/女将/屋头的/奶奶/内人/家眷/老嫚子
乳房	21	个个/咂儿/妈儿/奶头儿/奶子/妹妹/妈妈/奶/奶子/妞妞/奶奶/奶妞/乳头儿/妈妈儿/斗斗儿/咪咪/妈/捏捏疙瘩/灭灭/芒芒
这里	28	这儿/这/这点儿/这堂/这大/这歹/这圪垯/这块/这凯/格尖/咧口儿/这来/这下/格里/格块/格拉/这块儿/这向头儿/这合儿/这边儿拉/这垯/自垯/这些/这地方/这得/札儿/这塔儿
什么	23	什么儿/什呢/啥/啥子/啥搞儿/甚/甚子/嘛/么得/么二/咋个/哪样/唧子/唧个/什么的/么（儿）/么个/么事/么东西/哄/咋么
行（可以）	17	行咾/可以/中/沾/要得/使得/可得/用得/帮尖/照/中用/管/成/能成/好的/得得

该书最后附了49幅方言地图，其中有19种说法以上的条目就有23条，占一半左右，这些条目及其所用不同符号数（表示不同的说法种类）是：

太阳19	冰雹29	打闪19	土块19	尿布23	脑袋22
口水19	小孩儿30	外祖父29	外祖母33	玉米33	红薯27
土豆儿25	公牛19	麻雀34	蜻蜓35	蹲28	那里37
胡同19	这里32	什么29	被（介词）31	一起28	

如果缩小到一个省的官话方言的范围内作一番考察，其结果还会更加使人吃惊。就在包围着北京的河北省，据李行健主编的《河北方言词汇编》(1995)，下列词条所见的不同方言词条目数如下：

早晨（33）	傍晚（40）	雪珠儿（41）	冰锥儿（47）	蝙蝠（48）	货郎儿（39）
蚕茧儿（45）	台阶儿（29）	厕所（35）	牙垢（37）	囟门儿（38）	乞丐（33）
丈夫（42）	妻子（41）	伤风（31）	粥（36）	巫婆（52）	有喜（42）
故意（34）	傻里瓜唧（79）	吝啬鬼（48）	吝啬（62）	舒服（39）	尿包（36）

诚然，在许多说法中有同义词，称谓中有背称和面称之别，但是在官话内部，确实不好说词汇差异就不大，这是应该肯定的。

至于在东南方言中，显然有更多的词汇差异。20年前，我曾经就《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在地道的泉州话、苏州话和广州话的口语中所用的方言词做过统计，结果如下（李如龙，1982）：

	所用方言词	总用词量	方言词所占比例	材料来源
泉州话	100	120	80%	本人自编

广州话	91	140	65%	《汉语方言概要》
苏州话	64	115	55%	《现代吴语的研究》

这是用同一段话翻译成方言口语所作的统计比较，其中包括不少多次重复的常用的方言词。虽然"翻译"时着意于同或异可能有区别，但从总体上看，在东南方言的口语用词中，说方言词汇差异可能占总词汇量的一半以上，这应该是有事实根据的。

再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小例子。据平田昌司主编的《徽州方言研究》（1998，180页），对父亲的面称在徽州7个县的方言中就有16种说法，其中休宁一点就有五种说法：

绩溪	歙县	屯溪	休宁	黟县	祁门	婺源
伯伯（含	伯	爹	爷，阿爷	爹爹	爷儿	爸爸
变调与不	爷	爷	大（阴去）	爸爸	伯儿	爷
变调两种）	相	爸（新）	阿大、大大	官人		

汉语方言词汇的差异有多大，更科学的说法还有待于找出一种可用数量统计的方法来，这里所举例子只是全豹的一斑罢了。

2. 哪些方面的用词方言差异大？

方言历来通行于口语，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书面语都是用的统一的民族共同语，而且书面语和口语早有分道扬镳之势。方言词语进入书面语的极少．相反，随着政治的深入、科学的普及、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书面语却大量地涌入口语。当今社会里，不论是城镇或农村，也不论是哪个方言区，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口语之中，谁能回避与日俱增的书面语词？什么"改革、政策、收入、机遇、先进、调查、股票、广告、旅游、反贪、扫黄、下岗"、"计划生育"简称"计生"，"减轻负担"简称"减负"，不用多久便在全国各地通行并进入口语。这些日益增多的书面语词当然是极少有方言词的。

口语之中，大量的方言词语都存在于日常生活用语之中，例如关于天象气候、地理环境、人体、人物、职业、称谓、饮食、服饰、房舍、起居、舟车、旅行、生老病死、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农林牧副、买卖经营等等方面的许多常用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此外，各类虚词也是当然的常用词。这些用语是人们一天到晚的生活、一年到头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的。世代相因，老方言词传承下来了；口口相传，新方言词也流行开来了，于是形成了越是常用的口语用词方言差异越大的局面。笔者曾就现代汉语前100个高频词作过考察，除去少量数词和书面语用词之外，作为单音词，各方言间少有词汇差异的只有7条：年、水、手、有、来、出、大。其中"水"在闽南话读文读音表示"美"，"手"在东南方言中通常包括"胳膊"，"有"在闽语中还有许多特殊用法（如说："有看到"、"看有食无"），"出"在粤语里还兼表方位（出便：外面），"来"在吴语还用作助词（好得来：好得很）。其余名列前茅的高频字用作单音词时，各方言间的差异都是人们所熟知的：

的/个/其/格/嘅　　了/仔/哉/咯/去　　是/系　　不/勿/唔/无

在/喺/勒/伫/着　　我/伲/奴/咱/俺/侬家/阿拉/卬　　你/汝/侬

他/渠/其/伊　　这/格/呢/只/者/选　　那/许/嗨/该/吖

和/合/同/同埋/搭/跟　　说/讲/咀/话　看/觑/望/睇/瞪/睒

哭/叫/喊/啼/吼/嚎　　很/好/老/野/尽/蛮/咹　　给/畀/把/护/度/拨

没/无/唔/未/未曾/毛/冒　　家/屋里/厝/兜/屋下/屋企

（上例中首字是共同语说法，各斜线间是方言说法）

封闭性词类[①] 大体上都是常用的，因而方言差异大。据《汉语方言词汇》（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以下简称《词汇》），以下各类封闭性的词，几乎没有一条是20点方言说法相同的：

类别	时间词	方位词	称谓词	指代词	量词	各类虚词
条目	32	14	61	44	43	47

非封闭性词类中，方言差异最多的是人体名称、动物名称。50条人体名称之中，只有"手"一条是各点无异的。91条动物名称之中也只有"牛、马"两条各点无异，其他动物名称中，"蚂蚁"有14种说法，"蜻蜓"有18种说法。68条植物名称中只有5条是各点一致的，其他如"玉米"有20种说法，"土豆"有17种说法。赵元任先生说过："在称谓名词特别是对面称呼上，在许多小植物小动物的名称上，尤其是昆虫的名字，不但是北京的形式是地方性的，可以说没有任何方言里的名称够得上全国性。"（赵元任，1979，13页）以上材料论证了赵先生的这个说法，但关于其他封闭性语词的方言差异，赵先生没有提及。

动词和形容词相比，动词的方言差异多。302条动词中未发现方言差异的只有35条，占11.5%。144条形容词中未发现方言差异的38条，占26.4%。

以上情况大体说明了，和人们日常生活贴近的用词方言差异多，反之方言差异少。人体名称是经常要说，并可"近譬诸身"，拿来构成其他用语。动词大多与人的活动有关，所以方言差异也多。以下是《词汇》所展示的常用动词的不同说法：看（14），拿（13），睡（11），落下（12），生病（37）；形容词则有关人事的有主观色彩的差异多，关于物态的差异少。例如："长、短、厚、大、深、浅、空、满、圆、平、正、反、横、直、弯、斜、轻、重、密、疏、硬、软、生、熟、远、近、少、慢、早、好、贵、臭、甜、咸"等，20点都只有一种说法；而"漂亮"则有30种说法，"吝啬、丑陋"各有22种说法。

同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事物的名称，如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等大型工业品的名称，方言差异少；小件物品也因为贴近日常生活而方言差异大。例如：

煤油/洋油/火水/涂油　火柴/洋火/番仔火/自来火　水泥/洋灰/洋泥/红毛灰

自行车/单车/脚踏车/骹踏车　肥皂/胰子/番碱/雪文　冰棍儿/棒冰/霜条/雪条

热水瓶/暖水瓶/电壶/电罐　电灯/电火/电光/电亮　手电筒/电棒/手电/电筒

从词义的角度说，表示整体的泛指的类别概念的词各方言趋同的比较多，而分体的特指的概念则有更多的方言差异。例如："牛、马"在20种方言没有不同说法，但分了性别、大小及种类之后（公牛、母牛、水牛、黄牛、马驹等）各方言说法即多所不同。类似这种区别还有很多：

菜——菠菜、韭菜、洋白菜（梅县：角菜、快菜、包菜）

糖——红糖、冰糖、麦芽糖（厦门：乌糖、糖霜、麦芽糕）

手——左手、右手、手指（武汉：倒手、顺手、指甲）

洗——洗脸、洗澡、涮碗（苏州：揩面、汰浴、盪碗）

买——买米、买布、买油、买药（西安：量米、扯布、打油、抓药）

① 封闭性词类：语法上指可列举的词类和其他形式类。

冷——（天）冷、（水）冷、（物性）冷（福州：清、冻、冷）

如果方言词语不是表示单纯的事物或动作、状态，而是比较复杂的含义或带有较为浓厚的感情色彩的，往往方言差异大。例如《词汇》所列，“捉迷藏”有33种说法，“打瞌睡”有26种说法，“接吻，出嫁”各有20种说法，吹牛、拍马则有15和23种说法。

从词的构成方式说，如无词根的差异，单音词、单纯词的方言差异少，加缀词、叠音词或合成词、词组词则方言差异多。例如霜、雪、湖、海、缸、锁、砖、门、盐、茶、玻璃、葡萄等，《词汇》中均无差异，上文所举“洋白菜、麦芽糖、洗脸、买布、打瞌睡、捉迷藏”等则方言差异多。还有些加缀词也是各地多所不同的。例如：皮/皮儿/皮子/皮皮　哥哥/哥/阿哥/依哥/哥子　虾/虾子/虾公/虾公子/虾米/虾米子　鼻子/鼻头/鼻公/鼻哥/鼻　老鹰/老鹰儿/鹰婆/鹰婆子/老鹰婆　下面/下头/下边儿/下底/下转/下背/下便。

3. 方言词汇差异有哪些类型

大多数的方言词汇差异都是词与词成对应的差异。各种方言词汇差异归纳起来有如下6种不同的类型。

（1）词源差异

方言形成的时代，受原住民语言的影响留下的“底层”，这些方言词和北方汉人从中原带来的汉语是不同源流的。这种“底层”现象集中表现在地名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松石在他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就考证了数十个留在两广地名中的壮语语词，例如那、都、思、古、六、罗、云、布、邑等等（徐松石，1993年）。80年代之后，游汝杰比较了台语（壮侗语）和南方汉语方言的量词及鸟虫类名词词头，提出了一批“底层词”（游汝杰，1999）。90年代李敬忠在比较了粤方言和现代壮侗语的词汇之后提出：“现代粤语里，有20%左右的古百越语（当今壮侗语族仍普遍使用）的词汇。”（李敬忠，1994）李如龙也研究了福建的四个地名用字，指出它们是古百越语的底层（李如龙，1993，1998）。由于方言学者和民族语言学者的联手合作，南方方言的底层现象研究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

中古及近现代以来也有一些方言先后借用了一些外族语言的语词。例如广州话和上海话中的英语借词，闽南话里的马来—印尼语借词，东北方言中的满语借词等等。这些方言词在性质上也属于异源词。

（2）词根差异

许多单音词在不同的方言里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这便是词根的差异。例如：

吃/喫/食　穿/着/颂　脱/褪/除　站/立/徛　锅/鼎/镬
他/渠/伊　抹/擦/拭　找/寻/讨　藏/园/摒　说/讲/话
稠/浓/厚　不/弗/唔　怕/惊/吓　胖/壮/肥　小/细/嫩

这些词根的差异大多数是方言里保存了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说法。上举例词中，头一种说法是普通话和官话方言的说法，后面是东南诸方言的说法，大体上后者先于前者。也有些是方言的创新，例如“穿着”说“颂”是闽语的创新，“脱（衣服）”说“除”是粤语的创新。

有些双音词一个词素是共同的，另一个词素有异。例如：

鸡蛋/鸡卵/鸡春　猪肝/猪润/猪湿　江米/糯米/秫米
家具/家俬/家生　茶杯/茶瓯/茶瓯　冰条/霜条/雪条冰棍儿

开水/沸水/滚水　　公鸡/生鸡/雄鸡　　亲戚/亲眷/亲情

(3) 词形差异

有些方言词由相同的词根构成，但是构词法不完全相同：加不加词缀，加不加修饰，加什么词缀，是否用重叠式或词素顺序各不相同。例如：

雁/大雁/大雁子/雁鹅　　驴/毛驴/驴子/毛驴儿　　小马/马驹/马仔/马崽子

公马/儿马/马公/马牯　　泡/泡儿/泡泡/泡子　　客人/人客/客

哑巴/哑子/哑佬/哑儿　　蒜/大蒜/老蒜/蒜头　　本儿/本子/本本

由于造词法不同，有些方言词词形差异更大，甚至连词根也有异。例如：

花生/番豆/地豆/地生/落花生　　茄子/茄/矮瓜/紫菜/吊菜

甲鱼/鳖/老鳖/团鱼/圆鱼　　老虎/虎/大猫/大虫/老虫

垃圾/脏土/屑子/粪扫/灰　　中午/晌午/日昼/中时/晏昼

(4) 词义差异

应该说，方言词中有词源差异的方言词是很少的，有词根差异的也不多，词形不同的就比较多了，而基本词义相对应的方言词之中，词义上有种种差异的则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不同方言词尽管基本意义可以相对应，如果就义项的多少以及在语句中的组合功能、色彩的差别说，意义完全相同的方言词几乎是找不到的。

许多词汇学的书都说，有些基本词汇自古至今十分稳定，词义并未发生变化，例如“天、地、山、水、手、脚”。如果说这些基本词的基本义并未发生重大变化是符合事实的，但就各方言的词义来说，却是经常可以发现许多重大差异的。“地”在许多方言里可以用来指称“旱地”（闽语）或“坟墓”（客家），这是义项多的例子。“天”在官话区兼指“一昼夜时间”（“来了三天了”）或“某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五更天”，“黄梅天”）；在非官话里“天”常常不具有这个义项，“一天”上海话说“一日天”，闽粤语说“一日”，有的说“一工”。这是义项少的例子。在闽南话里，“天天”读文读音可用作形容词去指“不好动，架子大”，还可以说“开散天”，意义是“像天字那样把脚张得开开的”；“山、水”也可以用作形容词，“山”是“多山”的意思（阮厝真山：我的家乡尽是山），“水”是泛指的“美”。闽粤语“手、脚”常常兼指“胳膊”和“腿”。至于不少方言里“肥、胖”不分，“吃、喝”不分，“热水、菜汤”不分，“椅子、凳子”不分，“包子、馒头”不分，“外甥、外孙”不分，甚至“苍蝇、蚊子”不分，这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

除了词汇意义的不同，基本意义相对应的方言词之间还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的差异。语法意义的差异经常表现为词性的兼类，例如梅县“税”可用作动词表示“租”，闽语“去”读轻声置于动词之后表示动作的完成或事件的结束（如厦门话破去：破了，澹去：湿了，拍无去：丢了）。在官话方言里，“老”用作动词（人老了）、形容词（老人）、副词（老好人）、词缀（老李），“花”可以用作名词（开花）、动词（花钱）、形容词（老花眼）。粤方言里的“几”用作数词（几个人）、副词（几好：多么好）；“咁”用作指示词（咁大：那么大）、连词（咁唔使去：那么不必去）。闽方言的厦门话“着”用作动词（着对了：中了）、副词（着去：该去）、助词（食着苦苦：吃起来有点苦，有食着：吃过了）；“用”可用作动词（用钱）、介词（用边仔行：从边上走）。赣语萍乡话“把”可用作动词表示“把守”（～到大门收票）、“给予”（把我一本书）；也可用作介词表示“让”（～他去饿）、“把”（～门关到）；还可用作数量词（十～

人，一～草，一～轿子）。所谓修辞意义的差异就是方言词里的各种附加意义，褒贬色彩的不同。例如官话里“老头儿”是昵称，“老头子”是贬称，福州话“老货”是贬称（老东西），厦门话“老货仔”是昵称（老人家）。官话里偶尔也说“何如”“未曾”“见笑”，显得文言味很浓，但在福州话（何如：怎样），莆田话（未曾：还没有），厦门话（见笑，羞耻）却是十分通俗的口语。

（5）词频差异

这里说的词频差异包括词频——方言词的使用频度和词值（相当于西方学者所说的 Valency，可翻作“词值”）——方言词素的构词能力。有些词在甲方言是基本词，很常用，构词能力和组合能力强，在乙方言是生僻词，不能构成派生词，也很少和其他词组合，就像化学元素一样，有的很活泼，有的很不活泼。虽然不同方言都有这个词，其价值却是大不一样的。例如：

闽西客家长汀话也说“山”，但更常说“岭”，用“岭”派生的词很多，如说岭坡（山坡）、岭顶上（山上）、岭脚下（山下）、岭路（山路）、岭边（山边）、岭岗（小山岗）、岭窝（山谷）、细岭（小山）。普通话也“山、岭”都说，但“岭”不常用，据《现代汉语词典》，“岭”字领头的派生词只有一条，“山”字领头的派生词有 86 条。

闽方言多说“溪”少说“河”，以泉州话为例，“溪”可以派生：溪水（河水）、溪头（上游）、溪尾（下游）、溪口（河口）、溪底（河床）、溪岸（河岸）、溪沙（河沙）、溪石（河里的石头）、溪边（河边）、溪船（内河小木船）、溪鱼（淡水鱼）、溪坎（河边陡岸）、溪门（河面）等。据《现代汉语词典》、“溪”字领头构词只有两条，“河”字领头构词则有 38 条。

闽南方言多说“拍”，少说“打”，“拍”的构词能力强，以福州话为例可说：拍毛（丢失）、拍施（撒下）、拍打（武打）、拍算（打算）、拍米（买米）、拍马（作弊）、拍滚斗（翻筋斗）、拍针（打针）、拍招呼（打招呼）、拍遢埕（迷路）等，《现代汉语词典》“拍”领头构词只有 14 条，“打”领头构词则有 179 条。

（6）词音差异

现代方言和共同语一样也已经是多音词占多数了。词素组合成词后，有的方言发生了一系列的联音变化，例如轻声、变调、儿化、小称音变、变声、变韵，还有文白异读，别义异读等等，另一些方言则很少连读音变，连各类异读也少。也就是说，有的方言大体上字音等于词音，另一些方言则大不一样。这就是词音的差异。词音的差异既是语音差异，也是词汇差异，研究方言词时也必须予以关注。由于这些内容上一章已经有过详细介绍，此处不再作具体的讨论。

以上所述的词汇差异都是构成词汇对应的差异，除此之外，还有不成对应的词汇差异，即有些概念在比较的一方成词，在另一方不成词，须用词组来表达，或者根本不存在该概念。应该说，这种不成对应的词汇差异是更加重要的词汇差异，也是语义差异的重要方面。以往的词汇比较常常局限于成对应的词汇差异的比较，对不成对应的词汇差异尚未注意考察，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

例如：普通话的“个子”在上海话说“块头”，在福州话说“汉码”，在厦门话就没有相应的概念。论高矮时说“大汉、细汉”，论胖瘦时说“大股、细股”，问个子多高便说“大汉抑细

汉"、问个子多大则说"大股抑细股"。普通话的早饭、中饭、晚饭在闽粤客诸方言也常常问不出来，因为方言里只能连着"吃"说"食朝、食昼、食夜"。有时是方言词在共同语里找不到相对应的词，例如粤语里的"泊车"指的是"有代价地定时定地停泊汽车"，并不能简单地与"停车"相对应；"揸车"则是"驾驶汽车"的意思，和"开车"也不能对应。又如，闽方言里有个很常用的动词是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所没有的，福州、厦门均说 ti? (阳入)，意为"意欲拥有"，"唔挃"是不想要，肯定式则常与"卜"连用，如说"卜挃厚的，唔挃薄的"(要厚的，不要薄的)，给人东西问人要不要，可说"挃唔挃"，约人做事则不能用。"要不要买票"福州话说"有买票无"或"买唔买票"；厦门话说"卜买票唔 (无)"或"着买票唔 (无)"。这个"挃"也不能与普通的"要"相对应。这都是概念的有无造成的词汇的不相对应。

各地特有的食品、民居、服饰乃至各种民俗活动的有关名称也往往是共同语里没有相对应的词语的。这方面情况本书第十章还会讨论，此处从略。

在惯用语 (词组词) 里，这种词汇不成对应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例如上海话带"喫"字的惯用语，不少就是很难用单个词语来对译的："喫隑饭 (寄人篱下)、喫生活 (挨揍)、喫讲茶 (帮会纠纷时一种调解方式)、喫红灯 (遇上红灯、考试不及格)、喫食乖 (挑好吃的人)、喫螺蛳 (读书、说话时不连贯)"。

有些不成对应的方言词是因为概念分类的不同 (一方有类名一方没有)，例如年糕的总名闽语称为"粿"，客家话称为"粄"，许多方言并无总名。"回家"在普通话和许多方言里是个很普通的概念，在一些方言中也没有相对应的词。上海话只说"转去、转来"，硬要说"回家"，只能造出一个词组说"转到屋里向"。与此相仿，厦门话只能说"倒来、倒去"或"倒来即厝，倒去许厝"。

不成对应的方言词往往是最具方言特色的，对研究词汇史也很有意义，由于没有共同语词目，调查时就不容易发现，今后的方言词汇调查应该特别引起注意。

二、汉语方言的词汇系统

1. 词汇是一个系统

在早期研究词汇学的论著和教材中曾经流行着一种说法：词汇是语言中词的总汇 (或称"汇集"，"总和")。《汉语词汇讲话》首先提出："词汇和语法构造一样，也是成体系的。"(周祖谟，1959，10 页) 黄景欣 (1961) 在批评了"总汇"说之后进一步指出，词汇是"一系列具有一定形式、意义和功能特征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词汇单位 (包括词以及和词具有同等功能的固定词组) 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后来虽然反对"词汇有系统性"的提法不多，但是"词汇系统性不强"的说法还是相当流行的，许多研究家虽然也在探索词汇的各种系统性，但是往往各自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很难说到一道，未能形成一个公认的词汇系统的认识。

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关于词汇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也由于词汇的系统性本来就比较复杂。造成词汇系统的复杂性和研究的困难，至少有四种原因。

(1) 词汇单位数量庞大。语音的单位，不论是音素或音节数量都不大，大多数方言的声、韵母都只有十几个、数十个，音节数大概都在 1 000 多个。语法方面的虚词和特殊句式也不会

太多，几百条就不算少了。而各种语言的词汇总量就总有数万条、数十万条之钜，就基本词而论，也应有数千个。

(2) 词汇和意义直接相关。语音只有区别意义的功能，极少与具体的语义直接相关（像小称变调或儿化合音那种语素音变在语音单位中只是少数），语法的意义是抽象化的关系意义和类别意义，而词的意义是和具体的概念相关的，除了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表达客观的概念意义之外，词义还有使用语言的人的各种特殊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的含义。这种理解可能是偏离了客观意义的，也可能是更加深刻而准确的。这种运用可能很巧妙，也可能很笨拙。这也是词汇的归类和分析的难处之一。

(3) 词汇反映社会生活是最直接、最迅速的。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因而词汇的变化也是须臾不停的。工厂的产品换了新的包装、市场上出现了新的舶来品，词汇里就得有一个个的新词来称说它。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各自的专用语、常用词。词语的常用度、附加意义、感情色彩不但因行业而异，因不同人群而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尚的制约。凡此种种，因为变动不居，也造成研究的困难。

(4) 在语言的结构系统中，不论是单个的语词或成群的词语，除了各自特有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还有一定的语音形式，其中蕴含着因联音成词而发生的各种变化规律，词语内部的组织则有一定的语法规律。因此，研究词汇绝不能孤立地就词汇研究词汇，而必须联系语音和语法的结构去研究。诚然，研究语音，有时也得观照词汇和语法，研究语法也必须注意语音和语义；但都不像词汇那样，离开语音和语法的分析就会寸步难行。

语言是一个系统，语音、语法的系统性早已被人们接受，词汇也是一个系统，尽管有种种困难，我们也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去认识它。

2. 方言词汇的一般系统

方言词汇的系统性有些是和所有语言共有的。包括：

(1)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派生系统。一般认为基本词汇是在历史变迁中比较稳定的，在各种地域和社会集团中普遍使用的并具有派生能力的词。共同语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派生系统，方言也有自己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派生系统。有些基本词汇是共同语和方言共有的，例如天、地、山、水、红、白、上、下；有些基本词汇是某些方言或某一方言特有的。例如：吴语区：汏（洗）、望（看）、掮（扛）、驮（背）、调（换）、拎（拿）、着（穿）、渧（滴）、吓（怕）、揿（按）、掼（摔）、洞（窟窿）、镬（锅）、勿（不）、老（很）。

闽语区：粟（稻谷）、秫（糯米）、箬（叶子）、曝（晒）、敨（解开）、惊（怕）、腹（肚子）、晏（迟）、褪（脱）、囝（儿子）、鼎（锅）、侬（人）、喙（嘴）、厝（家、房子）、塗（泥土）。

粤语区：嘢（东西）、遮（伞）、脷（舌头）、樽（瓶）、送（菜餚）、拶（拿）、除（脱）、谂（想）、争（差、欠）、饮（喝）、喊（哭）、波（球）、料（馅儿）、敨（歇）、倾（交谈）。

这些基本词在各自通行的范围内都有派生能力。例如闽语的“鼎”可派生出：～盖（锅盖）、～底、～脐、～烟、～筅（炊帚）；粤语的“入”可派生出：～来、～会、～便（里面）、～流（入门）、～手（着手）、～数（进账）、～笼（中圈套）、～沓（投合，合情理）、～漆（上漆）。

(2) 多层级的义类系统。张永言先生在《词汇学简论》中指出：“在词汇领域里，各个语

言单位之间的联系主要是意义上的联系，我们要把一种语言的词汇当作一个体系来研究，首先就得按照词的语义联系进行分门别类的工作。”（张永言，1982，67页）我国传统的词汇学研究一向十分重视语义的分类，最早的经典著作《尔雅》就是一部义类词典。它把所收的语词分成“释诂、释言、释训”及“释亲、释宫、释器”等19篇，前三者是注释常用多音词中的古语、方言及联绵字的，后者是各类常用词。义类的区分有大类、小类，大类套着小类。例如，名词中有“时空”类，“空间”类又有“方位、处所”等小类。有关“人”的就有人称、人体、称谓等小类，称谓之中又有亲属称谓、社会称谓、职业称谓以及自称、他称、谦称、蔑称等等。可见，词汇的义类也是有层级区别的。义类的分析是我国古典词汇学（训诂学）的好传统，现代语言学兴起以来未能引起应有的注意，有关的研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很令人遗憾的。其实，这项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和概念的关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制定方言调查词表、以便按类问词，也有很大的实用意义。

（3）按词语的语法构成所分的构词法系统以及按词的语法意义和功能所分的词类系统。其中，关于词素构成词的方式，如单纯词、合成词以及词素之间的陈述、支配、附加、联合、补充等关系，这是词汇学和语法学共同研究的对象。关于词构成“语”（或可称“联语”），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或统称为熟语）的构成系统则是词汇学的研究内容。方言之间的构词方式和“联语”方式未必存在着有或无之别，但哪种方式用得多，哪种方式用得少，是一定有差异的。从一般的语感说，官话区的成语和歇后语相当多，南方诸方言则可能相对较少，谚语则是各地都不在少数。至于词类系统主要应是语法研究的对象，有时为词汇区分义类时也会用到词类研究的现成分类。

（4）滋生新词的造词法系统。造词法和构词法有一定联系，但是属于不同的系统，造词法是纵向的考察，构词法是横向的归纳。汉语的造词法从大的方面看有音义相生、语素合成、语缀派生、修辞引申、词组单词化等类别。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地域方言的造词法在类别上也可能没有大的不同，但为了表达某一个具体的概念时，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则往往采取不同的造词法造出新词。造词法不同是许多后起的方言词的差异的重要方面。关于这一点，下文还有进一步的讨论。

（5）按词义之间的不同关系所分的同义词、反义词和同音异义词系统。同义词和反义词在语义上有一定的逻辑上的依据，但也因时因地而异，同音异义词则更是受时地的制约。不同的方言的这些类别也是有同有异的。近江方言往往方言词与普通话转借词同义并用。例如上海话：阳春面＝清汤面，洋盆＝浴缸，寻开心＝开玩笑，雁鹅＝大雁，做厂＝工人，人客＝客人。在言语运用中，同义词、同音词和反义词都是修辞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研究方言词汇系统时也值得关注这一系统的内容。

（6）从纵向观点看，词汇之中论资历有前辈人、老年人、年轻人和新生儿之别；论历史有历史上用过、现在不用的历史词，古时常用现在少用了的古语词以及旧时未有、近期新产生的新词语；论出身有传承词、变异词、创新词、借用词之别，不论是古今汉语或南北方言，在这些系统中也是有异有同的。下文也将进一步的讨论。

（7）从语用的角度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所使用的词汇有不同的类别：行业语、习惯语、秘密语；在不同的交际领域使用的词汇也有不同的类别：书面语、口头语、戏曲用语、诗歌用语、宗教用语等等。从词义色彩分，则有中性词语以及褒义词、贬义词、詈语、礼貌用语等等。

以上各种类别系统是研究共同语和研究方言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有的系统方言特点多，有的系统方言差异小，从研究方法说则大同小异。

3、方言词汇的特殊系统

有些系统是方言词汇中特有的，包括：

（1）方言固有词和转借词系统。方言固有词就是狭义的方言词，即与共同语相异的方言词。任何时代的共同语对各方言都必定会施加影响，在古代，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书面语起作用的，在现代社会里，书面共同语和口头共同语（普通话）对方言的影响双管齐下，因而影响力更大。就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比较而言，共同语词汇对方言的影响最大。因此，现代方言中除了历史上传下来的方言固有词之外，还有大量的从共同语转借过来的词。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这些转借词都按照方言语音对应规律折合过了，有的是原来方言词所没有的概念，它们在口语交际中有的还很常用，应该说已经加入了方言词汇的行列。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有大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涌现的新词语：解放、土改、合作社、公社、丰产、大跃进、平反、蹲点、拨乱反正、走后门、走过场、双肩挑、交谊舞、卡拉OK、乡镇企业……真是不胜列举，近数年间每年所编的“新词新语”单是见诸报刊书文的就不在少数。199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于根元主编）就收了1978～1990年间产生的新词3710条。这些新词大多可以用方音折合，在方言口语中交际。除此之外，还有些是方言里原来已经有固有的说法，由于普通话的说法更具普遍性，方言区的人也接纳了共同语的说法，把它折合成方言语音与方言固有词并行并用。例如武汉官话原有的许多方言词汇已经和普通话词汇并用，有的还逐渐让位给普通话的说法了：家业（家具），膀子（胳膊），倒手（左手），抹脸（洗脸），发毛、发气（发脾气），团的（圆的），撇脱、撩撇（容易），清白（清楚）。福州话“书斋、斋友”已经让位给“学校、同学”，厦门话的“籴米、粜米”已经让位给“买米、卖米”，“爸爸、妈妈”这类共同语的当面称呼则基本上已经在南方各方言里普及。

（2）方言特征词系统。方言特征词是一定地域里一定批量的、区内大体一致、区外相对殊异的方言词。方言特征词是方言之间的词汇区别特征。不同的方言之间有不同的语音特征，也有不同的词汇特征和语法特征。没有共同的语音特征，不同方言点、方言片之间不能相互通话；如果没有共同的词汇特征，各个相关的方言点也不能成为同一的方言区。

不论是大区或是小片，方言特征词是客观存在的。这里举两个例证。一是江苏省内的三大方言：吴方言、江淮官话和北方官话。据《江苏省志方言志》（鲍明炜主编，1998）比较的词目614条之中，①三区不同的约100条，②吴语与江淮官话、北方官话相异的约80条，③北方官话与吴语、江淮官话相异的约70条，④吴语与北方官话异，江淮官话游移于二者之间的40条。4项总计，吴语与北方官话相异的词汇共有290条，大体占所比较词汇的一半。应该说，这大体上就是它们之间相区别的特征词。另一个是福建境内的闽方言，据李如龙、陈章太的两篇姊妹篇（1983，1985）所作词汇比较，体现闽方言的一致性的词语137条，其中词形完全相同的115条，词根相同、词形有异的22条。体现福建境内五区闽方言的差异的词语214条，其中：

东部3区（闽东、闽南、莆仙）与西部两区（闽北、闽中）明显不同的	41条
闽东、闽南、闽北三区明显不同的	36条

东、西5区虽有交叉，多所不同的	65条
个别区特异的	40条
差异繁多，区域界线不明的	32条

用这些特征词来说明闽语与外区方言的差异及省内五区片之间的异同关系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方言特征词只能是方言词。有些方言词各地差别很大，在同一方言区之内缺乏统一性，这些方言词不是方言区的特征词。只有那些区内多数方言大多相同的方言词才具有特征意义。例如上文所举吴、闽、粤方言的基本词汇就是这样的特征词。然而在方言区的边缘地带，由于不同方言的接触和相互渗透，多数点共有的特征词在这些地带未能表现出来，这也是常有的事。只要在方言区的中心区及大部分地区通行，就应该承认它是特征词。例如闽语"人"说"侬"，"他"说"伊"，"泥土"说"涂"，从福州至海南十分一致，在别的方言区也不为多见，是很典型的特征词，但是在闽北一带，"人"不说"侬"，"他"说"渠"，"泥土"说"泥"，这显然是因为受了西边的客赣方言的影响而发生的局部的变异，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侬、伊、涂"是闽语的特征词。

有些方言特征词在外区方言很少见，这是些最具特征意义的特征词。有些方言特征词在外方言偶有所见，但不具普遍性，这种偶发的"异地同现"不能用来否认方言特征词的存在。例如据《河北方言词汇编》（李行健主编，1995），在邯郸地区的官话中，也有把"你"说成"侬"（内丘话）或"汝"（广宗话），把"他"说成"伊"（大名话）的，也有把"鼻子"称"鼻头"的，如果以此否认"侬"和"鼻头"是吴语的特征词，"汝"和"伊"是闽语的特征词，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侬、鼻头"在吴语区、"汝、伊"在闽语区都是普遍一致的，而在冀南官话只是个别点的反映。如果有些方言特征词也普遍存在于其他方言区，这说明该方言和别的外区方言有共同性。不同方言区之间特征词的交叉也是一种特征——说明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不同方言区之间共有一批特征词，或是由于二者之间有同源关系，曾是同一方言区；或是由于二者之间地缘相近、频繁往来，因而相互影响。这个方言区同某个或某些方言区共有一批特征词；另一个方言区则同另一个或另几个方言区共有另一些特征词，这也是两个方言区之间的区别特征。例如客方言与赣方言、粤方言都有一批共有的特征词，而与吴语、徽语或晋语则关系不深；闽语与吴语（尤其是闽东、闽北一带）及客家（主要是闽南）也有一批共有的特征词，但是与湘语、赣语也是共同点不多。

几个方言区之间共有一批方言特征词，这便是方言词汇上的区域特征。

例如客赣方言的虾公（虾）、鼻公（鼻子）、豚（底部）、整（修理）、坼（裂痕）、老弟（弟弟）、嘟（噘嘴）、舷边（边缘）、箩（箩筐）、塘（池塘）。有的特征词可能在更多的方言中共用。如广东境内闽客粤三大方言普遍说的大褛（大衣）、鸡窦（鸡窝）、煲（煮）、火水（煤油）、铺头（店铺）、恤衫（衬衣），这是粤语影响的结果。多种南方方言都说的翼（翅膀）、面（脸）、颈（脖子）、寻（找）、渠（他）、薸（浮萍）、囥（藏）、屋（房子）、乌（黑）、阔（宽）、狭（窄）、利（刀快）等等，则是古代汉语的共同留存。

方言的特征词系统包括几个方言区之间的区间特征词，包括一个方言内部的一定批量的方言区特征词，也包括方言区之下大大小小的方言片的特征词。从区间特征词到方言区、片特征词，这就是方言特征词的层级系统。

方言特征词是方言区之间的词汇区别特征，是方言词汇异同的比较研究成果，也是方言词

汇研究的目标之一。方言特征词多数是该方言的基本词汇，也有一些具有方言特点的一般词汇。研究方言特征词首先应注意那些常用的口语词，有派生能力的单音词。在许多特征词当中，这类特征词是最重要的。方言特征词有重要的，也有次要的，这是特征词系统的层级性的另一种表现。

由于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不同，不同的方言特征词的数量可以很不相同。一般说来，方言区的方言词多，特征词也会比较多。例如闽粤方言。方言区内词汇上的一致性大，特征词也会比较多，例如广府话、闽南话。方言区与外区方言关系浅、往来少，该区方言特征词也会比较多，例如闽北方言、湘南土话。反之，方言词本来就不多，或区内本来就缺乏词汇的一致性，或与周边方言关系深，交往多，这样的方言区的特征词就会比较少。晋语所能提出的特征词显然较少。特征词的数量多少也是方言词汇特征的一方面表现。

关于方言特征词的界定和分析可参阅李如龙（2000）。下章将再举一些具体例证作进一步讨论。

思考与练习

一、拿共同语最常用的前100个单音词的重要义项和你所熟悉的方言作比较，分别统计存在词汇差异和义项差异的百分比。

二、以往对于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分类存在什么问题？应如何分类才比较合理？

三、分析方言词汇的系统可以有哪些观察角度？

四、和共同语词汇相比较，哪些系统是方言词汇独有的系统？

参考文献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语文出版社

李行健主编（1995）　河北方言词汇编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1982）　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　《语文研究》第2期

平田昌司主编（1998）　徽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　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　语文出版社

赵元任（1979）　北京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徐松石（1993）　徐松石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游汝杰（1999）　游汝杰自选集　广西师大出版社

李敬忠（1994）　语言演变论　广州出版社

李如龙（1993）　地名与语言学论集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1998）　汉语地名学论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周祖谟（1959）　汉语词汇讲话　人民教育出版社

黄景欣（1961）　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语文》3月号

张永言（1982）　词汇学简论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于根元等（1994）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鲍明炜主编（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陈章太（1985）　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　《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李如龙（2000）　论方言特征词　《中国语言学报》第10期

第七章　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一、汉语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

1. 特征词比较

比较研究方言词汇必须摸清不同方言的词汇差异，这就是特征词的比较研究。以下谈几点研究方言特征词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1）特征词的比较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许多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是时贯古今，地跨南北的，这些词汇反映的方言特征词不多。例如：

风雨火水　金银铜铁　牛羊马龙　头手心血　油盐酒糖
笔墨针线　花草瓜果　刀尺船桥　三五百千　东西南北
长短深浅　咸酸苦辣　来去上下　坐爬洗扫　开关讨借

但是如果是基本词汇中方言有独特的说法，便是重要的方言特征词。例如：

锅/鼎/镬/煲　坟/墓/地/冢　睡/睏/目睭/睏觉
寒/清/冷/冻　美/俊/靓/水　哭/啼/吼/叫
爹/爷/父/老窦　娘/奶/母/姐　儿/子/囝/崽
桌/枱/床/盘　看/睇/觑/望　东西/嘢/乇/物事

个别区片基本词汇里也有一些方言特征词。例如闽东方言的犬（狗）、墿（路）、讨（找）、瘖（瘦）；闽北方言的豨（猪）、遮（盖被子）、讨（摘果子）、躭（远）；闽南方言的翁（丈夫）、糜（粥）、洘（稠）、芳（香）。

正如第六章所分析过的，越是常用的口语用语、生活用语（包括许多封闭性名词、代词、量词及各类虚词）方言差异越大。由此可见，调查比较方言特征词首先应该特别注意日常生活用语。

其次，比较研究方言特征词应该多注意考察多义词。由于常用，特征词在方言中就容易引申出相关义项，乃至辗转派生出不同词性或意义迥异的同音词。例如：

各方言的动态助词和介词几乎都是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这些词不论作为动词或虚词，都是高频词，义项也很多。在有的方言里，虚实还很难分清。相当于普通话的“着、了、过、在、把、给、被”都是这种状况（详细材料可参阅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1996，以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997）。

许多方言都有一个最常用的动词（有人称为“万能动词”）可与许多词语组合，因而具有

大量义项。据《于都方言词典》（谢留文，1998），“打”有24个义项，该书收录“打”字领头的方言词语达201条；另据《福州方言词典》（冯爱珍，1998），“做”有9个义项（其实还不全），所收用“做”字打头的方言词语则有126条。湘语的“搞”、赣语的“舞”，应该也有类似情形。不仅如此，方言量词也往往有极常用的一个或几个“万能量词”，如北京的“个”，上海的“只”，福州的“只、头”，这类词显然也是超级的多义词。

有些方言词用字很平常，但在方言中分化成几个词，有的和普通话无别，有的则是很有特色的方言词或方言义项。这种方言词有时也是特征词，因为用字平常，且与非方言词同形，便容易被忽略。例如“老”在吴、闽语也说“人老”，但是吴语又当副词说“老远”（很远），闽语则兼用作形容词表示“装腔作势”“老练”。“厚”除了“不薄”，在苏州还表示粥“稠”，在厦门还表示茶“酽”，在乌鲁木齐表示“咸”（菜厚得很），在瑞金还表示“丰盛”（酒菜厚得很）。“放”在中原官话还可表示“藏”（～东西）、“使用”（～毛笔写），在西南官话还可表示“许配”（嫁女），在某些吴语和闽语中还可以表示“排泄”（～屎、～尿）、“煮”（～汤）。这类方言特征词也都是多义的，很值得注意。

第三，比较研究方言特征词还应该多注意那些富有派生能力的词。特征词由于反映的是最基本的概念，不但在交际生活中是常用的，在表达意义上是多义的，在发展过程中则往往成为派生新词语的根词。大多数方言特征词都是能构成许多合成词的单音词，用它构成的多音词语在词汇系统中形成一个系列。略举数例如下：

“爷、娃”应是官话的特征词，使用频度高，义项多，构成相关语词也不少：爷爷、老爷、老大爷、大老爷、少爷、姑爷、老爷子、老佛爷、倒爷、爷儿们、爷儿俩、老天爷、土地爷、关帝爷、财神爷……；“娃”除表示“儿子”“小孩子”之外，有不少地方还说鸡～、狗～。

闽语的“厝、粟”也都是特征词，其派生能力也很强，例如：厦门话的祖厝（祖传的房子，祠堂）、大厝（大房子）、厝囝（小房子）、柴厝（木头房子）、厝脊（屋脊）、厝场（盖房子的工地）、厝盖（屋顶）、厝契（房契）、厝税（房租）、厝主（房东）、厝里（屋里、内人、家里）、厝头（娘家）、厝边（邻居）；粟种（谷种）、粟头（米中的谷子）、粟仓（谷仓）、粟桶（谷桶、打谷桶）、粟芽（谷芽，可人药）、粟爪（麻雀）、粟银（青苗债）、粟埕（晒谷场）、早粟（早季收成的稻谷）、秫粟（糯谷）、米粟（泛指粮食）。

吴语的“打、汏”都是特征词，“打”字可造：～头（领头）、～顿（落脚）、～烊（关店门）、～胡（开玩笑）、～合（合伙）、～雄（禽交配）；“汏”（洗）字可造：～手、～衣裳板、～衣裳作、～浴（洗澡）、～浴间，等等。

客家话的“牯、嫲”不但可作为后缀表示动物的雌雄，而且可以作为后缀构成称人或称说性别不明的动物或其他事物的名词。例如说“牛牯、猪嫲”，也说“贼牯、戆牯（傻子）、矮牯（矮子）、舌嫲（舌头）、笠嫲（斗笠）、虱嫲（虱子）”等等。

粤语的“埋、走”也是很具方言特色的、常用的多义词，用它构成的语词系列有：埋住（盖住）、埋站（靠站）、埋单（结账）、合埋眼（合上眼）、行埋去（走了去）；走快的（快点跑）、走鬼（躲鬼）、走粉（偷运毒品）、走宝（错过好机会）。

在派生能力上，方言特征词有少部分例外现象。例如各类代词及量词一般说来构词能力都很差，但是如果是常用的有方言特色的，也应该视为特征词，而不能因构词能力不强而把它们排除在外。

（2）提取方言特征词的步骤和方法

要找出某一区片方言的特征词，必须从点上深入的词汇调查开始。查过几个点之后，便可以抽出各点之间共同的方言词表，这个词表的词目不妨略为放宽多收些。然后再到面上就若干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检验，根据面上对齐的情况再作增删，提出方言特征词表的初稿。

区内的特征词表有了一定把握之后必须与外区的方言进行比较，分清哪些是与外区方言共有的，哪些是本区方言独有的。然后参照本区方言中不同的覆盖面把特征词表的条目分出主次轻重的几级。不论是本区或外区，方言点检验得越多，这个特征词表就越加完善。

不论是哪一级词目，还必须从使用频度、义项多少和派生能力的强弱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使划分重点词目和一般词目的界线更加准确。在运用特征词表为陌生的方言点作定性识别时，对于重点词目可以适当加权。这样做可以使特征词表的统计和定量分析更具准确性。

在进行不同方言之间特征词比较时，对于重点词目应作必要的考释。考释的重点是根据方言词的音韵地位从古韵书寻找“本字”，从古代诗文寻找“书证”。查不出本字的则可与周边方言或有关的民族语言寻求音韵地位相一致的语词，看是否从其他方言借用的或是早期民族语言残留的“底层”。进行这样的考证时，既要认真辨认方言词的音韵地位，理清方言与古音的对应关系，又要考察方言特征词的词义发生了什么变异，与古语词或其他语词有无引申、转移的途径。

考证方言特征词时应该特别注意方言词的各种音变现象和方言俗字所掩盖的方言词读音的真相。

方言特征词既然是常用的，在读音上就容易发生变异。有时这种变异并非正常的多音连读的音变，而是只见于个别语词的特殊变异。在词义上也可能因为多次引申而未能达到完全一致。例如闽语平声的“过”，《广韵》古禾切，义注：“过，所也。”福州话［kuai[1]］和厦门话的［kua[1]］符合歌韵白读对应，但福州话只用于“蔬菜老了”，厦门话则还可指“人见老”。也可用作动词表示“顺途停留”。闽语的“乞”在福州、厦门各有两种与广韵相应的读音：欺讫切［k'øyʔ[7]、k'it[7]］和去既切［k'øy[5] k'i[5]］，后者都用作介词“被”（如说“乞侬搦去”：被人抓走），前者在福州话泛指“给”，在厦门话表示“娶、乞讨、买”（如说“乞侬”：娶妻，“乞囝”：买儿子）。又如广州话的“听日”应是“天光日”的合音，这就成了与其他粤语以及客家话共有的特征词，“琴日（或音“寻日”）则应是“昨晚日”的合音，这样理解也就和珠江三角洲的粤语一致了。

由于经常使用，方言特征词在一些地区常有俗写的方言字。在比较的时候一定不能以俗字为凭，简单化地作出结论，而必须按照实际音韵地位去考察方言词的异同。例如粤语的“瞓觉”其实和吴语的“睏觉”是一回事，因为部分溪母字在粤方言读成 f 声母，所以另造别字。“徛”在粤语区写为“企”，其实读音也符合巨绮切，读为阳上，这是吴闽客赣湘粤共有的特征词。粤、客方言的“新妇”因词内特殊变音写为“心抱、心舅”，也属于这种情形。表示“领有”的助词“的”，在吴语区写为“格”，在客家地区写为“个”，在粤语区写为“嘅”，可能都是同样来自“个”的不同的读音。

研究方言特征词是大规模的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一个学者所知道的语言事实总是有限的，已有的调查记录材料也总是不够用的，面目前田野工作的人力、物力条件又常常是很有限的，这就需要各方面的学者通力协作，群策群力，才能共同完成这个繁重的任

务。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学者若能经常交换材料，联手建设方言语料库，坐下来讨论，相互切磋，审订，增删，就能使所提取的特征词表逐步完善起来。第一次提出的词表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被批得一无是处，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可喜的进展。做好这项工作一定要有足够的胆量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定要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风。这是一项方言学的基本建设工程，也是组织力量训练队伍，培养良好学风的重要实践。

2．词义比较

如果说特征词的比较是方言的整体的宏观的比较的话，词义比较便是个体的微观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以前，方言词汇调查往往停留在普通话词汇和方言词汇的对应比较，不太注意把这种对比真正落实在词义上。不少面上的方言词汇比较也并未限定在同一个词义上作对比，因而实际上是很难对齐的。例如“饿”在闽语中往往有两种说法，“肚子饿”在福州说“空”，厦门说“枵”，“饿死人”才说“饿”。如果按前者的理解去对比，说闽语没有“饿”的说法，这就错了。如果以为闽语的“空”和“枵”也能带宾语（说“空死人”）也同样错了。近20年来，出版了不少单点的方言词典，对方言词的词义做了很详细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了关于方言词汇和词义的许多复杂现象。这里试谈谈方言词义比较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1）关于概念义　词的基本义应该是它的概念义。比较方言词义首先要比较概念义。在比较概念义时考察的内容应是两方面，一是不同的方言里是否都有这个概念，一是不同的方言对客观事物的概念分类是否相同。如果有的方言缺乏这个比较的概念（被调查者往往回答“我们没这个说法”），或者具体含义不是一回事，就没有可比性，就不能勉强作比较。

下面举一些例子：

“早饭、午饭、晚饭”常常问不出，只能带着“吃”说，“食早、食昼、食夜”，而“朝、昼、夜”显然不等于“早饭、午饭、晚饭”。硬要说“早饭吃了吗”，只好说“早餐”，而“早餐”也并不就是“早饭”。

闽南话也没有普通话里“相亲、提亲、成亲、说亲”等可作双向理解的成套说法，有些相近说法并非同一个概念义。例如，可说“看侬”（看人）专指男方看女方；要么说“娶侬”（娶妻），要么说“做客”（出家），没有“成亲”的说法。童养媳与未婚夫成亲则说“上头”（即举行简易婚礼的仪式）。

有些概念的分类在不同方言里有很明显的区别，作词汇比较的时候一定要限定在某个具体义项上对齐。

例如，许多地方的吴语都把开水也叫“茶”，真正的茶则说“茶叶茶”，这大概是古时候吴人不喝白开水的缘故。如此，则吴语的茶和普通话的茶和开水都不能对应，而是二对一的关系。

普通话中猪很瘦，肉很瘦都说瘦，在福州话，前者说“瘔”（《广韵》所追切：减也），后者说“瘤”（《集韵》所景切：瘦谓之瘤）。

普通话的“盖”在建瓯话大多不说“盖”，盖房子说“开厝”（建房必先开山），盖盖子说“䕸”kaiŋ³（《集韵》古禫切：盖也），锅盖说“鼎片”，盖被子说“遮被”。只有一处用了盖，“盖闭”是一种有盖有托盘的品茶用的小茶碗。

在吴语，“灶”分两种，“灶头”是固定的，“行灶”是可移动的；但馒头和包子却又合称

“包子”。有些湘方言，苍蝇也叫蚊（念明母）子，必要区分时才把苍蝇称为“绿蚊子”、“饭蚊子”。在闽南沿海，海蛎壳烧的灰叫“壳灰”，石灰石烧的灰叫“石灰”，合起来统称为“灰”。

（2）关于引申义

一般说来，概念义就是词的基本义，引申义都从它引申而来。在方言常用词当中，多义词是大量存在的，许多有方言特色的义项都表现在引申义上。因此，比较方言词的词义尤其要注意那些多义词中的引申义项。

引申义有近义引申、相关义引申和反义引申以及不同词类的兼类引申等小类。

近义引申是最常见的。《四川方言词典》（张一舟等，1986）收了许多西南官话的多义词，而且大多附有小说杂文中的用例，可见意义已经相当稳定。各地官话词汇词根不同的较少，近义引申也许是官话区最常见的词汇差异。兹举数例如下：

“赶”的引申义：①派：～人送个信　②乘：～车、～船　③参加，赴：～生期酒（赴寿宴），～场（赶集）　④比：一个～一个强　⑤凑：～拉凑（凑热闹）　⑥接连：一勺～一勺淋下来

“过”的引申义：①采用某种方式或办法：大才～找，小才～考　②完，尽：草多到烧不～　③用在动词后表示再做一次：说错了说～就是　④传播：那个大嫂爱～话　⑤见不到：肉都～红了，熟了。　⑥透过：牛肉炖得～心了　⑦少吃以度过：～早，～午　⑧失去（性能）：药放久了，～性了

“安逸”的引申义：①舒服：现在～了　②令人满意：那电影太～了　③喜欢：早就不～他了　④够呛：这海椒把我辣～了

“老实”的基本义厚道、不滑头在各方言里都有，在广州话还引申为“式样、颜色朴素大方”，在成都引申为“实在、确实”，在昆明还可用作副词“极”，如说“老实高”：实在太高了。

相关义引申的例子：

四川官话“脑壳”可指“脑袋”（大～）、“脑筋”（～好使）、“脑海”（记在～里）、“头发”（梳～、剪～）。与此相仿闽南话“头”也可指“头发”（剪～）、“髻子”（梳～）。

“喫”在上海话里除了包含普通话的“吃”的多种义项之外，还包含了以下各种作为动词的义项：①遭受：～批评，～排头。②欺负，侵占：黑～黑，～小人。③获得：～野食，～香。④接受，承受：～软、～硬。⑤吸，喝：～茶，～香烟。⑥耗费大：～劲，～料。⑦佩服：我就～伊一个人。⑧估计：～勿准。

“生活”应该是比较后起的词，各地方言里引申的相关义项也不少，有的引申的跨度还比较大。在江淮官话，“生活”可指“活儿，事儿”（靠干活做事才能生活）。在上海话指“生意”（有生意做便能生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做生意），又指“工夫，本领”（有本领自可生活），还可指“刑罚”（是否反义引申？）在曲阜，“生活”也表示“勤奋”，孔夫子的生活态度不会是懒散的！在西北官话（如西安话）里，有时“毛笔”（音 səŋxuo）也写为“生活”，其实是“生花”读轻声的结果。

反义相训的例子比较少见。但也能找到。例如某些西南官话“抽”既可表示推（车上坡帮他～），也可表示拉（～他一把）。北方官话“挂”引申为“记挂、挂念”和“高高挂起、挂起来”（不处理），也是一种反义引申。福州话“唔使死”可以是“不必死”，也可以用来表示

"该死"。

"打扮"在山东话可指"拍打"，在四川话可表示"治疗"，这是相关义引申，在云南话表示"责难"，在潮州可表示"捉弄"，这应该是反义引申。

(3) 关于语法义

方言词在语法意义方面也经常有差异。不少方言词兼有几种不同的词性，兼有几个不同的词性，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引申。这种兼类引申在词义上的联系还是很密切、很明显的，从汉语语法的灵活性特点来看，似可看成多义词而不必因词性不同就算是同音词。

不少方言形容词和副词是同形的：

上海话："邪气、交关"同时表示"多"（铜钿～）和"很、非常"（邪气灵光，大交关）。

福州话："狠"既表示"多"（𫧮～：不多）、"厉害"（拍尽～：打得很厉害），也用作副词"很"（～好）。

广州话："好"既表示"不坏"（～人），也用作副词"很"（～大，～好）。

"光"的基本义是名词，用作形容词时，闽语表示"光亮"（天窗真～），洛阳话表示"狡猾"（这人～着呢）。用作动词，镇江话表示最后一道油漆（使光亮），徐州表示"刮光"（～胡子），东北话表示"做完"（一天的工作就～出来了）。用作副词，北京表示"净、只"（～说不做），河南话表示"经常"（别～叫我替你操心）。

许多方言的介词"被"都是从"给予"义的动词引申虚化而来的。在北京是"给"，上海话是"拨"pəʔ，福州话是"乞"k'øyʔ，泉州话是"度"t'ɔ^{6}，梅县话是"分"pun^{1}，广州话是"畀"pei$^{5-3}$。这也是词性引申转移的好例子（参阅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7）。

上海话里有些动宾词组可以转化为名词或动词。例如："写字"可指洋行里的职员，"说话"指的是"话语"，"粗做"是干粗活的佣人，"做新妇"则是"出嫁"。

词在短语中的组合关系也是词的语法意义的表现。实词也有组合关系的差异，例如用作动词的"上"在上海话可说"上秤（过秤）、上棚（家禽夜晚回窝）、上劲（起劲）、上云（乌云密聚）、上南（往南）"；而普通话用"上"的地方则不说"上"：上口→顺口，上心→用心，上操→出操。至于虚词，组合关系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否定词"不"的几个最重要的组合中，各大方言的说法就有许多不同。请看下表：

	北京	上海	福州	广州
① 单用：不，(不是这样)	不	勿是/勿	唔是	唔系
② 单用：不，(我不去)	不	覅	毛	唔得
③ 不＋动：我不去	不	勿/覅	唔/毛	唔
④ 不＋形：今天不冷	不	勿	𫧮	唔
⑤ 动＋不＋补：做不得	不	勿/勿好做	𫧮做得	唔做得
⑥ 不＋会＋动：不会做	不	𫧮	𫧮	唔识

从上表可以看到，北京离句独立单用的"不"在南方不少是不能单说一个否定词的。而同一个"不"在方言里或者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否定词，或者与其他语素合成为双音的否定词，或者语序不同，总之有许多方面的差异。

(4) 关于附加义

词的附加义主要是附加在基本义以外的褒贬义，风格义。褒贬义体现人们对所称说的事物

的好恶、爱憎，风格义则有庄重、诙谐、严肃、戏谑、形象化、书面化等不同的具体内容。这里不拟细说，只举关于与“死”有关的各种说法。

昆明话里关于“死”的说法除了和共同语的书面语相同的“归天、逝世、去世、过世、谢世、辞世”之外，中性的还有“停床、去掉了”的说法，委婉的有“老了、不在了、回老家了、出事了、跟着他××去了”（××是已故的亲人），戏谑的有“跷辫子、跷脚”，贬义的有“短命了、进土了、见阎王去了”等说法（张映庚，1997）。

广州话关于“死”的说法中，委婉的有“过身、过世”，戏谑的有“收档（收摊）、去大烟通、去别有天”，贬义的有“瓜老衬（瓜即断气）、摊直、拉柴、褛席”，詈语还有“早該、仆街”等（麦耘、谭步云，1997）。

3．词形比较

上文说过，造成方言词的词形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构词法的不同。一是造词法的不同。前者是词汇学和语法学共有的研究课题，后者则是词汇学特有的研究课题。关于构词法，下一章还将专门讨论，这里先说造词法的比较。

方言词汇差异大多表现为造词法的不同。中古以来，滋生新词的途径大量地表现为语素合成，即用两个语素（3个以上的不多）按照并列、修饰、陈述、支配、补充等关系组成双音词以表示新的概念。新造的词又是怎样表示交际生活中需要称说的事物的呢，究其类型主要又有说明体和描状体两种。下面举些例子来说明。

说明体是对事物的要素、结构或功能、效果的概括。例如关于“厨房”的说法就有以下各种（据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

厨房里总要有灶，大量方言词都拿灶作文章：灶前（福州）、灶间（上海）、灶上（句容）、灶下（常州）、灶底（衢州）、灶边（江门）、灶窝（密县）、灶根（宁波）、灶骹（厦门）、灶口（溧水）、灶头（广州）、灶台（成都）、灶头屋（宜兴）、灶头家（丹阳）、灶根间（定海）、灶头里（绍兴）、灶火屋（郑州）、灶门口（柳州）、灶下底（仙游）、灶门前（芜湖）、灶屋（长沙）、灶屋间（吴江）。

有了灶还得要有锅，才能做饭烹调，锅也是厨房的要素。方言里锅说镬、鼎，于是厨房又有以下说法：锅间（合肥）、锅上（南京）、锅房（苏北）、锅屋（徐州）、锅前（无为）、锅灶下（歙县）、锅厦（曲沃）、鼎间（建瓯）、鼎下（宁德）。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说法：厨下（临川）、厨里（襄垣）、厨屋（开封）、厨扇（常山）、厨镬间（奉化）、伙屋（利津）、伙房（太原）、茶堂（双峰）。

煤油说洋油（温州）、番油（揭西）、番仔油（诏安），这是从来历（舶来品）说的；说火油、火水、水火油，这是从烧火的功用说的。

长相好，说漂亮、靓（广州）、标致（苏州）、生得好（福州）、生好（温州）、精（梅县），这是从自身的特征说的；好看，好睇（广州）、好觑（建瓯）、惜人（太原）是从旁人的感觉说的；客气（南昌）、排场（西安）、体面（武汉）、雅（潮州）、作佳（福州）、雅式（建瓯）是从场面上的效果说的，这也是说明体的造词法。

描述体是对事物的状态、情貌、性质等方面所作的概括。例如把萤火虫说成明火虫（西安）火虫（修水）、亮火虫（武汉）、火萤虫（合肥）、火焰虫（梅县）、焰火虫（宁都）、烟火

虫（永新），这是从它的发光性能描述的。游火虫（苏州）、夜火虫（南昌）、晚火虫（阳江）、夜毛虫（新余）这是指明了它的夜行的特征。蓝尾星（福州）是一种比喻，火金姑（厦门）、明牛牛（太原）是一种昵称。

玉米，说玉茭子（太原）、玉如黍（扬州）、珍珠粟（阳江）、玉芦（都昌）、金豆（安义）、玉豆（赣榆）是从色泽去描状的。包粟（梅县）、包米（西河）、包麦（连南）、棒子（济南）、棒头（镇江）是从果实的外貌去描状的。蜀黍（南京）、六谷（合肥）、粟米（广州）、粟麦（温州）、大芦黍（盱眙）是从分类上说的。油天炮（福州）、麦穗（厦门）、观音豆（建瓯）则是一种比况。

4. 其他比较

方言词汇的共时比较还应该考察在多音词里有无连音变化和字音异读，这是语音比较和词汇比较共有的内容。也可以有构词法的比较，这是词汇比较和语法比较共有的内容。属于词汇学特有的比较则还有词频的比较。不同方言都有各自的高频词。方言词中的高频词显然是最富于方言特色的，是我们比较方言词时首先必须注目的对象。由于方言语料库尚未建立起来，方言词的词频统计也缺乏依据，有关这方面的材料的分析只好留待来日了。

二、汉语方言词汇的历时比较

1. 考求方言词本字

为今语寻求古语之源或为古语列举今语之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传统研究项目之一。郭璞注《方言》就常常联系当时的方言，如卷四："裪、襦谓之袖"，郭注："衣褾，音橘，江东呼䘴，音婉"。卷五："𧀸，陈楚宋魏之间或谓之箪，或谓之檅"，郭注："今江东通呼勺为檅，音羲"。今闽语普遍称衣袖为"手䘴"，称勺为"檅"，可以论证郭璞之注。明代海盐胡震亨作《唐音癸签》，卷二十四"诂笺九"说："俗谓柔言索物曰泥，乃计切，谚所谓软缠也。……元微之忆内诗：'泥他沽酒拔金钗'，非烟传诗：'脉脉春情更泥谁'"。今福州话仍说软缠为"泥"，也可说明闽东方言与吴语的历史关系。近人章太炎的《新方言》和黄侃的《蕲春语》可谓总结近代考求方言本字的巨著。传统语文学考本字的出发点及其目的都在于说明现代语词"古已有之"。当时对现代方言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只能是个别条目的考证；方法上也未形成严密的步骤，有时为了更多地说明今语"古已有之"，就用"一声之转"来搪塞，没能达到科学的要求。

现代方言学的考本字按照梅祖麟（1995）的说法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认为一个方言只有一套演变规律"，他称之为按音找字的"觅字派"；一是"分辨方言中的音韵层次，在各个音韵层次中找出演变规律"，他称之为"寻音派"。1980年发表的《福州方言本字考》（李如龙，1996），则把需要考证的方言本字分为两大类的，即"读音属于常例的本字"和"读音属于变例的本字"。前者是"现代汉语已经不用或少用的生僻字"或"现代汉语虽然还沿用，但字义已经发生变化的字"。这个理解和梅先生的分类是一致的。后者则是反映了不同历史层次的读音属于变例或特例的字。

（1）为什么要为方言词考求本字

为方言词考求本字并非为了找个字来记录方言词，也不是为了证明现代方言“无一字无来历”，而是现代方言与古代语言的音韵和词汇的历时比较。“一方面是运用音韵学原理来加深理解方言现象，另一方面又是运用方言事实来论证音韵现象，这是音韵学和方言学相互为用的集中表现。”（同上注 97 页）关于通过文白异读和别义异读来研究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上文第 5 章已经专门讨论过，这里再谈谈考本字对词汇研究的重要意义。

首先，考订了方言词的本字便可以看到方言词与古代汉语的关系。丁邦新（1997）在《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语言篇》里曾经考证过闽南话称铁锅的“鼎”字。据他统计，《史记》（三家注）中，关于“饭锅”有四种说法，各种说法所出现的次数如下：

鼎 229 次，　　釜 21 次，　　镬 3 次，　　锅 1 次

其中“锅”字不见于正文，当是汉之后的用字，“镬”字 1 次见于索隐，其余 2 次均指“汤镬”，即作为刑具的“油锅”。“釜”字扣除见于注文的之外，7 次原文均指烹调之炊具（如《赵世家》：悬釜而炊）。而用例最多的“鼎”字大多指“宝器”（如“宝鼎、九鼎、鼎足”）或年号（元鼎），真正指“食器”的只有 6 次，又大多用于引述前代人之烹具。可见，司马迁时代铁锅多称“釜”，“鼎”只是当时人记忆中之前代用法。闽语的“鼎”是直接从先秦的用法保留下来的。又如梅祖麟（1995）所考的吴语“许”（hɛ：许诺，那里），罗杰瑞（1979）所考的闽语的“治”字，经过论证之后，都是从古代汉语的用语中传承下来，而不是什么“有音无字”的“创新”，其性质就十分明确了。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以及刘克庄的“西域何曾有许香”，其中的“许”（那样）也在现今的吴闽方言中找到了“旁证”。如果说吴语“许”的白读为 hɛ，还比较难以辨认的话，福州话 $hy^3 \sim hi^3$ 并说，都表示“远指”，泉州一带也有 $hɯ^3$、he^3 的音。这种有多种方言都能对齐的读音考出来的本字自然更为可靠。

其次，把许多方言点的材料对齐之后，再考出本字，还可以从中了解诸方言之间的词汇和语音上的同和异，看到不同方言在演变过程中的不同历史地位。例如李荣的《吴语本字举例》（1980）所考的“《集韵》：倮，吴人呼彼称，通作渠”。他说：“这个当第三人称代词的渠字，在现代方言里使用的范围很广，吴语地区、安徽南部徽州地区、湖北东南部、江西、广东都用，客家话也用。”从各点的语音差异则可看到不同的读音层次，例如在该文所举例中应是常熟的 $gɛ^2$ 在前，而后是温岭的 gie^2，最后才是南昌的 $tɕ'ie^2$。如果把更多的方言的第三人称代词的说法排列在一起，除了“渠”之外，官话说“他”，闽语说“伊”，还可以了解各种说法的分布，从而了解不同方言之间的亲疏远近的关系。从纵向看则可了解：“伊”盛行于南北朝，“渠”通用于唐宋，而“他”则应是近代汉语才流行起来的说法，各种说法的历史层次也显示出来了。

第三，不但现代方言词的读音和本字的早期读音有较大变化（成为特殊对应），在字义上也往往有变异。认定现代方言词的本字后，经过字义的比较还可以看到古今字义的引申和转移，体察词义转移的种种规律。例如《集韵》所收“敨”字，注“展也”，他口切。在现代方言中，不少地方有“敨气”（透透气）的说法（武汉、福州、广州、金华），有的进一步引申为歇息，如南昌说：“敨凉”，广州还可说：“敨下先（先歇歇），敨下脚（歇脚），敨工（歇工）”。有的还引申为“宽敞、宽裕”（金华、武汉），这是从“通透、舒展”的含义引申开来的。另一些方言用的是从束缚、堆积、掊盖中“展开”之义。例如上海话打开报纸也说“敨开”，金华

话把包着的东西解开也说“敨”，厦门话解开绳子、松绑说“敨索”，福州话把堆积的东西摊开也说“敨”。青岛话谓“包扎物松散而脱落”为敨，则是从主动变为被动。武汉话布料“缩水”也说“敨水”，可能是从“展开”反义引申为“收缩”。

（2）怎样为方言词考求本字

考本字的第一道手续是进行音韵论证。无论是读音符合古今音对应常例的生僻字或古今音不合对应的常用字，首先必须对所考的方言词的读音进行分析，看看今音的声韵调有几种古音来源，根据古音和今音的各自音节结构规律，排除某些可能性，再就仅存的几种可能性到古字书里去找意义相同、相近或相关的字。这种方法可以称为“排除法”。例如闽南话“跟随”说[te⁵]（厦门音）声母可能是端、知或定、澄，但因为是阴去调，定、澄母即可排除；韵母e可能来自祃韵（蛇t'e⁵）、代韵（戴te⁵）、卦韵（债tse⁵）、霁韵（帝te⁵）、祭韵（滞t'e⁵）等，其中祃、祭、卦三韵都是二、三等韵，不与端知母相拼，也可排除。最后在《广韵》霁韵找到了都计切：“趆，趋走貌”，音义俱合。又如福州话的“树木”说ts'ieu⁵，俗写为“樹”，并非本字。ts'声母可能来自清、从、邪、昌、禅等母，ieu韵可能来自笑、啸、幼、遇等韵，声调为阴去，只能来自古去声。啸、幼二韵精章组无字，可以排除，在笑韵和遇韵所能找到的还只能是“树”。原来“树”的读音søy⁶和ts'ieu⁵是有文白对应关系的：s/ts：笑、上、芍，øy/ieu：住、柱，阳去/阴去：而、问、巷，ts'ieu⁵。可见正是søy⁶的白读音。

除了“排除法”，考本字的音韵论证还可以有“类推法”和“比照法”。所谓类推法是按照文白对应条例去检验，因音找字。例如闽语，以母字的白读在福州有读为s－的，如：盐、檐sieŋ²，痒suoŋ⁶，蝇siŋ²，翼siʔ⁸；在厦门蝇、翼也读s－；此外还有读为ts、ts'的，如檐tsĩ²，痒tsiũ⁶，扬ts'iũ²－粟：谷子扬场。按此对应检查全部以母字，便可以再考出一批本字：福州话“耀”读sieu⁵，意为夸耀（谚曰，“亲母自～骹腿白”）。盐的去声读法（福州音sieŋ⁶，厦门音sĩ⁶）正合《广韵》：以赡切，“以盐腌也”。又厦门话“跃”还可说ts'iɔk⁸，“液”可说sioʔ⁸（骹～、手～），“养”可说tsiũ⁶（头～囝：头胎），“延”可说ts'ian²（延宕）。

所谓比照法是从别的方言发现了读音的变例之后，检查姊妹方言从而找出类似的读音特殊的方言词本字。例如，在了解了闽北建瓯话有来母字读s－，见母字和禅母字读零声母的白读对应之后，对照闽语中的泉州话便可发现如下的本字：

濑 lua⁵（落～：下浅滩）　　泪 lui⁵（蜡烛～）　　㝗 laŋ⁵（～缝：空出一缝）
　sua⁵（湍急）　　　　　　　sui⁵（下滴）　　　　　saŋ⁵（疏～：稀疏）
锅 ə¹（铣～：铝锅）　　　　过 ə⁵（～裘：传染疾病）
虎 ɔ³～hɔ³（单说可表“欺诈”）

音韵论证最好要有姊妹方言作为旁证。例如郑张尚芳考证温州话的dza⁶（义为错）的本字是赚，《广韵》伫陷切，“重买”。徐注《说文》：错也。如果拿闽语作旁证，福州音taŋ⁶，厦门音tã⁶皆通。又如福州话“拿”说tɔ²，俗写为“掏”，实为“拕”，《集韵》唐何切，引也。若拿吴语宁波话的dəu²作旁证，也是非常有力的。

音韵论证是考本字的根基，丝毫马虎不得，最忌用“一音之转”来打马虎眼。在复杂的方言事实之中，有时声韵调俱异，但仍是同一个字（如上文的例子，福州话树，文读søy⁶，白读ts'ieu⁵）；有时只有一项稍异，却是另一个字。例如，闽粤语的“站立”义的“徛”，分明是《广韵》的“渠绮切，立也”，有人总写为企，若是为了少写几笔起见，无可指摘；若以此为本

字则谬矣。企在《广韵》有两种音义：去智切，望也；丘弭切，企望也，均与现代方言中读阳上的音义不同。又如闽南话瓜果成熟并引申为人“老到”说 sik^{7}，有人以为其本字就是“熟”（sik^{8}），虽然只有阴阳入的声调之别，却是不能互混的。古汉语里宿将是老将，宿疾是痼疾，宿愿是久有的愿望，都有时久成熟之义。sik^{7} 的本字只能是“宿”。

然而，方言词的读音却也并非绝对没有“一音之转”的情况的。除了文白对应中有些字数很少的“特例”之外，还有些方言词的读音只是发生在个别词里，究其原因大体上有连音音变，类推音变和别义异读。这里举广州话数例加以说明（详见李如龙，1997）：

“儿媳妇”，说 sɐm^{1} p'ou^{4}，俗写“心抱”，本字应是“新妇”。sɐn^{1} 韵尾受同化变为 sɐm^{1}。又“现在”说 ka^{1} ha^{4} 或 ji^{2} ka^{1}～ji^{1} ka^{1}，俗写作“家下、而家”，本字应是“今下、如今”。前者 kɐm^{1} 韵母受同化变为 ka^{1}。后者原音 jy^{1} kɐm^{1} 前后音韵母皆经过同化而成。在早年的教会词典里还有“如今”的记录。

“昨天”，说 ts'ɐm^{2} jɐt^{9}，或 k'ɐm^{2} jɐt^{9}，写为“寻日，琴日”，则应是“昨晚日”的合音。在东莞，“昨”读送气声母，花县音为 ts'ɐm^{2} man^{4}，均是“昨晚”的音，可为佐证。又“明天”说 t'iŋ^{1} jɐt^{9} 写为“听日”，则应是“天光日”的合音。三水说“听光晚”或“听晚”可为佐证。

第三人称代词说 k'øy^{4}，声调变读为阳上。这是受我、你（阳上调）感染（或称类推）的结果。与此同理，mou^{4} 俗写为“冇”，本字应是“无”，声调也是因“有”（阳上调）类推而变读。

“渡”用作动词读 tou^{6}，用作名词（渡船）读 tou^{5}；“沙”用作名词读 sa^{1}，形容沙哑读 sa^{5}；“下”用作方位词读 ha^{4}，用作动词（下荔枝：摘荔枝）音 ha^{4}，用作动量词音 ha^{5}，这是变调别义的例子。

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这种“一音之转”用来确认本字，也是不应该否定的。

考本字的第二道手续是字义分析，即古籍中的字义和方言词词义的比较。

广州话㩧 pok^{7}，本字应是“㱿”，《集韵》伯各切，击也。今指用棍击。同音的“壆”则应是“膊”，《集韵》：界埒也。今特指堤坝。福州话 pɔʔ^{8} 指的是乌类或昆虫栖止，本字应是“泊”，《广韵》：傍各切，止也。又，物品分成几分，最后增减搭配以取均衡，福州话说 aŋ^{2}，本字应是“衡”，《广韵》户庚切，横也，平也。由泛指“击”而转为“棍击”，从陆地的“界埒”转指水中“堤坝”，由船只水滨“停泊”转为空中飞行虫鸟的“栖止”，从平衡转为“使均衡”，古义和今义都有明显的联系，字义的变化还不算大。有时，方言词的词义引申的幅度比较大，例如以母字读 s－在闽南话有“疡”字，读 siɔŋ^{2}，如说“流～”（肮脏），“齿～”（牙垢）；又读 siũ^{2}，如说“起～”（表面出现变质或病态粘液），“～黐黐”（粘糊状）。又如“趁”本义应是“追逐、追赶”。《广韵》丑刃切：趁逐。《一切经音义》：“关西以逐物为趁也”，此义仍见于今吴、闽语，说“趁猪、趁鸡”（象山、莆田）。近代汉语引申为挣、赚（钱），《水浒》多有用例（“他有一座酒店，在城东快活林内，甚是趁钱”），此义普遍见于今闽语，也见于赣语（建宁）。此外，又引申为“赶赴”。如说“趁墟”（赶集），见于闽粤语（沙县、广州）。还有不少其他说法：“趁人”（建阳：妇女与人私通，又金华说“趁侬”），“趁样”（厦门：仿效），“趁前日起”（用作介词，如杭州、福州）。“趁雨”（冒雨，用于闽语），“趁手”（顺手，见于盐城、上海、广州），“趁势”（顺便，趁机会，见于厦门、阳江）。有些常用词词义引申的幅度也相当大。例如“喝”除了“饮用，吆喝”之外，各地方言还有不少其他用法。喝人（骗人，昆

明、成都)，喝奶（吸奶，合肥、济宁)，喝药（服毒，牟平)，喝烟（抽烟，天门)，喝粥（分娩，北京)，喝扬（宣扬，聊城)，喝风（密封器透气，成都)。

考本字的第三道手续是寻求书证。即从古籍中查询本字有无与现今方言相仿的用例。李荣先生说："考本字当然还要读书。闽语夜叫'暝'，也写作'冥'，福州 $maŋ^{53}$，厦门 $m\tilde{ĩ}^{24}$，潮阳 $m\tilde{e}^{55}$都是阳平。这个'暝'字当'夜'讲可以举几个比《切韵》略早的好例子：宗怀《早春》：'昨暝春风起，今朝春气来。'庾信《秋夜望南飞雁》：'无奈人心复有忆，今暝将渠俱不眠。''昨暝'就是'昨晚'，跟'今朝'对举，'今暝'就是'今夜'。"（李荣，1985，28 页）有了书证就说明古时候该字在口语中有过用例，是确实存在过的，比起只从古字书上录下反切和义注自然有不同的价值。

例如"着"（旧时均写为"著"），在现代方言里有多种用法，都见诸唐宋时代的诗文。闽、粤、客方言"唔着"表示"不对、不正确"。杨万里诗《道父山歌》："种田不收一年辛，取妇不着一生贫。"闽、吴方言"着"表示"应该、必须"，也常见于唐诗用例。韩愈《遣兴》诗："莫忧世事兼身事，须着人间比梦间。"白居易《还李十一马》诗："传语李君劳寄马，病来惟着杖扶身。"又《府酒》诗："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着钱。"吴闽方言还用"着"表示"睡熟"（福州话睏野着：睡得很熟）。杜甫《客夜》诗："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陆游《自咏绝句》："睡着何曾厌夜长，老人少睡坐何妨。"许多官话都用"着"表示"在"（着家：在家）或"到"（扔着水里：扔到水里），杜甫《阆山歌》："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庐着青壁。"沈佺期《杂诗》："妾家临渭北，春梦着辽西。"苏轼《减兰》词："懊恼风情，春着花枝百态生。""着"表示"遭遇，触及，命中"等义更是在吴、闽、粤语及官话广泛应用，也是古代常有的说法。陆游《卜算子》词："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杨万里《新涂抛江》诗："烟雨横江水着天，不曾夏涝似今年。"苏轼《答李邦直》诗"美人如春风，着物物未知。"

诚然，就方言词汇进行纵向比较，考出确切的本字，就能赋予方言词汇材料更加重要的价值，作为汉语词汇史的佐证。然而一定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展示历史的事实，而不能为考本字而考本字，更不能认为本字考得越多越好，甚至以为方言词是"无一字无来历"而任意撮合勉强凑数。李荣先生曾说过：本字考得好是"画龙点睛"，考得不好便难免于"画蛇添足"，弄巧成拙。这是十分有道理的。

2. 方言词汇历时系统的分析

在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方言词汇逐渐地出现和叠加，不断地演变和替换，有时骤增和扩展，有时也萎缩和消亡，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动荡的系统。对于这样的系统，进行历时的考察和分析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说，考释方言词本字是方言词汇的个体考察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还必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考察。

对方言词汇作历时系统分析也应该从分类开始。从历时的角度看纷繁复杂的方言词汇，无非是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和借用词四大类。

（1）承传词

所谓承传词是从古代汉语直接承传下来的，其中又包含着自古代通语承传下来的和古代方言承传下来的两种。

东南方言中的许多常用词是古代通语的直接继承者。例如：行（行走)、走（逃跑)、惊

(害怕)、食（吃）、寒（冷）、肥（胖）、光（亮）、利（锋利）、细（小）、面（脸）、徛、立（站立）、寻（找）、望（看）、缚（绑）、箸（筷子）、卵（蛋）、晏（迟、晚）、炊（蒸）、担（挑）、饮（喝）、嬉（玩）、系（是）、着（穿）、共（同）、无（没）、目（眼）、日（太阳、天）、翼（翅膀）、索（绳子）。在后来的现代共同语里，口语的用词发生了变化，这些古代通语的用词只保留在书面语或文言词里（例如行动、走马观花、惊吓、食物、粮食、数九寒天……）。这些古语词便成了东南方言里颇具特色的方言词。

另一种是现代方言保存了古代方言的说法。例如《集韵》所收的“囝”，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唐诗中早有顾况的诗以“囝”为题，至今还是闽方言的特征词。还有“鲑”，户佳切，《集韵》注：“吴人呼鱼菜总称。”“烌”，虚尤切，《集韵》：“吴俗谓灰为烌。”这些古吴语词如今并未保留在吴方言里，却大体不变地保存在闽方言中。“鲑”在福州、厦门还有两种音义 ha^2/he^2 用于“鲑油”，是小杂鱼炼成的咸卤；kie^2/kue^2 用于“咸鲑”，是腌制的小杂鱼。这说明闽语词汇中有一个相当古远的和古吴语共有的方言词的层次。

扬雄的《方言》列举了不少南楚方言词，有些说法至今还保留在现在的南方方言里，成为它们的特征词。例如：“南楚之外曰睇”（卷 2），“睇”见于粤语和潮汕闽语；“南楚病愈者谓之差”（卷 3），“差”见于闽东方言；“猪一南楚谓之豨”（卷 8），“豨”见于闽北方言。

𦨈，《广韵》林直切，“赵魏间呼棘”。今普遍见于湘赣方言。髈，《广韵》匹朗切，“髈，髀，吴人云髈”，今见于吴湘方言。挦，《广韵》视占切，“挦，取也，卫鲁扬徐荆衡之郊曰挦”。“挦毛”（拔除鸡毛）的说法普遍见于湘赣语。咍，《广韵》呼来切，“笑也”。《楚辞》王注：“楚人谓相啁笑曰咍”。今湘语多谓玩笑为咍（以上部分材料取自彭逢澍 1999）。

看来，古代吴楚方言与当代诸方言之间的承继关系很值得仔细研究。

不论是古通语或古方言，在数千年历史中又可分出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某些重要的方言常用词如能联系古代文献的用例，确定其所沿用的历史时代，对于了解方言形成的大体年代极有价值。上文所引丁邦新就闽南话的特征词“鼎”所作精彩考证，他的结论是：“今日闽南语中用为食器之‘鼎’，至少保存西汉时代尚可了解之一种用法。”换言之，这条特征词说明了闽南语至少有汉代语言的留存。

据《〈世说新语〉语言研究》（张振德、宋子然主编，1995），《世说新语》人称代词使用情况如下（括号中为用例次数，第三人称只取三种主要用法）：

第一人称（235）	**第二人称**（91）	**第三人称**（850）
我（164）	汝（63）	之（521，其中 498 例作宾语）
吾（53）	尔（15）	其（316，主要作定语）
余、予、身、朕（18）	子（13）	伊（13，作主语、宾语、定语、兼语）

“伊”的用例虽然偏少，但用于句中是全方位的。现今闽语主要地区三身代词用“我、汝、伊”，这种状况也说明闽语相当接近地传承了六朝时期三身代词方面的主流状态。

在繁多的方言词之中，如果有一批时代相近的古语词同时在某一方言中承传下来，这绝不可能是偶合的，而一定是古时某地的语言在该方言早期的形成过程有过重大的影响。所以，人们在分析方言词汇特征时都十分重视研究方言所承传的古语词，这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提起古语词的承传，人们就总是想到东南诸方言。诚然，东南方言的承传词可能比官话

区占着更大比例，但并不意味着官话里就很少古语词。李荣先生说："语言是历史的产物，父子相传，总保留很多古代的成分。有些字虽然古已有之，却没有人认为是古语。比方'人、马'等字最古了，甲骨文里就有了，我们不说它是古语，那是因为这些字古今普遍使用的缘故。有些不普遍使用的古语，只限于某些方言，这才说某方言保留古语。"（李荣，1985，13页）以下略举几个官话方言的例子以见一斑。

据李行建、吴振清（1997），唐山保定一带称胡须为"髯"，《说文》："頾，须也。"天津、张家口、承德、邯郸等地称树根为"树本"，《说文》："木下曰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地谓催请客人赴宴曰："速"，《释文》："速，召也。"河北大部分地区谓吝啬为"悭"，《广韵》："悋也"，又称为"瞿"，《尔雅》："俭也"。（"悭"见于广州，音 han[1]，"瞿"见于泉州，音 k'iu[2]）。津唐地区，有病曰："有瘵儿了"，"瘵"，《说文》：病也。吴桥至今仍称学费为"束修"，这是《论语》说法的沿用。天津提篮子曰"携"，这是《庄子》早有的说法。另据喻遂生（1996），明末四川遂宁人李实所撰《蜀语》就有好些古语词的承传，至今还沿用于川北。例如：

《蜀语》原文	**古语出处**
以刀磨瓦盆或皮上曰鐾	《集韵》：鐾，蒲计切，治刀使利
织荆条为囤以贮粮食曰篅	《说文》：篅，以判竹圜以盛谷也
去垢曰磢	《广韵》：磢，瓦石洗物，初两切
污秽曰涴	《广韵》：涴，泥着物也，乌卧切
足蹂曰跐	《广雅》：跐，履也
牝牛曰牸	《玉篇》：牸，母牛也

可见，只要是古汉语传承下来的方言，留存着早年古语词是必然的，只是数量有多有少，所留存的语词有不同。比较各方言的承传词是了解方言差异的重要方面。

（2）变异词

所谓变异词是在传承前代语词之后意义或用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异的方言词。

闽方言和客方言沿用了"食"，不但吃饭是"食饭"，吸烟、喝酒也都说"食"；又"鼻"单用时不但指鼻子，也指"鼻涕"或"用鼻子闻"。粤方言"夜"兼用作形容词"晚"（好夜=很晚），"烂"兼指"破"（衣服烂了），"生"兼表"活"（生鱼）和"新鲜"（生果），"雪"兼表"冰"（雪条、雪糕、雪柜），这是词义扩大、用法增多的变异。

"熏"在说文指一种香草，闽方言用它来转指原产南美洲经菲律宾传来的菸草。"骹"，《集韵》口交切，原指"胫骨近足细处"、闽语用来指脚，有时兼指整条腿。"八"在《说文》原意为"分别"，在闽语义为"认识、知晓"，又引申为"曾经"，福州话还说"八背"（背时，倒霉）。"倩"本义是"假手于人"，在闽语转指"雇佣"。粤方言"数"转指"账目"（算数、数簿，欠数），"出、入"兼用来表达方位（出便：外面，入便：里面），"下饭"说"送饭"，并把"下饭菜"也叫"送"，字形则改写为"餸"。这是词义转移的变异。

"针"用作动词，在厦门表"注射"，在广州表"刺、蜇"；"身"用作量词，在闽、客方言指衣服一套，在粤语表示动量词打一顿；"快"在松江吴语可用作名词表示刀刃，在潮州闽语可用作数词表示九（谐"久"的音，"久"与快反义相训）；"肉"用作形容词，在北京指"肉多"（肉鼻子），在山西指肥胖，在山东指"脾气犟"，在东北指动作迟缓性情疏懒；"过"用作介词在客家话是"让"的意思（过你猜），在西南官话是"正对着"（武汉：过头一盆冷水），

在赣语和粤语则用于动词之后表示“重新来过”。这是词性转移的变异。

有些很常用的基本词因为反映的是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在现实生活的使用中，各方言区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不断地在基本意义上附加各种相关意义，造出多方面的变异词。例如“白”原是颜色词，《说文》：“西方色也”，（如“白日依山尽”）。不少地方的官话称暴雨为“白雨”。官话和吴、闽、粤语则有称黄豆为“白豆”的（与黑豆对举）。有些晋语和闽语称肥肉为“白肉”。有些官话和吴语称菜刀为“白刀”。盐城称米饭为“白饭”。厦门称带鱼为“白鱼”，称银元为“白银”。西南官话称红薯为“白苕”，称饴糖为“白糖”。西安称锡为“白铁”，等等。这都是着眼于白颜色而辗转造出的方言词。后来或引申出“光亮”的意思，西南官话“白日”指光亮的时光（上午或下午）。北方官话白天又说“白日、白儿、白个、白下、白地”。厦门称汽灯为“白火”。从“白”的无色又引申为“空”、除了“白手起家、白开水、交白卷、打白条、白费力”之外，晋语用“白汉、白丁”指文盲，江淮官话（广济）称空田为“白田”，苏州吴语称空地为“白场”，徐州称愚蠢无用的人为“白板”。从“白”的不杂又引申出“纯正、未经加工、不加配料”等意思。如不少地方说的“白粥”指纯粥。未加油漆的家具，闽语称“白坯”或“白身”，未加油漆的船篷绍兴叫“白篷”。不少地方称开水为“白开、白茶、白汤”也是这类说法。因为各地民俗都以白色为孝服，故有“白喜事”（丧事）、“白帖”（讣告）、“头白”（孝巾）、“白裙”（孝裙）等名称。由于有不同取向和不同结构方式的变异，有时同样的字面在不同的方言可能表示完全不同而且并不相关的意思。例如“白话”在东北方言和上海话指的是“说话”，其中的“白”是动词（道白）；在京津地区也用作动词，但指的是“闲扯”；在东北又指“胡说、谎话”；在北京有时指“说讨好的话”；在双峰的湘语用作名词，指“故事”；在粤语则指本地方言（平平白白的口语）。又如“老伯”在闽西客话指哥哥，在毕节官话指父亲，在揭阳闽语指父亲的伯父，陵县（山东）官话则指公公（夫之父），在官话和吴语多用来称伯父（如无锡）。“老弟”在陆川粤语是哥哥，在闽西客话是弟弟，在岳阳湘语也称妹妹，在新余赣语则指小叔子，在许多官话指的是朋友。更离奇的是“老子”可指曾祖父母（浏阳），又指老头儿（宜春、崇安）、也可称叔父（苏北）或姑母（重庆），有的称丈夫（富阳，邵武），在宁波则指老鼠。从这一点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不要因用字普通、字义明白而忽略对这些字作方言差异的考察。越是常用的字词，越需要比较方言的变异。

（3）创新词

所谓创新词是各方言区在自己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根据交际的需要新创造的方言词。这类词在以往的语言或文献中很难找到用例。

各地那些表示一定地形地貌的地理通名应该属于这类创新词。南方的早期移民从中原南下，接触到新的自然环境，当然必须创立一些新的方言词，而这些词因为是称说常见事物的，便成了基本词。例如吴语区的浜、溇、泾，闽语区的垵、坜、垄，粤语区的涌（音冲）、沥、滘。其实在北方也不乏此类方言词语，例如晋语区就有墚、塬、峁，中原官话区有峪、崮、淀。

方言口语里那些无“本字”可考的常用单音词，可能是音义发生较大变化而至于本字难明；也可能是古时局部地区用过，文献未曾记载；也可能是早期的方言创新。例如上海话“蹲着、呆着，晒（太阳）”都说［bu²］、“遮盖”说［t'ã¹］，“抓”说［tʌʔ⁷］，“余剩”说［t'in⁵］。闽客方言的［p'aŋ⁵］意为空虚，不实。闽语“捡”说［k'aʔ⁷］或［k'ioʔ⁷］，“瓶”说［kan¹］。

粤语“东西”说“嘢”，“久煮”说“煲”。还有许多从拟声词转换而来的动词（“降降响、吵吵响、吱吱叫”之类）、叹词（欸，喂）、语气词等，也属于这类方言词。各方言都有一批这类写不出字的音节造成的单音或多音的方言词。闽南话里就有不少既鼻化又带喉塞的“怪音节”词：m ɔ̃ʔ^{7}，（击打）、s ãʔ^{7}（搂紧）、sŋʔ^{8}（用鼻子吸入）、ts'ŋʔ^{8}（动作缓慢、啰嗦）、ŋi ãuʔ^{7}（钩起）、mu ĩʔ^{7}（闭口食貌）、su ĩʔ^{7}（泣声）。粤方言则有不少写不出字或勉强写出字来字义十分费解的双声叠韵词：lo^{1} lyn^{1}（小儿因身体不适而哭闹，又指肚子不舒服的感觉）、lœn^{6} tsœn^{6}（麻烦、累赘、啰嗦、举动不灵）、lɐm^{4} sɐm^{3}（麻烦，纠缠不清）、lɐp^{9} lyn^{6}（杂乱、随便）、lai^{1} ts'ai^{2}（翘鼻子）、lap^{8} tsap^{9}（杂乱、繁复）、la^{3} lɐi^{6}（舌头因咸涩而发麻的感觉）。此外，各地方言里表示形容词生动形式的前缀、后缀，晋语的分音词等等也都属于这类方言词。

有更多的方言词是用汉语共有的语素创造出来的，虽然读音和用字并不特别，但所造的方言词却很具特色。这类方言词中有：

本地作物或本地食品或适应本地环境的房舍设施等的名称：茄子又称落苏（上海）、紫菜（福州）、吊菜（梅县）、矮瓜（广州）；洋白菜又称圆白菜（太原）、包菜（武汉、福州、长沙）、椰菜（广州）、高丽菜（厦门）、球菜（温州）；馄饨又称水饺（武汉、扬州）、清汤（南昌）、扁食（厦门）。西北关于窑洞的一系列名称，东南沿海关于建房各种石料、石材及其加工方法的名称都是这类创新词。不论是主食、副食、大菜、点心，各地都有一整套特有的方言词来称说。以下是福州话里部分食物名称，不少还很难用简单的词语去对译，非本地人也很难为实地理解的：广东熗（一种焖饭）、箊藷包（草包蒸饭）、豆腐箸（腐竹）、豆腐蛎（海蛎烧豆腐）、虾饭（鲜虾皮）、虾奸（腌制的虾皮）、蛏老蜞（蛋炒蛏）、素烩（素杂烩汤）、燕（肉皮馄饨）、蛎饼（油煤糕）、油炸馃（油条）、鑫（糍巴）、糖馃（甜年糕）、白馃（淡年糕）、火把（麻花儿）、发酥（xua ts'œ 炒花生米）、光饼（小烧饼）、征东饼（大烧饼）、箸头抽（稠粥）。在上海话里，单是糕点类就有：松子糕、海棠糕、印糕、重阳糕、赤豆糕、黄松糕、方糕、条头糕、松糕、鑫饭糕、金团、青团、汤团、双酿团、瘪子团、糯米团、年糕团等等不一而足。

有关风俗习惯的各种仪式、忌讳语、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职业称谓及人品评价等方面也有不少方言创新词。例如北京鸡蛋说“鸡子儿”、蛋汤说“木须汤”，广州猪舌称“猪脷”，猪肝说“猪润”。扫墓，或称“挂钱、挂纸”（徽州），“砻纸、献纸”（福建），或说“拜山”（广东），或说“醮地”（客家）。有些晚近由国外引进的舶来品，各地也创造了自己的新词去称说。例如肥皂说“胰子（北京）、洋胰（郑州）、洋胰子（锦州）、洋碱（西安、长沙）、番仔腊（永安）、鬼子碱（邵武）、胰皂（福州）、雪文（厦门）”。

此外，像福州话的“同居”（邻居）、“纸票”（钞票）、“纳闷”（傻、蠢）、“白面”（妓女）、“过位”（做客）、“徛紧”（抱团）、“花彩”（小费），广州话的“揾食”（混饭、糊口）、“咸湿”（下流）、“孤寒”（吝啬）、“糖水”（甜汤）、“拍拖”（谈恋爱）、“地盘”（建房工地）、“银纸”（钞票）之类的常用词各地方言都还有一大批，真是难以枚举。

有时，变异词和创新词并不容易区分。因为许多创新都是从变异引申扩大而来的。从古代到现代，在词汇演变历史上都有一些新词“暴发户”，即某些基本词的用法突然迅速而大量地扩充，因而便出现了一些“万能动词”、“万能副词”或“万能量词”。在中古到近代的转变期，宋代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曾十分生动地记录了他对“暴发户”“打”字的抱怨：“今世俗言语之讹，而举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谬者，惟‘打’字尔。其义本谓考击，故人相殴、以物相

击皆谓之打，而工造金银器亦谓之打，可矣，盖有槌挝作击之义也。至于造舟车者曰打船、打车，网鱼曰打鱼，汲水曰打水，役夫饷饭曰打饭，兵士给衣粮曰打衣粮，从者执伞曰打伞，以糊粘纸曰打粘，以丈尺量地曰打量，举手拭眼之昏明曰打拭，至于名儒硕学，语皆如此，触事皆谓之打。而遍检字书，了无此字。其义取考击之打、自音谪耿，以字学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击物之声，故音谪耿为是，不知因何转为丁雅。"他不但对义项膨胀不理解，对读音有变也不理解。从欧阳修的时代到现在，"打"字的用法还在变，有的当年的说法失传了，有的新说法又出现了。据《现代汉语大词典》，"打"字共有 25 个义项，用"打"字带头的词语有 192 条。又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打"字共有 35 个义项，"打"字带头的方言词语多达 90 页，大约在 2000 条以上。

（4）借用词

除了从古代共同语或方言承传、变异之外，方言特征词还有一些是借用的结果。因为方言的演变除了纵向的承变，还必定有横向的接触和渗透，这种渗透便是一种广义的借用。

广义的方言词的借用可以是本语言的借用，包括方言形成之后受后来共同语的制约而借用和受周边方言的影响而借用。

以吴语的人称代词为例，南朝吴歌第一人称说"侬"，到了明代，对本地方言饶有兴趣的冯梦龙还在《古今谭概杂志》中记载了"嘉定近海处"的人称代词是"我侬、你侬、渠侬、谁侬"，到了现代吴语，普遍的说法是"我、侬（倷）、渠［ɦi²］"，在近江的宜兴、溧阳、靖江一带，二、三人称则有"你、他"的说法。第一人称由"侬、我侬"变为"我"，第二人称由"你侬"（潘悟云认为是"汝侬"）变为"你"，第三人称由"渠"变为"他"，都是唐宋之后中原共同语不断冲击、催化的结果（参阅陈忠敏、潘悟云，1999）。

粤语的不少双音词和共同语语素逆序，例如"取录、经已、利便，挤拥、怪责、晨早（若是"早晨"是问候语 good morning）、髭鬓、布碎、下底、订装"，据 1896 年出版的 W. Lobcheid 所编《汉英词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1869 年香港出版）此类逆序词还要更多，有 100 多条是当年还是逆序词现代粤语改同共同语的：民人、地天、辉光、洋海、加添、收接、容纵、叫哭、备具、常时、少缺、告祷、机危、晒曝、气叹、心多、藏埋、程课、哑聋、裁制。这显然也是方言受共同语影响的结果。

广东境内的闽、客方言普遍说"遮（伞）、火水（煤油）、樽（瓶子）、煲（久煮）、番鬼（洋人）"，应该是向当地的强势方言粤语借用的结果；闽南西部的龙岩话说的"老弟（弟弟）、糖蜂（蜜蜂）、圆鱼（鳖）、婿郎（女婿）、着棋（下棋）"则是受近邻闽西客话的影响而来的。这是周边方言的渗透。

有些方言特征词则是古代向原住民的语言借用的或近代向外国语言借用的。前者通常称为"底层"现象，后者则称为"外来词"。闽南话和客家话共有的"啱啱（刚好）、嘲（口水）、neŋ（乳房）、lut（滑落）、lin（滚动）、lam（下陷）、liaʔ（舔）"等说法，许多学者都认为可能是古百越语（现代壮侗语的前身）留下的底层。至于粤语，这种"底层"更多。李敬忠在《粤语中百越语成分问题》（李敬忠，1994）中举出 30 多条例词应是比较可信的，其中的"lam^{55}（花蕾）、kap^{55}（田鸡）、$maŋ^{55}$（拉）、tap^{33}（捶打）、$t'am^{33}$（哄）、nan^{35}（作弄）、kat（刺入）、$ŋak^{55}$（骗）、$pai^{33}ŋai^{33}$（烦恼）、$tsoŋ^{22}$（还有）、$tiŋ^{22}$（还是）"都是比较明显的属于"底层"现象的特征词。至于近代以来一些方言向外国语言借用的词语也有些是相当常用甚至

引申出几个义项、派生出几个词语的。例如粤语的“飞（fare），波士（boss），士多（store）/士多房（杂物间），多士（toas）/多士炉（面包炉），咭（card）/咭片/信用咭（信用卡），波（ball）/乒乓波（乒乓球）/波鞋（球鞋），啤啤（baby）/啤啤仔（男婴）/啤啤女（女婴），巴士（bus）/大巴/小巴，恤衫（shirt）/飞机恤（茄克）”等等。闽方言里的印尼语借词也有类似情形。详细情况可参阅《闽南话与印尼语的相互借词》（李如龙，1999，131～175页），此处不再列举。

总的说来，承传词是方言区的先民从故土的母语中沿袭下来的，应是方言形成时代的用语，历史比较久远；变异词是社会生活几经变迁之后约定俗成的；创新词则多半是比较后起的。当然也有些早期创造的，原住民的语言底层是方言形成的古代阶段留存下来的，也可能后来又发生了某些变异。然后是本族共同语和周边方言的借用，这类特征词大约是中古至近代形成的。外国语的借用则是近代以来与外国人多了交往才发生的现象，历史不会太长。

对不同方言来说，承传词、变异词、创新词、借用词等，各类方言词所占的比重是很不相同的。虽然目前尚无严密统计，但根据一般的印象，东南方言的古代承传词似乎多些。官话方言变异词可能占着很大的比例。创新词是各方言普遍都有的。向共同语及姊妹方言借用多的是弱势小方言，向外国语借用多的是出洋多的闽粤方言区和外人来得多的大商埠（如上海、广州、香港）。

3. 方言词汇历史演变的特点

汉语的词汇从古至今的演变，首要的特点是多音化。向熹（1993）说：“词汇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主要方向。上古汉语已有相当数量的复音词，中古以后复音词大量增加。以两个单音词作为词素或以一个单音词素加一个附加成分构成新词，成为汉语新词产生的主要方式。”据统计，到了近代的《水浒》、《红楼》、《儿女英雄传》，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大约是一半对一半，1949年之后单、复音词比例大约是14.2%:85.8%。（马西尼，1997）

汉语方言间的词汇差异可以论证这种结论。

保存古语词较多的南方方言有更多的单音词。以下单音词在徽州方言里普遍都是承传古汉语的单音词说法，在其他不少方言里都已用双音词来表达：栗（栗子）、藕（莲藕）、谷（稻谷）、麦（麦子）、桌（桌子）、女（女儿）、事（事情）、物（东西）、槛（窗户）、房（屋子）、屋（房子）、稻（稻子）章、印（图章）、筷（筷子）、姨（姨母）、灰（灰尘）。在粤语有更多的单音词：乜（什么）、嘢（东西）、枱（桌子）、颈（脖子）、褛（大衣）、脷（舌头）、樽（瓶子）、仔（儿子）、埕（坛子）、尾（尾巴）、钟（点钟）、窿（窟窿）、数（账目）、锈（铁锈）、簿（本子）、翼（翅膀）、枧（肥皂）、络（网兜）、憎（厌恶）、望（盼望）、嬲（生气）、执（收拾）、旺（兴旺、繁荣）、倾（交谈）、衰（倒霉）、平（便宜）、侨（洋气）、谦（过谦）、若（如果）、忧（担心）、废（腐朽）、啱（合适）、几（多么）、抵（划算）、拆（开裂）、威（厉害）、博（交换）、知（知道）、正（十足）、奸（阴险）、悭（节俭、俭省）、靓（漂亮）、滞（积食）、窍（计策）、衫（上衣）。

在南方方言中，凡是单音词和多音词并行的，单音词大体上都是方言固有的早期传下来的，双音的说法则多半是现代普通话移用的。例如，现在的福州方言里有许多单音词已经只能在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口中才能听到，中年以下的本地人大多替换为双音词了：文—文章、文

雅、斯文，凉—风凉（形容词）、凉风（动词），快—爽快，赖—依赖、诬赖，蔗—甘蔗，皮—皮肤，刁—刁皮，断［$toun^3$］—对断、拍对断，操—做操、行操、操练，跋—跋倒（跌倒），围—估计，卫—袒护，斋—学校，善—好心，笐—行笐、竹竿，桯—大桶，旲—闹热、销路好，疲—疲软，孽—做呆、耍赖，溢—潮水，贱—便宜，匙—锁匙。

向熹还指出："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新词产生的数量多，旧词死亡的数量少。""词的多义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概括是符合语言发展的总趋势的。作为人类思维成果的结晶，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语言的词汇总是愈来愈丰富，单音词的义项也愈来愈多。就汉语方言词汇的情况看，在这方面应该有更突出的表现。因为方言主要是以口语的形式存在的，口语的使用固然也有约定俗成的作用，使诸多的词语在交际实践中优胜劣汰，用进废退，但总不如书面语那样便于修正和推敲，发挥标准化、规范化的作用。同时，方言作为民族语言的地域变体，它总是要不断地接受着共同语的影响，在方言之间的接触过程中，弱势方言也会不断地接受强势方言的影响，在与外族语言相处（尤其是双语并用）时方言还会与外族语言相互交融，借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共同语比较而言，尤其是和书面标准语相对而言，方言词汇总是兼收并蓄的，这就使得它具有更多的同义词和多义词。

上海方言不但有方言固有词与共同语移用词并用，有些方言固有词还有新旧两种说法，这就造成三种说法并行的局面（据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

锲子—镰刀	丸药—药丸	镬盖—锅盖	声气—声音
寒豆—蚕豆	窗盘—窗台	物事—东西	珍珠米—玉米
压勿杀—千斤顶	牙子—牙齿	开年—明年	晏—迟

栈房—客栈—旅馆	槽坊—酱园—酱油店	洋灰—水门汀—水泥
夜快头—黄昏头—傍晚	旧年—旧年子—去年	后日—后日天—后天
半日—半日天—半天	今朝—今朝子—今天	里向—里首—里面
潮来—起潮—涨潮	潮落—落潮—退潮	叉袋—麻叉袋—麻袋
长头雨—长脚雨—连阴雨	木拖板—木屐板—木拖鞋	撑矮棒—司的克—拐杖

徐州话属于中原官话，可能由于它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方言词特别易于兼容并蓄，同一事物和现象，在徐州话往往有多种说法（据李申，1985）。例如：

手绢儿：手捏子、手擦子、手袱子

酵子（发面儿用）：引子、面头、引头、引脚、引脚头

四季豆：云豆、莓豆（子）、四角莓、架莓

癞蛤蟆：癞鼓、气鼓、癞子鼓、气子鼓

往日：每天、往天似、每儿个、每儿每儿、每天似

昨天：昨个儿、昨门儿、早昨天、早昨儿个、早昨门儿

整天：成天、朝天、朝天似、论天、论天似

刚才：将、将将、将会儿、将才

驼背：罗锅儿、罗锅子、背锅、罗锅腰

胡说：胡侃、胡诌、胡扯、胡沁、胡扯八瘸

煤灰（余烬）：炭灰、炭渣子、炭灰渣子、炉渣、炉渣灰、炉渣灰子

不行：不管、不管乎儿、不管斤、不办事

立刻：马上、马上当、马展、当时、一屁拉

真行：赛、棒、盖、真强、来劲、办劲、办事、不穰、不离乎

至于多义词在各个方言词典里比比皆是。仅以朱建颂（1995）新编《武汉方言词典》为例，在该书的164、165两页里：

“抵”有6个义项：支撑、抵挡、面对面、抵消、顶撞、儿童抵指以表决裂。

“对”有7个义项：对会、朝（介词）、对配（对对子）、对比、正确、搀、成双东西的量词。

“飞”有8个义项：（鸟）飞、（雪）飘、飞（跑）、自行车飞轮、奇特而美、欢喜、极（副词）、飞象。

此外“咬、死、盘”有5个义项，“坨子、烧”有6个义项，“接、错、带”有7个义项，“点、好”有8个义项，“过”有10个义项。

把古今南北打通考察若干常用字，还可以看到方言词义引申的多向性和多样性。这里试举两个例子。

洋，《说文》是水名，《尔雅》即有“多”的意思，郝懿行《尔雅义疏》引《匡谬正俗》云：“今山东俗谓众为多”又说“按以洋为多，古今通语”。“洋洋大观”是早有的说法。在吴、闽语大片平地称洋（有的写为垟），又说“田洋、洋田”。后来引申为“深海”（七星洋、海洋），可能从海水滔滔引申出舒适坦荡之意。“得意洋洋、洋洋自得”成都话说“洋昏了”。到后来，凡是从外洋传来的东西都可冠以“洋”字号：“洋龙”或指火车（南京），或称救火车（上海）、抽水机（常州）。“洋戏”是留声机（福州、太原、徐州）。“洋气”除了和“土气”相对之外，还可指稀奇（洛阳）或浮夸（聊城）。在许多方言里，“洋火”指火柴，“洋泥、洋灰”指水泥。“洋烟”指鸦片（太原、昆明、梅县），或指香烟（青岛、赤峰）。在商县，说“这事是洋的”意思是靠不住，不可靠。

生，《说文》：“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本义是草木生长，很快就扩散到人与动物的生育、生养。唐山称能繁殖后代的公马为“生马”，晋语称母牛为“生牛”，临武称公鸡为“生鸡”。鸡鸭下蛋，粤语说“生春”，闽语说“生卵”。其后事件发生也说生，如上海说“生心”（生疑），海康闽语说“生话”（口角），武汉说“生言”（造谣），生锈又说“生鲜”（南昌）、“生鉎”（福州）。后来又引申为生存。“生活”可指生意、功夫（上海），也可指“事儿、活儿”（扬州）。“生理”在吴、闽语指的是“生意”（苏州、厦门）。“生意”在吴语指的是“职业”（上海）。“生计”也可指生意（绍兴）。这些说法无非都为了“生存”。从“生长”又引申出“鲜活”之义。如粤语“生果”（鲜果）、“生鱼”（活鱼）。从“生—熟”之对立又引申出“陌生、新异、生疏”。例如：“生书”（松江指“新课文”），“生外”（聊城指“疏远”），“生田”（苏州指新开的田）。陌生又说“生份”（北京、潮州）、“生当”（建宁）或“生步”（广州）。福州话为避讳把小动物死去说“生去”。正是这种词义引申的多向和多样，造成方言词中大量的多义词。

蒋绍愚在谈到汉语词汇系统的历史发展时说：“总的看来，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化。”（蒋绍愚，1989）从中古时期到近代汉语，应该说词缀和虚词的大量产生（所谓的“语法化”）是汉语词汇系统历史发展中的另一个大变化。

据许多近代汉语专家的研究，诸如各种粘着性的助词“着、了、过、的、得、地”，各种词缀“阿、老、们、子、儿、头”等等的完全虚化，显然都是宋元以来完成的（刘坚、江蓝生等，1992）。

曹广顺指出：“唐五代是近代汉语动词体系形成、新动词全面产生的一个重要时期，近代汉语助词体系的形成，是近代汉语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曹广顺，1995）明清以来不但有四字格成语大量出现，三字组及多字组词化词组也得到大规模发展。现代生活中的这些惯用语大多是从比喻义、借代义开始逐渐词化的，有人称为“修辞造词”。放包袱、走后门、冷处理、短平快、放卫星、上刀山下火海、海枯石烂、石破天惊、日月经天等等，早已不能按字面意义去理解了。近50年间这类与英语 phrase 相当的词组词的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近十几年来新词新语词典、惯用语词典、成语谚语词典应运而生，一发而不可收，这是有语言发展的事实根据的。

综观古往今来的汉语新词滋生的历史过程，也许可以说，从音义相生（近音近义派生、异读别义、联绵字等）到语素合成，从语法化（语缀和虚词的形成）到修辞化（成语、谚语、歇后语等惯用语），汉语的造词法经历过四个历变更替的高潮。而从汉语方言词汇的状况说，也完全可以看到这个全过程的演变。实际上也可以以不同方言词汇的差异为纲来进行纵向比较，可惜的是汉语方言还没有建立庞大的词汇语料库，要对各地方言的词汇进行此类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为时尚早。经过一番材料的积累和处理，进行全面的比较统计一定可以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并从中提炼出反映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崭新的理论。

思考与练习

一、你对“方言特征词”有何理解？本章关于特征词的分析是否符合科学性的要求？

二、试以10个最常用、方言差异最多的词为例，用《汉语方言大词典》的材料进行词义比较（包括派生词中的义项义），看看汉语方言词义差异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三、按照考本字的要求和步骤试考释50个你所熟悉的方言的本字。

四、举例说明共同语词汇和方言词汇相互影响和转化的事实。

参考文献

张双庆主编（1996）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7）　动词谓语句　暨南大学出版社

谢留文（1998）　于都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冯爱珍（1998）　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一舟等（1986）　四川方言词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张映庚（1997）　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　云南教育出版社

麦　耘、谭步云（1997）　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梅祖麟（1995）　方言本字研究的两种方法，见《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1996）　福州方言本字考　《方言与音韵论集》　香港中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丁邦新等（1997）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 住民志语言篇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
罗杰瑞（1979） 闽语里的“治”字 《方言》第3期
李 荣（1980） 吴语本字举例 《方言》第2期
李 荣（1985） 关于方言研究的几点意见 《语文论衡》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1997） 广州话常用词里的几种字音变读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
彭逢澍（1999） 湘方言考释 湖南师大出版社
张振德、宋子然主编（1995） 《世说新语》语言研究 巴蜀书社
李 荣（1985） 语文论衡 商务印书馆
李行健、吴振清（1997） 天津河北方言古词语汇释 天津教育出版社
喻遂生（1996） 《蜀语》今踪 见《李实学术研讨会文集》 语文出版社
陈忠敏、潘悟云（1999） 论吴语的人称代词 见李如龙、张双庆主编《代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W. Lobcneid（1869） 《汉英词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香港
李敬忠（1994） 语言演变论 广州出版社
李如龙（1999）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 湖南师大出版社
向 熹（1993） 简明汉语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马西尼（1997）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 申（1985） 徐州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朱建颂（1995） 武汉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蒋绍愚（1989） 古汉语词汇纲要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 坚、江蓝生等（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曹广顺（1995） 近代汉语助词 语文出版社

第八章　汉语方言语法差异

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回顾

真正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最早当推1926年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学报》发表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一文。在这篇篇幅不短的文章中，作者开风气之先，从组合分布到语义用法对三者语助词的异同进行了相当细微的对比分析，是一篇十分成功的方言语法专题比较研究，其典范意义至今仍然难以磨灭。

随着结构主义描写语法的理论方法的影响不断扩大，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逐渐成熟，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成果，揭示了不少方言语法特殊现象。但由于所涉及的方言点较多，研究人员又少（其中不少人是在主攻语言学某一方面的同时兼及方言语法的研究），从总体上说，方言语法研究的力量至今依然很薄弱，许多特殊的方言语法现象都还没有深入挖掘，比较全面地反映某地语法整体面貌的专著还很少，联系共同语语法作比较并进行理论探讨的就更少了。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长期以来都认为汉语方言在语法方面相互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如赵元任先生就认为："在所有的汉语方言之间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是在语法方面。我们可以说，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言中否定式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等等之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汉语口语语法》1979，13页）

吕叔湘先生也认为："方言的语法和普通话的语法比较，句法方面的差别很小，虚词和近乎虚词的构词成分的差别比较大些。"（见吕叔湘，1977）类似的观点袁家骅先生在《汉语方言概要》一书中也表述过："语法结构是语言最稳固的本质部分，汉语方言间的语法结构可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别仅表现在细节上。"（袁家骅等1983，12章）这些看法在客观上都不利于方言语法的深入研究。

朱德熙先生在《语法丛稿》"汉语"一章中认为"方言之间在词法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而在句法方面朱先生的态度不是很明朗，只是提到"把"字句和反复问句在方言之间有差别，而且这些差别有时甚至是有无使用的差别，如粤方言和吴方言就没有"把"字句。这可以使人有多种理解。如果把"把"字句的使用归结为介词"把"的使用，那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别就像吕叔湘先生所说的那样，只是"虚词和近乎虚词的构词成分的差别比较大些"。但如果把"把"字句当成表处置义的一种可能的表达方式，那么方言之间的差别不会比汉英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小，都是为表达能共同感知的概念义而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总的说来，朱先生对方言语法的研究是重视的，他关于"的"字的研究、反复问句的研究，都运用了许多方言材

料，也带动了大家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对比30年代到80年代的方言研究，已经从语音为主转移到词汇语法为主，因而取得可喜的成绩，（1996年出版的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收了方言语法研究成果505种，其中80年代发表的就超过400篇。1991年后的成果该书未收。）这是汉语方言研究重大进展的标志。

方言语法的研究在80年代之前只是个别语法特点的描述，像张洪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1972）那样的专著是很少见的。进入80年代，单点的较为全面的语法描写多起来了。如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1980）主要就是语法的描写。此外，罗肇锦的《客语语法》(1985）介绍了不少台湾客家方言的语法现象，许宝华、汤珍珠主编的《上海市区方言志》(1988）也用较大篇幅描述了上海话语法，杨秀芳的《台湾闽南语语法稿》(1991）是一部有分量的语法专著。90年代之后，由南到北铺开，方言语法专著多起来了，客家方言有何耿镛（大埔，1993）、林立芳（梅县，1997）和项梦冰（连城，1999）的三本，一本比一本深入；赣语有汪国胜的《大冶方言语法研究》(1994)；晋语有邢向东等的《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1997)。1997～1998年间，单是吴方言语法就有钱乃荣（上海）、李小凡（苏州）和徐烈炯、邵敬敏（上海）的专著三本。有的虽然不是语法专著，却有大量描写语法的篇幅，如客家话的周日健（新丰，1990），粤语的何伟棠（增城，1993）等，闽语的施其生（汕头语1996）、陈泽平（福州语，1998）、周长楫等（厦门话，1998）等，官话有王群生（湖北荆沙，1994），晋语的侯精一（平遥，1999）、乔全生（洪洞，1999）等，都在各自的专著当中有较多的语法研究内容。

近五年间，方言语法的专题比较和区域性方言语法比较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涌现了一批成果，这是方言语法研究纵深发展的另一个标志。1991年之后，一批国内外的中青年学者开展了“中国东南部方言的语法比较”，每隔1～2年开一次会讨论一个专题，把东南各方言的不同表现展示在同一本书里，已经出版的专著有《动词的体》(1996)、《动词谓语句》(1997)、《代词》(1999）和《介词》(2000）等。关于动词的体貌还有胡明扬主编的《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1996)，湖南方言方面则有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1996）和《湖南方言的介词》(1998)。此外，刘纶鑫的《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也有较多的语法比较的内容。这些论著都是集中了一批专家研究母语语法的成果，就某个专题作了细微的描写，所提供的材料比较翔实，为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基础。

二、汉语方言语法的差异不容小看

随着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深入开展，汉语方言之间语法差异不大的观点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怀疑。

参加东南方言语法比较研究课题的学者们在每次讨论之后都对方言语法差异有新的认识。李如龙在为三本论文集所写的前言里反映了大家的这些认识：

“汉语方言的体固然也能概括出一些共同的语法意义，共同的规律，但是各方言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透过这一点，我们体会到，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绝不是微小的，无关紧要的。”（张双庆主编，1996）

“即使在句法方面，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也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相当多，相当大的。所谓多是构成差异的方面多，差异的方式也多，所谓大是不同语法形式跨度大，有些事实是以前很少听说过的。”（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7）

“代词是一个小家庭——为数不多的封闭性词类。一种方言的代词，不必花太多时间就可以穷尽地罗列出来。可是，把东南部各方言的一些抽样的方言点的代词都罗列出来了，还是使人大吃一惊：竟然也有那么大的差别，有那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9）

另一批学者在北京讨论了“汉语方言的体貌”后，其中有的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看法：“汉语方言语法之间的差别不见得比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小。过去的某些结论现在看来值得怀疑。方言之间助词方面的差别远比过去想象的大。”（胡明扬主编，1996，68页）

为什么对汉语方言的语法差异看法如此不同？看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学者用来衡量的标准不同。差别的大小是个相对的概念，方言语法之间必定有同有异，着眼于同或着眼于异，必定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官话之间说，可能语法差异小些，而东南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就大得多。

第二，方言语法研究的深度有变化。以往的研究一般是作者在跟普通话语法比较之后，就自己母语的不同语法现象采取小专题的形式进行探讨分析的。这种注重挖掘方言特殊语法现象的研究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不能尽如人意的是受时代要求的限制，这些文章一般都是把方言中用法不同、结构形式不同的某一语法现象摆完了事，很少联系（受材料限制，一般也很难联系）其他方言做深入的比较研究。这就很难得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结论来。虽然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工作目前还很薄弱，但跟十多年前比起来，毕竟材料已经积累了不少，只要用心一查，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随处可见，除了上文朱德熙先生提到的表处置义的“把”字句以及反复问的表现形式之外，在否定式、比较的表达等许多方面，各方言之间的差别也可以说是存在着重大差异的。

第三，由于共同语语法对方言的影响较大，许多方言在使用原有方言句型的同时还会使用表达同样意思的共同语的句型。例如广州话固有的说法是“我行先”，如今“我先行”的说法也慢慢说开了，如果拿新派的说法和普通话作比较，自然就会得出“差异不大”的结论。

三、汉语方言语法差异的主要表现

那么，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别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从目前所发掘的材料看，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 音变

这里的音变指的是方言中由于表示某种语法功用所引起的语音变化，这些语音变化往往是很有规律的。根据变化的部分可分为变韵、变音和连读变调三类。这种由语法引起的音变在上文讨论方言语音时已经提过，这里再补充一些例子。

变韵最常见的就是官话方言的儿化。如：

盖→盖儿　　　　吹风→吹风儿

“盖”读本韵是个动词，儿化后成了名词，“吹风”是个动宾词组，“吹风儿”是个动词（透露）。

有些官话方言的儿化变韵不像北京话那样在韵母上加卷舌动作，而是加上固定的一些音，如山东淄博话加的是 ε、ei：

很破烂 p'ə l ã→捡破烂p'ɔ lε

不相信ɕi ə̃→捎口信ɕiei

河南获嘉方言是另一种变韵：

刨 pau→木头刨pɔ

挑 t'iau→剃头挑t'iɔ

盖 kai→锅盖kio

提 t'i→油提t'i：ou

有的方言附加某些语法意义后发生的是声调或音长的变化。声调变音最典型的是粤语广州话的部分名词的变调。如：

钳 k'im^{21}→老虎钳 k'im$^{21}_{35}$

夹 kap^{3}→书夹 kap$^{3}_{35}$

睡 søy^{22}→独睡 søy$^{22}_{35}$（单人床）

又如（前者名词作修饰语，后者无此用法）

鸭毛 ap^{3}→烧鸭 ap$^{3}_{35}$

女装 nøy^{23}→靓女 nøy$^{23}_{35}$

鸡蛋糕 tan^{22}→鸡蛋tan$^{22}_{35}$

绿豆沙 tɐu^{22}→绿豆tɐu$^{22}_{35}$

而音长发生变化的可以举武汉话单音节补语延长时值表强调为例：

雪地里白汪［ua：ŋ^{55}］了的（格外白）

盆子里的鱼活鲜［ɕiε：n^{55}］了的（欢蹦乱跳）

被窝里冷冰［pi：n^{55}］了的（极凉）

屋里吵吼［xo：u^{42}］了的（闹哄哄）

饿得［tɤ：^{213}］了（饿极了）

小姑娘秀气流［nio：u^{213}］了（美丽极了）

以上是把变韵、变音分开说的，实际上，不少南方方言在表“小”义时，变音和变韵是同时进行的。典型的如湖北阳新三溪话的名词表“小”音变：

刀［ta^{33}］$_{大的刀}$→［tɐn^{55}］$_{小的刀}$

塘［t'ɔŋ^{21}］$_{大塘}$→［t'ɐŋ^{55}］$_{小塘}$

鸡［tɕi^{33}］$_{大鸡}$→［tɕiɐn^{55}］$_{小鸡仔}$

花［xuɔ^{33}］$_{大朵的花}$→［xu ɐ̃^{55}］$_{小朵的花}$

一块［i^{45} k'uɐ^{33}］$_{一大块}$→［i^{45} k'u ɐ̃^{55}］$_{一小块}$

火钳 [xo^{211} $tɕ'iɐn^{211}$]大火钳→ [xo^{211} $tɕ'in^{55}$]小火钳

姑娘 [ku^{33} $niɔŋ^{21}$]成年女孩→ [ku^{33} nin^{55}]小女孩

这种既变音又变韵的语法表现形式在徽语（如歙县）、吴语（如义乌）以及粤语（如信宜）都发现过不少。

至于连读变调，有的只与调类组合有关而与语法表达格式无关，另一类则是语法表达格式制约的结果。如下列短语由于表达的意思不同或者反映结构关系松紧的不同而在上海话中就往往采用不同的连读变调方式：

想起来 $ɕi\ ã^{34}$ $tɕ'i^{34}$ lE^{23}→

$ɕi\ ã^{33}$ $tɕ'i^{55}$ lE^{21}（动补结构：想起。如"我想起来一桩事体。"）

$ɕi\ ã^{44}$ $tɕ'i^{22}$ lE^{44}（动宾结构：想起床，如"天亮勒，我想起来做生活。"）

拍两张 $p'Aʔ^{55}$ $li\ ã^{23}$ $ts\ ã^{53}$→

$p'Aʔ^{33}$ $li\ ã^{55}$ $ts\ ã^{21}$（照几张，虚数。如"就拍两张算勒。"）

$p'Aʔ^{44}$ $li\ ã^{22}$ $ts\ ã^{44}$（照两张，确数。如"拍两张还是拍三张？"）

炒饭 $ts'ɔ^{34}$ vE^{23}→

$ts'ɔ^{33}$ vE^{44}（名词，如"吃炒饭，不吃菜。"）

$ts'ɔ^{33}$ vE^{44}/$ts'ɔ^{44}$ vE^{23}（动宾结构。如"先炒饭，后炒菜"，后者的组合关系较松，按两种变调规律去读均可。）

东西 $toŋ^{53}$ $ɕi^{53}$→

$toŋ^{55}$ $ɕi^{21}$（物件。如"侬啥个东西！"）

$toŋ^{55}$ $ɕi^{21}$/$toŋ^{44}$ $ɕi^{53}$（方向。如"走路要分清南北东西"，后者的组合关系较松，按广用式、窄用式变调均可。）

2. 构词法

在构词法方面，常见的方言语法差别有重叠、附加、逆序和"形＋量"结构这四项。

（1）重叠

重叠构词法主要指的是名词的重叠构词。普通话采用重叠形式构成的名词只限于部分亲属称谓和少数物名，例如"妈妈、哥哥、姐姐、爷爷、猩猩"等，范围比较小，能产性不强。但在西北官话、西南官话以及晋语的许多地方，采用重叠形式构成的名词很多，而且也不限于AA这种形式。以青海方言为例，有很多以AA形式构成的名词，A可以是名词性语素，也可以是动词、形容词甚至量词语素。如：

名词性语素：房房（房子）、勺勺（勺子）、馆馆（饭馆）、浆浆（浆糊）、水水（汁水）、墙墙（墙）、牛牛（牛）、庙庙（庙）、驴驴（驴）

动词性语素：塞塞（塞儿）、夹夹（夹子）、盖盖（盖子）、耍耍（玩具）、垫垫（垫儿）

形容性语素：弯弯（弯儿）、尖尖（尖儿）、空空（空子）、乱乱（乱子）

量词性语素：对对（对联）、伙伙（同伙）、朵朵（朵儿）、颗颗（颗粒）

西南官话的贵阳话有：

缸缸（茶缸）、水水（水儿）、气气（味儿）、圆圆（圆形物）、坎坎（台阶）、嘴嘴（嘴巴）

晋语的祁县话则有：

大大（大姐）、红红（红颜料）、猴猴（较小者）、刷刷（刷子）、吃吃（吃的）、蛛蛛（蜘蛛）

除了 AA 式外，有不少方言还以 ABB 或者 AAB 的形式来构成复合性名词。ABB 式的如兰州话：

烟嘴嘴（烟嘴儿）　　麦苗苗（麦苗儿）
柴棍棍（柴棍儿）　　冰棒棒（冰棒儿）
铁铲铲（铁铲儿）　　酒盅盅（酒盅儿）

AAB 式的如陕西西安话：

筒筒茶（筒装茶叶）　　瓶瓶酒（瓶装酒）
芽芽马（蚂蚁）　　笼笼肉（粉蒸肉）

值得一提的是，AA 式名词在南方的粤语、客家话以及闽南话中极少见，但在吴语上海话以及闽语福州话中却很常见。

（2）附加

利用附加的方式来构词在南北诸方言中都有，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具体的附加成分不同这上面。以词头“阿”和词尾“们”字为例。地道的北京话中似乎没有使用“阿”的习惯，但在南方的吴语上海话，闽语厦门话以及粤语广州话中都用得很普遍（福州话用“依”，用法相同）。而词尾“们”用来表示多数，主要通行在官话方言区，南方方言口语中一般不使用“们”。如上海话用“笃”：俚笃（他们）、朋友笃（朋友们）。广州话用“哋”：我哋（我们）、你哋（你们）。梅县话用“兜”：倨兜（我们）、你兜（你们），等等不一而足。

名词词尾“子”和“头”南北方言大多都有，但是使用频度及分布不同。吴、赣、湘语不少双音词后面加子尾，如上海话的“今朝子、明朝子、昨日子、学生子”，南昌话的“涎围子、麻雀子、驼背子”，双峰话的“老鼠子、老鸦子、蚂蚁子”。粤语的“仔”读作 tsai35，应该和“崽”同源，可能是“子”的古读。闽语的“仔”则是“囝”（九件切）的弱化，闽语的“囝”尾是其他汉语方言所少见的。“头”作词尾更多见于吴语，例如上海话的“鼻头（鼻子）、绢头（手帕）、被头（被子）、夜头（晚上）、角落头（角落上）、门口头（门口）、早晨头”。

（3）其他

表示动物性别的语素后置，这是湘、赣、客、粤、闽诸方言的特点。例如：

	长沙	南昌	梅县	广州	厦门
母猪	猪婆	猪婆	猪嫲	猪乸	猪母
公狗	狗公	狗公	狗牯	狗公	狗公

又，量词前面可以加“大、小”用作形容词，这是闽粤客方言的共同特点，如说“大只、细只”，“大条、嫩条”等。例如福州话：

只顶帽野嫩顶。（这顶帽子好小）
只条裤野大条。（这条裤子很大）
只把铁锤团恰嫩，大把其掏来。（这把锤子太小，大的拿来）
大粒其八角，嫩粒其六角。（大的八毛钱，小的六毛）
只种玫瑰花真大菩。（这种玫瑰花朵很大）
大大只其包包带两只。（很大的包儿带两个）

3. 构形法

严格意义上的构形法和构词法在汉语里不容易区分，这里所说的构形法指的只是那些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各类词语以及短语结构的重叠。以下从有关名词量词、形容词和动词三个方面来说明。

（1）名词、量词的重叠

普通话名词、量词的重叠主要是表示数量方面的变化。如“爱护公物，人人有责”“条条大路通北京”中的“人人、条条”指的是“每个人、每一条”的意思，属构形重叠。而昆明话的“人人”指的是画的或制作的小人（如“剪个纸人人”），“片片”指的是“片状物”（如“铁片片”），属构词重叠（详见上文构词法部分）。

有关名词、量词的重叠，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区别首先要分清同样的重叠形式在各个方言当中究竟是属于构词重叠还是属于构形重叠，其次才能在同样的条件下讨论方言之间重叠的差别。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属于构形重叠的名词、量词的重叠，各方言之间确实差别不大。

（2）形容词的重叠

形容词的构形重叠主要表示事物性状程度的改变，南北各地方言都有，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具体的重叠形式上面。如普通话有关形容词的重叠形式有“AA 儿（红红儿）、AABB（干干净净）、ABAB（通红通红）、ABB（黑乎乎）”等形式，上海话则除了有 AABB（实实结结、清清爽爽）、ABAB（蜡黄蜡黄、习嫩习嫩）、ABB（木兴兴、瘦刮刮）这三种重叠形式之外，还有 AAB 这种表示程度有别的格式。如：

血血红/墨墨黑/粉粉碎/呼呼烫/胖胖小

明明叫/急急乎/乌乌能/特特里/慢慢介

而厦门话的单音节形容词除了能重叠成 AA 式之外，还能重叠成 AAA、AAAA、甚至 AAAAA 这样的形式，有强调或特别强调事物的性质状态达到极端的作用。如：

乌乌　$ɔ^{55}_{11}$ $ɔ^{55}$（有些黑）

乌乌乌　$ɔ^{55}_{35}$ $ɔ^{55}_{11}$ $ɔ^{55}$（极黑）

乌乌乌乌　$ɔ^{55}_{35}$ $ɔ^{55}_{35}$ $ɔ^{55}_{11}$ $ɔ^{55}$（极黑极黑）

乌乌乌乌乌　$ɔ^{55}_{35}$ $ɔ^{55}_{35}$ $ɔ^{55}_{35}$ $ɔ^{55}_{11}$ $ɔ^{55}$（黑得没法说）

紧紧　kin^{53}_{55} kin^{53}（较快）

紧紧紧　kin^{53}_{55} kin^{53}_{55} kin^{53}（极快）

紧紧紧紧　kin^{53}_{55} kin^{53}_{55} kin^{53}_{55} kin^{53}（极快极快）

紧紧紧紧紧　kin^{53}_{55} kin^{53}_{55} kin^{53}_{55} kin^{53}_{55} kin^{53}（快得不得了）

如果再考虑到各种各样附加语缀的形式，如 A 里 BC（脏里呱唧）、A 不 BC（白不雌列）等，那么汉语方言里有关形容词的变化形式及其表义的各种差别就相当地令人目不暇接了。

（3）动词的重叠

共同语里的动词重叠一般指像“看看、想想、唱唱歌、道道歉、推了一推”这样的动词变化形式。这些变化形式主要表达量小时短、尝试一下的意思，在语气上往往起着缓和语气的作用（比较：你教教我！/你教我！）。但在方言中，类似动词重叠的变化形式无论其语义特征还

是语用表现，都远较共同语复杂。这儿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安徽霍丘话动词重叠表达的意思相当于共同语的“正V着”，一般用来交代某一事件发生时的前发事件。如：

（他）（正在）吃吃，没菜了。/他正在吃的时候，没有菜了。

（他）（正）担心担心，那边火又着了。/他正在担心的时候，那边火又着了起来。

武汉话动词重叠表多量，且单一动词重叠就能完句。如：眼睛眨眨神。（眼睛眨个不停的样子）/走起路来扭扭神。（走起路来不停地扭动腰肢的模样）。河南洛阳话动词重叠的用法甚至更特殊，能用来充当同形动词的状语。如：挨挨儿挨住/守守儿守着/挤挤儿挤住/干干儿干了，等。而福州话的动词重叠能充当名词的修饰语。如：我做做其数都清清楚楚。（我所做的账日都清清楚楚）/嘴吼食食其是什乇？（嘴里吃的是什么？）

显然，这些动词重叠，无论把它放到哪个层面上去跟共同语比较，都很难说两者差别不大。

4. 虚词的使用

虚词及表示语法意义的虚成分的不同，这是方言与方言之间最常见、最细微、也最复杂的差异。由于虚词常跟特定的句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虚词的使用往往也是方言句法特点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全面地罗列方言里不同的虚词及其用法需要大量篇幅，这里只就程度副词、结构助词和介词三方面各举一些差异，以见其一斑。

（1）程度副词

共同语常见的程度副词有：“很、挺、怪、更、最、太、忒、好、真、较、比较、非常、十分、特别、尤其、稍微”等等，其中有些确实是全国通用的，如“最、好、真”等，使用的地域范围都相当广，但是最常用的程度副词在不同的方言却往往有别。相当于普通话的“很”，在长江流域不少地方少用或不用，而用“蛮”。如武汉话“很”只用作补语（香得很），在状语地位只说“蛮”：

心里蛮舒服/房里坐倒蛮多人/利害得蛮狠/蛮香是不是？/他蛮忙，来不了/你说得蛮好/火着得蛮大。

沿着长江，“蛮”的说法还通行于长沙、南昌、南京、扬州、苏州、上海，例如上海话：

搿部电影哪能？蛮好看个。

路是蛮平个，剩怕我只脚痛走勿动。

而在闽语则说“尽”或“野”，在粤语和客家话说“好”，在浙南吴语（如温州）则说“显”，并且置于形容词之后（大显、特显）。

此外，表示“太、过”这一程度义的副词各地使用的情况也差别很大。如东北方言：湖水精浅，不能养鱼。/棉衣精薄，不抗风。/面条精细，容易煮熟。而江西的南昌话用“死”，如：人死懒/脾气死臭/个只箱子死重。与南昌相邻的清江一带以及远在闽南的厦门则用“伤”。如清江话：

盐伤多哩/你伤客气哩/车开得伤快哩

又如厦门话：生伤矮/行伤慢/染伤红，等。

（2）结构助词

共同语的结构助词有“的、得、所”等，其中最常用的是表示领属关系的“的”字，在各地方言中都有相应的表现形式，可比性较高，差别也较大。以它为例很能说明南北方言的重大差别。

官话方言里大体都说“的”，声母也都是 t－，而在东南各方言中，发音上大都以 k－，g－等舌根音开头，显然是另一个字。如上海话的“个 [gəʔ/ɦəʔ]”：

妹妹个房间/学堂个财产/卖菜个/打字个/收旧货个

又如广州话的“嘅 [$kɛ^{33}$]”

呢个系我嘅（这是我的）/我要红嘅

整餸嘅手势（做菜的手艺）/呢度嘅天气（这里的天气）

梁小姐系三点度到嘅（梁小姐是三点左右到的）

而闽语各地则都用“其”。如福州话：

伊都是讲无算其（他总是说话不算数）

伊包包是蓝其（她的包儿是蓝色的）

总款其侬野少（这样的人很少见）

又如厦门话：

遮是你其 [e^{24}] 册（这是你的书）

送你一躯（su^{44}，身躯的合音）水其衫裤（送你一套漂亮的衣服）

海口话的“其”读 [kai^{21}/$kɛ^{21}$]，例如：

即多是我其，许多是伊其。（这些是我的，那些是他的。）

送报纸其无见来。（送报纸的还没看见他来）

酸其我无爱食（酸的我不爱吃）

此外，表示动词的体和态的助词（普通话的“着、了、过”等）在各方言里类别多，差异也大，近几年已发掘了大量材料，这里不再举例。

（3）介词

现代汉语里的介词都是从动词演变来的，大部分介词都还保留着动词的功能，方言资料一般只反映作为介词的情况，相关的动词功能较少涉及。下面以介引对象的介词为例，说明汉语方言在介词使用方面也存在不少差异。

普通话用来介引对象的常用介词有“把、被、叫、让、给”等，与它相对应的介词在方言里也有许多不同。如贵州贵阳话就用“着”字来引进动作行为的施事者，相当于普通话的“被”字。如：耗子着猫猫吃了/碗着他打烂完/着雨淋了。与此相应的在上海话用的是“拨”。如：有几棵大树拨辣台风吹倒脱勒/勿要哇啦哇啦叫，拨人家听见难听哦？而汕头方言则是用表“送、给”义的“分”字或“乞”字完成这一语法功能。如：

伊分（乞）侬拍死（他被人打死）

伊分（乞）我骂好久（他被我骂了好久）

有意思的是，湖北蒲圻话也使用介词“把”，但不是用于介引处置对象，而是与“倒”连用介引施事对象，相当于普通话的“被”。例如：

树叶儿把倒风吹落了。（树叶儿被风吹掉了。）

包嘚把倒狗嘚吃了。（包子让狗子吃了。）

这种来源相同，语法功能却各不相同的现象在方言当中是很普遍的，并不限于虚词使用这

一项。

5. 句法关系的不同

方言句法关系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句式的不同以及语序的不同两个方面。

(1) 句式的不同

以比较句为例。比较句有平比、差比之别，在平比句，各地方言一般都用“A＋连词＋B＋性状词”这一句式。如：

北京：我跟你一般高

广州：我同你一样高

上海：我搭侬一样高

梅县：佢同你一般高

厦门：我合你平平悬

但在差比句中，普通话常用的是“A＋比＋B＋形容词”，而方言中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如：

北京：他比我能干

广州：今日暖过琴日（今天比昨天暖和）/牛大过猪好多（牛比猪大得多）

湖南汝城：病人强过郎中/笋子高过竹

山东平度：这个好起那个

梅县：今晡日比秋晡日过冷（今天比昨天冷）

厦门：我较［$k'aʔ^{11}_{53}$］矮伊（我比他矮）/我重伊五斤（我比他重五斤）

表达是非问的疑问句，普通话一般分为三种：一是单用上扬语调来表达，如“今天星期天？”二是在陈述句后加表疑问的语助词，如“今天是星期天吗？”三是谓语部分肯定与否定相叠构成选择性是非词，如“今天是不是星期天？”在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三种并存，但更多的是使用前面两种，而南方方言则大多使用第三种，并且在具体使用中又往往表现出一些特有句式来。如广州话在利用肯定和否定的方式表疑问的时候，宾语可以放在肯定部分和否定部分的中间。如：

你去学校唔去？（你去不去学校？）

你哋係帮三姑姐搬屋唔係？（你们是不是来帮助三姑姑搬房子？）

而闽南一带在连接肯定与否定部分时会加个表“还是”义的连接词“阿”。如：

厦门：汝有读册阿无？（你有没有念书？）

潮州：汝爱去阿唔？（你要去吗？）

有时候这个“阿”也可以省去。如：

厦门：汝有看见无？（你看见了吗？）

海南闽语可以加的连词是“阿是”。如：

伊［ve^{55}］来无？（他来不来？）

伊［ve^{55}］来阿是无？（他要来还是不来？）

此外，吴语以及西南官话等还存在一种谓语加疑问副词来表疑问的“可＋VP？”句式。如：

苏州：耐阿晓得？（你知道不知道？）

耐看阿好？（你看好不好？）

昆明：你格认得？（你认得不认得？）

这条裙子格漂亮？（这条裙子漂亮不漂亮？）

合肥：你克喜欢看电影？（你喜欢不喜欢看电影？）

他克是你兄弟？（他是不是你弟弟？）

这些跟普通话差别较大的句式，都很有方言特色。

(2) 语序的不同

语序在汉语句子中很重要，一般来说，各地方言的语序相互之间分歧不算很大，一些最基本的语序，如"主语＋谓语＋宾语""定语＋中心语"以及"动＋补"等格式，方言跟共同语都比较一致，但在比较一致之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一致。以下就双宾语位置、状语的位置以及补语的位置等方面来看方言语序有差别的现象。

双宾语的位置：双宾句在共同语中一般是指人宾语放在指物宾语的前面，如"给我一本书"，可是在南方不少方言中，双宾语的位置有时候刚好跟共同语相反。如：

上海：我拨一本书侬（我给你一本书）

丹阳：把点铜钿我（给我点钱）

衡阳：同头得钱你（回头给你钱）

广州：我问句话你（我问你一句话）

梅县：工厂奖五千元佢（工厂奖给他五千元）

厦门：伊两箍银护我（他给我两元钱）

状语的位置：状语在共同语中一般放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如"少说几句/再吃一碗/我先走/很大"等，但在南方方言中往往存在着状语后置的现象。如：

梅县：讲少两句话（少说两句话）

广州：唔该你斟杯茶畀我先（请你先倒一杯茶给我）

长沙：你莫吃净菜，也要扒一口饭（你别净吃菜，饭也要扒一口）

益阳：我打加几下狠的（我狠狠地打了几下）

上海：国庆节到快啦（国庆节快到了）

温州：渠个人好显（他这个人很好）

厦门：汝行事先，我行落尾（你先走，我后走）

有意思的是，由于受藏语的影响，青海话的状语也放在谓词前面，但有时候位置特别的靠前，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如：

我详细没看过（我没详细看过）

上课的时候胡要想（上课的时候别胡想）

相当质量高（质量相当高）

胡都材料多（材料非常多）

补语的位置：在普通话中，如果一个句子的谓语既带补语同时又带宾语，常见的语序是补语在前，宾语在后。如："喝得完这杯酒/喝不完这杯酒"，"抬得动这块石头/抬不动这块石头"等。但在南方不少方言中，更常见的是宾语在前，补语在后。如：

上海：晒其干（晒干它）/打侬勿过（打不过你）
温州：把刀割佢勿落（这把刀割不下它）
长沙：你看那牛背上都放得鸡蛋稳（放稳鸡蛋）
修机子，扭螺丝不动（转不动螺丝）
梅县：装得系多东西落（装得下许多东西）
广州：你睇得佢过？（你睇得过他？）
佢食得肥猪肉多，所以肚屙（他吃多了肥猪肉，所以拉肚子）
你打佢唔过嘅（你打不过他的）
厦门：掠伊会着（抓得到他）/掠伊𫖷着（抓不到他）

带否定词的可能补语句里，否定词的位置在方言里也很多样，例如普通话说的“我说不过他”，在许多方言里不但“不”的用词不同，位置也有不同：

上海话：我讲其勿过
福州话：我讲伊𫖷过
潮州话：我呾伊唔过
建瓯话：我𫖷话得渠过
益阳话：我讲不他过

以上所述只是举例性质。近年来，方言语法的材料发表不少了，但是分类归纳还要假以时日。把不同的几个点的材料集中起来进行归类，也是初学者掌握材料、学习研究方法的一种练习。

思考与练习

一、查阅你所熟悉的方言的语法研究已有些什么成果，写一份读书报告，指出哪些问题还有待研究。

二、就某一虚词或虚语素（如“的、了、把”等）拿几个重要方言点作一番比较，看看方言语法差异有多大。

三、经过调查，列举某一方言点最常用的量词、程度副词和动词的用法，然后综合几个点的材料开展讨论作出分析。

四、举例说明普通话书面语语法对方言语法的影响。

参考文献

赵元任（1926）　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清华学报》3卷2期，865～918页
赵元任（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1977）　通过对比研究语法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袁家骅等（1983）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黄伯荣主编（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出版社
张双庆主编（1996）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出版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7）　动词谓语句　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9）　代词　暨南大学出版社
胡明扬主编（1996）　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第九章　汉语方言语法的描写和比较研究

一、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不容易

研究方言语法最重要的第一步是要弄清方言事实，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作好调查工作。方言语法材料的调查比语音调查、词汇调查都更加困难，尤其是对非官话地区的方言作语法调查更难。从以往的经验看，方言语法调查研究之难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占有语料和例句难

语法研究要从占有语料和例句开始，由于方言缺乏书面语料，要记录大量口语例句，这第一步的工作难度就很大。研究普通话语法有取之不尽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的语料，这是任何方言都不具备的。有的方言虽然也有山歌及地方戏曲的脚本，但往往同日常口语表达有一定的距离，并非理想的语料，人们只能自己动手记录大量故事、对话等材料来建立方言口语语料库。这对研究基础比较好或与普通话语音差别不很大的方言来说不难办到，但若是目标方言的研究基础比较弱并且与共同语语音差别比较大，那么要建立一个稍具规模，比如说三十万字的自然口语语料库，对一个并不以此方言为母语的人来说，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必须从记录最基本的单字音做起，整理同音字表，摸清多音词连读变音规律，否则，缺少这些先行的工作，所记录的语料是经不起推敲的。

2. 把握语言事实难

调查者对所调查的方言缺乏语感，难以把握语言事实。如果说建立口语语料库是纯客观地反映目标方言的一个过程，那么当语料库完成之后，经初步分析，还会发现一些已有语料无法解释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跟踪专题调查，这种专题调查就更是无本可依，而必须靠自己去发掘。一般说来，任何从共同语出发而拟定的调查例句都不易触及问题的实质。

比如共同语“他吃着饭”这句话在广州话中可以有三种说法：

佢食紧饭/佢食开饭/佢食住饭

这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广州话在表动作进行持续的时候，起码有三个动态助词可以使用。至于这三个动态助词之间有何细微区别，光从普通话的“着”字入手，根本就无法揭示方言的特征。进一步从语义特征入手，考察这三个动态助词与不同特征类的动词使用搭配的情况，到头来还是会碰到三个助词都可以跟某一类动词搭配使用的情况（如例句中的“吃”类动词），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只有充分调动自己丰富的母语语用经验，才能体会这三个助词的细微区别（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参看彭小川 1996）。可以说，在认识方言语法形式与意义两者精妙关系

的过程中，内省外证的方法有时确实是一条捷径，非母语者与此无缘。

3. 解决理论、方法问题难

关于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还有许多理论、方法上的问题没解决。这是从方言语法研究的知识来源上讲的。目前的方言语法研究文章，从关注的问题到相关问题的分析阐述，绝大部分可以说是跟在共同语语法研究后面亦步亦趋，谈不上精细严密的科学分析。这在初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但共同语语法的研究毕竟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这中间各种分析方法以及理论主张不可谓少，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今，汉语语法（主要指共同语语法）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各种分析方法以及理论主张纷至沓来，为我们深入理解共同语语法做出了它们各自独特的贡献。然而，这对大多数涉足方言语法研究的学者来说作用不大，这首先是因为许多基本的方言现象还没弄清，难以进行精细严密的研究；其次是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许多方言学者可以说是同时兼顾语音、词汇、语法的，要让他们同时还要熟悉诸多理论主张、掌握各种分析方法、并进而运用于方言语法分析，是很难的，而且很多时候毫无必要。这跟研究者的追求目标有关，而目前的方言语法研究在追求目标方面还很模糊，从历史演变到类型分布一直到具体的某格式、某虚词的使用特点都涉及到，但又都不是很明确地摆出来，这就使得不少研究者在面对诸多热腾腾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时显得无从下手。

二、方言语法的描写

1. 与共同语语法相比较的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的描写

从上面有关理论跟方法的讨论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选择恰当的理论和方法要根据方言原有的研究基础以及本人的学术旨趣来定。个人学术旨趣不容易说清，这里只谈谈方言语法研究初级阶段所涉及到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

只要稍为注意一下，我们可以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后所出现的一些语法分析方法，如层次分析、变换分析以及语义特征分析等，其实在方言语法文章当中鲜有反映。这并不是这些分析方法是错误的，不能用，而是因为许多方言原先的研究基础太弱，还很难涉及到诸如歧义分析等深层问题。由于目前的方言语法文章大多还停留在方言特殊语法现象的找寻上面，通过与普通话的对比进而发现方言语法的特殊现象便成为大多数学者常用的方法。而在问题的分析阐述方面，结构主义仍然是主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结构主义是目前方言语法分析的主流，但这个主流并不是每个方言语法研究者都自觉加人的，应该说大多数是在跟共同语语法的对比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卷入的。只要我们随便翻一下有关方言语法的文章，从术语的使用到语言现象的分析上面，无不烙有共同语语法研究的印记。在初级阶段，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共同语语法的研究当中毕竟凝聚了众多学者的智慧，尤其是在揭示共同语的基本事实方面，老一辈学者运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成果及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在目前的方言语法研究当中仍然有着普遍的借鉴意义。

由于方言语法研究存在着诸多困难以及目前方言语法研究还普遍薄弱，我们还是建议研究

者最好从自己熟悉的方言（母语更好）入手，在跟共同语语法对比当中发现方言特殊的语法现象，然后加以分析和条理化。在这个偏重“内省”的研究过程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

2. 单点方言语法特点的描写应该注意的问题

（1）要特别注意语音和语法语义的关系

方言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是注重口语的研究，在记录词汇和长篇语料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音变现象。对于那些跟语法结构有直接关系的语音变化应该要特别加以留意。有关音变在方言中的表现前面一节已经举了一些例，这里再以厦门话的连读变调为例说明音变与语法结构的关系 。

厦门话的一般连读变调规律是前字变调后字不变调。如：

山西　su ã$^{55}_{11}$ sai^{55}　　银行　gun$^{35}_{11}$ haŋ^{35}

火鸟　he$^{53}_{55}$ tsiau^{53}（多嘴的人）　粪扫　pun$^{21}_{53}$ so^{21}（垃圾）

道路　to$^{11}_{21}$ lɔ^{11}　　督促　tɔk$^{32}_{5}$ ts'iɔk^{32}

列席　liat$^{5}_{32}$ sik^{5}

但是，如果两字之间是主谓关系的词组，那么连读时前字不能变调。如：

花开　hue^{55} k'ui^{55}　　头眩　t'au^{35} hin^{35}

手软　ts'iu^{53} nŋ^{53}　　喙破　ts'ui^{21} p'ua^{21}

地动　te^{11} taŋ^{11}　　日出　lit^{5} ts'ut^{32}

显然，是否连读变调在厦门话中有时具有判别两个字是词还是词组的作用。如：

米绞　bi$^{53}_{55}$ ka^{53}（碾坊）　　糖乌　t'ŋ$^{35}_{11}$ ɔ^{55}（经油热的调料糖）

火烧　he$^{53}_{55}$ sio^{55}（火灾）　　头插　t'au$^{35}_{11}$ ts'aʔ^{32}（玉簪一类装饰品）

这些词字面上看不出来是词还是短语，只有结合它们的连读变调表现才能确定它们不是主谓关系的短语。

此外，有些方言由于要表达某种语法意义会出现衍音的现象。如福州话：

讲　kouŋ^{33}→kiŋ^{21} kouŋ^{24} kouŋ^{32}　（说着说着）

行　kiaŋ^{53}→kiŋ^{21} lu^{32} kiaŋ^{53}　（随便走着）

扫　sau^{213}→si^{21} sau^{53} sau^{213}　（持续不断地扫）

写　sia^{33}→si^{31} lu^{24} sia^{32}　（随便写写）

其中的 kiŋ^{21}和 si^{21}都是为了表示动作行为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断地进行或翻来覆去地进行而衍生的音节，没有很实在的意义。

（2）要注意方言语法形式和意义的关系

共同语语法的研究向来都很注意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方言语法研究也一样应该注意。目前的方言语法研究大多是从跟共同语对比出发的，由于历史渊源的关系，方言语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与共同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联系：或是形式跟意义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或是形式跟意义不大一致的相似关系，或是形式跟意义都不相同的相异关系。属于相异关系的方言语法现象可能并不太多，比较容易发现；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大量似是而非的属于相似关系的方言语法现象。

比如量词当中，广州话的“啖（一～饭：一口饭）、孖（一～油条：一根油条）、督（一～尿：一泡尿）、辘（一～蔗：一节甘蔗）、旧（一～猪肉：一块猪肉）”等几个词，或者共同语不用，或者虽用但意思完全不同，两者在形式跟意义方面属相异关系，很容易被研究者发现。而用作量词的“只”在广州话、普通话都有，但在广州话使用的范围要宽得多。如：

一只狗、一只牛、一只猪、一只牙、一只鸡髀（鸡腿）

一只碗、一只镬、一只筷子、一只船、一只袖子

这就是相似关系。考察这类现象不能只是着眼于两者都把“只”用作量词，而应该进一步比较双方所衡量的范围的差别。这类相似而不相同的语法现象在方言中很普遍，都需要研究者细心理清其中的异同。

（3）要有全面系统的观念

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语法系统随着研究者的观察角度或在同一角度之下随着研究深度的不同面有不同的认识反映，我们这里所主张的不是要方言语法研究者一开始就抱着建立方言语法系统的宏伟目标，而是想提醒大家在拿方言跟共同语作比较时，不要孤立地刻画方言中的某一特殊语法现象，而应该注意到，不论是共同语或方言，各种语法特征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必须从更大的系统上面去考察这些方言差异的特征。

比如“把”字句，如果光看字面形式，南方许多方言中的“把”字意义还很实在，还没虚化到介引受事成分的程度。如果因此而断定本方言没有“把”字句的结论，这就不能算是认真的研究。若能就共同语“把”字句主要表处置这一核心义来考察本方言处置义的表达方式，就有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比如上海话虽然不用“把”字句来表处置义，但可以用“拿”字句。如：

我拿月历挂好辣墙头浪。（我把日历在墙上挂好）

伊拿难做个生活掼拨我。（他把难做的事甩给我干）

不过这种“介—宾—动”的句式在上海话并不常用，常用的是把受事成分提到句首或者动词前面的句式。如：

月历我挂好辣墙头浪。/我月历挂好辣墙头浪。

难做个生活伊掼拨我。/伊难做个生活掼拨我。

如果动词后没有其他成分，通常要接一个类似复指成分的“伊”作结尾，这种用法才是最常见的。如：

搿眼垃圾掼脱伊！（把这些垃圾扔掉！）

搿只鸡杀脱伊。

地板拖拖伊。

只有这样才算是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上海话处置义的方言语法表现。

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考察的范围，就会发现同样的表示处置的介词在福州话中用“将”和“共”，在安义话用“拿”，在梅县方言用“将”和“同”，在屯昌话用“掐”和“牵”，在休宁话老派用“帮”，新派用“把”，等等，除了使用的介词各不相同外，在东南方言中，受事成分提到句首或动词之前和用第三人称来复指处置对象，都有很广泛的分布。例如：

温州话：身份证带身边。（把身份证带在身边）

你饭吃底爻！（你把饭吃了）

门驮渠（把它）关起。（把门关上）

福州话：身份证共伊带身边。（把身份证带在身上）

伊姐被单驮洗了。（姐姐把被单洗了）

广州话：食晒啲饭佢，唔好嘥嘢。（把饭吃完，别浪费）

扫走晒啲烂嘢。（把那些破烂东西扫掉）

连城（客家话）：门去关转来/去门关转来。（去把门关上）

这碗饭食撇佢。（把这碗饭吃了）

碗先洗净来。（先把碗洗干净喽）

有关东南方言的处置句的情形，可参阅李如龙、张双庆主编的《动词谓语句》（1997）。

由此可见，把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紧密联系起来，便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现方言语法的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面考察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的差异时有时还要注意某些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量词“两”在方言中一般都是表示重量的单位（如二两油、三两茶叶等），但有些地方，“两”还可以用来衡量人的“命”，如厦门话：一千银怀值四两命（钱再多，命运不好也枉然）、三两人讲四两话（比喻不自量力，好夸海口）。这些异常的量名搭配只有联系当地的民俗文化心理才能讲清楚。不过，这些由地方文化心理带来的语言形式通常并不具有能产性，不能据此类推方言语法的组合规律，也不能拿这些方言的特殊形式去跟别的规律性的形式相提并论。如广州话的“猪红、猪利、猪润”跟共同语的“雪白、猩红、鹅黄”以及“饼干、肉松”等在构词法上就不具有可比性。

3．单点方言语法描写的一般内容

汉语方言语法该研究的内容很多，凡是和共同语有差别的方言语法现象都需要调查研究。但是如果一开头就面面俱到，就难于避免庞杂，在有限的时间内往往也难以胜任。因此，为了集中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在个人的单点描写中可选取某些方言语法特点进行专题研究，尤其是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汉语语法特点的描写，还可以用来作为纵横两向比较的基础。

从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课题来看，以下六项可以作为单点方言语法考察的重点内容：

（1）重叠式　这是比较有汉语特色的一类语法现象，揭示各种词类的不同的重叠格式及其所表达的语义语用的细微差别，仍然是很值得考察的内容。其中名词的重叠问题比较简单，只要分清构词重叠和构形重叠即可。比较复杂的是形容词和动词的重叠形式及其表义的细微差别，其中形容词的重叠跟方言区的人对事物性状的度的认识区别有关，而动词的重叠目前还很难简单划一地把它跟某一语法意义联系起来。例如官话方言单音动词的重叠往往表示动作的“量少时短”，而在闽南方言则有“量多（悉数）时长（反复）”的语法意义。有时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语法意义共用同一种语法形式这种情况，这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归纳。

（2）量词的使用范围及其差异　普遍使用量词，这也是汉语的特点之一。而在方言中，量词使用也是相当错综复杂的。从个体量词、集体量词到动量词、临时量词，各地使用的情况都有不少差异，需要作详细的调查和系统的分析。分析量词应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各方言中都有一个或一批最常用的量词要列举出来，并列举其使用范围，考察这些量词的语义特征；二是要注意量词单独与名词组合时有没有定指的作用。这种量词兼有指示作用的用法于南方的粤、

闽、吴方言较为常见，有的学者认为与壮侗语有关。

（3）代词　汉语的代词一般分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三类。官话地区的代词相互之间差别较小，而吴语、闽语、粤语以及客赣方言等相互之间差别较大，需要逐个罗列并分别考察其用法如复数式、句法关系等，特别应该注意方言的指示代词有没有近指、中指、远指的“三分”用法。

（4）介词　方言里介词使用的差别也很值得注意。研究介词时除了考察各个介词的用法之外，还要注意各个介词有没有相应的同形动词，因为汉语的介词绝大多数是从动词演变来的。考察介词与同形动词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特别注意从实义动词演变为虚义的介词时，二者之间有无语音上的差异以及句法关系上的差异等，这对于理解汉语实词虚化的规律很有帮助。有些介词在方言中尚未最后形成（只见于受共同语影响的句式中），这就要探寻同样的语法意义在方言固有的语法中是如何表达的，如上文所述的处置式在不少方言中就是用受事前置的句式来表达的。

（5）助词　汉语的助词其实是个大杂类，一般包括结构助词、时态助词和语气助词三类。每一类在方言中的表现都很不一样。助词的分析难度较大，因为助词的意义比介词 、连词等虚词更虚，而作用又很复杂，往往几类纠缠不清。此外，考察助词时还会涉及句法、句型等问题，如谈结构助词时必须要谈到句法的结构关系，谈语气词时要提到句型类别，而分析动态助词时更是非要对方言的时态表达系统有个明确的认识不可。因此，考察方言的助词使用时，最好分成几个专题进行考察。

（6）句型研究　汉语方言的句型除了语序的差异之外，把字句、被字句、比较句、是非问句和反复问句等在方言中的表现都有较大的差异，都需要进行单点的分析考察。由于特定的句型往往表达特定的语义关系，因此考察方言中的句型表现往往是从某一特定的语义关系的表达出发，而不能只是从某一具体句子形式出发。这可以说是汉语方言间句法比较的一条原则和有效手段。

除了以上这些内容外，一些很有方言特点的特殊词语的用法以及语序、语缀等都可以作为单点方言语法分析的重要内容。

在各种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对某一方言点作全面的分析和系统的描写。如上文所述，此类著作已经有了一些，这些著作对于开拓方言语法的研究是可供借鉴的。但总的来说，方言语法的专著数量还是太少，尤其是一些有影响的方言点，如厦门、福州、梅县、南昌、长沙、成都、昆明、太原、武汉、杭州、温州等都很值得作全面的描写。如果这些重要方言点的语法描写全了，那么对于推动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以及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无疑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

建立在与共同语语法比较基础上的单点方言语法的描写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语言事实和语法研究成果，能够加深我们对共同语语法事实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往往限于共时平面上的异同认识，很难避免片面性。为了把方言语法的研究引向深入，很有必要提倡在描写的基础上开展纵横两面的比较研究。

1. 方言语法特点的共时比较研究

单点方言与共同语语法的比较当然也是共时的比较研究，这里说的共时比较研究主要指方言区内的比较研究和多种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一个方言区大体有共同的形成历史，因而在语法上总存在着一定的共同性。但是区内方言又往往有自己的变异，因而也有某些差异。方言语法的共时比较先从一个区入手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也总能说明一些问题。

这种区域性比较目前做得最好的是代词系统的研究。在吴语区，游汝杰于 1995 年发表了《吴语里的人称代词》（《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经过一番比较，该文归纳了吴语第一人称有"我、吾、奴"三类，第二人称有"侬、你、尔"三类，第三人称则都来自"渠"，并对复数式的词尾及各种词头作了梳理。1999 年出版的《代词》一书另有三篇论文是关于吴语代词的区域比较，如：陈忠敏、潘悟云的《论吴语的人称代词》，潘悟云、陶寰的《吴语的指代词》以及钱乃荣的《北部吴语的代词系统》等。这三篇论文对吴语代词的研究可谓深入细致，从字音变化的分析、词源的考证，到语法功能、语法形式的类型和分布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关于吴语第三人称代词是"渠"而不是"伊"成了定论，指示代词中则不但有不分近指远指的"一分"，也有近指、中指、远指的"三分"。这种区域研究已经不单纯是共时平面的比较，而是透过区域比较联系古今变异的专题研究，很值得今后方言语法研究者借鉴。

在《代词》一书中，还有李如龙的《闽南方言的代词》一文，是就各地闽南话的代词所作的比较研究。

此外，值得提出的还有游汝杰的《吴语里的反复问句》。该文对吴语的反复问句不只是罗列事实，而是作了"未然体"与"已然体"的分类，并通过地理分布的考察进行了历史层次的分析，并拿它和闽语的反复问句作了比较。他的结论是三种类型的反复问句中，V－neg 型可追溯到先秦汉语，V－neg－V 形成于两宋之交，F－V（可 Vp）则晚至明代之后才形成。这些不同类型的反复问句在同一个地点共存是普遍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生成了一些混合型的结构。就与外区关系说，浙南吴语的反复问句和闽语同类型，宣州片则与江淮官话同类型（游汝杰，1999）。

不同方言区之间语法特点的比较研究只能就某个专题进行，为了使比较研究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上并且具备说服力，这种专题应该从小处入手，因小见大。在这方面有几篇论文值得推荐。

就共时平面语法描写分析的严密科学性上来说，项梦冰（1988）的《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一文是个比较成功的尝试。关于南方方言常见的"人客、闹热"和"鸡公、鸡婆"一类的复合词，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有学者指出这是"修饰成分后置"的现象，并且认为这是与壮侗语的语法特点有关连。项文经过多种方言事实的比较，论证了此类复合词依然可以解释为偏正结构，"客人"和"人客"的实际含义还略有区别，不论是并列式、偏正式、主谓式和述宾式都不应该看成"修饰语后置"。对于上古汉语和北方方言没有这种"正偏式"构词，文中也提出了驳议。最近丁邦新在《方言》杂志发表的《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一文也表示了赞同的意见。

在 2000 年东南方言比较研究的武夷山会议上李如龙发表了《东南方言人称代词比较研

究》，刘丹青发表了《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也是打通方言区界线进行的语法特点比较研究。前者在吴语、闽语区域比较的基础上就东南诸方言的人称代词作了类型的归纳，从而总结了东南方言人称代词的特点，从一个侧面考察了东南诸方言之间的关系，并对汉语人称代词的“数”的范畴和“格”的范畴提出质疑。而《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则是一篇立意很高的跨方言、跨地域的方言语法比较论文。该文不满足于现有的在普通话研究中所形成发展的语法理论框架，而是试图以语序类型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为背景，把语序理论、话题理论和语法化理论结合起来，在古今汉语以及若干方言语言事实比较的基础上，尝试用新的路子来进行汉语方言语序类型的比较研究，观察的角度和所得出的结论都很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该文主要围绕汉语小句结构的基本语序类型究竟是什么来展开讨论，指出汉语历史上虽然曾存在过两种有明确句法条件的 SOV 句式（疑问代词做宾语前置和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如《论语·子罕》“吾谁欺，欺天乎？”和《诗经·硕鼠》“三岁贯汝，莫我肯顾”），但秦汉以后，汉语更加一致稳定的句子模式是 SVO 型。针对海外学者常把中古以后出现的“将”字句、“把”字句当作汉语中 SOV 句式的作法，作者承认，有处置式的汉语至少不是典型的 SVO 型语言。而对于一些学者把汉语受事成分提前的句子（如“衣服我洗干净了/我衣服洗干净了”等）处理成 SOV 型句子的作法，作者却并不赞成。经过一番斟酌，作者认为可能有这样一种可能，即 SVO 型语言优先选择受事充当话题，这个话题占据的主要是次话题的位置，也就是施事成分与动词之间的位置。这种话题的语法化，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真的 SOV 型语言。验之于汉语方言，有些方言如吴语、闽语等，的确已经出现了这种由话题化引发的语序演变的迹象，但是还没有一种方言真正完成了这一过程。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之下，作者认为吴语、闽语的语序类型是从次话题优先到 SOV 萌芽的类型，尤其是浙江的吴语，它动词后的宾语位置已经越来越萎缩，能容纳的受事成分已经越来越少，而次话题的位置却越来越发达，能容纳更多的话题性不强的成分。如温州方言：

渠一篇文章写完罢。（他写完一篇文章了）

显然，这是向 SOV 语言发展的萌芽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视野中，粤语相对来说可能是最典型的 SVO 类型的方言，有更多的与 VO 类型语序和谐的结构，比如差比句用“形容词 + 标记 + 基准”结构（你肥过我）、动词的常用修饰语后置现象最多（行先/讲多/揼一条添/食晒啲饭）、类似“核心 + 定语”式的复合词也最多（如“鸡乸、狗公、人客、肉碎”等）。这些都是和 SVO 语言特征相一致的右分枝顺行结构。

看来，长期以来我们对南方方言诸多后置成分的热衷关注显得有点少见多怪了，因为照这种语序理论看来，这些所谓的“后置成分”本来就是 SVO 型语言和谐共生的现象，而汉语在历史上毕竟是以 SVO 型为主流的语言。恐怕真正应该让我们多加思忖的倒是那些习以为常的“定语 + 中心语”的名词结构和“状语 + 谓语”的语序组合，因为这些结构组合跟已知的 SVO 型语言的语序太不和谐一致了。

2. 方言语法特点的历史比较研究

由于现代汉语方言与历代移民的播迁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汉语史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些语法特点往往会随着移民的流动而保存在一些方言之中。拿方言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比较，

往往能够让我们看清一些方言语法特点在汉语史上的继承关系，有助于整体把握汉语语法史的发展规律。

反映方言语法直接继承古汉语的例子可举词头“阿”的方言存留为例。据王力先生的研究，词头“阿”在上古末期就已经产生，用作人名词头的有曹操的小字“阿瞒”、刘禅的小字“阿斗”等，而用作亲属称呼的词头有如下面几个例子：

阿翁讵宜以子戏父？（《世说新语·排调》）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诗》）

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南史·齐本记下·废帝郁林王记》）

这两种用法的“阿”现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了，但在南方不少方言都还保存着。如上海话的“阿哥、阿奶（祖母）、阿舅、阿侄、阿伯”以及对“王福根”这个人的昵称“阿福、阿根、阿福根”等，都是直接从上古继承而来。广州话、厦门话跟上海话一样，都继承了上古词头“阿”，并在继承的基础上略有发展变化，如可用在数词前面表示排行（如阿三、阿二等）。广州话甚至可以加到姓氏前面来使用，如“阿陈老陈、阿黄老黄、阿老陈老陈、阿老李老李”等。

实际上，像词头“阿”这样一目了然的例子是很少的。由于方言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即使继承了古汉语的某一语法特征，这个特征往往也是以变化了的面貌出现，因此在把方言跟古汉语进行比较的时候，研究者对方言的语法现象要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把握住现象背后比较稳定的方言语法规律，这样才能获得确实可靠的比较基础。此外，由于历史上文献资料繁多，研究语法史的学者一般也不会同时了解方言研究者们的学术需要，因此，在把方言跟古汉语进行比较的时候，方言学者往往还要综合语法史的研究成果，必要的时候还要亲自对原始语料进行归纳分析。

下文再以探讨福州话完成貌助词“去”的历史渊源为例，说明方言语法特点在进行历时比较时的一般做法（详见陈泽平 1992、1998 相关论著）。

福州话里这个表示状态变化实现的助词陈文写作“咯”，总是粘附在动词和形容词后面，读轻声，语音变化的形式跟复合趋向动词“上去、落去（下去）、转去（回去）、出去、起去（起来）”中的“去”一样，即前一音节是鼻尾韵时读［ŋɔ］，塞尾韵时读［kɔ］，而元音收尾则读［ɔ］。当它用在静态动词或性质形容词之后时，表示事物的状态或性质发生了变化。如“脸色变咯脸色变了/汝最近肥咯你最近胖了/天晴咯天晴了”。而用在不及物的动态动词之后时，则表示动作行为已经发生或开始，原先静止状态结束，如“火车开咯火车开动了/贼囝走咯小偷儿溜了/伊啼咯她哭了”。

这些用法和所处位置跟共同语表完成的“了”字没有什么两样，真正能体现福州话“咯”字用法的特点是：(1) 趋向补语后面不再加“咯”，共同语的“走了进去/说了出来”等“动词+了+趋向动词”的句式在福州话没有相应的完成体表达方法。(2)“咯”字跟动宾结构不相容，它一般不出现在动宾短语后面，也不能插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即福州话中以助词“咯”构成的完成貌句式只有“动+咯”，没有“动+咯+宾”。这跟“了”字的分布不一样，是考察问题的关键。

由语音的变化形式我们可以推断，福州话的“咯”可能就是“去”，但也可能是别的声母为舌根音的字，例如“却”。但经过仔细分析，中古的助词“去”和“却”由于来历不同，它们在句式的分布上有差别。“却”是从表示动作对象被“去除”的实词义虚化而来的，所以即

使虚化成助词之后也仍主要用于及物动词之后，构成“动＋却＋宾”的格式。而“去”却是从作补语的趋向动词虚化而来的，所以主要是用在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后面，构成“动（形）＋去”的格式，后面不能带宾语。比较下面两对例句：

老去诗篇浑漫兴（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篱边老却陶潜菊（杜甫《秋尽》）

死去原知万事空（陆游《示儿》）
一句子死却天下人（《祖堂集》87页，台北广文书局）

同是“老、死”两个词，作为不及物动词时后加“去”，而在使动用法中则用“却”，同时后面带宾语。

显然，中古助词“却”不是福州话“咯”的直接来源，而“去”字，则无论语音还是语义用法，都跟今天福州话的助词“咯”如铸一模：语音表现形式两者一样，加在动词形容词后面都表示“完成”这一意思，句式分布上两者后面不能带宾语。此外，趋向补语后面不能加助词“咯”，显然是因为“咯”本来就是由趋向动词“去”虚化而来。

其实，如果联系福州话的姐妹方言——闽南话来看，这个“咯”在闽南还保留着完整的“去”的读音 khi^5，写法上也习惯于用“去”。可见，方言语法的历时比较也离不开共时比较，并且应该以共时的比较为基础。

据曹广顺（1995）研究，“去”也是近代汉语中较为活跃的一个事态助词，它的功能，“主要是指明事物或状态已经或将要发生某种变化，与事态助词‘了’的作用相近”。这个“去”“在唐以前的文献中尚未出现过。从唐代起，文献中开始起用。但在不同类别的文献中分布不均。史籍、笔记小说中没有出现典型的例子。唐诗中可见，但为数不多。……使用……最多的文献当数禅宗语录。”（据他统计，《祖堂集》出现76例）到宋代，助词“去”继续使用，但并无扩大趋势，元以后少见，至明代仅为残迹。闽语各区普遍用“去”作助词，反映的正是唐宋时代的口语。由此可见，方言语法的历时比较对于理解方言的历史层次是有重要意义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闽语用作连词和介词的“共”字和用作介词的“乞”字。不论闽东闽南，以下的句式都很常见到：

无管横共直都着去（不管是和非，都得去）
我共伊讲过了（我同他讲过了）
鸡角乞我搦着了（小公鸡被我抓到了）

前一句“共”用作连词，后两句的“共”和“乞”用作介词。

这两种用法也都见于中古汉语，据刘坚等的研究（1992），它们始见于六朝，至元末明初尚有尾声：

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颜氏家训）
过去有人，共多人众坐于屋中（百喻经）
共相公使人到客店，勘录金成随身物（入唐求法巡礼行纪）
我也不共汝争（调风月）
到此怎惜我贞共孝（董西厢）
乞他大爹再三央陪他坐坐儿（金瓶梅）

这和上述的助词“去”一样反映的也是闽语虚词和中古汉语的关系。

3. 方言语法的跨语言比较研究

方言语法的跨语言比较研究是在更加广阔的语言背景之下对汉语方言的语法现象进行观照，这种观照可以从三个相关的角度进行。

一是把我们所知道的汉语方言语法的特殊现象拿来跟别的语言作比较，看看别的语言中有没有相同的语法现象。这种比较的结果往往让我们看到方言的语法特点其实一点也不“特”，在别的语言当中也有。例如厦门话中有方位名词重叠表极处的意思，如：

徛伫边边（站在最边上）

排伫头头（排在最前头的地方）

放尾尾（放在最末端的地方）

伊坐伫中中（他坐在最正中的地方）

跟共同语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比起来，这种用法应该算是厦门话的一个特点。不过，这一特点也见于壮语。例如（加点的为方位词）：

hwnj　gwnz　gwnz　bae　（到最高一层去）
上　上　上　去

ok　rog　rog　ba　（到最外的地方去）
出　外　外　去

roengz　laj　laj　bae　（到最下面去）
下　下　下　去

haeuj　ndaw　ndaw　bae　（进最里头去）
进　里　里　去

这种雷同究竟是一种“底层”现象还是语言接触的渗透，还是类型上的相似，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次是就其他语言的语法现象来观照汉语方言的语法现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见，马庆株曾从藏语动词有自主与非自主这两大语义特征得到启发并成功地运用到汉语动词研究中来，由此看来，只要研究继续深入下去，这种由外及里的观照应该也是一条有效的研究途径。

最后是忽略语言的特性，把汉语方言放到已知的所有语言当中加以考察。这实际上是从类型学的角度来分析汉语方言与其他语言共同的一些语法现象。这种考察往往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汉语方言的语法事实。比如汉语方言中的重叠现象，这是方言学界研究得最为深入的一个课题，但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侧重方言当中具体的重叠格式，而对各种重叠格式的语义特征着墨并不多，从类型学的角度将汉语各方言的重叠式跟其他不同语言的重叠式进行比较的研究那就更少了。张敏（1997）拓宽比较范围，把汉语方言的重叠现象放到更大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在分布范围上，重叠现象不仅出现在汉藏语系诸语言里，也出现在与汉语无系属关系的邻近语言如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诸语言以及日语里，甚至远离中国的乌拉尔语系、闪含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等等也都有所反映，而在表义特征上，各种语言的重叠式经常负载的显著特征是“量的增加”，汉语方言的重叠现象无论其内部差异如何大，其实都没有超出已知的其他语言的重叠现象。显然，要想深入地理解方言中的重叠现象，光从汉语内部去比较还不够，还必须把它放到更大的背景中从类型学的角度去加以把握。

以上从历时、共时和跨语言三个方面谈了汉语方言语法深入比较研究的三种常见作法，这三种研究法可以独立进行，也可综合运用，这要看解决问题的需要。

4. 关于方言语法研究追求的目标

最近十多年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是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但这只是相对于过去来说的。跟方言语音的研究比起来，方言语法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表现在：（1）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分析还不够细致深入，缺乏系统的观念，大多数方言语法文章只注重于挖掘与共同语语法不同的某些语法特点；（2）研究范围和视野还不够宽广，许多有代表性的方言点可供参考的语法专著、语法论文还相当有限；（3）研究队伍还不够壮大，具备语法学良好素养的方言研究者并不多。这种局面跟汉语方言分布广、品种多、差异大的客观情况相比，实在是很不相称的。在这种情况下，把方言语法研究的目标定为理论上的探讨，显得有点奢谈。以下仅对此谈点感性的思考。

方言语法研究追求的目标虽说是因人而异，但总的说来，共时的地域分布以及历时的演变途径仍应是大家共同着力探讨的重要课题。

关于共时的地域分布。跟语音特点的探讨一样，方言语法特点的挖掘其实就是直接揭示不同语法形式或相同语法形式的不同用法在地域上的分布情况。所不同者，语音特点除了跟共同语标准音作对比之外，还有个《切韵》音系作为参照物，而语法特点则大多是相对于共同语语法来说的。因此，方言语法特点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相同的语义关系在不同方言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语法形式的表现，若没有专门的语法史研究作背景，这种从共时比较得出的语法特点一般不大容易说清它的历史演变过程。

由于方言语法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目前还很难利用方言语法特点的分布情况来给汉语方言进行分区。《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汉语方言分区这一部分采用的标准主要是语音，有时候也用到一些词汇特点。如“江西省与湖南省的汉语方言”一节中谈到客家话主要特点是：“我”说“俚”，“我的”说“俚个”，“吃饭、喝茶”说“食饭、食茶”，“是”说“係”等。这里虽然也涉及到一些语法现象，如表领属的结构助词用“个”，系动词用“係”。但主要还是属于词汇标准，而非语法标准。尽管这样，利用语法特点的分布情况来给汉语方言进行分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还是值得一试的。

至于语法特点历时演变途径的探讨，这方面的尝试比较多，成果也很显著。比如朱德熙先生的《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1980）一文，对共同语“的”字的历史，就追到了唐宋时代的“底”和“地”。又如梅祖麟先生的《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1989）一文，也对古代汉语中的“著”在方言中的演变情况从音韵学上进行了一番探讨。不过，对于数目众多分歧严重的现代汉语方言来说，这类侧重勾勒历史演变过程的文章还嫌太少，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方言语法特点的形成过程依然是十分茫然的。

在诸多探讨方言语法特点的文章当中，有两种作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的地理分布，并尝试用语言接触来理解汉语方言语法特点的形成过程。这方面比较著名的是日本的桥本万太郎先生，他在《语言地理类型学》（1985）一书中，就尝试着从语言接触这一角度来理解汉语南北方言语法的差异现象，很能开阔我们的视野。而游汝杰先生的《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1982）则从历史比较法等角度来分析南方方

言以及台语中与量词有关的结构模式，对我们理解方言中量词使用的特殊性也大有帮助。

二是从人类的一般认知角度来理解方言之间语法现象的共性和特性。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还很少，成果也还不显著。但从戴浩一、谢信一以及张敏等人对汉语语法的开创性研究来看，从认知角度来理解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现象应该是一条触及很深的研究道路，值得方言语法研究者学习借鉴并结合到具体的研究工作当中。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汉语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异，其实就是不同地方的人在认识事物过程中具体的概念化途径的不同。这些都需要我们去大胆尝试，并认真加以求证。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发展，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追求的目标应该是多样的、有变化的，而不是只限于目前所看到的种种作法。但今后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今天的研究，这是可以肯定的。

思考与练习

一、搜集各种方言语法的调查表格，权衡其优劣，谈谈方言语法材料应如何收集。

二、描写方言语法特点时应注意些什么？

三、就已发表的连读变调资料作比较，考察方言语法如何影响多音连读的变调。

四、读一本中古汉语或近代汉语原著（如《世说新语》、《祖堂集》、《唐宋变文集》等），然后同你熟悉的方言作比较，看看方言语法与中古或近代汉语有什么关系。

参考文献

彭小川（1996）　广州话的动态助词“住”　《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1997）　动词谓语句　暨南大学出版社

游汝杰（1995）　吴语里的人称代词　《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1辑）　上海教育出版社

游汝杰（1999）　游汝杰自选集　广西师大出版社

项梦冰（1988）　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　《语言研究》第2期

丁邦新（2000）　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　《方言》第3期

陈泽平（1992）　试论完成貌助词“去”　《中国语文》，第2期

（1998）　福州方言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曹广顺（1995）　近代汉语助词　语文出版社

刘坚等（1992）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张　敏（1997）　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的重叠现象　《国外语言学》，第2期

朱德熙（1980）　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　《方言》第3期

梅祖麟（1989）　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　《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桥本万太郎（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游汝杰（1982）　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　《民族语文》第2期

附注：本章有些具体材料参考了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黄伯荣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1996）和詹伯慧、李如龙等著《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等书，文中未一一注明，特此说明。

第十章　汉语方言与历史文化研究

一、方言研究的新视角

关于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老一辈语言学家罗常培曾有过关注。他 1950 年出版的专著《语言与文化》至今还给人们不少启发。在撰写《临川音系》时他也十分注重联系历史文化来考察方言。最近 20 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注意，已经出了许多论文和多部专著。这是汉语方言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方言是历史现象，它是历史上形成的，并随着社会的演变走出一条自己的演变道路，只有联系社会历史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方言事实。方言又是文化现象，作为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方言反映地域文化是全方位的，也是常年不懈的。透过方言事实，我们可以把地域文化看得更加真切。

在国外，继结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之后，兴起了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这也是从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转到外部联系的研究。事实证明，只有全方位的研究才能透彻地了解所研究的对象，这是人文科学从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中解脱出来，走综合研究之路所得到的经验。

研究方言的内部结构和研究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是补充的关系、兼容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矛盾的关系。本来，事物的特征就是它的内部的结构系统和外部的诸多联系相互制约、相互结合而展现出来的。研究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不但不能抛开传统方言学研究内容系统所得到的成果，相反的还必须时时注意运用这些成果，在内外相互论证的过程中检验这些成果，用新的材料去补充这些成果。

然而，从内部研究方言和从外部研究方言也是有区别的。其一，从思路说，“内部”研究一是调查、记录方言事实，一是从事实的分析比较找出方言自身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而“外部”研究则着意于为这些事实寻求理解和解释。其二，从方法上说，“内部”研究是纯语言学的研究；“外部”研究则是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既要运用语言学的方法，也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献学的方法。

虽然，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早在六十多年前英国语言学家 L.R. 帕默尔在他的《语言学概论》里就有过明确的表达：“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点现在是十分清楚的了。”（帕默尔，1983，139 页）但是，我们对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应该研究哪些内容，如何进行研究还没建立明确的规范，理论上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框架和成系统的术语。这里只能根据一些较为成功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一番大略的介绍。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从宏观方面去考察，看看现存的方言为什么是如此划分、如此发展、如此分布，

这既不是语言内部因素决定的，也不是某个伟人或某些人所规定的，而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所决定的。一是从微观方面去考察，人们不难看到，方言的许多词语既有反映全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观念和习俗的一面，也有反映本地域特有的历史、文化、观念和习俗的一面。以下我们就从这两方面作些分析。

二、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宏观研究

1. 方言的分区分布及方言间的亲疏关系与移民史有直接关系

方言的分化与社会的分裂、人民的迁徙、地理的阻隔、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接触都有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移民的因素。以下举几个实例加以说明。

(1) 江西省的移民和江西方言

江西省历来是移民出入最频繁的地区之一，也是方言品种最多的省份之一，让我们看看这里二者之间的关系。

江西境内有赣、客、吴、徽、闽和官话六种大方言，其中分布最广的是赣方言和客方言。

赣方言分布在赣中和赣北的62个县市，占全省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颜森，1986，以下各方言区分布主要依据此文）。一般认为赣方言形成于汉唐两代，是北方南下移民带来的。有两个数字很能说明这一点。据梁方仲（1980），东汉开始后的一百多年，(2～140）豫章郡的户口从35万激增至166万，翻了4.7倍。另据《元和郡县图志》，唐代后期在全国户口普遍减少的情况下，赣江中游和鄱阳湖地区人口却大增。自开元至元和，饶州从1.4万户增至7万户，洪饶8州虽只增加45 000户，在全国总户数的比重却激增4倍（刘纶鑫等，1999，4页）。加上东晋末年和唐末五代在北人南迁的两次高潮中到那里落户的人口，可以推断赣语在10世纪就形成了。

客方言分布在赣南17个县、赣西北的铜鼓县及其毗邻地区以及中部客赣交界处的一些县市。在详细研究了五个县的居民迁徙史之后，刘纶鑫说："从迁人的移民这一角度来说，客家方言区和赣方言区内的居民的来源是一致的。在迁入江西之前，甚至在进入江西境内之后，根本不存在什么客家人和赣人的区别。""今天江西境内的居民，不论是赣方言区还是客家方言区的居民，大都是历代南迁的移民层层累积的结果。江西中、北部（赣方言区）居民迁入的时间较早，赣南（客家方言区）的居民很多是由赣北、赣中迁来的，或者说其中不少家族是先迁到赣北、赣中，再迁赣南，有一个逐步南迁的过程。"（同上15～16页）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也正因为客赣有相同的移民源流，所以它们之间不论是语音或词汇都有不少共同点，以致至今还有学者认为它们应该归为一个方言区。

吴语区分布在赣东北上饶一带的5个县市。那里是唐代所立的"信州"。上饶本为江东吴国所置的县，玉山则是"证圣元年分常山、须江等县置。乾元元年，自衢州割人信州"（《元和郡县图志》），可见那里本来就是吴地，所谓"吴头楚尾"，这一带正是"吴头"。

官话区分布在赣北的九江、瑞昌和赣南的赣州、信丰等5个县市。前者属江淮官话，后者是西南官话。九江唐宋称江州。公元975年，北宋军灭南唐，翌年，江州陷，宋军屠城数万人（许怀林，1993，240页）。后来，江州与安徽境内的宣州、池州及江宁府等同属江南东路，人

口应是就近从江淮官话区补充的。自太平兴国到崇宁的一百多年间，江州人口又从 2.4 万增到 13.8 万（同上，251 页）。靖康之后，北方先后为金元所统治，北方人口渡江南迁持续了一个半世纪，集中移动达 66 年。移民之多、影响之大是空前绝后的。单是蒙元攻宋之役，南宋下令“江淮清野”，嘉熙元年（1237）“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无虑数十百万”（杜范《清献集》卷 8）。从迁入地说，《鸡肋篇》卷上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江州则是淮南人渡江登陆处。恰好南宋初期因金军及李成等部大肆屠杀，至绍兴 5 年，江州人口“十损七八”。淮南渡江百姓迁入江州自应不在少数（参阅葛剑雄主编，1997，卷 4，332 页）。至南宋末，蒙古人入川屠杀平民，川人顺江东下，从江州进入江西。九江地区的官话应与这几次大移民有关。赣州及信丰的西南官话相传是明代正德年间王守仁到柳州借“狼兵”来镇压农民起义时留下守城的兵士带来的。

徽语区分布在婺源、德兴及景德镇市区。那里与安徽的徽语区毗连，婺源县一直属于徽州府，至 1934 年才划归江西省，那一带属于徽语区是历来如此的。

赣语区有客家话，而赣东北除了客家话，还有闽南话的方言岛，这是明清之间形成的。据曹树基研究（葛剑雄主编，1997）“明代开始并于清代前期大量迁入赣南及赣中山区的闽粤客家人，穿越赣中盆地和赣北平原，进入赣西及赣西北的丘陵山区。清代前期又有为数不少的客家人及闽南人，经闽北迁入赣东北”。该书第 6 卷的第 6 章分析了大量史料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至于赣语在江西境外的分布也完全是不同时期的大批量的移民所带去的。明初洪武大移民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湖广填四川”和“江西填湖广”，这个“南人东移”的流动一直延续到清代。现今湘东沿湘赣边界的十几个县形成了一条赣语的长廊以及鄂东南与江西连界的通城、蒲圻、通山、阳新，咸宁、大冶等 8 县，安徽西南角的望江、东至、宿松、太湖、潜山、岳西等 8 县所通行的赣语（李如龙，1988）应该是那时定型的。当然后来由于和当地的湘语及官话的交融发生了不少变异，以至如今是否还应划归赣方言区，还有些不同看法。福建省西北角的邵武、光泽、建宁原来就与赣东连界，邵武县隋代曾划归临川郡，唐代曾属抚州，那一带武夷山两侧的人看来是频有往来。明永乐间建宁、邵武一带曾屡次发生瘟疫，永乐 17 年，“建宁县张准言：‘建宁、延平二府自永乐以来屡大疫，民死 77 万 460 余口。’”（转引自《中国移民史》第 5 卷，370 页）后来看来是武夷山西边的赣人陆续迁移过来填补，这种长时间小批量的移民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因此邵武一带的闽语已经蜕变为赣语，崇安、建阳一带的闽北方言则受到赣语的重大影响（李如龙，1997）。

(2) 明初的大移民及方言的变迁

在宋末大移民之后，明初洪武年间的大移民也是规模很大，对后来影响很深的移民。据《中国移民史》报告，朱元璋定都南京，老家淮西一带的亲信、旧部、老乡晋京为官的“公侯族属”约有 2 万人。京师驻守士兵按例南地由北人充当，连家属约有 70 万人。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和加强京都建设，还有各地富户工匠也入京定居。明人贝琼曾有《秋思》诗云：“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交誓半淮人。”南京方言彻底变为江淮官话并在全国发生重大影响、成为新的共同语，显然和这次京师大移民有直接的关系。在南方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上文已经提过。在北方，规模最大的移民是山西人移居河北、河南和山东。这是一次官方组织的移民。《明太祖实录》197 卷云：“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每户给钞

20锭，以备家具。”（转引自侯精一，1999，46页）在河北南部的广平、大名二府山西移民达26.5万（葛剑雄主编，1997，242页）。在河南省，怀庆、开封、南阳等府以山西人为主体的移民都占总人口的近半（同上书，264页）。正是这次移民使晋语向山西以东以南扩展。这就是现今晋语的“邯新片”，“包括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共36个市县”。邯郸、临漳、魏县、邢台及林县、鹤壁、获嘉、焦作、辉县、沁阳、济源都在这范围之内（参阅侯精一，1999）。为了加强统治，朱元璋还创立了卫所制度，（5 600人为一卫，1 120人为一所）设世袭军户，家属随军屯田自给，三分屯种，七分操守。卫所的军户都是外地调人。这就使后代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方言岛。例如福建武平县中山镇有赣方言岛，是明洪武24年所建“武平千户所”，35姓军籍主要来自抚州、吉州等地，现在的中山话俗称“军家话”虽然和当地客家话所差无几，还是可以看出赣方言的老底（李如龙等，1995）。在广东东部沿海明代设有碣石卫（陆丰县）、平海千户所（惠东县）、海丰千户所（海丰县），至今那里也留下了一串官话方言岛（俗称军话）：陆丰共有6 000人说军话（包括古埔4 000多人，溪云1 000人，河西区400人等）；海丰县则有2 000多人；惠东县约有1 800多人（李新魁，1994）。在海南岛还有儋州千户所、崖州千户所之设，现今也在一些村庄通行军话（可参阅《海南省志（3)》人口志、方言志、宗教志）。

（3）闽语莆仙话和潮、雷、琼闽语的关系

这里还可以提供两条语言事实与移民史相论证的材料。两宋期间，“由于人稠地狭问题最为严重，福建遂成为宋代对外移民开始较早的地区，并是迁出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葛剑雄主编，1997，169页）。长江以南的5个“路”之中，福建路的户均田亩数最少，只有11.2亩，是平均数的36%。南宋初曾丰说“闽地褊，不足以衣食之地，于是蔽而之四方”。迁出的去向主要是广东沿海，从粤东的潮汕海陆丰到雷州及琼州。祝穆《方舆纪胜》说到潮州时云：“虽境土有闽广之异，而风俗无潮漳之分”；王象之《舆地纪胜》则说“土俗熙熙，有广南福建之语”，说到“南恩州”时又说：“民庶侨居杂处，多瓯闽之人”，“化州以典质为业者十户，而闽人居其九”。《琼台志·风俗》云：“赵宋以来，闽越江广之人仕、商流寓于此者，子孙多能收家谱是徽。”据司徒尚纪（1990）研究，大姓符氏是福建人人琼抚黎所传，邱氏原居莆田，随抗元军入琼，崖县孙氏先祖也是莆田人，蔡氏原籍仙游宋代迁人。许多年来，我走遍潮汕平原及雷州、琼州，关于“祖先来自莆田”的说法随处都有。后来，我在这些方言的词汇中发现了好几条方言词和莆田、仙游的闽语说法相同，而跟泉州、漳州的闽南话不同。例如管桌子叫“床”，从潮汕到雷州、海南均无例外，这是莆仙方言特有的说法，在其他闽语极为少见。又开水说“沸水”，肥肉说“白肉”，是莆仙和雷琼说法相同而漳泉并不说的。又海口称花生为“地生”也是莆、仙的说法而未见于漳、泉（李如龙等，1996）。

2. 方言的分区、分布及相互关系与人文地理的历史关系密切

这里说的人文地理的历史包括地区开发史、聚落方式、行政区划史以及交通状况等方面的内容。方言是地理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地理的因素是受到人的活动的制约的。人文地理的许多因素对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反过来说，要深刻地理解方言事实，就必须联系人文地理的历史背景作考察。

历史上郡县州府的设置往往反映着人们在一定地域的开发。建置的先后也便反映着开发的

先后，反映着方言形成的先后。游汝杰（1993）曾经列出浙南沿江各县建置的朝代说明南部吴语的分片。秦在浙江上游立大末（后来的衢州），东汉立永宁（今温州），这是浙南最早垦发的地方。后来，大末人越乌溪和仙霞岭，开垦松阴溪，东汉末置遂昌、松阳，隋唐又先后置丽水、青田，这便是后来的丽衢片方言。而永宁人则沿海扩张于晋和三国时期，先后立乐清和瑞安，这是温州片方言。过细地比较这些方言的材料，一定可以理出与开发史、行政区划史相一致的历史层次来。

不同方言区片，有的沿江河分布，有的沿海岸线分布，有的沿山分布，各种情况都有它的历史背景。福建境内的闽方言明显地分为五区，五个区的分布一是与江河流域有关，二是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有关（参阅李如龙、陈章太，1985）。

闽东方言，南片为闽江下游，明清的福州府地；北片的太姥山区的霍童区交溪流域，明清的福宁府地，在唐代皆属福州。

闽北方言，属武夷山区东侧的建溪流域，唐宋时期为建州，明清为建宁府地。

闽中方言，位于戴云山与武夷余脉之间，属沙溪流域，明清时期为南剑州境。

莆仙方言，在木兰溪平原，宋时为兴化军，后为兴化府地

闽南方言，隋唐时期先属泉州，后分立漳州，明清泉州府地为晋江流域，是为北片口音；漳州府为九龙江流域，是为南片口音；后起的厦门是泉漳混合口音，台湾音同此，是为东片。

浙南吴语共分 4 个片：台州片分布于永安溪、始丰溪及所会的灵江流域，原为台州府地；婺州片分布于金华江流域，历史上为婺州、金华府；瓯江片分布于乐清湾以南沿海，包括楠溪、瓯江及飞云江三个小流域，历史上是温州府地；处衢片又按瓯江上游及衢江两个水系分为东西两片，大体上相当于历史上的处州和衢州辖地。

至于吴语的北片（太湖片）虽然地跨江浙两省和上海市，因为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临绍平原，境内湖泊星布，黄浦江、大运河、钱塘江、富春江、曹娥江、甬江及繁多的小河网纵横交错，交通便易，早有繁荣的商品经济和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除了杭州因南宋建都百余年深受官话影响之外，多数地区口音相近，数千万人之间大体都可以通话。

客家方言不论在闽西、赣南或在广东各地，大体上都是沿山而居。因而有俗谚称："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先民从中原渡江南下经过鄱阳湖地区时并无与山打交道的经历，他们并非乐于住山、善于治山，而是出于无奈。来到闽西、赣南就只有起伏的丘陵了，入粤之后，平原地区早有先来者，他们也只能在山区栖身。

3. 关于东南方言形成的新思考。

近些年来，关于东南方言的形成及其性质，有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出现这些新观点的原因有三：第一，东南方言同共同语及其基础方言有很大差异，有些差异已经难以用"同源分化"来解释，特别是那些在多种东南方言中并见而与古代汉语差异甚大的事实，人们不能不换一种方式来寻求解释。第二，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提出大量材料证明东南地区在先秦两汉之间并非蛮荒一片，而是有高度文明的。东南方言区的人在体格上含有大量壮侗语族人的特征。第三，拿东南方言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比较，学者们已经找出越来越多的"底层"现象。

90 年代初期，李敬忠提出粤方言常用词中有 20% 属于壮侗语，其方言词与共同语的差异

则超过50％，他的结论是：粤语不应该认为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李敬忠，1994）。

房学嘉在他的1994年出版的《客家源流探奥》一书中提出："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既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而是由古越族残存者的后裔与秦统一中国以来来自中国北部及中部的中原流人互相混化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历史上确曾有过一批南迁客家地区的中原流人，但与当地人相比，其数量任何时候都属少数。客家共同体在形成的过程中，其主体应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房学嘉，1994，2～3页）

邓晓华则认为南方汉语方言来自先秦时代就形成的"一种具有古越语特色的南方汉语"。他说："南方古印纹陶文化各区的分布与现代汉语南方方言的格局是基本相符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南方汉语方言（除客家）分布的地理格局在先秦时期已奠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与北来移民的语言进行交流和融合，逐渐发展为现代南方方言。"（邓晓华，1993）

刘纶鑫在联系江西省的历史并比较了客赣方言之后写道："移民的语言和文化从来就没有占据并取代过江西本地的语言和文化。情况恰恰相反，移民在江西落脚之后，其原有的语言文化逐渐被江西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所同化。尽管移民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给江西原有的客、赣方言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给客、赣方言注入了许多中原汉语的成分。"（刘纶鑫，1999，6页）

潘悟云对于古代中国东南部的语言接触作了这样的描述："这里居住着百越居民，他们很早就与北方的汉族发生接触了。……百越族要学习汉族先进的技术、文化，必须学习汉语，于是在百越社会中就出现了双语现象，百越人互相之间说百越语，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说汉语，不过不是纯正的汉语，在语音、语序上都留有百越的特征，也夹杂着一些百越语词。随着汉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混合语式的汉语中百越成分越来越少。此外，长期的双语现象，使百越语自身也吸收越来越多的汉语成分，百越语与混合语式汉语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最后百越语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混合语式汉语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东南汉语的前身。"他的结论是："汉语的东南方言并不是从北方汉语方言中分化出来，而是古代的百越语在北方汉语的不断影响下，通过语言的混合，旧质不断消亡，新质不断增加而形成的新语言。"（潘悟云，2000）

关于东南方言的这些历史分析虽然都还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尚非定论，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奇谈怪论，是值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的。至少，我们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真的考察：

（1）东南方言中有不少汉代以前的上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的留存，如果说这些成分都是六朝以后南下汉人带来的，为什么当时未南下的汉人反倒把这些特点大量地抛弃呢？显然，汉代以前南方百越人与中原汉人早有往来，这是较好的解释。关于这段史籍中记载未详的民族融合史也许可以用南方方言的上古汉语留存来论证。

（2）东南方言中有不少成分是和上古汉语显然有别的，特别是一些口语中的"有音无字"词，即古字书上未有相应的记录的用词，其中不少已经可以在壮侗语里找到音义相应的说法。这类"底层"词很值得我们的注意，需要作大规模的发掘。

（3）即使是一些古籍（包括《方言》、《集韵》）中有字可征的方言词，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却未发现在中原地区有过用例（如吴语、闽语的谓人为"侬"，闽人呼儿曰"囝"，楚人呼火为"煤"，等等），这些语词也未尝不可作为"底层"考察的对象，拿它们和壮侗语或苗瑶语的用词作比较。

（4）从方法论上说，关于语言的演变和发展，我们不能只有纵向的发生学的思路，只用原

始母语的构拟和谱系树的方法来解释古汉语和现代方言的关系，而必须充分注意语言接触中的横向的渗透作用；我们也不应该坚守"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训条，无视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而应该联系历史文化来考察语言的发展，寻求语言学和相关学科的接轨——相互检验和论证。

诚然，关于这些方面的思考我们也不应当刻意追求新颖而轻易抛弃旧说，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依然要坚持严密的科学性，尤其是分清不同时代发生的历史事实——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及有史以来的远古时代及上古时代，注意语言现象的不同历史层次；分清不同时代里构成方言体系的主体部分和非主体部分；分清语言成分的客观异同和语言归属的主观认同，并努力如实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用石器时代的地下文物的异同、DNA 的异同来论证现今语言的亲缘关系是否跨度太大了？少量的"底层"现象恐怕也不足于推翻语言的整体框架的类属。语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历史形成的，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总之，联系更广泛的历史文化现象来考察汉语方言，学者们的这些新思考是值得欢迎的，是需要引起讨论的。认真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不但有助于汉语方言学及汉语史的研究，还有助于汉藏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不但有助于语言学的发展，也可以为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论据。

三、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的微观研究

从微观方面研究方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主要是方言词语的研究。不是所有的方言词语都能反映方言区的历史文化，例如"三尺布，五寸长"，"他来，我去"，"这个好，那个坏"，这些话并无什么特殊的文化内容。但是或多或少反映文化内容的词语也不在少数。方言词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容有的是全民族共同的，有的则是一定的地域特有的，正像其他方言的词义一样。有时这两方面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纠缠在一起的。

我们把反映历史文化的词语称为"文化词语"。常见的文化词语有四个小类。

1. 风物词语

从古代社会到近代社会，环境对人类生活的制约是很明显的。人们居住在一个地方就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来开展生产活动、设计生活方式。除了少数现代社会里的白领阶层，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可以完全实现国际接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不同地区在这些方面依然有很大的差异。越是保留传统的地方，生活方式越是不同。不论是沿海或沙漠，草原或丘陵，天寒地冻的北国或草木长青的南岛，人们的衣食住行的方式总是那么殊异。于是在居处方面，房舍建筑的各种形式及不同材料和构件、不同施工方式都有各自的名称，关于各种符合本地习惯的主食副食、风味小吃及其制作方式、炊事用具的名称，关于各种服饰、用料、裁制方式和工具的名称，关于各种交通设施、工具及操作方式的名称，真是举不胜举。统而言之，这就是风物词语。

（1）关于自然环境的语词

各地关于地形地貌的名称都很具特色：草原上的敖包，秦晋高原的峪、塬、峁、墚，长江三角洲的泾、浜、漊、溇，福建丘陵地带的垅、垵、坜、坑，许多沿海地区的礁、鼻、沃、

角。此外，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各自就有一批繁多的景物词。哈尔滨冰雪最多，什么冰渣儿、冰脑子（河里初冻的冰）、冰流子（冰锥）、冰层、疙瘩娄子（路上的硬冰）、雪糁子（霰）、雪窠儿（积雪深处）、雨夹雪、鹅毛大雪、棉花套子雪、大片儿雪、冒烟儿雪（暴风雪）、下盐粒子、大烟儿炮、清雪儿、小清雪、冷子（雹）、挂蜡、泡冰排（河中流冰）等等，不一而足；而终年未见冰雪的广州却冰雪不分，管冰叫雪：雪条（冰棍儿）、雪糕（冰激凌）、雪柜（冰箱）、雪水（冰水，又喻指冷天的雨）、雪茸（冰花，刨冰，一种冷食）、雪屐（冰鞋）。

（2）关于居处器用的语词

北方住的是窑洞，睡的是炕，于是就有一整套关于窑洞和炕的名称：以平遥方言为例（侯精一，1995），就有窑儿、窑窑（小墙洞）、闷窑、赤启子窑、明装楼（窑顶房）；盘炕、炕洞子、暖炕头、凉炕头（近火和远火两端）、炕垅（炕沿儿）、炕围子（沿炕的油漆墙壁）、炕角落儿、实炕炕（无烟道处）、脚头（放脚的一端）。福建沿海住的是不见木的石头房子，睡的是各式各样的木床、竹床，关于石头房子和各种石料及不同样式的床铺则有另一套名称，以厦门话为例：石枋（石板）、石条（条石）、石柱、石磉（片状柱下石）、柱珠（柱状柱下石）、石通（石梁）、砛石（天井边沿打平的厚石板）、角石、板棚石、石窗、石级、石壁，眠床，床框（床沿）、床枋、铺枋（床板）、床架、床骹（床腿）、遮风（三面档风板）、踏斗（上床时垫脚儿）、铺仔（简易小床）。周围没有村庄的路上常有凉亭（或称棚子草寮、枋寮、茅厂），江南夏日炎炎，春雨绵绵，村口的木桥桥面上还有遮阳挡雨的屋盖，称为篷桥、厝桥，或桥亭、廊桥。

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旧时全靠长江上的木船，逆水而上非得拉纤。于是有一套关于拉纤的术语。据黄尚军（1996）所列就有：桡工、纤工、滩子、滩工、滩户、滩师、二行（中号纤绳）、飞子（小号纤绳）、掏绳（竹篾编的大绳索）、纤头（头名纤夫）、收纤、放纤、升纤、降纤（按距离及纤路地形调整纤绳）、驾长、太公、大太公、二太公、二篙、杠子、三桡、水划子、提拖、号子工（船上各种角色名称）。而在珠江三角洲的河网地带，早已船只穿梭、车辆横流了，以下各词并非新词语，有的是百年之前就已通行，现在倒是少用了的：电船、电扒（汽艇）、火船（轮船）、座舱（只有座位的客轮）、艔（轮渡船、内河客轮）、横水艔（过渡、小艇）、花尾艔（拖轮带动的客船）、飞翔船（气垫船），巴士、的士、中巴、小巴、直通巴士、市虎（市内汽车）、泥头车（运送沙、石泥的货车）、三脚鸡（三轮汽车）、房车（小轿车）、座驾（私家小车）、电单车、铁马（摩托车）、拖卡、挂接车（拖挂的车厢）、货卡（货车）（参阅麦耘、谭步云，1997）。此外，平原有独轮车（鸡公车），山区有背篓，沿海及内河有各种大小船只，都有自己的一套名称。

由于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项目不同，农时季节各异，耕作方式和所使用的农具也相差很大。南方使用耕牛（又有黄牛、水牛之别），北方使用骡、驴。山区要为田坎劈草。北方农民扎头巾，南方既要戴斗笠防晒，又要穿棕衣挡雨。平原农业运输用马拉车，山区用肩挑、背篓。各方面的方言词差异是可以想见的。

（3）关于饮食和服饰

民以食为天，不同地方的饮食习惯有很大差异，各种食品的名称连同操作方法、所用器具加起来常常都有几百个。温端政、张光明（1995）所编《忻州方言词典》单是各种面食就收了

120多条，其中好些是南方人从未听过的：豆面、山药粉面、混面、片片子面、包皮面、金裹银、流鱼儿、和子面、汤汤子、硬蛋儿、手粑子、切头、白胡子老汉……。而在以大米为主食的福州，则大量是米制食品的名称：饭包、饭巴、茄薯饭、饭饮、饭汤、八果饭、歙饭、氹饭、糗饭、饭粥、糖粥、咸粥、后九粥、米糊、米粉、兴化粉、粉干、馃、菜头馃、白馃、芋馃、糖粿、九重馃、下南馃、菠菠馃、糍、浮油糍、碗糕、软糕、蒙糕、粽、尖尾粽、牛头粽、鼎边糊。

服饰的差异也很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各有不同的体制，现代以来同一个地区更新换代也很快。旧时的"大襟、对襟"，"三寸金莲"所穿用的尖足鞋、裹脚布、布袜等等，都成了文物了。在穿遍了布鞋、胶鞋、皮鞋、塑料鞋之后，人们又回头穿起木屐和草鞋。发式和头饰的花样也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有许多方言名称如不及时调查很快就有可能失传了。

2．习俗词语

记录各地习俗的方言词也是数量繁多的。从四时节日、婚丧喜庆、信仰祭祀、戏曲游乐，到人际交往、行业经营、称谓忌讳等等，不但有仪式、器具、供品的名称，从事有关活动专兼职人员的称谓，也有各种活动动作的动词，还有体现一定常规的谚语、惯用语。例如：

四川的"偷"俗。偷窃是不道德的行为，四川话有谚："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贼名背到老。"然而，据黄尚军调查，四川也确有一种以"偷"来讨吉利的风俗。这种风俗宋人文难简《虏廷事实·放偷》早有记载："虏中每至正月十六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堤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之，方得原物。"此俗至今在四川许多地方依然存在，但可偷的时间地点不同，所偷之物则只是一些不值钱的碗、筷、杯、巾等小东西。

偷新碗：到婚喜之家偷碗，或从洞房中偷走小东西。碗音近"稳"，寓意求稳。

偷泥娃娃、偷红沙、偷蒲团、枣子：未生育妇女为求子嗣，到庙中偷以上诸物，得子后再行答谢。枣子谐音"早子"。

偷瓜、偷月饼：中秋之夜到瓜田偷瓜、吃瓜赏月；或到人丁兴旺之家偷月饼、汤丸。瓜多子，喻多子多福。

偷红灯：正月十五偷大门口红灯，送与无子之家，待得子后送还并以重谢。

偷寿碗、偷肉：古稀老人病故后在丧宴上偷寿碗，或到办红白大事家偷肉一片，亦为求吉利。

饮茶在中国大概已有数千年历史，至少在江南是普遍的习惯。吴方言普遍称白开水为茶，茶水则称"茶叶茶"。在许多方言区，饮茶远不是为解渴，是待客之道，健身之道，治病之方，也是许多礼俗中用来调整人事关系的方法。四川有一种民间习俗叫"吃讲茶"（或称"吃碗茶"）。乡邻有了纠纷，请本地乡贤长辈到茶馆饮茶调停，争执双方先诉说事态，分析案由，老者作出评判后，理亏的"付茶钱"，论个平手的平均分摊茶钱。此外，还有"吃合棕茶"，是不同伙的纤夫互请喝茶，以期途中相助。"吃书茶"是茶馆听书赏曲，听众所付茶款由茶馆及艺人分成收人。这种饮茶成了人际交往的手段（参阅黄尚军，1996）。旧时常有积德老者烧好茶水，在夏日的大树下或凉棚里"奉茶"（或称"官茶"），免费供过往行人饮用。在福建农村

"茶疗"是一般农户的常识。各种常见小疾病都有合用的中草药可以"煎汤"饮服，茶叶制成"旧茶、厚茶、茶饼、神釉、苦茶、咸茶"是居家必备的成药。闽赣交界处则有"擂茶"，把茶叶和适时的青草药配好，和着芝麻、红枣等置于粗制陶钵之中，用截段的油茶树杆手工磨成粉末，而后冲开水饮用，既能解渴又能充饥健身，有时可以边喝边谈以至深夜。在一些山区，婚事过程中，常有用茶来表示情意的规矩：相亲时姑娘出场敬茶，表示允婚，后生如果不满意，即使口再渴，也是绝对不能一口饮下的。婚宴之后，新娘向长辈亲人敬茶，按礼数称呼，长者必须放置红包在茶盘上，否则便是失礼（李如龙，1997）。

在福州，旧时没有文化的人多有以"三把刀"（厨刀、裁缝刀、理发刀）为业的。各地理发匠有不少向福州师傅学手艺，并向师傅学了爱说话、说福州话的习惯。在山西，理发则是长子县的传统职业。尽管地位低下，却也走南闯北得以糊口。学理发一要学磨刀，二要学行话。学了行话才便于同行交往，才能被同行接纳。据侯精一调查，理发行业的行话竟有 200 多条（侯精一，1999）。

关于禁忌和避讳及种种委婉用语，种种称谓中的谦称、尊称、贱称，亲属称谓中的从儿称谓，多年来许多书上都有详细材料，这里不再罗列。

3. 观念词语

（1）反映自然观、宗教观的词语

方言形成于古代社会，由于当时科学尚未昌明，人们对于自然界（包括人类自身）的现象未能正确理解，因而许多方言词就显得很不科学。诸如日食、月食说"天狗食日、天狗食月"，地震说"地牛翻身、地牛转肩"，不少地方都可以听到。古人普遍以为"心之官则思"，因而方言中也充满着用"心、腹"来表示思想的词条。例如：泉州话就说：心神（心思、心血）、心行（心地、品行）、心适（有趣）、清心（灰心、心凉）、软心（软心肠）、激心（伤心）、苦心（伤心），擘腹（烦恼）、糟腹（糟心）、凿腹（厌恶）、腹截（心里骂娘）。

近代社会的舶来品也有不少方言名称是不切合科学实际的。例如明明是烧汽油为动力的汽车（早期还是木炭烧蒸汽作动力的）东北官话称"电车"，于是公路也说"电车道、电道"。热水瓶只是用空气层隔热保温，在闽粤方言也以为与"电"有关，称为"电罐（厦门）、电瓶（泉州）、电筐（永泰）、电壶（梅县）"。

在长期的农业社会里，世世代代的农民适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对于大自然也获得许多科学的认识。各地方言都有大量农谚，包括识天识地的气象谚语和农业耕作的谚语。这些谚语都是千百年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大多内容精辟，节奏明快，声韵铿锵，朗朗上口。这里试举一组流行于汕尾海边渔村的农谚（魏伟新主编，1994）：

六月雷公通海吼，七月雷公抱团走（六月海上打雷风不大，七月则有台风）

六月出红云，劝君媛行船（六月有晚霞兆示台风）

小漏船唔补，大漏饲鱼肚（防微杜渐）

八月鱼头齐（八月常有大渔讯）

乌猪流河兆风台（乌云遮银河兆示台风）

风回南，风台歇（风向转南台风欲止）

巴浪惊风，带鱼惊漏（捕巴浪鱼怕刮风，钓带鱼怕浪）

白露吹东风，风浪好，渔讯丰（白露前后刮东风，预示有好天气，好捕鱼）
耕田惊投墟，读册惊钓鱼（种地怕赶集，读书怕钓鱼，赶集、钓鱼均费时）
海中无鱼三哑贵（三哑为海中一种小鱼）
南汾蚝，青草蚶（海丰县内地名和名产）
春雨足，鱼虾涌（春雨足，有利鱼类繁殖）
冥时落雨日时晴，虾脯曝燋草菜生（夜雨日晴，渔农两旺）
张网师父，牵鱼师仔（师父徒弟有分工）
行船开铺，唔离三步（行船开铺马虎不得）
早雨快晴，晏雨留冥（傍晚下雨往往连夜）
买茶唔买葱，买鱼唔买咸巴浪（葱与巴浪鱼均为低贱物）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宗教。儒家思想是数千年占着统治地位，但并未形成宗教式的信仰。道家、佛家也只是一种聊备一格的信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有另一个神仙、菩萨和鬼神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宗教色彩的，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的希望（来生会更好），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为善而不作恶）。不过中国的民间信仰有许多是真人真事升华的，除了玉皇大帝、阎王爷、海龙王、土地爷之外有更多的关帝爷、张飞庙、岳王庙、妈祖庙（天妃宫）。各地关于这些神祇的名称以及祭拜的礼仪是十分繁琐的。此外还有敬拜祖宗、祭供野鬼、驱赶妖魔鬼怪的种类繁多的节日和活动。我们应该把方言词语的调查和所有这些民间信仰、民俗活动的研究结合起来。

（2）反映社会观、职业观的词语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重整体、轻个体的社会。这种整体大的是国家民族、中的是乡里州县，小的是家族。其中最实际的是基层的用血缘和地缘联结起来的整体。这种社会网络在相当的时期内一直是维持社会生活运作和形成道德规范的基础。各地方言都有一整套方言词语来体现这种网络和规范。例如闽南方言：

爸母兄弟——这是“骨肉至亲”，谚曰“拍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亲堂叔孙——即同宗族亲，“五服之内”都是自家人，必须团结对外，“手指向内屈，拳头向外打”。

亲情五十——即异地姻亲，因为是异地不能永远走下去，因而又有“一代亲，二代表，三代煞了了”的说法。

乌篮血迹——指出生的摇篮地，因为有祖祠及坟山，总是带着几分神圣，因而必须“富贵不离祖”，“叶落归根”。

厝边上下——指的邻居，往常又是宗亲，因而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

乡里头尾——同乡的本家，因“出门相见入门相见”，因而都必须以礼相待。不少地方至今同乡宗亲还是不分年龄，论资排辈以叔侄、姑婶相称，并有“白头孙，坐地叔”的说法。

在生产力低下，资源不足的条件下，用地缘联结起来的本地人，还必须一致对付外地人（宝鸡称“外方人”，绩溪称“外处佬”，上海叫“外帮人”，广州叫“外江佬”，泉州叫“外江仔”，福州称“两个声”，西昌说“外河人”，政和称“外垟人”，台湾说“外位侬”，榆次称“外路家”，大连叫“外场儿人”）。对于外地人还有更带贬义的称呼，江北的叫“侉子”，江南的叫“蛮子”。对于外国民族的，也有一些很不友好的说法了，这是“内圣外王”的传统长期

作用的结果，也与近代以来中国人受西方民族欺侮有关。

如果说，南方人关于域外人的不友好称呼（例如：番仔、番婆、番鬼佬、番妹）还比较少的话，北方话里除了“鬼子、洋鬼子、长毛子”之外，还有更多带“胡”字的贬义词。普通话里“胡闹、胡弄、胡说、胡扯、胡来、胡作非为，胡搅蛮缠、胡言乱语”之类说法就不少了。在各地官话中这类说法更多。例如山东各地“胡说”就有以下说法：胡巴、胡支、胡淘、胡说白道、胡诌野扯，胡支扯吓、胡拉八砍。东北则说：胡抡、胡沁、胡雷、胡勤、胡勒勒、胡扯六拉、胡诌八扯、胡遛八扯。东北还直称土匪为“胡子、胡匪”。

职业观是社会观的组成部分。一定的地域根据自然条件和历史传统的特点总是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草原放牧，山区育林，沿海捕捞，平原种植等等，这是大的格局。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副业、手工业、服务行业等在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地位，从而得到不同的发展。旧时的晋帮、徽帮云集之处是传统商业的繁荣地，上海滩和珠江十三行则是现代化商业的集散地。这些地方对营商者有更多的褒扬。而在像客家地区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无商不奸”的观念是十分浓厚的。各地对经营各种行业的人员有不同的称谓，含不同的褒贬色彩。例如同是“教书先生”，有的方言里流行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谚语，备受敬重；有的地方则是贫穷潦倒、寒酸吝啬的代名词。过去的“刀笔吏、戏子”和当代的“律师”、“歌星、影星”相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

（3）反映人生观、道德观的词语

语言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全方位的。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思想观念都在语言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例如，有“宁可冷清穷，也唔肮脏富”“以道得财，宽心自在”“血汗钱，心里甜”的准则，也有“人无横财不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考察反映思想观念的方言词语一是要抓住那些进人基本词的基本义的词语，一是要看哪些方面的观念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词语中有大量的表现。

各地方言都有“好孩子、好后生”之类的说法，其基本词义体现了人们为后代所制定的道德规范。我们在编《福州方言词典》时曾经为注释“好囝、呆囝”而犯难，如果只简单地对译为“好孩子、坏孩子”是不能反映方言词的特点的。经过调查访问，“好囝”概括为“省俭勤劳之人”，“呆囝”注为“不肖子，流氓、恶棍”。评判是否好青年，最主要的标准是勤俭，无不良嗜好，与之相对则是好逸恶劳，挥霍害人。福州话还有列举“呆囝”劣迹的谚语：“嫖、赌、饮、鸦片、拳头伬，逢症唔辞”，把练武术爱唱曲（伬唱）也列为不正当的事。在粤语里，更为人们所赞赏的是“叻仔、叻女”，重点在于聪明、能干。又如福州话还有一些常用词：“徛紧”是提倡团结对外的，“徛底”（往里站）是提倡谦逊、不要突出个人的，“做家”是提倡勤俭持家的，都是褒义词，这是群体主义的人生哲学。闽南话则有“古道、古意”，是倡导循规蹈矩、随和谦逊，克己待人，与世无争的。这是以古为正，守旧为本的传统观念的表现。为了张扬勤俭之德，对子好吃懒做，挥霍浪费，在闽语中有许多竭尽漫骂之能事的贬义词。福州话称懒人为“定虫”，对贪食之徒则骂为“噇去死，噇尾顿”（噇，《广韵》宅江切：喫貌，《集韵》：食无廉也）。闽南话称懒人为“臭惮、贪惮虫、畏死尸”，骂人贪吃为“重辞生、胀大肚、孝孤”。

经历过无数动乱、分裂割据及其所带来的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求稳怕乱，但求温饱、不图发迹的人生观。各地方言中“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无事便是乐，无病便是福"，"但求保平安，不求添福寿"之类的谚语真是不胜枚举。"安宁"之意，中原官话说"安业"，冀鲁官话说"安生"，胶辽官话说"安耽"，西南官话说"安靖、安逸、安然"，东北官话说"顺当"，许多官话则说"顺序"（北京、聊城、兰州、徐州）。此外，表示"顺当"各地又说"顺溜、顺滩、顺承、顺顺溜溜、顺脑、顺头"等，也都是些常用语。

比平安、稳顺再好一点便是"福气"和"好命"了。各地方言对于福气和好命也一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闽语区，常见的包括以下内容：多子早子，儿孙满堂，人丁兴旺；不必干粗笨的活而过小康生活，身体健康，无病痛之苦（旧时过穷日子难以发胖，一旦肥胖便称为"发福"）；家庭和睦，不必受气。反之便是无福气、福运薄、劳碌命、苦命、命不好。

这类方言词是在数百年前形成的，随着社会生活的演进，人们的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年轻一代，许多人已经不熟悉这些老话的具体含义了。例如"发福"的说法现在少用了，代之而起的是"千金难买老来瘦"。研究这些反映历史文化的方言词语不是为了肯定或颂扬其中所包含的旧思想观念，而是为了了解这些文化词语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考察这些文化词语的内容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异。

反映一定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的成语谚语在各方言里特别多，虽然有些内容大体一致，只有遣词造句的差别；也有一些内容是理解各不相同。在许多不同内容，甚至相反内容的俗谚之中必有被反复强调的主题或家喻户晓的著名条目，这就是方言工作者应该注意研究的内容。例如闽南方言区所说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拍拼"，"敢死提去食，敢拼则会赢"，"一枝草，一点露；壁边草，坦横雨"，（任何生物自有活路）"鸭囝落水身就浮"，"甘愿做牛马，免惊无犁拖"，等等，便是在长期出外谋生，艰苦奋斗中总结出来的人所皆知的自勉自强的口号。

4. 史迹词语

(1) 统式史迹词语

有些史迹词语保留了前代社会生活所经历过的生活制度和习惯。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少历史上的制度和习惯分别保留在不同的地方。"礼失而求诸野"，透过这些方言词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少历史的事实。例如桌子在现代方言中有各种说法，分别反映着不同时代的生活制度。闽西北的建宁、泰宁和邵武一带赣语以及海南岛迈话说"盘儿"，应是上古席地而坐时代的痕迹，当时的桌子只是一块木盘子。但是这种说法未见于古籍，可能是早期方言的创新。后来有些方言叫床（闽语的莆仙话、潮汕话、海南话），合乎汉代的记录。《说文》："床，安身之几坐也。"段注："床之制略同几而庳于几，可坐，故曰安身之几坐，床制同几，故有足有枕。"汉代的"几"往往是长条形的，所以可坐可卧，也可放置杂物，如"琴床"。今山西平遥说的"床床"指的是"小凳子"，山西长治所说的"盘床"则是把萝卜擦成丝的礤床。浙江绍兴诸暨一带的"桌床"指的还是"桌子"（福建尤溪话同此）。至迟在宋代，已经把"几案"称为"卓"了。卓的原义是高（《说文》：高也），后来写为桌。宋史绳祖《学斋佔毕》卷二："盖其席地而坐，不设椅卓，即古之设筵敷席也。"

又如闽语的农作物名称，水稻说"釉"（《集韵》："稻实"），稻谷说"粟"（《说文》："嘉谷实也"，《广韵》："禾子也"），糯米说"秫"（《说文》："稷之粘者"），都保留了早期中原汉语的说法，也说明闽人的先祖种植水稻的经验应是在入闽之前就有了的。然而开山为田，刀耕火

种称为“畬”。畬，《说文》：“三岁治田也”，合《广韵》余诸切。又《广韵》：式车切，“烧榛种田”，闽音 sia 合于后者。看来是南下到丘陵地定居的汉人向原住民学来的耕种方法，今闽南话山坡上的旱地仍说“山畬”，地名中也多有用作通名的。闽西六县带畬字地名则有 138 处（李如龙，1997），如武平有黄畬、蓝畬、坪畬、洋畬等等。“畬”字在唐代就已入诗，如刘禹锡《竹枝词》：“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李商隐《赠田叟》：“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冥传深谷声。”都是描写当时南方地区的农村生活的，可见闽人学会“烧畬”，已有千年历史。今壮侗语大多称丘陵地、旱田为 rai[4]（傣语）或 ɬai[4]（龙州壮语），“畬”可能从壮侗语借用的。闽西直到唐代还有大量壮侗语族的原住民，因而带“畬”字地名在那里最为密集。

（2）特式史迹词语

此类词语指的是某地的自然地理的早期特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后来在方言词语中留存下来了。

保存史迹的词语首先是大量的地名。

有人从十万分之一北京市地图中找到了与树林有关的现存地名 170 多条：松树台、杨树河、榆林、梨园岭、黑枣沟、栗树园、豹沟、鹿叫、豹峪等等。联系史籍所载，宋代北京郊外还有“千里松林”，明末清初则有“松林数百里”，证明这些地名确是早年林区，曾是虎豹出没之地，如今都没有林子了（李宝田，1980）。近年来北京的沙尘暴的频繁出现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据司徒尚纪研究，古时岭南越人尚鬼，盛行“鸡卜”，并有“鸟田助耕”的传说，可能反映了鸟的图腾。粤中因而有不少带“鹤”字的地名：广州有白鹤洞、鹤边、鹤村，番禺有鹤洲、鹤溪、鹤庄，斗门有鹤咀、鹤洲山、鹤兜山，高州有鹤山，怀集有白鹤寨，博罗有鹤田、鹤岭，龙川有鹤市、鹤崖……（司徒尚纪，1994）。

关于秦始皇派遣徐福带领童男童女海上求仙的传说，许多地方都盛行着，山东崂山县有“徐福岛、登瀛村”，江苏赣榆县则有“徐福村、徐福河、徐福社”。这种史实年代久远，加上流传附会之说，已经难以确证。而泉州市内的白司库巷是宋元市舶司的仓库所在处，聚宝街是当年的珠宝市场，车桥头是当年交通要道，土山街则是造东西塔时所筑运大石头的斜坡起点，这些记录昔日繁华景象的地名则并不难考证。至于广州市内的中山路、陵园路、先烈路、执信路与辛亥革命的黄花岗起义有关，更是众所周知的了（李如龙，1998）。

与史迹有关的方言词还有一些常见的风物词。例如福州人爱吃的“光饼、征东饼”相传是当年戚家军平倭时所制干粮传下来的，前者小而微咸，后者大而微甜，中心都有一个穿透的小洞是当年穿线成串的眼儿。云南的“过桥米线”，广东的“沙河粉”也是这类带着故事的风物词。

山东曲阜方言称说话“在理”为“子曰儿”，“诗云子曰”本是书面用语，在这里成了大白话，这话出现在孔夫子的家乡绝非偶然。金华吴语喻称只会说空话说大话、做事不实在的人为“伯嚭”，说的人未必都知道这是三千年前越国太宰的名字传下来的，伯嚭确是一个典型的专说假大空的话、奉迎拍马的投机家，从楚降吴，最后吴破降越，为越地后人贻笑千年，真是恰如其分。

四、方言的文化类型分析

1. 方言的文化特征的考察

方言的文化特征是从语言外部的历史文化的视角所考察的方言特征。语言是一个多面体，对语言应该作多视角的研究。对于有声语言的音响可以从声学的角度研究其特征；对于繁多的词汇可以研究其语义特征；对于语法系统则可研究其结构特征。方言作为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现象，我们也可以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考察其文化特征。正如对于人的研究也是多种视角形成了多种学科：就其血肉之躯可以研究其生理构造、心理活动的特征；作为社会的个体成员，又可以研究人的社会属性及特征，等等。

考察方言的文化特征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福建方言》一书（李如龙，1997）提出了五个方面：

（1）从方言成分的结构关系考察方言的整合力

正如本书上文多次提到过的，许多现代方言都有古方言的源流、原住民语言的底层、有不同历史时代共同语的影响，也有自身的变异和创新。经过历史语言学的分析，人们并不难理解：现存的方言体系中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来源的语言现象的“叠置”（徐通锵，1991）。这种叠置并非杂乱无章的堆砌，也不是机械的叠合，而是一种系统的整合，把许多层次的成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同的方言在这种叠置的过程中表现了不同的整合力。整合力的强弱在语音系统上表现最为明显。整合力强的往往以某一时代的某一语音系统为基础把不同层次的成分折合其中，结构系统比较明晰，与《广韵》系统（诸方言用来比较的中介）的对应比较整齐，字音的例外变读较少。反之，古今音的对应就会繁复杂乱，例外变读多。在各地客家方言中，梅县话的整合力是强的，粤西客话的整合力就弱。不论是全浊声母清化后声调、声母的分化或阳声韵、入声韵的今读，梅县音都与广韵系统对应整齐（袁家骅等，1983），而粤西客话则对应繁复（李如龙等，1999）。在词汇语法方面，整合力差的方言由于兼收并蓄，往往有很多的同义词和同义句型，同一句话有好几种说法，而整合力强的方言就比较单纯。梅县客话和粤西客话之间也不乏这种差异。

整合力强的方言往往出现在人口密集、交通便易、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因为整合力是在频繁的交际中养成的，这样的地区人际交往频繁，一旦方言形成之后容易维持相对的规范；在学校里，师生传授也比较能尊奉已有的规律。在闽语区，东部沿海的福州话、厦门话、汕头话整合力强，西部山区的建瓯话、永安话、龙岩话整合力弱。在吴语区，北片整合力强，南片整合力差。

（2）从方言区的内部关系考察方言的聚合力

任何方言区都是由许多地点方言组成的。同区的方言之间总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然而在不同的方言区，方言之间的关系有很大差异。有的方言区内部差异小，代表点方言的威信高，对区内小方言影响大，整个方言区呈现很强的向心力，人们的方言意识也很浓厚。这种方言区是向心型方言。有的方言区内部差异很大，有时一个县内就有几种互不通话的小方言。区内没有高威信的代表点，没有明显的方言区的观念，人们的方言意识也很薄弱，这种方言是离

心型方言。

方言的聚合力的大小也是历史文化所决定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及其邻近的方言，如果人口没有经过大规模迁移变动，那一带方言往往是向心的。大片平原、水陆交通便利的地区的方言也往往是向心型方言。如果分化的历史不长，尽管地理距离遥远，山川阻隔，也不容易成为离心型方言，例如各地官话就是如此。

方言区的聚合力和整合力是相联系的，整合力是一个个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聚合力是各个语言系统之间的异同关系。整合力强的方言一般地说也有较强的聚合力。因为人口密集、有经济文化中心、异地之间交际频繁，代表点方言对周边小方言辐射力强，不同小方言之间也容易在交际中逐渐磨合，向权威方言靠拢，成为向心型方言。

（3）从方言间的接触（或与共同语的接触）考察方言的竞争力

在漫长的年代里，方言和共同语总是共存并用的。随着时代的演进，方言区的人兼通共同语的越来越多了，在双语并用的过程中，共同语和方言就会相互影响。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不同方言之间的接触也是越来越加频繁，在接触过程中也会相互发生影响。

在语言接触中，谁影响谁，有一个竞争力的问题。

共同语对于方言来说总是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的，但是对于不同的方言，这种影响力也有大小之别。有些方言对共同语的影响不具备竞争力，共同语对这方言的影响是大量的、广泛的、深刻的。近代以来，近江诸方言就是这种情形。北片吴语、赣语、湘语正在迅速地放弃方言的特殊成分，接受共同语的成分。而远江诸方言则对于共同语的影响有所保留，有时还会有反作用的影响。例如粤语的不少新词近年来大有过长江、渡黄河之势。台湾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流行之后，“走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原是闽南话，“享不了”是享用不尽的意思，非闽语区的人似乎也认可了，多少人竟也跟着唱起与共同语意思相反的方言句子。

在方言之间，这种竞争力就更加悬殊了。竞争力强的方言可以以少胜多，闽方言和客方言有些方言岛只有数百人，在四周强势方言包围之下，几百年过去了，还没有消亡或被同化。竞争力相对较弱的方言也可能以多负少。马来西亚境内的华人以说闽语的占大多数，但是近数十年间，原华人之间的通用方言——闽南话逐渐让位给粤语。会说闽语的华人不少学会粤语，兼通粤语，而原粤语区的人却不学闽语（李如龙主编，2000）。

语言接触中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劣势。共同语借助政治的力量和书面标准语的作用对于各种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优势。粤语新词的扩散与改革开放后香港——深圳——珠江三角洲——广州的经济发展有关。客家方言岛的广泛存在则是文化意识起着决定作用。客家形成以来的数百年就是靠着内部的团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宁卖祖宗田，唔卖祖宗言”一直是他们的族规家训。

至于竞争力和整合力、聚合力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整合力、聚合力强的方言，在语言接触中竞争力也比较强。

（4）从方言的社会应用考察方言的活跃度

语言的使用范围是无边的，从个人的思维活动、言语行为到社会的交际生活，内容极为广泛和繁复。自从有了民族共同语，有了外语的使用，即使是竞争力很强的方言也不可能在一切社会生活场合都使用。全国的方言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莫过于香港的粤语了。从日常生活交际到各级各类学校授课、教学活动，从商业交易到戏曲（粤剧）欣赏，从某些报刊专栏到通俗小

说，粤语不但有口头语，也有书面语，不但有通俗语体，也有艺术语体和科学语体（高等学校的各类专业课讲授）。然而官方的文书、报章的新闻、社论以及各类学校的课本，文艺和科学的论著还是大体上用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而在华洋杂处的场合，例如洋行、机场、码头等场合还得使用英语。如果说，在古代社会可能有纯方言的社会交际生活的话，在现代社会里再也找不到了。在最落后的山村，即使是文盲充斥，如今村民们也要看看电视、听听广播，他们也要接触普通话。

不同的方言确有不同的活跃度。有些方言区中小学里还在使用方言授课，干部会上用方言发言，珠江三角洲有些地方还是这种状况。有些方言区则父母与子女之间已经不使用方言，方言交际退缩到老一辈人之间的沟通了。我在闽北做调查时，有些家长告诉我，跟孩子说的话和课本里说的话不同，不利于他们的学习。

方言在现实生活中的活跃度既取决于方言的竞争力，也取决于共同语的普及程度，并与历史传统有关。闽粤方言都是竞争力较强的方言，但是闽语地区读书识字素有拼读国音的传统，普通话普及程度也较高，因而方言活跃度不如粤方言。方言与共同语差异大小也与方言活跃度相关。近江诸方言已经逐渐接近官话方言了，普通话在这些地方很容易被接受，因而人们就没有固守方言的必要，远江诸方言区一般人是听不懂普通话的，即使会听也不甚了了，即使会说也很难达意，因此只要可以使用方言的场合，人们还习惯于说自己的土话。

（5）从方言的演变考察方言的稳定度

从纵向看方言的历史演变便会发现，有的方言变得慢，保存前代语言成分和语言特点多；有的方言则变得快。如上文说过，近江方言是变得快的，远江方言是变得慢的。在许多方言区，大城市的方言变得快，边远农村的方言变得慢。

考察方言演变的快慢最好有早期方言材料做比较，例如明清以来不少方言区编过韵书，上世纪末以来西方教会人士编过不少沿海方言的词典，还有地方文艺家所整理记录的民歌（如吴方言的《山歌》）和戏曲（如闽南的《荔枝记》）。拿这些材料和现代方言作比较可以很确切地了解近数百年间方言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缺乏类似的资料，经过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比较也可以考察不同的方言里保存什么时代的成分多，从而体察其演变的速度。

方言是稳定还是多变，从历史原因说，与居民来源是否稳定有关。多次不同地方来的移民的叠加或更换，方言往往变化快，一次性大批量移民定型、后来又较少社会变动的方言，则往往较为稳定。从现实情况说，周边方言复杂的小方言区、普通话普及地区的方言往往变动大，社会生活自成体系的大方言区，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地区则往往比较稳定。当然，强势方言、向心型方言、整合力强的方言，也有利于稳定；反之，弱势方言、离心型、整合力差的方言，则多属变异型方言。

2.方言文化类型的区分

考察了方言的文化特征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特征划分出两种互相对立的类型。例如根据聚合力的强弱可把方言分为向心型和离心型两类。具体的某一种方言可能是比较典型（极端）的向心或离心，有的则是偏于某一方的中间状态，这就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1）单纯型和驳杂型

整合力强的方言的结构系统往往比较单纯，和古音类的对应比较整齐，虽然也有不同历史

层次之分，但是主次有序，脉络清楚。这类方言还往往有重要的结构上的创新，形成鲜明的方言特色。整合力弱的方言的结构系统则比较杂乱，与古音类对应不整齐，语言的层次不太明朗，在结构上也缺乏创新，少有鲜明的方言特色。前者是单纯型，后者是驳杂型。当然，这里的所谓“单纯”，也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从根本上说，任何方言都有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的叠置，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单纯。

闽方言中，闽东的福州话是单纯型的，闽北的建瓯话则是驳杂型的。就声调说，福州话7调除“浊上作去”，部分常用次浊去声字的白读归阴去之外，少有其他例外。而建瓯话则将浊平字归入上声或阴去，阳去调和阳入调则都包含着古上、去、入三调的字，有些阳声韵字也读入声调，与古音的对应就很不整齐，还有些字调的转移显然是近代以来受普通话或福州话影响而来的。福州话近二百年间生成了整套变声、变韵、变调的规律，形成鲜明的方言特点，而建瓯则全无这些连音变化（李如龙，1990）。

在粤、客、吴方言中，广州话、梅县话、苏州话是单纯型的方言（袁家骅等，1983），而化州话（李健，1996）、长汀话（李如龙，1965）、丹阳话（吕叔湘，1993）是驳杂型的。这些驳杂型方言大多不是方言区的中心方言，而是处于边远地区，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有过别方言的影响。

（2）向心型和离心型

在全国方言之中，聚合力最强、内部差异最小，代表方言最有威信的是官话方言。上文说过，这同它们分化的年代较迟有关。此外，与它的作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的地位也有相当大的关系。因为是基础方言，所以距标准语近，书面的标准语实际上也在影响着它们内部的趋同。在南方方言中，聚合力最强的向心型方言是粤方言。各地粤语或称广州话、广东话、广府话，或称为“白话”。包括桂东南地区在内，各地说白话的人们都知道，从南宁白话到港、澳白话都是同一个方言区，并以模仿广州话的发音和说法为荣。确实，大多数地区的粤语都可以通话，尤其是东片的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内部差异更小。在浙皖交界的旧严州和徽州府，在湘南、粤北，许多小方言之间差异很大，至今还归属不明。包括徽州人在内，人们并没有鲜明的方言区划观念，境内也没有权威方言作为共同的标准。在这样的地方，你问当地人“你们说什么话”，他的回答总是冠以大小地名的“××话”，淳安话、建德话，桂阳话，龙潭墟话……。

在同一个大方言区之内可能有的向心，有的离心。一般说来，方言的中心区是向心的，边远地区不同方言区的交界处是离心的。苏沪杭嘉湖的北片吴语是向心的，浙南的南片吴语是离心的。以梅县话为代表的粤东的客家话是向心的，闽西、赣南一带则是离心的。在向心型的方言片，代表方言也可能因社会生活发生变化，跟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而转移，例如吴语的代表方言从苏州转到上海，闽南话从泉州转为厦门，潮汕闽语从潮州转为汕头。

（3）扩展型和收缩型

在语言接触中竞争力强的方言是扩展型方言。其标志之一是地域的扩展。历史上某一地域原来通行甲方言，后来蜕变为乙方言，例如闽西北角的浦城县北部原应是闽语区，后来蜕变为吴语区；邵武光泽一带原也是闽语区，后来蜕变为赣语区。宋元之后，闽语的中心区转到沿海，西北角闽语在数百年前的竞争力是敌不过吴语和赣语的，当然，吴语区和赣语区的移民不断入住也是重要原因。地域扩展的另一种方式是，随着移民把方言带到区外形成方言岛或方言群岛。若是小批量移民入住到强势方言区，往往放弃自己的母语，使用当地方言。只有竞争力

大的方言区的人移民之后才能保留母语，形成方言岛。泉州一带移民人住闽东北和浙南沿海便是这种情形。许多客方言分布在闽、浙、赣的方言岛也是这样。

方言扩展的另一种标志是拿自己的语言特点影响别人。最明显的是词汇的借用。上文已经列举过，广东省内的三大方言中，粤语词汇影响客家话和闽南话的不少，倒过来的情况却很少见。这就说明粤语对于闽语和客家话来说是竞争力强的扩展型方言。在方言接触的竞争中，有时还可以发现，语音规律和语法也会相互影响。例如闽江上游的沙县话属于闽中方言，其上声变韵显然是受福州话影响的结果（陈章太、李如龙，1991，202 页）。

官话方言自然也是扩展型的方言，在洞庭湖和鄱阳湖及其以东的江南地区，不但官话方言的语言成分大量进人湘语、赣语、徽语和北片吴语，使这些“近江方言”放弃许多原来的方言成分；而且有不少地方就蜕变为官话方言：九江、芜湖、南京是很早就变了的，徽州地区的北片不同地方也已经不通行徽语，吴语西鄙的金坛、溧阳、丹阳等也变得性质难明了（详见《中国语言地图集》B_8 图）。

（4）活跃型和萎缩型

从现实情况看，使用人口越多、范围越大的方言在交际生活中越活跃，因为使用这样的方言可以同更多人的交往，社会效益高。又，农村里的方言比城市方言活跃，这是因为农村里人际交往以本地人为主，城里往往有更多的外地人往来。还有，和共同语差别小的方言也容易具备活跃度，这是因为外方言区的人容易懂。在官话方言中，东北官话与共同语差异最小，东北人不改口人们也都能听懂。西南官话在云贵川三省的广袤地区没有多少差别，本来就流通甚广，加以特殊的语音和词汇不太多，外方言区的人很容易听懂它，因此他们也很喜欢用自己的母语和外人交谈。

如果是离心型的方言区，有时一个县内就有几种互不通话的小方言，使用母语可以通行的面太窄了。这样的农村对于推广普通话反倒有更大的积极性。福建的西部山区就是这样的典型。新中国建立以来，外地干部职工到这些地方工作，本地人外出上学、谋生，加上学校教育逐渐普及，学校授课都用的普通话，几十年间接受并完成了义务教育的人大体都可以使用普通话。广播、电影、电视也都是普通话节目，人们感到不学普通话实在很难适应现代生活。于是连老一辈的农民都给带动起来了，在那里，赶集的老太太都可以用普通话和外地人交谈（李如龙，1998)。这样的方言比什么方言都萎缩得快。十几年前，国家语委在闽北一个很少为人所知的县城（泰宁）举办方言调查研究班，从全国 20 多个省区来的老师们一到那里就惊叹不已：这样一个小山城竟然早已普及了普通话，连本地人在一起聊天也用的普通话，若不是亲眼见到，真是不敢相信。在这些地区，方言已经退缩到家庭生活的小角落，甚至是老年人之间交际时才用。

（5）稳固型和变异型

这里的“稳固型”指的是变化较慢的方言，“变异型”指变化较快的方言。

一般说来，城里的方言比乡下变得快。闽北方言中各县城都有 7～8 个声调，老府城建瓯话只有 6 调。建阳、崇安及浦城县石陂一带还有全浊声母，建瓯话已经全部清化（李如龙，1991，《闽语研究·闽北方言》)。

说城市的方言变得快是相对的，如果人口稳定，也可能变得并不太快，如果人口大量叠加则可能变得很快。有两个例子可作比较。上海市区的新老派之间差别相当大。就语音说，老派

有紧喉音声母ʔb、ʔd，有β无v，分尖团，韵母有51个，其中入声韵14个，声调有6个；新派无紧喉音，有v无β，不分尖团，韵母只有32个，其中入声韵只有5个，声调也并为5个（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而福州话拿三百年前的《戚林八音》和现今的福州音相比较，只是把原来的6个韵并成3个韵，还有些字从甲韵归入乙韵（李如龙等，1979）。

说农村方言变得慢也是相对的。有些农村里的方言岛由于受别方言的包围和渗透，也可能变化很大。例如闽东宁德的碗窑闽南方言岛，20岁青年较之70岁老人，韵母少了8个，另外14个韵母的音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李如龙等，1982）。有些周边方言所没有的音在各方包围之下也可能消失得很快。例如闽北石陂话，70岁老人还有与中古音十分接近的整套全浊声母，中年人就残缺不全了，青年人则大体上已经丢失了全浊音。

可见，稳固到什么程度，变异又到什么规模，都必须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地推论。

五、双语双方言现象

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在某些方言地区通行着两种语言或方言，这种状况近代以来颇有扩展之势，并对方言的演变和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很值得引起注意并进行专门的研究。

1. 双语双方言的类型

广义的方言区的双语制应该包括方言与民族语并用、几种方言并用和方言与民族共同语并用三种类型。严格地说，称为“多语制”比称为双语制更好些，因为不论是哪种类型，并用的都可以不止两种，而三种类型也完全可以兼而有之。例如新疆伊宁市居住着维吾尔、汉、回、哈萨克、乌孜别克，锡伯、满等10多个民族，“不少人除了掌握本族母语外，还能熟练地使用另外一两种以至三四种、四五种语言”（戴庆厦，1993）。在云南，“苗族兼通汉语、壮语或瑶语的不少；瑶族群众一般兼通汉语，部分兼通壮语和苗语；阿昌族不少会说汉语、傣语、景颇语或傈僳语；崩龙族多数人能讲汉语、傣语或景颇语；布朗族多数人兼通傣语、佤语或汉语”（余朝晖，1990）。这是多种民族语和汉语（西北官话或西南官话）的兼用。广东省惠东县平海镇的“军话”是个官话方言岛，这里“讲军话的平海人一般都能讲五六种方言，按其运用的频率和熟练程度，除军话外，依次是客家话、学（福）佬话、普通话、粤语和占米话。”（潘家懿，1997）海南省的儋县那大镇“本地人多数会说多种话，特别是售货员、售票员、摊贩，儋州话、客家话、海南话、普通话、临高话（应是壮语的一种方言）都能对答如流。”（梁猷刚，1985）这是多种汉语方言和共同语的兼用。以下着重讨论多种汉语方言兼用的现象。

少数民族兼通汉语或方言区人民兼通共同语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地域现象。它主要取决于少数民族与汉族历来关系如何，是否在一处杂居，两种民族的文化融合程度如何。有的民族只有少数人保留自己的语言，多数人改说汉语，如土家族；有的民族则只有少数人兼通汉语，如藏族。兼通双语的人又与其文化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有关。双方言、多方言现象则不仅是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与地域相关的。这种多方言区就其分布地域来说有以下四种情况（李如龙等，1995）：

（1）带状双方言区：见于不同方言区交界处。例如闽南话和闽西客话的交界处，从龙岩市经漳平、南靖、平和、云霄到诏安县止，绵延二百多公里，或宽或窄、或断或连，有个闽南话

（福佬）和客家话的双语带（李如龙等，1995，21 页，78 页，96 页）。在江苏境内有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和吴方言，“方言间的边界交错，有很长的边界线。边界上的方言交互影响，语言现象多种多样，这就增加了本省方言的复杂性……不管在城镇还是在农村都有双语现象，其间有各种过渡词语的说法，是十分丰富多彩的。”（鲍明炜主编，1998）这种方言交界处的双语带是适应人们交往的需要形成的，只要两个方言区之间没有天堑阻隔，人民之间有经济、文化、通婚往来，就很容易形成不同形式、不同状态的双语带。

（2）岛状双方言区

大大小小的方言岛往往是由于外方言区的批量移民聚居而形成的。不论地域多大，几乎所有的方言岛都是双语区。因为岛民们总要和周围操当地方言的人打交道。明代在边远地区、多事地区设立许多卫所，而且驻防的兵士都要南北互调。到南方来的北方兵住在城堡里划地屯垦，相互通婚，有的还自鸣高贵，少与本地人交往，即使有交往也难以学会南方方言，于是这些小城堡的周围有的后来便形成了官话方言岛。在福建的南平、长乐县洋屿乡，在广东的平海镇，在海南的崖县、儋州都有这类官话方言岛。客家人迁往湘赣交界处北段一带以及闽、浙交界处西段，迁往闽北、闽东以及迁往台湾的新竹、苗栗一带，还有广西、四川和香港新界的许多地方，也留下了不少客家方言岛。

（3）片状双方言区

在一定地域之内，除了通行原有的方言土语之外，同时通行着说不同方言土语的人都能接受的另一个方言。这种地片大的可达一个省，小的也有一个县的。广东省的大小城镇，不论是粤语区、客话区或闽语区，大体上都可通行广州话。粤北重镇韶关市，原先通行土话的湛江，原来是通行雷州闽语的，现在也改口说“白话”，并尽量向广州音看齐。西江上游的封开、云浮一带，原来通行的粤语和广州话有不小的差异，如今大多数人都用广州话来代替自己原有的口音了。在福建中部戴云山北坡的尤溪县，因为处于闽语几个大区之间，县内有五六种难以通话的小方言。为了便于交往，各地都以城关话为共同语（李如龙，1991，《闽语研究·尤溪县内的方言》）。在湖南省南部的郴州地区所通行的“土话”品种多、差异大，相互间难以通话。为了彼此沟通，他们共以附近通行的西南官话作为媒介，实行湘南土话和西南官话的双方言制（周振鹤、游汝杰，1985）。

另一种片状双方言区是因为区内穿插存在着多种方言，由于经常接触，不少人除了说自己的母语，同时兼通其他方言。广西境内有不少这类情况。《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说：“在广西双语（双方言）或多语（多方言）的语言环境较为普遍，能说两种以上方言的人比比皆是。南宁市不少会说白话的人也能说邕州官话（下廓街话）或桂林官话。南宁市郊的人多半会说平话和白话。桂林郊区的人除了说桂北平话外，一般都能说桂林官话。客家人兼通白话和官话的也很多，较为典型的是贺县，有些贺县人能说官话、白话、客家话、平话等四种方言。”（杨焕典主编，1998，1 页）

（4）点状双方言区

陆续有人报道，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厂矿区由于各地移民杂处，也形成了多方言区。成批的外地人聚居一处，一方面说自己的母语，一方面说着当地通行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在湖南有人称之为“矿山话”。四川省有个很典型的这种点状双方言区，这就是渡口市。该市是 20 世纪 60 年代才兴起的钢城。到 1980 年已经有 82 万人口，外地人和本地人大体是四六开。外地

人集中住在市内的东区和西区，有些外地人聚居的街区还说着移民的母语，如东北、华北来的7万多人就还说着北方话，但同时也通行着“四川普通话”。梁德曼曾经这样描写过：“在渡口市各单位和各地区，你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方言。外地人和四川人进行交谈尽量地带上一点四川话的色彩。四川人和外地人说话尽量地避免使用太土的方音和词汇。来自南方方言区的人和同乡说家乡话和非同乡说不纯粹的普通话或不地道的四川话。”（梁德曼，1985）

另一种点状双方言区是在两个方言区交界处的集镇上。由于两个方言区的人来赶集，镇上的人兼通两种方言，并且形成一种兼收并蓄的混合型方言。而离开了这个集镇，在农村中还是各区说自己的话。本人在建阳县调查方言时发现过这样的方言点——黄坑话（李如龙，1991《闽语研究·闽北方言》185页）。

2. 双方言区的语言渗透和融合

（1）双方言的功能类型

对于双方言者或双方言社区来说，总有第一方言（母语）和第二方言（非母语）之别。这两种方言的社会功能可能有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

备　用　型		对同母语的使用第一方言，第二方言只供对外备用
并用型	兼　用	多用第二方言，兼用第二方言
	替　用	少用第一方言，多用第二方言
换　用　型		各种场合经常使用第二方言，第一方言只供备用

此表主要是考察社会用语的，言语的交际还有家庭用语和个人的思维用语。三种用语之间通常成正比，但有时也有不一致的，过细的研究还应该分别统计。

就整个社区要作这样的判断必须进行社会调查，用统计数据说明问题。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可能有许多差别。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对个人的双语应用都会造成影响，男性、年轻人、外出活动多的、文化程度高的人往往使用第二方言更多些。

（2）双方言之间的相互渗透

双方言在同一地域的并用最显著的效果便是方言间的相互渗透，语言之间的横向作用——渗透有各种形式：借词、书面语对口头语的作用，翻译等等，双语并用是语言渗透中最集中、最强烈的形式。方言间的渗透是促使方言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双语区的语言渗透是很有必要进行考察的。

方言之间的渗透有不同的度，少量的影响一般从借词并用开始，是为轻度渗透；借用词数量较大，并有部分句型借用和语音系统的调整，这是中度渗透；大量的借词（包括并用和替换），语音和语法系统有较大调整的是为深度渗透。

在闽客之间的双方言带，闽南话向客家话借用了一些常用词，属轻度渗透。以平和县九峰镇闽南话为例（下例中以/为界，前者为借用的客家话，后者为闽南话，括号中为普通话）：

番豆/落花生、涂豆（花生）　　摸脉/候脉（号脉）
你人家/您（你们）　　狂狗/痟狗（疯狗）
手袜/手囊（手套）　　墨盘/砚（砚台）
牛牯/牛港（公牛）　　灶头间/灶骹（厨房）
阿爹/咹公（爷爷）　　分/护（给）

有的是闽客合璧词：

满囝——最小的儿子，客：满子，　　闽：尾囝
老厝——祖屋，　　客：老屋，　　闽：祖厝
灰卵——咸蛋，　　客：灰蛋，　　闽：咸卵
越转头——回头，　　客：转头，　　闽：越头　　（李如龙等，1995，116 页）

在闽东北宁德县的碗窑闽南方言岛，新派借用大量闽东方言词。从下例可以看出，有不少是很常用的基本词（同上书，147 页，表中/前为借用的闽东话，后者为闽南话，括号中为普通话）：

乇/物件（东西）	胰皂/雪文（肥皂）
薰团/薰支（烟卷儿）	冰箸/冰条（冰棍儿）
紫菜/茄（茄子）	老公/翁（丈夫）
老妈/姥（妻子）	泛讲/讲古（聊天儿）
对手/相共（帮忙）	透骹/畅（痛快）
澈洁/清气（干净）	吃亏/艰苦（难受）
做家/俭省（节俭）	合适/够值（合算）
草坪/草埔（草地）	铜片/铜镭（铜板儿）

在语音方面，由于受闽东方言的影响，新辈把老辈的 29 个阳声、入声韵合并为 11 个（同上书，141 页）：

ɤe，u→ue	ɤeʔ、ueʔ→ueʔ
am、an、aŋ→aŋ	ap、at、ak→aʔ
im、in、iŋ→ieŋ	ip、it、ik、ɤt→iek～ieʔ
iam、ian→iaŋ	iap、iat、iaʔ→iak～iaʔ
uan、uaŋ→uaŋ	uat、uaʔ→uak～uaʔ
m、ŋ→ŋ	

有 14 个韵的韵值也发生了变化（同上书 142 页）：

ɤ→ø	uʔ→øʔ	ɯ→y～ɯ		
ɤe→ue	ɤeʔ→ueʔ	iŋ→ieŋ	ik→ieʔ	
un→uoŋ	ut→uok～uoʔ			
ɤn→yøŋ	ɤʔ→yøʔ	ian→iaŋ	iak→iaʔ	uak→uaʔ

这种状态应属中度渗透。

如果是深度的渗透，就可能变得面目皆非，和操原来母语的人无法通话了。这就是下文将要说的“混杂型方言”。

（3）双方言制的融合

历史地考察双方言现象应该说它只是一种竞争的过程，不可能长期地维持双方言并用的状态。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交往更加密切，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更加明显，语言的单元化融合是一种社会的需求。

双方言制的融合前景有三种：

第一种，在双语并用的过程中相互竞争，最终弱势方言退出交际生活，可能有少数语言特

点融入强势方言。例如，上海兴起之后不少宁波人来营商，苏北人来打工，第一代、第二代宁波人、苏北人可能都是双语者，第三代之后就被同化，都说上海话了。这些外来者的后代成了推动上海话变异创新的因素之一。又如“苏南的溧水县，太平天国后有大批河南移民涌入，河南官话和当地吴语的双言制已在他们中间维持一百多年，但是因为在人数、经济和文化上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到今天新一代已几近放弃河南话，即使是老一辈的河南话，也因为受吴语的影响而变得很不纯粹。”（游汝杰，1999）随着时间的推移，散布在各地的小方言岛绝大多数都要走上这种消融的道路。

第二种，若是竞争双方的方言实力相当，就会出现相互渗透，逐渐融合定型为另一种混杂型方言。这种混杂型方言类似西方语言学家所说的克里奥尔语（creole）。混杂型方言的根本特点在于其方言特征是多元的。（如果是双方言融合的是二元的，多方言融合的是多元的），而且这些特征已经整合成定型的系统，因而归入哪个方言区都不合适。古往今来，汉语方言中有过不少这种混合型的方言区、片、点。江淮一带的方言早期应属吴方言或是吴方言成分更多的方言，后来黄河流域的移民不断充人，北方官话渗透的结果使它变为官话的一区——江淮官话区。由于地缘接近和社会交往较多，南片各县可能经历过双语时代，越是往南吴语成分越多。例如如皋话就是“以吴语为基本，加上下江官话的部分影响而成的，所以吴语的色彩较浓，下江官话的色彩较淡，成为这两个方言区域之间的中间方言”（丁邦新，1966）。又如广东的惠州市是典型的既说“本地话”又说“白话”的双方言区。而“本地话”既像客家话又像白话（粤语），学术界有人说是客话（傅雨贤，1993），有人说是粤语（刘叔新，1987），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据我所做过的初步调查获得的感觉是归入哪个方言都不合适，应是一种混合型方言。100年前的厦门话实际上是漳州腔和泉州腔混合而成的，厦门初开埠时，来自漳州和泉州的人必定各说各的话，然后像开股份公司一样融合起来，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才有了定型的厦门话。海南省南端的“迈话”（李如龙，1996）和福建大田后路话（李如龙，1996）也是很典型的混合型方言。

第三种，两种或多种方言都让位给第三者。粤北的韶关市区原有“本地话”和“客家话”，如今已让位给广州话。像广西的贺县一带，平话、客话、白话可能最后都得让位给西南官话。许多五方杂处的厂矿区，迟早也都会让位给普通话。

思考与练习

一、有些方言现象不联系历史文化特点就难以理解，试举例说明。

二、就你所熟悉的方言区查阅有关本区的移民史资料，并与该方言区的形成年代、历史层次相互检验和论证。

三、回乡作调查，就本方言区独特的风物词语、习俗词语、观念词语、史迹词语取出一类写成调查报告。

四、本书所列方言的文化类型是否符合方言实际，在理论上能否具备说服力。

五、普通话与方言的双语现象和双方言现象有什么不同。

参考文献

L.R. 帕默尔（1983）　语言学概论（李荣等译）　商务印书馆

颜　森（1986）　江西方言的分区（稿）　《方言》第1期
梁方仲（1980）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纶鑫（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怀林（1993）　江西史稿　江西高校出版社
葛剑雄主编（1997）　中国移民史（第6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1988）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赣方言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李如龙（1997）　福建方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
侯精一（1999）　现代晋语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庄初升、严修鸿（1995）　福建双方言研究　（香港）汉学出版社
李新魁（1994）　广东的方言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司徒尚纪（1990）　海南岛历代民族迁移和人口分布初探　《历史地理》第7期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等（1996）　闽粤琼闽语词汇比较研究　《第四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汕头大学出版社
游汝杰（1993）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陈章太（1985）　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　《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　商务印书馆
李敬忠（1994）　语言演变记　广州出版社
房学嘉（1994）　客家源流探奥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邓晓华（1993）　人类文化语言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潘悟云（2000）　语言接触和汉语东南方言的形成　语言接触国际圆桌学术会议（2000年8月，香港）
侯精一（1995）　平遥方言民俗语汇　语文出版社
黄尚军（1996）　四川方言与民俗　四川人民出版社
麦　耘、谭步云（1997）　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温端政、张光明（1995）　忻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1997）　福建方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
魏伟新主编（1994）　海丰俗语谚语歇后语词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
李宝田（1980）　地名与北京地区环境的变迁　《地名知识》第1期
司徒尚纪（1994）　岭南史地论集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李如龙（1998）　汉语地名学论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通锵（1991）　历史语言学（15—16章）　商务印书馆
袁家骅等（1983）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李如龙等（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第3章）　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主编（2000）　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1990）　建瓯话的声调　《中国语文》第2期
李　健（1996）　化州粤语概说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如龙（1965）　长汀话二音节三音节的连读变调　《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吕叔湘（1993）　丹阳方言语音编　语文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1991）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李如龙（1998）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　湖南师大出版社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等（1979）　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　《中国语文》第2期
李如龙等（1982）　宁德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　《中国语文》第5期
戴庆厦（1993）　社会语言学教程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余朝晖（1990）　云南的双语及双语教学之现状　载中国少数民族双语研究论集　民族出版社

潘家懿（1997） 军话岛上的语言生活《双语双方言（五）》汉学出版社（香港）
梁猷刚（1985） 语言复杂的海南岛儋县那大镇 《方言》第1期
鲍明炜主编（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周振鹤、游汝杰（1985） 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 《方言》第4期
杨焕典主编（1998）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梁德曼（1985） 四川省渡口市方言的现状和未来 《方言》第4期
游汝杰（1999） 游汝杰自选集·汉语方言演变的文化原因 广西师大出版社
丁邦新（1966） 如皋方言的音韵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6本
傅雨贤（1993） 惠州客家话吸收粤语探索 《双语双方言（三）》 汉学出版社
刘叔新（1987） 惠州话系属考 中国语言学会第4届年会论文
李如龙（1996） 方言与音韵论集 （海南岛的迈话，福建大田后路话）

第十一章　汉语方言学的应用研究

一、方言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

任何学科都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理论研究是基础，应用研究则是它的延伸和发展。应用研究必须以理论研究为前提，理论则必须在应用中检验，这两方面是互相依赖、互相推动的。

广义的应用包括用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去论证相关学科的问题，例如拿方言学成果去论证汉语史的问题或文化史的问题。狭义的应用应该是为现实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服务的。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方言学一开始就比较重视应用研究。20～30年代的汉语方言学主要为搜集歌谣、研究民俗服务和为音韵学服务。50年代之后强调了研究方言应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服务。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提出："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会同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组织各地师范学院和大学语文系的力量，在1956年和1957年完成全国每一个县的方言的初步调查工作。"同年，高教部和教育部向各省发布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的联合指示》，对于"开设课程、培训骨干、调查方言和编写学习普通话手册"等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李荣，1957）。语言研究所在丁声树、李荣两先生主持下举办了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为各省培训方言普查骨干。

然而，数十年来的汉语方言学的应用研究应该说效果并不太显著。这主要是由于认识不足，着力不够。

应用研究比起理论研究是容易些还是更难？应该说更难。因为方言学的应用研究除了调查方言、掌握方言材料、了解其内部结构规律之外，还要了解相关学科的观点和方法，掌握其他学科的材料；还要有实际工作的运作，包括设计工作方案和计划，经过实践之后还要有调查总结和评价。例如研究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关系、使二者相互论证，就要研究与地域文化相关的思想史、移民史、经济史、文化史、民俗学等等。把方言调查研究成果应用于母语教育不但需要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还应该进行一系列的设计、试验和总结。可见，应用离不开研究，不经过艰苦的研究，要在应用上见到成效是不可能的。把应用理解为单纯的现成的工作而不去开展研究，便是我们已有的方言学应用研究成效不大的根本原因。

语言是人类思维活动须臾不可缺少的工具，是社会群体之间协作沟通须臾不能离开的交际凭借，也是历史文明得以传承的链条。语言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正因为如此，语言学的应用是无边的。方言学的应用也是无止境的，方言学应用研究的任务是繁重的。方言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如果不能为社会生活服务，从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方言学的发展就会举步维艰。1958年前后的全国方言普查因为是政府行为，一举获得了

上千点的方言基础材料，这是成功的经验。但是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方言工作者难以得到良好工作条件的抱怨。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法想想，方言学为社会生活作了多少贡献？为什么会受到外界的冷落？人们就不难发现，方言学的应用研究并没有做好。

本章讨论几个方言学应用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研究这些课题的目标和方法。

二、为方言地区的语言教育服务

1. 方言地区的语言教育状况

所谓语言教育主要指的是民族共同语的教育。在“地球村”的时代，还应该包含外语教育，这里只讨论前者。

共同语教育是民族文化建设的重大的工程。语文教育是启蒙教育的第一块基石。小学语文课教得好，儿童的智力开发就会有好的效果，因为语言训练是和思维训练相关连的，语文是学习百科的基础。语文教育对义务教育来说是成败的关键之一，语文教育对于塑造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至关重要的。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20 年来，共同语的普及有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的进展。然而绝大多数学龄儿童的母语（最先学会的语言）还是方言，至少是和共同语有明显差异的“地方普通话”。汉语的方言，那怕是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官话方言，和标准的共同语之间都有不小的差异，这种方言母语对于儿童学习共同语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少年儿童学习外国语相比，方言母语对学习本族共同语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前者是“另起炉灶”重新学一套，后者则是自觉不自觉地对应折合，修修补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人，一开口说普通话，乡音浓重，但所学英语口语却发音规范，应对流利。

对于这样的局面，从事义务教育的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更谈不上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普遍的情形是：语文老师们总认为语文课教的是普通话、共同语，与方言何干？连同他们在内，校内外的人说的都是本地的普通话，真有几个注意咬音的还会有人笑话他“装腔作势”哩。再说，所有的中小学教材里从来就没有联系方言实际、利用对应规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安排，有些认真的老师在教学中倒是常常发现了一些本地学生发音不准或用词造句受方言影响的现象，但是要他们去总结规律，制作教材却又是不可能的事。一来没有时间捉摸，二来没有内行的人给与指导，自己原先也没有受过训练。于是只好“入乡随俗”、降格以求。在应付考试时突击一番，放一马让学生勉强过关罢了。近年来，师范院校的学生需要经过普通话口语测试，真正严格要求了，合格的恐怕只是少数。

汉语方言之间不但语音差异大，词汇语法上也差异不小。学生中发音不准是大多数人的情况。程度好一点的写起文章来至少是词汇贫乏、句型单调，因为他们知道方言词和方言句型不能套用，却又想不出共同语该怎么说才是准确生动的，凑合着说，便只好贫乏和单调。那些识别能力不强的学生，还难免套用方言词汇和句式，便成了错词病句了。在吴语区的普通话中，“我说的同他说的两样（不一样）”，“你不要（不）去只好我去”之类的说法是普遍存在的；在闽语区，“他有来找我商量”，“没有（不），不是我说的”也总是被认为是正确的表达；在粤语区，“吃多一点”，“你先回去先”的说法也随处可以听到。

可见，在基础教育中要切实提高语文水平，非排除方言影响不可。

2. 联系方言实际教学标准语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

联系方言实际教学普通话符合语言习得和语言教育的规律，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英国的应用语言学家皮特·科德认为："在我们习得语言行为（表现为母语形式）之后，学习一种第二语言，其实是改变或扩充已有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从头开始学一套全新的技能"，"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确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才是应该学的东西，"因为学生会"把母语规则不恰当地应用于目的语"（S. 皮特·科德，1983，119页），母语习得对于儿童来说是先入为主，根深蒂固的，如果不在启蒙教育的阶段改变和标准语不同的母语习惯，往后要加以纠正就非常艰难，有的人则要贻误终生。

李如龙（1997）提出过："方言母语对语言学的干扰，更大面积、更经常的表现不在于不通，不规范和造成误解，而在于不顺、不好、不流利、不准确、不生动。""由于不能掌握标准音，咬字没有把握，说起普通话难免结巴、不通畅。""为了回避方言词和方言句型，一时又想不出合乎规范的、准确的词句，想不出生动的表达方式，于是就常常用些意义并不相符、表达也不贴切的词句姑且对付着说下去、写下去。这样的语言便跳不出'用词生硬而贫乏，句型单调而枯燥'的窠臼。"

可见，置方言母语于不顾，在所有的方言区都不加区别地就共同语教共同语，这是违背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的原理的。

绝大多数中小学语文老师都是本地人，也熟悉本地方言，联系方言实际教学普通话对他们来说并非不切实际的过分要求。事实上，有许多老师已经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有的还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和试验，取得了某些可喜的成绩。查一遍字典，联系周围常听到的误读就可以排出本地人容易读错音的字表。查词典、听本地人说话中不规范的用词和造句，积累半年、一年就可以梳理出一套补充教材发给学生，既可作为练习材料，也可以作为测试的选题依据。关于方音辨正，方言词汇语法特点的描述，各方言区都已经有了一批研究成果，这项工作只要引起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研究部门的注意，把本地有经验的老师组织起来，互相切磋，编写练习材料，开展教学活动，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语言时的类推能力是先天存在的机制。官话区四个声调的方言，调值可能和北京话相去甚远，但绝大多数人都能自发地类推，读准普通话的四声，没有人一个字一个字去记忆是阴阳上去的哪个调。只要有教师的引导和启发，学生们也完全可以运用自己已有的母语的感性知识和语言识别能力去认识对应规律，纠正自己学习共同语时的误差。这种发挥人所共有的先天能力，以己之长克己之短的教学方法，变自发为自觉的启发自学的教学方法，是惟一正确的方法。

3. 联系方言实际教学标准语的要点

联系方言教学标准语，首先是语音方面的方音辨正。这方面已有的经验较多。主要是利用方音和标准音的对应规律，利用方音或标准音的语音构造规律及利用方音与古音的演变规律（包括古代的汉字谐声规律）。这三个方面又常常是相互联系的。例如：东南方言普遍没有普通

话的翘舌音 tʂ、tʂʻ、ʂ。普通话的翘舌音中有一部分是古知组字，这些字在上古音和某些方音（如闽语、湘语）中读成 t、tʻ 声母，在上古时代，端组、知组和章组字又常常是通谐的，因此，可以利用古今音、方音与标准音的对应关系以及声旁类推，列出相当一部分翘舌音声母的常用字：

声旁	端组字	知组字	章组字
召	迢	召超	招照沼诏韶绍邵
者	都堵屠	著猪箸储	者诸煮暑署薯奢（例外：绪）
主		柱拄	主注住蛀注驻
周	凋调	稠绸	周啁週
单	弹掸		戰单（姓）禅蝉阐
专	抟团（團）	传转	专砖肫
尚	躺趟堂		掌厂（廠）赏誉尚绱常裳
重	动（動）	重	种（種）腫
啇	敌（敵）滴	摘	適
蜀	独（獨）		触（觸）蜀烛（燭）属（屬）浊（濁）

有些方言分不清前后鼻音韵尾，因为谐声时代是 −n、−ŋ 有别的，前后鼻音韵各自可以相谐，但两大类之间并不混用，举两个声符为例：

分	fən	芬吩氛汾纷粉	工	koŋ	攻功贡/kʻoŋ 空
	pən	坌/pʻən 盆		xoŋ	红虹讧
	pan	颁扮/pʻan 盼		kaŋ	肛杠缸/扛
	pin	邠/pʻin 贫		tɕiaŋ	江/ɕiaŋ 项
				tɕʻioŋ	邛

从古音到标准音及方音的演变都有常例、变例和特例。常例可以利用对应规律成批地类推，而个别的例外字则往往造成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标准音的常见错误。例如北京音不合古反切的例外往往造成方言区的误读：

例字	反切	北京音	误读音
溪	苦奚切	$ɕi^1$	$tɕʻi^1$
瑞	是伪切	$ʐui^4$	$ʂui^4$
恋	力卷切	$lian^4$	$lyan^4$
贞	陟盈切	$tʂən^1$	$tʂəŋ^1$
荣	永兵切	$ʐuŋ^2$	$yuŋ^2$
估	公户切	ku^1	ku^3
剧	奇逆切	$tɕy^4$	$tɕy^2$
纪	居理切	$tɕi^4$	$tɕi^3$
特	徒得切	$tʻə^4$	$tʻə^2$
豉	是义切	$tʂʻʅ^3$	$ʂʅ^4$

据统计，在《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所收6 000多字之中，此类北京音的例外对应就有 200 多字，这是很值得引起注意的。

有时例外出在方言，也会成为方言区的人误读的原因，如闽南话：

例字	反切	厦门音	误读音	北京音
波	博禾切	pʻo^{1}	pʻo^{1}	po^{1}
碧	逋逆切	pʻik^{7}	pʻi^{4}	pi^{4}
编	卑连切	pʻian^{1}	pʻian^{1}	pian^{1}
怕	普驾切	pʻã^{5}	pʻã^{4}	pʻa^{4}
钝	徒困切	tun^{1}	tun^{1}	tun^{4}
伞	苏旱切	suã^{5}	san^{4}	san^{3}
劲	居焮切	kiŋ^{5}	tɕiŋ^{4}	tɕin^{4}
纤	息廉切	tsʻiam^{1}	tɕʻian^{1}	ɕian^{1}

李如龙（1998，324 页）曾指出：“和基本对应、条件对应相比，例外的不合对应的是少数字。一般人，甚至语音教师，若非经过历史比较也很难了解这例外现象，在按对应类推时，就经常出现误读，而且根本不觉得有误。”

方言和共同语的词汇语法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以往利用方言调查成果为推广普通话服务通常只限于方音辨正，词汇和语法方面则只是罗列一些方言和共同语不同的词汇和句式，由于未经挑选，往往列了许多不容易错的对应，容易说错的则没有列出来，因而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效果并不好。

究竟是哪些方言词会影响普通话用词的规范？这必须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方言词汇差异的类型，一是词的常用度。

李如龙（1982）曾把方言词汇差异分为五种不同类型：

（1）对立型，即同名异实，例如南昌话：清汤（馄饨）、地方（门槛）、客气（漂亮）；福州话：对手（帮忙）、对头（互相）、起动（劳驾）、加工（多此一举）；广州话：班房（教室）、得意（有趣）、地盘（建筑工地）、马蹄（荸荠）、人工（工钱、工本）。

（2）对应型，即形异实同，例如甲鱼又有脚鱼（苏州）、团鱼（成都）、水鱼（广州）、鼋鱼（双峰）等说法；玉米又有棒子（济南）、包谷（武汉）、六谷（合肥）、包粟（梅县）、粟米（广州）、麦穗（厦门）等说法；眼泪又说眼水（合肥）、目汁（梅县）、目滓（福州）、目屎（厦门）等；弟弟又说阿弟（温州）、老弟（南昌）、细佬（广州）、小弟（厦门）、依弟（福州）；发誓又说起誓（北京）、罚咒（苏州）、讦愿（温州）、咒鬼（梅县）、咒誓（厦门）等等。

（3）交叉型，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例如“吃”，有的说“喫”，有的说“食”，但用法各不相同。不同的方言还可以说：吃烟（抽烟）、吃茶（喝酒）、吃奶（吸奶）、吃官司、吃香、吃得开、吃批评、吃惊、吃手（吃饭的人口）、吃气（用力）、吃心（多心）、吃书（勤学）、吃价（值钱）、吃胚（饭桶，无用的人）、吃屈（受屈）、吃教（信教）、吃趣（碰钉子）、吃钱（受贿）、吃疑（怀疑）。大凡常用词都有这种义项多寡、组合能力强弱的差异。另一种交叉是词义部分相同。例如许多东南方言手可指手，也可包括胳臂，脚也可包括腿；肥可以兼指动物、肉及人（肥猪、肥肉、肥人），走可指跑，也指逃。

（4）并用型，即新老说法、“土洋”（固有和外来）说法并用。有不少方言就是方言固有说法和普通话引进的说法并用。例如吴方言：枱子—桌子、里向—里头、本生—本来、众生—畜生、老虫—老鼠；粤方言：家姐—姐姐、猪膏—猪油、禁—结实。处于闽客方言交界处的龙岩

话则闽客两种方言词兼用：月娘—月光、星—天星、见笑—跌鼓（丢人）、狗公—狗牯（公狗）。

（5）补充型，即方言区的创新词而在共同语没有相应的说法。近些年来，有些粤方言词就因为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创新的词，官话区无相应说法，便由南而北地传开了。例如："炒鱿鱼、大排档、打工仔、打工妹、饮茶、泊车、搞啱（完）、发烧友、按揭、炒楼花、烂尾楼、物业、巴士、大巴、中巴、小巴、双层巴、生猛海鲜、盐焗鸡"等等。此外各地方言都有一些言简意赅的惯用语、俗语、成语、谚语，有的也是共同语所没有的。

以上五种类型中，最容易造成说普通话用词不当的是交叉型的方言词。而并用型的方言词本地人大概都能分清何者较土、何者较为通用，补充型方言词即使被套用于普通话也不会显得唐突，因为共同语里本来就没有相应说法。

至于对立型和对应型，会不会影响普通话用词的规范，则要看是否常用词。若是极常用词，尤其是共同语词也见于书面语的，方言区的人由于具备阅读的基础并不难于辨别。例如太阳说日头、热头、日，月亮说月光、月娘、月，父亲说老窦、爷老头子，以及站（立、徛）、他（渠、伊）、吃（食、喫）、看（睇、觑、映）、东西（物事、物件、乇、嘢）、小（细、嫩）等等，一般人并不会套用方言词。至于那些不太常用的词语，当人们没有全面掌握普通话用语时就容易套用方言词。例如在粤语区，马蹄（荸荠）、人工（工本）、粟米（玉米）、水鱼（鳖）、早造（早季）、晚造（晚季）、利是（红包、压岁钱）、冲凉（洗澡）、打边炉（吃火锅）、发梦（做梦）、七七八八（八不离十）等说法就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要摸清哪些方言词和方言句式容易被套用，需要在教学中加以辨正，看来要进行另一种方言调查，即"地方普通话"（或称过渡语）的调查。只有经过调查才能对症下药，编好教材，进行有效的训练。

4. 运用方言调查成果教好标准语的方法

如上所述，要把方言调查研究成果应用到语言教育中去，不能把方言调查材料原封不动地搬上课堂，而必须进行再次方言调查，查看哪些方言特点会进入地方普通话，哪些不会。再举点福州话语法的例子，同是重叠式，单音名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式就容易被套用，如说：包包（包儿）、牌牌（牌子）、口口（口子）、一点点路（一点儿）、直直走、红红的房子、大大的路口；而动词的各种重叠式就不容易被套用："行行嗮"会说成"走一走"或"走一下"，"知掏去"会说成"罔拿去"，"琴看琴鲁看"会说成"随便看一下"。

这种调查也可说是"过渡语"（地方普通话）的调查。近十几年间，随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已经有些学者做了这类调查。有些学者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概括，做得比较好的如：

陈重瑜（1986）　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　《语言研究》第 1 期
陈亚川（1987）　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姚佑椿（1988）　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张楚浩（1988）　广州话对新加坡华语的影响　《第一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李如龙（1988）　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过渡语　《福建师大学报》第 2 期
姚佑椿（1989）　应该开展对"地方普通话"的研究　《语文建设》第 3 期
陈松岑（1990）　绍兴市城区普通话的社会分布及其发展趋势　《语文建设》第 1 期

陈亚川（1991）　“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　《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吴英成（1991）　从新加坡华语句法实况调查讨论华语句法规范化问题　《语文建设通讯》34期

这些研究成果可供应用时参考。

这类调查如果由大专或中小学语文老师来做，想必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一来，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分布在各个方言区的每个角落，必要时还可就近合作，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投入这项工作。二来，他们天天同本方言区的学生及其家长见面，既熟悉本地方言又经常接触“地方普通话”。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适当的指导，让他们从学生对话和作文中搜集材料，随手记录、长期积累，一定可以获得丰富的材料。所编出来的补充教材也一定更有针对性。

这类调查不但语文老师可以参加做，事实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学生乃至中学生也可以参加做。什么字音老读错，什么词老用错，可以化整为零，组织学生去调查。有的考察量词的用法，有的考察代词、介词、助词等用法。高等院校的学生完全可以用这类题目做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总之，如果各类学校的语言教师真正重视起来，动员起来，一定可以把这项调查工作做好。

经过调查之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接着便是编写补充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练习材料和教学训练方法的问题了。

如果说方言调查的成果是“生语料”的话，编给语文教学用的教材或练习应该是经过加工的“熟语料”。把生语料加工成熟语料，主要的工作是把容易读错的字组合成词，把容易用错的词组合成句，并尽量把这些词语和语句编成生动、有趣、琅琅上口的诗歌、谣谚、绕口令或对话、故事等。这种训练材料显然比排列表格好得多。

在教学、训练方法上也应该采取多样的做法。需要占用课堂教学的只是一小部分时间，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动手自己查阅工具书，对照自己的方言母语，然后自己整理材料、找规律。经过自己的这一番实践比课堂学习印象一定要深得多。此外，还可通过课余的各种表演、竞赛、测试等方式把这种正音正词活动搞得更加生动活泼，为学生所喜闻乐见。

三、为制定语文规划和语文政策服务

1. 考察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

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联系千家万户人群、传承千秋万代文明的纽带。为各项语文工作制定可行的规划和合理的政策，对于发挥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运作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六十年代，语文规划和政策是纳入政府行为运作的，当时的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在语文工作中占着重要地位，对方言调查也提出了要求，方言工作者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由于方言学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行政运作方面对于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的指导和督促也不够有力，因此所作贡献还不能令人满意。

1986年1月，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语文工作，提出了新时期语文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做好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大力推广和普及普通话”

被列为首要任务（《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关于推广普通话，确定了“大力推广，积极普及”的新方针。要求在20世纪之内使普通话成为学校的教学用语，机关的工作用语，传媒的宣传用语和社会公众场合的交际用语。对不同的人应具备的普通话水平可有三级九等之别。此外，会议的有关文件还提出，在北方方言区也应该推广普通话。推广普通话还应该注意词汇和语法的规范。

为了配合新时期的这一首要工作任务，合理地制定规划和有关政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应该先摸清全国各地区的语言生活状况。80年代以来，关于语言生活、语言规范的现状的调查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1994年陈章太发表了《语言生活调查刍议》，1995年李如龙发表了《提倡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从80年代到90年代，李如龙等调查了福建境内的双方言现象（李如龙等，1995）。黑龙江大学吕冀平、戴昭铭等承担了“当前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的研究课题，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语言生活作了调查，后来出版了同名著作(吕冀平等编，1999)。洛阳工学院则调查了新兴工业城市洛阳的语言生活。姚佑椿及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调查了“沪味普通话”和浦东地区语言生活状况。陈松岑调查了绍兴市普通话使用情况（陈章太，1998）。关于当代方言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的状况，李如龙曾归纳为4种类型：活跃型，如粤方言，在社会生活中仍有全方位的运用，在港澳地区还有书面语、通俗读物。并用型，即普通话与方言并用的“双轨”制，对内使用方言，对外使用共同语，闽南话地区（包括台湾省）最为典型。融合型，即方言接受大量普通话的词汇、句式乃至语音特点，逐渐放弃方言特色，湘赣方言则是此类典型。萎缩型，即普通话普及后并逐渐扩大使用领域，有的连家庭生活中也习惯于使用普通话，方言的使用范围收缩后，青少年都感到陌生了，闽北方言区是这种类型的代表。

最近一两年间，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可以期待，这一大规模的调查完成之后，制定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将获得更加可靠的依据。

2. 对语言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的理论的新思考

随着人们对现实的语言生活有了更多的理解，学者们对于现行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进行了深入一步的研究，对于一百年来的语文现代化运动也从更高的视角作出新的历史的评价。

1994年10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宣告成立，全国各地的学者对新时期的语文工作及历史上走过的道路做了大量的研究。周有光在语文现代化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的论文（1995）中提出：“语文生活的前进动力来自三个方面：1. 群众的语文运动；2. 学者的语文研究；3. 政府的语文政策。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语文运动就没有活力，没有语文研究就没有提高，没有语文政策就难以推行。”应该说，最近的十多年来，许多学者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有许多崭新的理论思考很值得作一番介绍。

对于一百年来的语文运动，许长安（1995）作了一个宏观的概括：“推广共同语是口语的现代化，实行白话文是书面语的现代化，推行简化汉字是汉字形体的现代化，创制拼音字母是汉字标音的现代化。前二者是语言的现代化，后二者是文字的现代化，四个方面合起来就是语文的现代化。”

关于语言的规范化、现代化，戴昭铭（1998）提出：“语文演变本身有一种由俗变雅和从

雅到俗的‘二律背反’的方面，这是语言内部雅俗两种力量的对比斗争和人们在语言运用中求雅求俗两种审美需要所致。”（97 页）

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推广普通话工作，李如龙（1986）在总结福建省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既肯定了已有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政治动员多、业务指导少，一般号召多、具体措施少，宣传发动多、检查督促少。”并且提出：“在普及的基础上，必须提出要求，创造条件，逐步提高。只有提高，才能巩固普及的成果，指导普及的方向，促进普及的发展。”“要从普及向提高发展，推广普通话就必须和汉语规范化、语言美教育结合起来”。

关于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在总结了历次学术界的有关讨论后，于根元（1996）罗列了“学术上的 18 种重要新见解”，其中包括：“规范就是服务”的理念，“要为不同层次的人们服务，要为人们长期的、短期的、简单的、复杂的多种需要服务，要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服务”。应该“多角度地分析规范”，“不同风格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要“从规范评议失误中学习”。概括地说，这是一种有更多柔性和弹性的规范观。

关于方言地区的普通话和方言并用的双语现象，李如龙（1995）在介绍了闽南方言地区的双轨制语言生活的历史和现状后，对这种语言生活作了如下的评价：“这里既可以与海内外华人用普通话自由交谈，又便于闽南‘老乡’用家乡话，恳叙乡情；既有适应现代化需要的规范化语文工具，又有丰富多彩的使人沉浸于乡土之情的文艺欣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最好要便捷；语言又是文化表达的工具，最好又应该多彩。共同语和方言并用，便兼有了这种便捷和多彩，对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是大有好处的。”以往只是说“推普并不是要消灭方言”，但对这种双轨制并没有正面的肯定，现在这种认识已经被许多学者所认可。

3. 为制定规范标准提供依据

制定各方面的规范标准无疑地是语言规范化的重要工作。在这方面，方言学工作者也应该承担一些任务。但是目前关注这一工作任务的还不多，研究成果也有限。这里提出的课题希望能引起行内学者的关注。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全国各地乃至国内外的交流越来越多，语言的变异也随着加剧。这其中，新词新语的产生是最突出的表现，语音方面和语法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变异。

随着共同语在各方言区的不断普及和书面语对方言口语影响的不断加剧，共同语和方言在双语并用的过程中相互间的影响、渗透势必成为现代汉语变异的重要动因。东南沿海作为改革的前沿，港、澳、台商人到大陆办厂，特区经济的腾飞，境外文化从这些窗口传入，无形中提升了粤闽方言的活跃度，有些方言词逐渐进入了普通话，共同语里的一些新词语也是从方言区先引进、先创造的。有的学者提出，与“普通话南下”的主流并存的还有“粤语北上”的支流，有的学者则惊呼普通话正经受着方言词语的“污染”。对于这些现象无疑地也应该进行具体的考察，跟踪其进退浮沉，总结其中的规律，权衡其利弊，认定其中的积极因素，为审音、编制规范词典和探索语法原则，提供翔实的依据。

四、为其他相关学科服务

1. 为地名学服务

凡是人迹所到之处就有地名，数量庞大的地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地名所指称的对象看，有地理环境系统，人文聚落系统，行政区划系统；从地名的语言形式分，有语词结构系统（原生地名、相关地名……），语源系统（本族语地名、外族语地名、方言地名），语用系统（标准地名、民间地名、历史地名……）；从命名法分类则有描述性地名、记叙性地名、寓托性地名。这些系统的形成和演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地名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地名是地表方位和地理实体的名称，又是地图的注记，研究地名学必须具备地理学知识。地名又是历史上形成并经历过长期的演变，没有历史学的知识，地名研究是寸步难行的。地名又是语言里的专有名词，应该是语言学里的专名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地名学应该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

地名学研究需要语言学和方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表现在许多方面，详细的应用可参考李如龙（1998）所著《汉语地名学论稿》。这里择要介绍几点，所举材料多采自该书。

（1）地名的调查和考证

地名的研究必须从调查开始。有许多古来就有的聚落的名称都经历过很长的历史，都是用古代方言命名的，几经变迁之后，读音变了，含义失传了，字形也有种种的写法。地名的形音义调查和考证往往要联系当地方言以及早期在那里住过的民族的语言，才能得到准确的结论。

例如闽语区常有俗名雅化的现象，本地音说的“小名”和文字上写的“大名”不同。长乐县的首占，按字读为 siu^{44} $tsieŋ^{213}$，本地音说 $tsiu^{44}$ $taiŋ^{213}$，实际含义为“酒店”。厦门的集美按字读为 $tsip^{21}$ bi^{53}，本地音 $tsin^{21}$ $bə^{53}$，义为“尽尾”（末尾，那里是大陆的终点）。龙海有两个长福乡，读音 $tiɔŋ^{22}$ $hɔk^{32}$，说话音 $tŋ^{21}$ pak^{32}，义为“塘北”。如不调查实际音读，从而了解其本来含义就不能弄清其命名的因由。

广东的番禺，番音潘 phun；厦门东沿的何厝乡，何音 ua；华北各地张各庄、赵哥庄、李戈庄，各、哥、戈都是“家”的古读；客家地区的“坊”音 pioŋ，也是地名中的古音。这些旧读说明了地名命名的年代，也记录了方音演变走过的历程。

闽粤琼等省都有带“拿”字的地名，在雷州半岛一带最为集中。na^2是壮侗语的“水田”，那里的原住民是壮侗语族的先民，这是最有力的证明。与此同类的现象，塔格来自维吾尔语 tag（山），浩特来自蒙语的 hot（城），藏布来自藏语的 zaŋbo（江），松花江译自满语的 sunggriula（天河）。这是地名中的不同民族语语源，此类考证不但使地名的音义有确切的解释，也为民族史提供重要的佐证。

有时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方言区读音不同，含义也不同；有时是本来不同的音义在不同地方写成同样的字；有的是同样的词写成不同的字。如果不经考证就不能看清真面目。例如：

塘，在闽粤湘赣等方言区指的是池塘。向塘、塘下、上塘、李家塘之类地名很常见。在吴语区，塘指的是挡水的堤。清人范寅的《越谚》说：“塘，捍海堤防也。越都南山北海东西皆

江，潮咸不粒，筑土卫之，潴淡水隔咸水以保良田庐舍。非如别县田中储水曰塘也。”从长江口到钱江口，这类带塘字地名甚多。

澳，在闽台浙粤沿海，带“澳”字的地名甚多。在闽南有时简写为沃，在浙南则写为岙。这类地名大多分布在小海湾处，闽方言里还把大海湾说“大澳”，小海湾称“澳仔”。《说文》卷 11 云：“澳，隈涯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隈。”又“隈，水曲澳也”。原意正是海湾。

墟，南方各省都有农村的定日集市。有的地方写为“圩”，在北方官话称为“集”，西南官话称为“场”。柳宗元被贬南方后所作《童区寄传》已有“去逾四十里之墟所卖之”的说法，旧注称“南越中谓野市曰虚”。清代番禺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说：“越谓野市曰虚。市之所在，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故曰虚也。……昔者圣人日中为市，聚则盈，散则虚。今北名集，从聚也，南名虚，从散也。”可谓所言极是。

各方言都是“房子”和“家”合称一词。在按姓氏聚居的村落，北方方言说“张各庄、刘各庄”，各，即家也；湘赣方言区说“李家坊、朱家坊”；客家地区称“李屋、张屋”；闽语区称“李厝，张厝”。这是因方言词不同而异的地名。

(2) 地名的命名之由的分析

除了最早的地名是由子音义偶然组合的之外，大多数地名都有命名的因由。记录了地名在当地的读音之后还要联系该地的自然环境及历史情况，弄清命名的依据和实际含义。命名法的研究是地名学的特有课题，应该联系语言学、方言学和地理、历史的状况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地名的命名法大概可以分为描述性、记叙性和寓托性三大类。描述性地名有表示地理位置的，如淮阴在淮河之南，十里铺、三里河是表距离的；有表示墟日的，如羊场、狗街是按十二生肖所表示的墟日命名的；有表示自然景观或说明自然资源的，如九曲溪、三叉街、白沙、赤石、冷水滩、白云山，松洋、松源、铜陵、铁岭等。记叙性地名或记叙文化景观，如灯市口、碗窑、烟墩、石陂、新墟、龙王庙；或记叙民族、姓氏或历史人物，如瑶岭、黎母山表明该地原住民的族属，韩江、韩山是潮州人纪念韩愈所名，中山路、成功村、祥谦乡是崇敬历史名人的地名，苏家坡、黄庄是早期聚居的族性的记录。寓托性地名或体现一定观念，如永定河、孝义县、和平街、光明村；或寄托某种意愿，如福建省的县市名带有“福、泰、安、宁、和、平、清、明”等字的占近半数。从地名的命名之由有时可以追寻到重要的历史线索，河南登封县有“五城岗”，1977 年在那里发掘过夏代文物；福建武夷山下有城村，村口有石坊刻名“古粤”，后来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古闽越人的军事城堡。

理解地名的命名意义最忌“望文生义”。河北遵化金山峪沟确实开采过金矿，广东韶关金鸡岭则是因山顶有石如雄鸡而命名，闽南的金门、金井大概只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吧！

(3) 地名的类型区和民族语言区及方言区可以互相论证

把成千上万的地名从各方面进行类聚分析，便可以得到各种地名景观。各种地名景观中有自然的地理景观，沙漠、高原、滨海、丘陵地带各有不同的通名系列。有人文历史的景观，北京、西安等古城和深圳特区有截然不同的地名系列。也有不同的语言景观，由特定的语言或方言的通名或专名类聚起来的区域和民族语、方言的分布往往是叠合的。例如：

民族语景观：广西《龙川县地名集》中霞美公社的地名共有 116 条，其中含有壮语通名的地名就有 70 处，占 60%以上：

通名	壮义	地名数	举例
那	水田	15	～念、～灶、～镇、～兴
弄	山间小平地	16	板～、～平、～埠、～龙
岜	石头山	13	～内、～海、～那、～崇
陇	山沟	14	～竿、大～、～谷、水～
板	村庄	12	～弄、～旁、～门、～崖

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录》全区带有“查干”（蒙古语音为 Qagan 意为白色）二字的地名就有 204 处，其中还有不少是同名的：查干敖包 19 处，查干诺尔 23 处，查干陶勒盖 17 处。另据 197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辽宁省有查干乌苏、吉林省有查干泡、查干花，甘肃省有查干春子井、宁夏自治区有查干德勒斯、查干池。这说明那一带的原住民都是蒙古族的先民。

方言词景观：在表现地形地貌的通名方面，晋语及西北方言区在黄土高坡上有“峪塬、峁、梁、崮、圪垯、墕、嵝险，圐圙（库伦）”，等等；吴语区在长江三角洲有“浜、泾、溇、堰、圩、埭、浦、港”，等等；东南丘陵地带则有闽语的“垵、埗、埕、岕、隔、坂”和客方言的“崃、嶂、岃、塅、坳”以及通行于多个方言区的“坪、坑、墩、垅、墟、坡”等等；在珠江三角洲有粤方言的“涌（音冲）、滘（漖）、氹、槩、围”等。

在聚落的通名方面，官话区有“庄、屯、集、胡同、铺、堡、圪塄”，吴语区有“弄、垟、畈、廊、汇、港、庙”，客赣方言区有“家、屋、寮、塅、寨、漈”；闽方言区的“宅、社、厝、埔、廍、圳、屿、园、岺”都带有一定方言色彩，有一定分布地域。

构成地名的还有常用的方位词。吴方言以“浪”为“上”（潭～、埂～），闽方言以“墘、兜”为“旁”（田～、溪～），客方言以“背”为“面”（上～、寨～），赣方言的冢（底）等等，也都很有特色。

2. 为民俗学和地方文艺研究服务

民间习俗，不论是物质方面的饮食、服饰、生产、交换等习惯或是精神方面的信仰、宗教、伦理、礼仪、文艺、体育等风俗，都无不与方言结下不解之缘。各种观念、仪式、活动及所用器具，总要用方言词来称说。可以说，方言就是第一民俗。在一个方言区里生长的人，学会了这种方言便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一整套的文化观念和行为规范，适应了一整套的民俗活动。难怪中国人开始调查方言就是 1918 年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发动的。沈兼士（1923）当年曾说过：“歌谣是一种方言文学，歌谣里的词语多少都是带有地域性的。倘使研究歌谣而忽略了方言，歌谣中的意思、情趣、音调至少会有一部分的损失。所以研究方言可以说是研究歌谣的第一步基础工夫。”游汝杰（1993）说：“语言和民俗都是人类的文化行为。……也有人把方言纳入民俗范畴，中国的地方志往往把方言列在风俗卷之中。方言和民俗都是地方文化，视为同类未始不可。”（147 页）

方言的谚语是地方文化中的道德信条。儿歌是培育下一代的口头教科书。故事是寄托人们的是非观念的劝人行善的形象说教。民歌则是可供传情和娱乐的心灵交流。引用谚语，念儿歌，讲故事，唱山歌，既是民俗活动，又是方言的言语活动。要研究这些浓缩着地域文化的作品，没有方言的研究是无从着手的。明末冯梦龙辑《山歌》十卷，只有研究语音才能理解其押韵和节律；只有研

究词汇和语法才能透彻了解其内容。书中共有1 000多个句子，350 个方言词汇，有些在现今的苏州话已经不通行，但见于温州话。这就还需要作方言间的比较，了解方言的历史演变。在客家地区，山歌的种类繁多，故有“九腔十八调”之称，根据内容、唱法及歌唱者的不同又分老山歌、山歌子、平板、杂歌、虚玄歌、逞歌、古怪歌、数字歌、五句板（竹板歌）、教化歌、病子歌、撑船歌、送郎歌、五更歌等等（参阅谢栋元，1994）。只有深入研究方言才能彻底了解这些歌谣的内容和形式。

儿歌、谚语的研究也离不开方言的研究。“卖什么吆喝什么”已经进入共同语，有如“在商言商”的意思。这谚语起源于北京的叫卖语言，使人联想起京城胡同里终日不断的各种长短不一、快慢有序、音调各异的叫卖声。又如北京俗谚，“一辈子当官，十辈子打砖”，这是民国初年对那些失却皇粮的遗少们的讥讽。那些人一无所能，也一无所有，只好流落街头混人丐帮，以砖撞击裸胸以乞得一点食物。不知道“打砖”的意思，就无法理解这一谚语了。

各地方言都有些禁忌语、委婉语、行业秘密语，还有用方言进行巫术、迷信活动的民俗现象。许多方言都有“反切语”，即利用反切原理把一个音变成两个音节，以便在一定范围内秘密交谈。赵元任（1930）对此早有研究，后来陆续有人报道。局部行业的秘密语也有所发现，如晋语理发行业的行话有侯精一（1988）的研究报告。其他在方言区普遍流行的委婉语、忌讳语最近几年也有大量的报告（曲彦斌，1996）。

绝大多数方言区都有自己的戏曲、说唱、清唱等地方文艺形式，有的方言还不止一种。这些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的艺术化加工为基础的。有的戏曲历史长、流传广、艺术水平高；有的历史短却贴近生活，生动活泼。在语言上，不论是道白、唱腔都有历史的继承，也有现实口语的基础，更有戏曲说唱自身的特点。方言语音和音乐节拍及旋律的配合大多是和谐统一的，但又各具特色。像京剧、越剧、黄梅戏，这些影响大的剧种，相声、评书、快书、鼓词等说唱文学，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戏剧戏曲学的角度开展的，语言学家介人的还不太多。关子苏州评弹、泉州南音、粤曲清唱则主要从音乐学的角度切人，与吴、闽、粤三大方言的音韵、用词的关系，也缺乏应有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应该说还有广阔的天地可供驰骋，还有许多崭新的课题等待开发，还有大量文化珍宝需要发掘。不能不令人遗憾的是，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民俗、歌谣的研究虽是汉语方言研究的发端，而在汉语方言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之后却未能回过头来为民俗、歌谣等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方言学的应用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在这方面似乎还是过于冷漠。在现代社会里，电视、VCD、卡拉 OK、流行歌曲等群众文化迅猛发展，传统的地方戏、曲艺等却逐渐在萎缩。然则，这些根植于中华文化、地域文化的艺术奇葩是永远不会消亡，这是可以肯定的。李如龙（1997）说过：“有远见的地方领导对于编写方言志，搜集民间谚语、歌谣和故事十分重视，对子整理研究民间音乐、地方戏曲、曲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地方文化活动予以大力支持，这是值得肯定的。人不能总在生意场上奔走，在酒楼舞厅里作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总要有古往今来的思索，总要有慢条斯理的休闲，总要有优雅艺术的欣赏和追求。地方文化中那些给人美的享受、善的教育的东西，一定会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如果语言、文学、艺术工作者能联手进行更加有效的研究，应该是可以为保存和发扬这些民族文化遗产作出自己的贡献的。

3. 为语言识别服务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侦查部门在案件的分析过程中，由于对作案人的书面语中出现的某些方言土语不解其义，便向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讨教。案件破获后，作案人即抓获于原所分析判定的地区，证实了语言识别的作用。此后，公安机关便总是要对案件中的方言问题以及其他语言现象，进行一番探讨研究。这样，语言学逐渐被运用到侦查破案上来，案件语言识别则成为公安业务中的一项新技术。”（邱大任，1985）

三十多年来，一些方言学者参与了语言识别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些公安干部也努力学习方言学，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有些专科院校开设了相关的课程，语言识别初步建立了一套工作方式。

语言识别是透过案件中的语言文字的分析去识别作案人的籍贯（所属方言区）、年龄、职业、文化程度、性别等特征，为侦查破案提供方向和依据。例如分析文中的繁简字、古今字、异体字可以推测作者的年龄（受启蒙教育的年代），经过分析文中遣词造句的特点（变异），可以了解作者的文化程度、年龄、职业和性别。而如能从录音或文字材料中发现其方言特点，则可对作案人的方言母语、普通话掌握情况提供准确的描绘，这对侦查工作肯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听口音，分辨案犯的方言母语，推断其籍贯和经历（何方言区出生，在何地住过，学习普通话的效果如何等等）是直接的语言识别，有经验的办案人员并不难进行分析。转化为书面语的表达就经过了一些转折，但是也留下更多可供考察的线索。以下谈谈对书面语的方言分析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1）方言同音别字　作案者如果文化程度不高，常常写方音相同的别字，把这些别字的特点综合起来就不难推断其方言母语。以下常见的表现方音特点的别字大多是从已经破案的案例中摘下的：

尖团不分：互相勾接（结）　（北京）
丰收井（景）象　（长春）
即（既）然如此　（成都）
赫鲁小（晓）夫　（北京）

泥、来、日、疑不分：勃列（涅）尔（日）列（涅）夫　（武汉）
兰（难）找寻　（长沙）
有年（严）重问题　（南昌）
当言（然）比局中人更明白　（大连）

平翘舌不分：牢稍（骚）满腹　（长沙）
在纸（紫）禁城内　（哈尔滨）
你去找虽（谁）说　（清远）

前后鼻音不分：红（昏）头转向　（张家口）
严重禁（警）告　（南京）
焕然一兴（新）　（太原）
你们不是要保护人名（民）吗　（福州）

开合口不分：不够（过）如此罢了　（泉州）
纸条撕乱（烂）擦屁股了　（张家口）
情况已经好展（转）　（上海）
札（做）威札（做）福　（常熟）
阴阳去不分：他们再（在）许多问题上撒谎　（北京）
代（带）来什么改革　（重庆）
不向（像）过去那样　（南京）
都被到（盗）用去了　（张家口）
舒促不分：都很损人立（利）己　（沈阳）
大家都个（各）搞个（各）的　（北京）
收护（获）很大　（烟台）
茶余酒后谤（唠）起家常课（嗑）来　（胶东）

有些语音特点通行的面很窄，发现这类材料很能缩小侦查范围。例如“就业”误为“求业”，“弹子”写成“台子”，这是江浙人；“恩赐”误为“恩自”，“赊账”写成“社账”是客家人。在福建省内，“虽然”误为“吹然”，“合同”写为“合统”反映的是福州腔的普通话；“少数”写为“早数、少助”只见于仙游话；“形式”误为“形色”，“造反派”误为“造反沛”，通常只见于闽南。而闽南话之中，如果“专心”写作“全心”，“同事”写为“同士”就可以排除泉州地区了，因为那里阳上阳去有别，阴阳平作前字的变调不混。

（2）方言字　不少方言区都通行着一些书写方言词的俗字，案件文书中此类字常常成为重要线索。例如：

闽东方言地区：榠（树）　饣卜（饭）　鲄（小鱼干）　硋（陶瓷）　缊（网）　乇（东西）　粡（瓷巴）　鲔（鱼卤）　绨（苎麻）　箓（篮）

粤方言地区：唔（不）　嘢（东西）　掂（完善）　埗（码头）　嘅（的）　冚（收拢）　笠（罩）　噉（这样）　企（站立）　枧（肥皂）

吴方言地区：伽（他们）　搿（这）　侪（都）　辣（在，介词）　勒（了）　哦（吗）　拨（给）　筷（篮）　塌（既肥）　铟（钱）

有些俗字在不同方言区字形相同、音义各异，必须加以分辨。例如“冇”在闽语区读p'aŋ，义为空虚；在粤语区音mou，义为没有。也有些俗字（地方简体字）在不同地方写法不同，可能与读音有关。例如楼写为“杦”，或写为“柚”，“家”写成“宩”或“宀，宊”，这也必须仔细辨认。

（3）方言词

有许多匿名信里常用的词在各地方言有明显差异，这是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鉴别材料。例如：否定词北方话说“不”，吴方言说“勿”，闽粤客方言说“唔”（或写为“怀”）。时间词，“现在”，北京说“现下、时下、眼下”，“目下”南北方都说，“而家、家下”是粤方言，“现刻、现时”是闽方言。计日量词官话区说“天”，东南方言说“日”，闽客粤方言也有说“工”的。连词“和”南北通用，“跟”主要通行于北方，“同”南方更多用，若用“共”是闽东话，用“佮、甲”是闽南话。疑问词华北、云南说“什么”，东北、西北、河南和吴语区说“啥”，四川说“啥子”，粤语说“乜”，如果说“孰人、孰事”则是范围很小的闽北人。

有些方言词很具特色，在外区又很少见，在方言区用惯了，许多人都套用于普通话。夹用这类方言词便很具特征意义。如“铁锅”说“鼎”，“信”说“批”，“萝卜”说“菜头”，“房子”说“厝”，这是闽方言；“晨早”（早晨），“影像”（照相），“畀面”（赏脸），“细佬”（弟弟，小孩），“樽”（瓶子），恤衫（衬衣），菲林（胶卷），揾工（找工作）则是粤方言。吴方言带“头”的词尾多，例如鼻头（鼻子）、筷头（筷子）、灶头（灶）、花头（花招）、班头（上班的班次）、夜头（晚上）、小鬼头（小鬼）。

以下方言词都是从福建省的闽方言区的案件中摘下的：

闽东方言：竹竿（竹竿）　攀讲（闲谈）　势况（形势、情况）　依家（叔父）　百七五（175）　下八洞（社会地位不高的老粗）　尾尾排（末了一排）　天它六套（天花乱坠）　无成分（没指望）　有单位（在职）

闽南方言：祖公（祖宗）　发愿（许愿）　身命（身子骨儿）　瘦骨（瘦小）　批信（信件）　小婶（弟媳）　头路（职业）　亲堂（堂亲）　后生家（年轻人）　致重（重要）　失德（缺德）　一块歌（一首歌）

（4）方言语法

方言语法常常影响普通话的表达，可能是因为这种差异比较“隐蔽”，不像读错音、用错词那样容易引起人们注意。本书有关章节所述的方言句式在作案材料中屡有所见。以下所列的例句是闽语区见到的：

闽东：他钱寄二百元给我（他寄了二百元给我）
澡洗一个睡觉（洗个澡睡觉去）
钱用去一半了（钱用了一半了）

闽北：天太晚了，不敢去（天太晚了，别去）
房子要修理理（房子要修理修理）
这次他拿不来吃（这一次他办不到）

闽南：对头来，走旁边（从头来，靠边走）
给他抓起来（把他抓起来）
你有看见没有（你看见了没有？）
大约五十左右斤（大约五十斤左右）
那些钱寄没有到（那些钱没寄到）

邱大任（1985）列举了一些常用词的不同组合关系有南北差异，在介绍方言语法的书和文章中很少见到。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很有启发性：

来和去的说法不同。北方话的表达从说话人出发，南方话的表达从听话人出发：

我去广州接你去（北京）
过几天给你邮去（天津）
上次给你去了一信，不知收到没？（天津）
请问我去信是否能收到？（四平）
我按时到广州车站来接你（广州）
我们到你家来坐（厦门）
很久没有给你来信了（福州）

我们这次来信是为了……（广州）

上和下在北方方言不但用作趋向补语，也可用作结果补语，后一种说法是南方方言没有的：

现在也当上了工人（沈阳）

与你取上联系（新乡）

过上豪华生活（哈尔滨）

三十几岁的壮年找不上对象（北京）

现我小儿子已经找下对象（包头）

如果能派下几个人来（北京）

菊英又生下一个男孩（天津）

不知道能不能请下假来（沧州）

方言学真是一个服务性行业，应该说，它在各方面的应用目前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例如，有些方言词可能保存了地方史的某个事实；各种称谓、小名、偏名、绰号，体现了某些特定的习俗。有些谚语是从地方戏曲的戏文中来的，地方戏失传了，谚语还存在，这就成了研究戏曲史的重要资料。某些外来语的更替可以作为舶来品或外来概念传入的年代的佐证。更多的应用研究领域还有待今后的实践来开拓。

思考与练习

一、你能否从自己的社会生活中感受到方言学必须加强应用研究？

二、你学过的语文课对你学习标准语帮助大不大？哪位老师对你有过很大帮助，为什么？哪位老师没给你留下印象，为什么？

三、你的家乡推广普通话的情况如何？请利用假期回家做一次社会调查，总结成功的经验，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进一步努力的建议。

四、查阅你所熟悉的地区的地图，看其中的地名用你的方言说出来有什么特点，其通名的系列有什么特点，常见的通名的音义你是否都能理解？

五、你所熟悉的方言区有什么地方戏或民歌、童谣？请搜集一些样品加以注音并为其中的方言词释义。

参考文献

李　荣（1957）　汉语方言调查手册　科学出版社

S. 皮特·科德（1983）　应用语言学导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据 1979 年原版译）

李如龙（1997）　语文教学和方言调查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 期

李如龙（1998）　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　湖南师大出版社

李如龙（1982）　论汉语方言词汇差异　《语文研究》第 2 期

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秘书处编（1987）　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语文出版社

陈章太（1994）　语言生活调查刍议　《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

李如龙（1995）　提倡方言地区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 9 期

李如龙等（1995）　福建双方言研究　香港汉学出版社

吕冀平（1999）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　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章太（1998）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周有光（1995）　信息化时代的中国语文现代化　《语文现代化论丛》　山东教育出版社
许长安（1995）　语文现代化的宏观考察　《语文现代化论丛》　山东教育出版社
戴昭铭（1998）　规范语言学探索　上海三联书店
李如龙（1986）　在方言复杂地区加速推广普通话　《语文建设》第6期
于根元（1996）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　书海出版社
李如龙（1995）　闽南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　《语文研究》第2期
李如龙（1998）　汉语地名学论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沈兼士（1923）　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　《歌谣》增刊
游汝杰（1993）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
谢栋元（1994）　客家话北方话对照辞典　辽宁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30）　反切语八种　《史语所集刊》二本二分
侯精一（1988）　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的研究报告　《中国语文》第2期
曲彦斌主编（1996）　中国民俗语言学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如龙（1997）　福建方言　福建人民出版社
邱大任（1985）　语言识别　群众出版社

后 记

20 世纪 80 年代里，在汉语方言学的领域耕耘多年的几个老朋友先后都带了研究生，由我提议，大家合编了《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作讲义。经过几年的周折，这本书作为大学文科教材于 1991 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有了它，开方言调查课就方便多了。然而不久就感到，要引导学生上路研究方言，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够用，尤其是带博士生时，总还得讲一些课，又感到缺乏合适的教材。1997 年，教育部高教司制订“九五”期间高校重点教材计划时，我申报了编写《汉语方言学》的项目，很快就批下来了，我也便动手把好些年来的各种讲稿作一番整理，断断续续写了一些章节。

不久，我就感到这本书不容易写好。因为近几年来正赶上汉语方言学的大丰收时期，反映方言事实的大型著作、大规模的调查报告一部部出版了，一些体现新观点、新方法的论著以及总结一个世纪的成就和经验的论文也先后涌现。现在编的教材对这些新成果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然而要了解它、评判它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只好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广泛涉猎这些新成果，从中吸取营养来充实和调整自己的理论思考，尽量做到既不脱离现实，也避免把自己的特点磨光，努力走近学科的前沿。经历了三个寒暑，已经到了世纪之交，再作进一步的推敲，还有许多事可做，现在煞车交卷也算是个时候。到了新的世纪，应该有更好的教材来代替它。当老师的就怕成了“教书匠”，拿自己的手艺当标准，只知道要徒弟们一锯一刨地模仿、一成不变地传承。我想老师应该是一名“渡伯”，教材只是一艘“渡船”，在学科的江河湖海里，渡伯用渡船把乘客从一个码头送到另一个码头，就算完成任务了，再给他们指个路向，自然更好。一部教材很难成为人们终生受用的指南针，也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学术的道路上必定会不断地出现新的障碍、新的领域，一代代的新人都必须自己去排除障碍，自己去探索、去开拓新领域。事实上每一代人在学术的道路上都总要比他们的老师走得更高、更远。若干年后，一部教材能引出另一部更好的新教材来，这是每一个编教材的人都应该感到欣慰的。

本书的内容都曾给博士生们讲过，有的同学参照我的观点写博士论文，搜集了不少新材料，把有关的问题分析得更加细致，使我得到了教学相长的收获。八、九两章是听过课、获得了博士学位的钱奠香同志写了初稿，由我修改而成的。有些章节的内容我在近年间曾写成单篇文章发表过，一些熟悉的年轻朋友也跟我讨论过，不论是赞成的或者是反对的，他们的意见于我都是有益的。1997 年我拟好全书提纲后曾经请教过了邦新、王福堂两位教授，他们都给了我热情的鼓舞和宝贵的建议。完稿之后又请他们审阅全文，在百忙之中他们也帮我看过了，并提了宝贵意见，丁先生还赐给了多所鼓励的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热情地接受本书的出版任

务，何毓玲编审则把责编的工作做得又细致又及时。所有的这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我都会永远地记住他们、感谢他们的。

李如龙
于厦门大学白城寓所
2000 年 12 月 5 日